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

牛军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寻求真相

作者收集并利用大量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解密的第一手历史档案，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案例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冷战背景下中国制定外交战略和处理中美苏关系、应对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决策机制、指导思想及其长远影响，对认识和总结中国外交决策的历史经验有重要的价值。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

牛军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 / 牛军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2.10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ISBN 978-7-5108-1709-0

Ⅰ. ①冷… Ⅱ. ①牛… Ⅲ.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文集 Ⅳ. ①D8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315号

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

作　　者	牛　军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9
字　　数	50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709-0
定　　价	68.00 元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出版说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当下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主导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当前一系列国际纠纷和冲突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学界掀起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与此同时，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也在兴起。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日益涌现，国际和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接连举办，从而使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成为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镇。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我们请中国冷战国际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主编了这套《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丛书。丛书邀请该领域海内外优秀的华人学者，把自己多年来的代表性论文，编选成册，以期从各个方面反映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成果。

九州出版社

代序：冷战国际史研究：世界与中国[*]

沈志华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学术成果之多、之新，学术活动之广泛、之频繁，令其他研究领域望尘莫及，以至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以新的概念，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著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交流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①] 所谓“国际史”，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冷战结束后二十年来，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确为历史学发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因此，中国《历史研究》杂志前主编徐思彦提出的看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②] ——毫不为过。在笔者看来，可以进一步指出，冷战国际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

冷战国际史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前沿性、跨学

---

* 本文是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为2010年10月16—17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年会论文。

① 人们也曾使用过“新冷战史”这一概念。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盖迪斯把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重新考察和评估冷战历史的现象称为“The New Cold War History”，见 John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 282。

② 徐思彦：《冷战史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10日。

科研究领域，当前在世界主要国家已成为发挥重要影响的学术潮流，并受到很多国家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视。本文打算从学术特征、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谈谈冷战国际史的研究状况及其在中国的表现。[①]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把冷战国际史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是因为在学者队伍、研究方法、活动方式等方面，它确有一些引起人们注意的学术特征。这些具有全球化时代学术代表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的国际学者队伍

与其他学科不同，冷战史研究者们没有组建一个世界性、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研究会，而是建立起一个个的研究中心或研究群。这些机构和群体的建立，或者以各自的学校为依托，或者以不断设立的研究项目为基础，但无论是常设机构，还是临时组合，他们都异常活跃，并经常按照不同的课题相互结合，交换文献资料，沟通研究信息，召开各种研讨会、书评会、讲演会等。各中心（研究组）几乎都设立了自己的英文网站，用以发布档案文献、研究信息、学术论文等。网络和会议是世界各地冷战史研究者沟通和联系的主要渠道。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设的冷战国际史项目，是美国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项目通过出版刊物和组织各种国际会议，大量收集、整理、翻译并公布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文献，还接受各国访问学者和学生，为他们提供收集资料、开阔视野、参与讨论的机会。目前，该项目的工作重心已经从莫斯科转向北京，并已同中国外交部签订几个有关公布或出版中国档案的协议。

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是另一

① 主要参考资料：Odd Westad（ed），*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2000；Wilfried Loth，“General Views on the Cold War”，*Cold War History*, Vol 3，No 2，January 2003，pp 157–165；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140—150 页；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批判》，《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3—22 页；*Зубок В М, Печатнов В 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3，№ 4，5；翟强：《西方冷战史研究近况》，2008 年 4 月 29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演讲；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в ИВИ РАН “Феноме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XX века：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6，№ 6，с 73–100。

个引起世人注意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档案馆致力解密美国政府涉及安全问题的档案，同时也收藏了大批俄国、东欧、拉美及其他地区的档案，其中很多文件已经电子化，供研究人员免费订阅下载。此外，档案馆还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档案馆就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程序问题提供咨询，并成为这些文件的收藏中心。自 2001 年以来，该档案馆定期在俄国举办冷战史研究暑期培训班，每年设立不同的专题。

伦敦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是英国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中心重点进行冷战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研究，出版的学术刊物（Cold War History）注重刊登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研究新解释和新研究的论文，还编辑冷战研究系列丛书。中心创造跨学科的研究条件，研究人员有机会与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世界范围的机构就教学和研究问题合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该中心建立了研究生交流项目。

以位于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是欧洲最著名的冷战史研究中心，主要从军事史的角度研究冷战，其联系和活动范围甚广。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冷战研究中心则重点研究欧洲的冷战及意大利对外关系。

在美国还有许多以大学为依托设立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这些中心都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冷战史课程，并举办公共讲座和研讨会、接受访问学者等。俄国历史学家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冷战史研究，1995 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冷战史研究中心，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斯拉夫研究所，还有一些大学，都有学者参与其中。中东欧各国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其中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它们分别设在匈牙利科学院 1956 年匈牙利革命历史研究所和保加利亚军事史协会之下，研究内容集中在冷战时期有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问题上。在亚洲，日本的冷战研究群主要是以申请研究项目为基础建立的，比较活跃的有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通过在日本文部省申请研究项目的方式，重点从事东亚冷战史研究。韩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冷战史研究机构，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他们经常以朝鲜战争研究为题，与各国学者进行讨论。庆南大学极东研究所、北韩大学院大学也有一批较为固定的学者参与国际学界有关朝鲜半岛统一和危机等问题的研讨。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

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召开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也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中成立了冷战史研究小组，经常举办读书会。此外，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了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在国际学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身在冷战格局演变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决策两次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在于中国学界的不懈努力。早在 80 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就参与了国际舞台上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讨论。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档案文献的不断披露，各级档案馆的陆续开放，中国学者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其中，重要的突破就在 1996 年 1 月美国 CWIHP 在香港召开"冷战在亚洲"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学者不仅提交了多篇引人注目的论文，而且就国际学界当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 1950 年 10 月 2 日毛泽东关于出兵朝鲜的电报的真伪问题，回答了俄国学者的质疑，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赞同和好评。[①] 以后不久，凡是涉及亚洲和第三世界的冷战史国际会议，都会有许多中国学者受到邀请。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始被大量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他们的看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04 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评估中央情报局（1948—1976 年）对华情报工作时，专门聘请了 4 位中国冷战史学者出席会议，与中情局官员展开了颇具特色的对话。

客观地讲，中国的冷战史研究队伍一开始是学者自身在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笔者那时刚刚从商界返回学术界，感到有两个新事物值得重视：一是俄国档案大规模的解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无限机会；一是冷战史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领域、思路和方式。于是，笔者和一些志同道合者，一方面积极组织收集、整理俄国档案，一方面开始有意识地集合对冷战史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我们差不多每年自费组织一次国内学者的讨论会，不分地区，不论单位，不要会务费，只要论文水平高，使用了新的档案文献，谁都可以参加。每次会议还有一些国外学者参加。几年下来，这支研究队伍便自然形成了。当时的客观条件是，第一，国家对学术研究的投入较少，能够用于基础学科研究的资金更是短缺；第二，从传统的观点看，冷战史是否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还受到质疑，甚至"冷战"一词的出现都令人敏感。所

---

① 该文后来在美国发表，见 Shen zhihua，"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Mao's 2 October 1950 Message to Stalin on Chinese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A Chinese Scholar's Repl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p 237–242。

以，没有民间自发的渠道，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很难起步。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情况大大改观。华东师范大学在陈兼教授的倡议下，在国内首先成立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几年后，学校领导投入大量资金，中心不断引进人才，连续开发项目，招收研究生，开设专业课，还办起了专业杂志和网站，从国外购买了大量档案文献，并加强了国内学者之间以及同国外学者的交流。这时，"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2009年夏，各校冷战史研究者在张家界会议上提出：共建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论坛，共同加强杂志和网站的建设。相信这支队伍将继续活跃在冷战史国际学界的前沿。

2. 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论"，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要说档案开放最规范、档案收集最便利、档案利用最有效的，还是美国。目前，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已经相继解密了冷战时期从杜鲁门到福特各位总统的档案。弗杰尼亚大学米勒中心的总统录音项目则收集了从罗斯福到尼克松六位总统大约5000小时的会议录音和电话录音，其中很多已用文字公布，可以从网站下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还收藏有美国政府前官员的个人档案和访谈记录。特别是乔治城大学设有一个外交口述史项目，收藏有美国许多外交官的访谈录和口述史的录音和文字记录。此外，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发展署的档案馆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档案材料。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会信息服务公司和美国大学出版公司将大批档案制成缩微胶卷，其中包括国务院、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由莱斯公司（LexisNexis）负责全球统一销售。[①] 此外，上述各冷战研究机构的网站，以及一些专业网站——如圣塔·克劳拉大学的冷战电子信息资源网，也

① 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已购买近2000卷缩微胶卷，目前正在整理目录，并将在网站公布。

大都发布各种档案文献。特别是国家安全档案馆为督促政府解密档案所做出的努力，深得各国学者的好评，有关中美缓和的基辛格文件、尼克松文件，就是在他们的催促下得以及时解密的。颇受中国学者关注的蒋介石日记，也收藏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至于学者最常使用的《美国外交文件》（FRUS）系列文献以及新近解密的中央情报局解密文件，目前已经陆续上网，研究者可以自由下载。

英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解密，外交部编辑出版了《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DBPO：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现已出版第一系列 8 卷（1945—1950）；第二系列 4 卷（1950—1960）；第三系列 5 卷（1960 —）。在意大利，备受关注的是保存在葛兰西学院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档案。

俄国在冷战结束初期曾大规模地解密和开放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已经成为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并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①] 不过，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已经开放的档案对于外国学者再度封存，不仅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门禁森严，就是以前开放的外交部和苏共中央档案馆，也令国外研究者望而却步。[②] 当然，政府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俄国档案开放并得到广泛利用的大趋势，目前涉及冷战时期俄国档案的收集和使用主要依靠三个来源。

第一，俄国学者利用近水楼台和内外有别的便利条件，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解密文件。这些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常带有披露者的主观色彩，未必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过，这种缺陷并不否定这些档案文献本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况且其中有许多文件迄今为止尚属唯一的版本。

第二，在俄国档案馆采取收缩政策以后，俄国学者及研究机构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专题性档案集，其中引起冷战史研究者注意的内容有：1945—1954 年苏联的核计划，共产党情报局历次会议记录，苏共二十大与非斯大林化，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宫廷政变”，至 1960 年前克格勃的工作，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活动，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书刊和新闻检查制度，1956 年匈牙利危机，中近东的冲突，还有苏联与美国、德国、奥地利、芬兰、以色列及东欧、非洲的关系等

---

① 关于俄国档案的开放和利用的情况介绍，参见 Mark Kramer, “Archival Research in Moscow: Progress and Pitfalls”, *CWIHP Bulletin*, Issue 3, Fall 1993, pp.18–39；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第 136—149 页；余敏玲：《俄国主要档案馆现状简介》，（台北）《近代中国》，第 140 期（2000 年），第 200—217 页。

② 参见 *Чубарьян А.О.*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6, с.3–22。

等。作为苏共高层决策的档案，出版了1945—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分历史文件，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分会议记录和决议。至于中苏关系，已经出版的三部文件集则公布了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这些文件集对于冷战史专题研究十分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编者的选择未必全面，有些关键性档案还要研究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取。

第三，俄国档案馆开放初期，许多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纷纷赶赴莫斯科收集档案，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机构捷足先登，花重金复制了大量俄国档案，其中专门收集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的主要有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国家安全档案馆。此外，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和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也收藏了大量俄国档案。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档案文献虽然显得分散零乱，查找起来也颇费工夫，但其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自己有选择权，而不会受制于人。

在俄国档案馆收缩的同时，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馆开始陆续对外开放。笔者最近去东欧和中欧七国访问，参观了二十多个档案馆。那里的国家档案馆和外交部档案馆在几年前已全面开放，特别是前共产党的档案，没有解密期限制。这种状况，对于研究者了解冷战时期铁幕另一边的情况，尤其是涉及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及东欧各国与苏联关系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俄国和中国档案管理政策紧缩的不足。目前在冷战国际史研究较多利用的有捷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档案，以及德国档案馆收藏的东德档案。一些国家的冷战史研究机构也收藏和整理了大量专题档案，如匈牙利中欧大学社会档案馆收藏的自由欧洲电台档案，匈牙利冷战研究中心所从事的项目：1945—1991年苏联集团活动年表、1988—1991年共产主义瓦解与冷战结束、匈牙利与东西方关系等。还有很多研究机构与冷战国际史项目或平行历史项目（PHP）合作，在这两个中心的网站或杂志上经过公布他们整理的各国档案，其内容涉及共产党情报局、华沙条约组织、苏南关系、阿南关系、中朝关系，以及罗马尼亚与华约关系、罗马尼亚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南斯拉夫与冷战、南斯拉夫与匈牙利事件的专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东欧各国档案的开放将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其意义不亚于90年代俄国档案的解密。这一点，非常值得引起注意。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策划收集、整理和翻译东欧档案的项目。

在亚洲，经过若干年的整顿，目前台湾的档案开放最为规范，使用也十分便利。应广大学者要求，内容丰富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几年前已从台北郊区的

北投外交部档案馆移至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数位化整理，至1975年以前的所有档案均制成可供下载的PDF格式，使用者也可以上网查询目录。此外，“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国民政府”目录中也有大量涉及冷战历史的档案，为了方便使用者，“国史馆”今年已在台北市内开设阅览室。香港大学的主图书馆则是亚洲地区收藏美国、英国档案（缩微胶卷和缩微胶片）最多的地方。

根据《国家公文书公开法》，自1976年以来，日本政府分21批陆续解密了外务省所藏战后的档案。目前档案的解密时间已到1972年，从解密的卷宗主题看，首先是有关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和日美关系的文件，其次如日本对东南亚各国政策、对中国海峡两岸政策、对朝鲜半岛政策，以及日本与阿拉伯世界各国、拉丁美洲各国和欧洲各国关系的档案，都已基本解密。[①] 此外，日本学者还注重整理和出版美国政府最新解密的对日政策档案。

韩国的国家档案馆也是对外开放的，但很少看到韩国学者直接引用韩国档案，据说是因为卷宗管理混乱，不易查找，外交通商部也没有专门的档案馆。不过，韩国学者也做出了很大努力。有关朝鲜战争及此前的档案，韩国本身的文件大部毁于战火，但学者们注意收集和编辑了主要参战国的档案。如美国文件：原主文化社1993年编辑、出版的《1945—1948年驻韩美军军政厅官报》、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1995年编辑、出版的《美军政期情报资料集（1945—1949年）》等。中国文件：将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基层部队的文件、命令、战士家书等编辑、影印成册，成为一套很有价值的文献集。俄国档案：把在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900余件档案影印出版，其中主要是顾问团关于朝鲜领导人的背景、朝鲜政治经济状况、朝鲜人民军的情况以及战争各阶段进程给莫斯科的报告。此外，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还在整理有关战俘问题的历史文献。

以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为主要牵头人，通过到当事国举办或邀请当事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正在一致努力，敦促越南、蒙古、古巴、印度和朝鲜政府打开他们那里档案馆的大门。特别是2009年5月在新加坡召集的亚太地区各国档案馆负责人的会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档案馆均表示了积极态度。显而易见，这些国家档案的解密，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① 有关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的卷宗目录及各批解密档案的数量，可以在日本外务省网站浏览。其网址是：http· //www mofa go jp/。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际也公布了档案法，解密年限为30年。但是迄今为止，档案制度及其管理方式几乎还停留在原地，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且不说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与近年来的俄国相比，中国大陆的档案管理、开放和利用，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其一，开放程度极其有限，特别是中央一级和各国务院主管部门的档案，根本就没有对社会开放。据说在1998年档案法修订和公布以后，有关机构还下达了“十不准看”的内部规定，照此排列下来，可以对公众开放的有研究价值的档案就所剩无几了。甚至南京的第二档案馆，尽管都是民国时期的文件，一般学者也很难看到。省级档案虽然好一些，但也有类似现象，而且很具中国特色——人际关系超于法律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主管部委都是决策机构，那里的档案不开放，对冷战时期中国的决策过程当然是无从了解的。不过，也有例外，外交部的档案已于2004年对社会公开，到目前为止已经分三批解密了1949—1965年的档案。不仅一般中国公民，甚至国外学者亦可前往查阅。

其二，中国的高层档案文献主要是经专门机关挑选和编辑后出版的，其优缺点如上所述，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得以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一般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且不说这种状况对广大学者来讲是十分不公平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

其三，中国没有专门的档案解密机构，也没有规范的和科学的解密程序，某一文件是否可以开放和利用，往往是主管人说了算，于是便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同样一件档案，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甚至在同一个档案馆，这个馆长批准查阅，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更为可怜的是，中国许多档案是否可以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进度和深度——竟取决于一个档案保管者的知识和政策水平。

中国限制档案开放的做法，最终受害的是中国自己。同一个事件，你不解密，人家解密，结果是研究者只能利用国外档案进行研究，不仅话语权旁落，也往往难以全面掌握历史真相。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中国有关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严谨，一方面在于档案管理者的观念需要根本转变：档案文献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社会？查阅和使用历史档案是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力？档案管理者对档案文献的责任，是重在保管收藏，还是重在为社会提供和利用？虽然这两方面的

改进，在中国均非普通学者力所能及，但是作为档案的使用者，中国的冷战历史研究者也不能只是被动地、消极地等待。在期待中国档案文献进一步开放，期待中国档案制度提高其公正性、公平性和法律化水平的同时，学者也必须而且应该努力有所作为。充分利用地方档案进行个案研究，就是一个突破口。面对21世纪学术研究发展的国际化和公开性前景，中国学者只有在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方面开拓出一个新局面，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说，研究者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且也是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的。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都已经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档案文献，如果这些单位联合起来，对于中国学者利用档案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利用推动着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反过来，冷战史研究的发展也推动着各国档案的解密，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运动。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研究一个专题，的确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特点。自不待言，研究双边关系要利用双边档案，而各国档案的解密则为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资料来源。如研究中苏关系时人们发现，由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特殊关系，在后者的档案馆里收藏着许多涉及中苏分裂时期苏共与东欧各党的往来函电，而这些材料无疑是判断苏联立场和态度转变的重要依据。同样，俄国外交部档案馆中保存的苏联驻朝使馆的大量电报和报告，也是研究中朝关系不可或缺的史料。至于研究冷战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危机，就更离不开对多边档案的利用了。以朝鲜战争为例，在目前冷战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关于这个专题所发表和披露的各国档案数量最多，范围最广。惟其如此，朝鲜战争研究才在前几年形成了高潮，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其他像研究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印度支那战争、匈牙利事件、台海危机、柏林墙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核武器问题等等，亦无不如此。总之，对于读冷战国际史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来说，没有档案文献的题目是不会去做的，做了也不会通过。

3. 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重建历史事实

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

构建历史事实。

在过去的冷战史研究中存在不同学派（如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等），其区别主要是观点不同，而对基本史实的认定则没有根本的分歧。冷战结束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即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缺失，过去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往往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被歪曲的。现在，双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到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对立也淡漠了，人们才发现，原来冷战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以往理解的那样。例如，过去研究者以为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 1950 年 1—2 月曾在莫斯科秘密会面，从而产生了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共谋论”解释。现在我们知道了，金日成 4 月 10 日到达莫斯科，而毛泽东在 2 月 17 日已经离开了那里。没有这种对史实的重新认定，研究者就无法了解朝鲜战争爆发的复杂过程和真正原因。还有，过去人们都认为，在波兰十月危机初期，是毛泽东的反对立场迫使赫鲁晓夫做出了从华沙周围撤兵的决定。现在我们知道了，在 10 月 19 日和 20 日苏共中央决定放弃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在华沙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新的史实认定并不否定中国后来在促成苏波关系缓和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却很可能导致对中、苏、波三角关系的简单化理解。类似的案例在新冷战史研究中比比皆是，整个冷战历史的过程正在重建，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然，在史实认定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解释，也不排除会发生分歧，甚至激烈的争论，但其总体目标是澄清史实，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也是对历史过程做出正确的和准确的判断，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观点方面的辩论，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派。由于新的档案文献大量地、成系统地涌现，冷战史研究不得不着力于重构历史，但也正是由于这些档案正在不断地、陆续地被披露或挖掘出来，根据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准则，在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不可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等待和努力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会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理论的升华。

4. 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中盛行的国际合作

冷战国际史研究国际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广泛的国际合作。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内涵决定的。

冷战史学者的国际合作首先表现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利用和交流方面。凡是参加冷战国际史的学术会议，各国学者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谁带来了什么新的档案，会议组织者也经常要求各国学者带来相关的档案或信息。休会和茶歇时，会场内外见到的都是学者们在交流档案资料。这种景象在冷战史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均可见到。有些会议的主旨就在于介绍和推荐最新解密的档案，如 2006 年 2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与亚洲冷战"，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刚刚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在国际学界亮相。还有的会议则是专门为了促进某一国家的档案开放，如 2000 年 1 月在河内、2003 年在乌兰巴托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以及 2009 年 6 月在威尔逊中心召开的国际会议"印度与冷战"，都体现了这样的功能。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了上述活动，并广泛邀请国外学者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学术讨论。一般说来，冷战史的学术讨论会只要稍具规模，就一定是国际会议。

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外交、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例如中苏同盟破裂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大改组及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中美关系缓和造成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及其对多重双边关系的影响，还有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波匈事件等等，无不如此。因此，在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几乎都无法单独由一个国家召开，这是导致冷战史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频频召开、冷战史学者在国际舞台异常活跃的主要原因。此外，冷战史研究中档案利用的多国性和综合性，也要求相关专题的各国学者必须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从形式上看，这种国际合作除了经常或定期召开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外，还有档案利用培训班、双边博士论坛、跨国口述访谈等，如威尔逊中心与乔治·华盛顿大学每年夏季组织的档案培训班，华东师大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连续举办的两次冷战史中美博士论坛，都极受各国学生欢迎。在某些专题研究方面，甚至出现了不同国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国际项目，如威尔逊中心组织的北朝鲜国际文献开发项目（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华东师大最近设计的关于社会主义同盟理论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比较研究的项目，都邀请了多国学者参与，组织了国际团队。此外，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与威尔逊中心商谈，准备明年在华盛顿设立驻美国的常设联络机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那就是从史料收集、研究方法到成果形式等各方面都体现出来的国际化现象。

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成果，因其对当代人记忆中的历史所进行的颠覆性描述和阐释而备受世人关注，甚至学术著作也能成为畅销书。不仅如此，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简直令人目不暇接。这里重点介绍一些中国学者比较关注和参与较多的学术成果。

1. 关于冷战起源和结束的讨论持续不断

冷战结束的最初几年，美国学术专著、报刊杂志甚至国家领导人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冷战的起源，人们似乎又回到了传统派的观点，认为苏联应对冷战的出现承担责任。至于冷战的结束，则是美国和西方所取得的胜利。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当属美国最著名的冷战史专家盖迪斯在 1997 年出版的专著《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历史》。作者是以胜利者的心态和姿态重新审视冷战历史的，认为冷战的形成都是共产主义的错误，而冷战的结束则是西方领导人——特别是像里根、撒切尔这样强硬派和保守派领导人正确决策的结果。[①] 盖迪斯的著作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在中国也颇有影响。不过，冷战史研究学者中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不少学者对他提出批评，如把冷战的责任完全推给斯大林有失偏颇；把冷战的结束看成是正义战胜邪恶则忽视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不道德和违背法律的现象；认为 70 年代美苏缓和只是维持战后的均势就低估了西欧国家的重要性；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如何影响冷战的进程缺乏关注和认识等。[②] 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9·11”

---

① John Gaddis，*We Now Know* 关于这种看法还有一部比较典型的著作：Norman Friedman，*The Fifty Year War Conflict and Strategy in the Cold War*，London：Chatham Publishing，2000。

② Carolyn Eisenberg，“Review of We Now Know by John L Gaddi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84，No 4，March 1998，pp 1462–64；David Painter，“A Parti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Cold War History*，Vol 6，No 4，November 2006，pp 527–34；Geir Lundestad，“The Cold War According to John Lewis Gaddis”，*Cold War History*，Vol 6，No 4，November 2006，pp 535–42

事件的发生使西方的价值观再次受到威胁，因冷战结束而产生的西方优越感顿时消失，“历史终结论”也很快被人遗忘，人们需要再次重新审视冷战。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2007年出版的弗杰尼亚大学教授莱夫勒的专著《为了人类的灵魂：美国、苏联与冷战》。作者强调：导致冷战爆发和延续的主要因素在于美苏的国内体制及国际机制，对美国政策提出了更多的批评；至于冷战的结束，则是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个人起了主要作用。[①] 中国学者对于冷战的起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从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的角度提出了新看法[②]，有的认为苏联是被动地卷入冷战的，斯大林的冷战战略是“内线进攻，外线防御”[③]。

2 关于苏联与冷战关系的研究引人注意

俄国档案馆开放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对苏联与冷战关系的研究在国际学界掀起了引人注意的热潮。在英语世界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马斯特尼的《冷战与苏联的不安全感》，他的观点与盖迪斯比较接近，认为斯大林由于从不相信别人而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不断寻求建立新的缓冲地带，以控制苏联的周边地区。[④] 旅美俄裔学者祖博克和普列沙科夫合著的《克里姆林宫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充分利用了大量公布的俄国档案，重点在于描述战后苏联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强调领袖个性、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俄罗斯历史文化以及地缘政治在冷战初期的重要性。[⑤] 祖博克的新著《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冷战》，则全面地考察了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及社会走向。[⑥] 在这方面，俄国学者自然做出了极大努力，他们对苏联参与冷战的研究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冷战结束初期，俄国学者依靠集体的力量，侧重于利用新档案比较全面地描述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研究很快就扩展开了，有的讨论冷战起源，有的研究缓和年代，有的专

---

① Melvyn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② 徐蓝：《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

③ 参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6期；《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

④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⑤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⑥ Vladislav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门考察苏联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还有的集中探寻苏联的核计划和核政策。俄国学者研究最深、成果最多的主要体现在战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领域。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主要原因是俄语人才短缺。现有比较重要的成果主要是张盛发的一部专著和笔者的几篇论文。[①] 最近几年年轻学者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从已经完成的博士论文即可看出，其中涉及苏捷关系、苏以关系、特殊移民、犹委会案件、阿富汗战争等等。

3 对于中美关系的考察经久不衰

中美关系是冷战国际史最早吸引研究者的领域之一，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到期解密的档案逐渐增多，人们的关注点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冷战结束后不久，在中美关系研究中，学者们最初比较感兴趣的还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中美关系是否有可能实现正常化的问题，即以往美国冷战史各学派有关“失去的机会”的争论。研究者根据新的史料再次进行了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失去机会”。他们强调中共与莫斯科之间已经建立的良好关系使毛泽东在 1949 年不愿意去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有限的外交及贸易联系不足以构成中美和解的契机。[②] 随后，人们较多研究的是 50 年代的中美冲突问题。学者们对中美冲突的起源、朝鲜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台海危机等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很多有分量的专著。在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档案解密后，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开始转向中美和解的进程。吴翠玲的专著讨论从 1961 年到 1974 年美国关于中美和解政策的实施过程，认为美国官场在 60 年代就开始提出并讨论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想法。[③] 朗巴斯的新著则考察约翰逊政府为改善对华关系所采取的一些新举措，并指出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的思想是建立在约翰逊政府对华新尝试的基础上的。[④] 伯尔、詹姆斯曼、唐奈心、夏亚峰以及麦克米伦等学者的著作，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对 70 年代初

①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0 期。

② Warren Cohen，Chen Jian，John Carver，Michael Sheng，and Odd Arne Westad，“Rethinking the Lost Chance in China”，*Diplomatic History*，Vol 21，No 1，Winter 1997，pp 71-115

③ Evelyn Goh，*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④ Michael Lumbers，*Piercing the Bamboo Curtain Tentative Bridge-Building to China during the Johnson Years,*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8

中美关系缓和进程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①] 中国学者最早参与国际讨论的课题就在这一领域，领衔者是资中筠、陶文钊等，跟进的有章百家、时殷弘、牛军等，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也有一批优秀成果问世。那时中国中美关系研究完全可以同美国学者媲美。[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中美缓和时期的美国档案继续开放，而中国档案很少见到，所以中国的研究人数虽然很多，但基本上是跟在美国学者的后边走。即使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发表，其作者也是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的。[③] 无疑，中美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

4 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迈上新台阶

由于以往难以见到的中国和俄国档案的大量披露，冷战国际史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在西方出版的论著中，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对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进行了详尽讨论[④]，旅美华人学者张曙光、在加拿大教书的瑞士籍学者吕德良和在中国工作的俄国学者拉琴科从不同的角度和时段，集中研究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⑤]；美国学者陈兼讲述毛泽东的对外政策，魏丽莎分析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政策，但主要落脚点都是中苏关系。[⑥] 此外，笔者还看到一部英文的博士论

---

① Wilham Burr, *The Kıssınger Transcrı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ıth Beıjıng and Mosc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ıstory of Amerıca's Curıous Relatıonshıp wıth Chına, from Nıxon to Clı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 1999; Wılham Kırby, Robert Ross, and Gong Lı (eds), *Normalızatıon of U S -Chına Relatıons An Internatıonal Hıstory*, Cambrı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ıversıty Press, 2005; Nancy Tucker, "Taıwan expendable? Nıxon and Kıssınger go to Chına", *Journal of Amerıcan Hıstory*, 92 1 (2005), pp 109–135; Xıa Yafeng, *Negotıatıng wıth the Enemy U S -Chına Talks durıng the Cold War, 1949–1972*, Bloomıngton: Indıana Unıversıty Press, 2006; Margaret MacMıllan, *Nı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n House, 2007

② 最近发表的重要成果有何慧的《尼克松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版)、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 20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③ 如张曙光的《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版)。

④ 原文为德文，中译本见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 年版。

⑤ Shu Guang Zhang, *Economıc Cold War, Amerıca's Embargo agaınst Chına and the Sıno-Sovıet Allıance, 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ıversıty Press, 2001; Lorenz Luthı, *The Sıno-Sovıet Splıt Cold War ın the Communıst World*, Prınceton and Oxford: Prınceton Unıversıty Press, 2008;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ın the Heavens the Sıno-Sovı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Washıngton, D C : Woodrow Wı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Stanford Unıversıty Press, 2009

⑥ Chen Jıan, *Mao's Chı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ıll & London: The Unıversıty of North Carolına Press, 2001; Elıza beth Wıshnıck, *Mendıng Fences The Evolutıon of Moscow's Chına Polı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ın*, Seattle and London: Unıversıty of Washıngton Press, 2001

文，作者利用了大量俄国档案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材料，讨论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发展教育事业，其内容和观点都十分吸引人。[①] 在俄国，综合性专著的作者大体上都是负责对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或党内干部，他们的论述还带有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政策进行辩护。不过，其史料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②] 在专题性著作中，比较集中讨论的是关于中苏边界问题。[③]，涉及的其他领域还有新疆问题、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等。[④] 这些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学术性较强，很有参考价值。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目前已经走到世界前列，其中特别是杨奎松、李丹慧、牛军和笔者本人的研究，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很多论文和专著已经或正在译成英文。[⑤] 中国学者的突出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使用中国和俄国的双边档案，这就比西方学者占了先机；二是中国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和对史料的解读要胜过西方学者，毕竟中国人对苏联的理解更为深刻。例如关于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其原因的讨论，中国学者的看法对现在通行的国家关系理论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挑战。[⑥]

5 朝鲜战争仍然是研究者最感兴趣的课题

朝鲜战争不仅在东亚各国脍炙人口，在美国也是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各有关

---

① Douglas Stiffler, *Building Socialism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Chinese Cadres and Soviet Expe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5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2

② *Брежнев А А* Китай: 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8;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1952, Москва: НИМ, 1999;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00; *Рахманин О Б* К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в XX веке, Обзор и анализ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2

③ *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 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фактах, Владивосток: Уссури, 1999;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1; *Попов И 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300 лет на грани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Рябушкин Д С* Мифы Даман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Ивасита А* 4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проблем: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ница, Москва: АСТ,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06

④ *Бармин В А*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гг ,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1960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ИИХ СПБГУ, 2000; *Мартыненко В П (ре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научные связи: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5

⑤ 详见徐思彦：《走向破裂的结盟：中苏同盟研究的新进展》，《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⑥ 详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的跋。

国家的档案大量解密，为新的研究注入了活力。除了比较全面地讲述战争过程的专著[①]，学者们还充分利用新档案、新史料考察了美国以外的国家参与这场战争的情况。关于苏联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学者们不仅讨论了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及苏联在战争起源和停战谈判中的作用，还描述了苏联空军参战的情景。[②]至于中国与朝鲜战争，讨论比较集中在中国出兵及其在战争中的形象等问题上。[③]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美国的盟国与战争的关系，如日本、英国、土耳其等。[④]即使在朝鲜战争研究中最为敏感和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战俘、细菌战等问题，也有不少学者涉

---

① 其中比较有影响著作包括：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蔡汉国、郑锡均、梁宁祚：《韩国战争》（三卷），首尔 国防军史研究所印行，1995—1997年；*Валковский Н Л гла ред* Война в Корее，1950–1953，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ПОЛИГОН，2000，*Торкунов А 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William Stueck，*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 A New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和田春树：《朝鲜战争全史》，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版；Alan J Levine，*Stalin's Last War Korea and the Approach to World War III*，Jefferson，North Carolina，and London：McFarland & Company，Inc，Publishers，2005。

② 如 Kathryn 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New Documentary Evidence"，*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1993，Vol 2，No 4，pp 425–457；"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WIHP Working Paper*，No 8，1993；"Korean，1949–50：To Attack，or Not to Attack? Stalin，Kim Il Sung，and the Prelude to War"，*CWIHP Bulletin*，Issue 5，Spring 1995，pp 1–9；*Орлов А 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 121–146；*Волохова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с 96–110；Zhang Xiaoming，*Red Wings over the Yalu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ir War in Korea*，College Station：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2002。

③ 全面研究的有陈兼和张曙光的专著，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Shu Guang Zhang，*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5。还有一些论文也值得注意：Thomas Christensen，"Threats，Assurances，and the Last Chance for Peace：The Lessons of Mao's Korean War Telegrams"，*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2，Vol 17，No 1，pp 122–150；Philip West，"Confronting the West：China as David and Goliath in the Korean War"，*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1993，Vol 2，No 1，pp 5–28；V Petrov，"Mao，Stalin，and Kim Il Sung：An Interpretative Essay"，*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1994，Vol 13，No 2，pp 3–30；Michael Sheng，"Mao，Tibet，and the Korean War"，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 8，No 3，Summer 2006，pp 15–33。

④ Roger Dingman，"The Dagger and the Gift：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Japan"，*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Vol 2，No 1，1993，pp 29–55；Michael Hopkins，"The Price of Cold War Partnership：Sir Oliver Franks and the British Military Commitment in the Korean War"，*Cold War History*，Vol 1，No 2，January 2001，pp 28–46；Çagdas Ungor，"Perceptions of China in the Turkish Korean War Narratives"，*Turkish Studies*，Vol 7，No 3，September 2006，pp 405–420

猎。[①]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也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关于铁幕另一边的故事，西方人如雾里看花，很难说清。在原来的东方阵营中，朝鲜学者闭目塞听，基本看不到他们的成果，俄国学者大多囿于传统，很少有所创建。[②] 而中国学者的研究早在 80 年代末就开始突破了以往的传统看法。[③] 随着档案文献的不断披露，对于中、苏、朝一方参与战争的过程的研究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入。在战争起源、中国出兵、中朝关系、停战谈判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④]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还有很多，如核武器的研制与核政策问题、马歇尔计划、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柏林封锁危机、东柏林骚动、波匈事件、华约与北约的对抗、台湾海峡危机、柏林墙的建立、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阿富汗战争、波兰团结工会等等，无论是老题目，还是新领域，由于这些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冷战结束后各国解密的档案文件，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学者对于其中某些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⑤]

三、冷战国际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冷战国际史在其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

---

① Laurence Jolidan, "Soviet Interrogation of U S POWs in the Korean War",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p 123–125; Kathryn Weathersby, "Deceiving the Deceivers: Moscow, Beijing, Pyongyang, and the Allegations of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Use in Korea", *CWIHP Bulletin*, Issue 11, Winter 1998, pp 176–185; Milton Leitenberg, "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Korean War Biological Warfare Allegations: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CWIHP Bulletin*, Issue 11, Winter 1998, pp 185–200; Stephen Endicott and Edward Hagerm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Milton Leitenberg, "The Korean War Biological Weapon Allegation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Disclosures", *Asian Perspective*, 24 (3), 2000, pp 159–172 笔者在台湾冷战时期海峡两岸的历史发展研究生工作坊（2008 年 8 月）还看到一篇专门研究中国战俘的论文，David Chang, "Huijia (To Return Home): The origins of the forcible screening for voluntary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POWs during the Korean War"。

② 值得注意的成果见 *Торкунов А 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0。

③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年版。

④ 参见邓峰:《朝鲜战争研究在中国：十年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 第 9 期，第 116—125 页。

⑤ 值得提及的是年轻学者也开始加入了讨论，如对美国外层空间政策（张扬）、美国核战略（詹欣）、苏联核武器研制（刘玉宝）、苏联对以色列政策的演变（肖瑜）、美国与北约的关系（姚百慧、丁祖煜）、波匈事件（胡泊、郭洁）、阿富汗战争（李琼、李晓亮）、美国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反应（葛腾飞、汪婧、樊百玉）等问题的研究。

研究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某些新的发展趋势。

1. 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

过去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属于两极结构，所谓冷战就是以美苏各自为首两大意识形态阵营（集团）的对抗，所以冷战国际史研究始终笼罩在大国关系的光环下，学者们很自然地也把主要目标锁定在考察美苏两国关系或两大阵营在危机中的决策及其结果。“9·11”事件以后，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西方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人们突然发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大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对于西方集团中弱小或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加拿大、西班牙、丹麦、芬兰、冰岛等——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现，对于第三世界众多处于冷战边缘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升温。目前，这些研究多数是从大国对边缘地区和国家的政策的角度从事考察，希望通过追溯冷战时期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介入，来找到当前这些地区动荡的根源。或者说，是研究冷战在第三世界的作用和结果。不久前文安立出版的专著《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作者研究了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越南、南非、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以及其他地区的干涉，并探讨了这种干涉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文安立认为，在欧洲由于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峙，冷战对抗陷入僵局，取得新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很少。而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则代表了冷战中最主要、最核心问题，第三世界是美苏两家推广和验证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场所。他们在这里的争夺，不仅是为了获取军事优势（盟友、基地等），更主要是希望通过干涉第三世界的内部事务、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来显示各自代表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合法性，来证明自己所信仰的价值观所具有的全球适用性。①

对于第三世界或冷战边缘地区和国家的研究还有一种“本末倒置”的趋向，即从研究这些地区或国家本身的历史出发，考察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特征和趋势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对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如果说前者倾向于讨论边缘地区和国家是如何在两极世界格局的影响下被动地卷入冷战的，那么后者的出发点则在于

① Odd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还可参见：Jeremi Suri，*Power and Protest Glob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éten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Jeffrey Engel（ed），*Local Consequences of the Global Cold War*，Washington D 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Stanford C 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考察边缘地区和国家是如何向两极世界挑战，从而影响了美苏两国的政策。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教授刘晓原在其新著《解放的制约——蒙古独立、中国领土属性和大国霸权的历史纠葛》的导言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小国、边缘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卷入冷战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选择和驱动力迫使美苏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政策。惟其如此，才会出现在美苏争夺的中心始终保持“冷战”的状态，而在边缘地区则“热战”连绵不断。① 另一部受到关注的著作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康纳利教授的《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后冷战时代的起源》。作者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置于东西方和南北方的双重矛盾中考察，指出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既包含东西方（美苏）之间对抗的因素，又包含南北方（殖民地人民与殖民主义国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矛盾的因素，仅用传统的冷战眼光来看待1945年后的历史是不够的和不全面的。② 中国学者对第三世界的研究主要是由年轻一代完成的，他们很多人一进入冷战史研究的大门便选择了这一新的领域，目前已经发表的成果虽然还不是很多、很成熟，但从这几年博士论文的选题看，中国在冷战与第三世界这个领域的研究必将迅速发展起来。③

其实，正是这种对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互动关系的研究，才会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

2. 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经济、文化、社会纳入观察视野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另一个发展趋向就是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从事跨学科的研究。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雷纳兹在其所著《一个被分割的世界：1945年以来的全球

---

① Liu Xiaoyuan，*Reins of Liberation: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② Matthew Connelly，*A Diplomatic Revolution:Alger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st-Cold War Er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③ 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可见戴超武的《1965年印巴战争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赵学功的《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简论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隐蔽行动计划》(《南开学报》，2007年第5期)，姚昱：《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舒建中的《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刘莲芬:《1960—1962年老挝危机与美泰关系》(《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孙德刚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与美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代兵的《日内瓦会议与老挝、柬埔寨的中立》(《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王延庆的《美国对南非核政策的演变》(《历史教学》，2008年第20期）等。

史》一书中提出，战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是“无法全部装在冷战这个盒子里的”，美苏冷战“分割”了世界，但冷战只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此外还有经济、民族、文化、宗教、南北差别、性别差异等问题，冷战的出现无疑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但同时又反过来深受这些社会问题的影响。他在书中系统地描述了一些与冷战根本不相关的事情，如非殖民化进程、科技发展、文化趋向、社会变革以及所有这一切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最后强调：“冷战只是这个时代的中心，而非时代本身。”[①] 作者是要提醒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研究，不能仅仅研究冷战本身，不能把研究的对象限制在传统的国际关系史范畴，还必须全面考察在这一时代发生的其他事件和问题。

当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无法取代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社会史等各类专门史研究，但重要的是，关于战后以来这些问题的考察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冷战这个核心问题，因为它们都在“一个被分割的世界”的框架下发生和发展的；同样重要的是，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溶合在一起，才构成了这个时代本身。在这方面，目前已有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成果中比较多的是关于“经济冷战”、“文化冷战”以及“宣传战——心理战”的研究。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较早使用了“经济冷战”的概念，并以此为书名，讲述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及其对中苏同盟造成的经济压力。[②] 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西蒙诺夫的研究对象是苏联的军工综合体组织，论证了苏联制度下的这一特殊经济部门如何担负着国家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职能，决定着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同时又成为国家安全系统最重要的环节，决定着武装力量军事技术组织的性质。[③]“文化冷战”的研究涉及美国文化的对外传播[④]，美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其结

---

① David Reynolds, *One World Divisible A Global History since 1945*, New York: Norton, 2000

② Zhang Shu Gu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6

④ Walter L Hixson,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1955*,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Volker Berghahn, *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 Cold Wars in Europe Sheppard Stone between Philanthropy, Academy, and Diplo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果[①],以及冷战中的文化政治[②]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宣传战–心理战"的研究出现得比较早，其中既有对苏联在国内宣传鼓动和对外开展"舌战"的介绍，也有对西方冷战广播及内部舆论导向的描述。[③]在所有这些领域的研究及其拓展，不仅丰富了冷战史研究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将加深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认识。

中国学者对经济冷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美日、美韩、中苏关系方面，成果比较显著。[④]于群集中研究心理冷战，取得不少成果。[⑤]对于文化冷战的研究相对比较落后，成果还很少见到。[⑥]

---

① John E Bowlt and Dmitrii Sarab'yanov, "Keepers of the Flame: An Exchange on Art and Western Cultural Influences in the USSR After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4, No 1, Winter 2002, pp 81–87; Victor Rosenberg,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53–1960, Diplomacy and Cultural Exchange During the Eisenhower Presidency*, Jefferson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 2005; Jeffrey Brooks, "Stalin's Ghost: Cold War Culture and U S -Soviet Relations", in Klaus Larres and Kenneth Osgood (eds), *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 pp 115–134

②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отв ред)* Восток-Россия-Запад,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рской мысли, 2001; Tony Shaw, "The Politics of Cold War Culture"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3, No 3, Fall 2001, pp 59–76; Patrick Major and Rana Mitter,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Toward a Comparative Socio-Cultur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old War History*, Vol 4, No 1, October 2003, pp 1–22

③ *Наджафов Д Г* Сталинский Агитпроп 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о архивным фондам ЦК ВКП (б) и МИД СССР// *ИВ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ИВИ РАН, 1998, с 205–227; *Фатеев А 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1945–1954 гг , Москва: ИРИ РАН, 1999; James B Critchlow, "Western Cold War Broadcasting",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 No 3, Fall 1999, pp 168–175; V Pechatnov, "Exercise in Frustratio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in the Early Cold War, 1945–47", *Cold War History*, Vol 1, No 2, January 2001, pp 1–27; *Рукавишников В О*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холодный мир: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в США и Европе о СССР/Росс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Запада,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5; Ira Chernus, "Meanings of Peace: The Rhetorical Cold War after Stalin", in Klaus Larres and Kenneth Osgood (eds), *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 pp 95–114

④ 其中最突出的是崔丕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他还有沈志华的《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2000年版)、邓峰和杜宇荣的《美国冷战战略与中日贸易关系（1948—1950)》(《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美国对华政策与中日贸易（1950—1952年)》(《日本研究》，2008年第2期)、姚昱和郭又新的《1953—1956年美国的橡胶政策与国内政治》(《世界历史》，2007年第6期)、梁志的《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与韩国的经济"起飞"》(《当代韩国》，2009年春季号）以及谢华的《冷战时期美国粮食外交的历史演变（1954—1969)》(《历史教学》，2009年第6期）等。

⑤ 于群:《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项目初探（1951—1960)》,《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5期，第83—90页;《"特洛伊计划"——美国冷战心理宣传战略探微》,《东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2期，第5—12页;《社会科学研究与美国心理冷战战略》,《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第68—82页;《论美国在伊拉克进行的心理战（1945—1958)》,《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3期，第47—53页。

⑥ 在这方面尝试的有牛可:《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总第79期)；于群:《战后初期美国在伊朗开展的冷战电影宣传战略（1945—1953)》，于群主编:《美国国家安全与冷战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3—293页。

3.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冷战国际史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

如果说冷战的结束为国际关系史学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开拓空间，那么这一结果的突然来临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专家而言，遇到的则是严峻的挑战。人们还发现，在旧冷战史研究中曾广泛应用过的某些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因其对冷战的结束缺乏预见而受到学者的质疑，而且面对大量的和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新史实似乎也正在失去其阐释价值。[①] 正像文安立所言，冷战国际史（新冷战史）"是一个让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迎头冲撞的领域"，现实主义固然因为国际体系的变化而正在失去其原有的解释能力，结构主义也由于受到某些固有模式的束缚而很难对冷战进程中复杂的现象做出更好的说明。[②]

其实，在冷战后的冷战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同样面临着某种困境，当他们面对兴高采烈地找到的大量渴望已久的档案时，当他们在新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兢兢业业地重建历史时，才突然发现原有的概念、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似乎还不足以让他们理解、解释和阐述新显露的历史现象。例如在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中，情况就是如此。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其数量多的惊人，不仅大量有关中苏两党高层内部的讨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已经为人所知，甚至像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苏联在克里姆林宫为毛泽东的卧室专门改建厕所、1959 年 9 月 30 日赫鲁晓夫在北京机场发表讲演时扩音器突然中断这样的细节，都可以得到确实的考证。面对越来越清楚的史实，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使用以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同盟利益说来解释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了。正是依据同盟是共同利益的体现这一框架，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在 1950 年代初认为既然中苏已经结盟，那么就是铁板一块了——殊不知恰恰此时，斯大林因在中苏条约谈判中被迫向毛泽东让步而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和怀疑；在 1960 年代初他们又认为中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的同盟是不会破裂的——殊不知时隔不久，中苏两国便分道扬镳了，而导致他们分裂的并非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③] 显然，维系中苏关系的不仅仅是利

① 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质疑，主要见 John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1993, pp 5–10；Jeffrey Checkel, "The Constructive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50 (1998), pp 324–348；William Wohlforth, "Reality Check: Revis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50 (1998), pp.650–680。

②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pp 7–10

③ 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关于这方面的分析报告见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 9、12 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版。

益，甚至主要不是利益，那么应该如何来解释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呢？于是，冷战史研究者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有学者提出了国内政治需要说，如陈兼就认为，中国革命的国内使命决定了其国际使命，外交政策是“国内动员的源泉”，为此，“毛泽东在国际关系方面故意制造敌人”。[①]还有学者提出了意识形态分歧说，如吕德良认为，莫斯科和北京在关于如何“正确”解释和实践共产主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中苏双方由此相互指责对方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没有意识形态之争，中苏也不可能分裂。[②]甚至有学者从性格和心理状态的角度分析毛泽东的对苏立场，如盛慕真就用精神分析法来描述毛泽东的个性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认为领袖的个性缺陷和心理障碍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因素。[③]这些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中苏关系的兴衰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历史学家正在尝试在合理的新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构历史活动之中的应有之意。笔者和李丹慧即将出版的《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一书，会提出一个对中苏分裂过程和原因的新的分析框架，也许有益于推动这一讨论。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策划的研究课题——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及同盟理论研究，也将从事这方面的尝试。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在出版的由莱夫勒和文安立共同主编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④]该书的目的是阐明冷战的根源、动力和结局；力图说明冷战是如何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冷战遗产是如何影响当今国际体系的。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国际史，除用一些章节讨论大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有更多篇幅讨论的是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广泛涉及社会史、科技史和经济史的内容，讨论了人口、消费、妇女和青年、科学和技术、种族和民族等一系列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狭义的外交史，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之外，还要说明的是冷战时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

①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 7–8、180

② Lorenz 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pp 46–50，63

③ Michael M Sheng，“Mao Zedong’s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China's Road to Disaster”，in Ofer Feldman and Linda Valenty（eds），*Profiling Political Leaders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London：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1，pp 111–128；“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Modern China*，Vol 34，No 4，October 2008，pp 477–507

④ Melvyn Leffler and Odd Westad（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I Origins, 1917–1962, Vol II Conflicts and Crises, 1962–1975, Vol III, Endings, 1975–199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2010

最重要的是什么；为什么只有了解经济、思想和文化互动是如何影响政治话语、外交事件、战略决策的，才能理解冷战的起源和结束。这部巨著的大部分作者是历史学家，但也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方法论方面，该书力图做到综合性、比较性和多元性的结合。可以说，这部著作代表了目前冷战国际史研究最前沿、最权威的学术成果，也反映了这一研究的发展趋势。

近来“新冷战”（New Cold War）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着利益和权力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使人们不得不想起冷战年代。[①] 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今后又将如何发展和演变？回答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思考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因为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因素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渊源都与冷战时期密切相关，所以，冷战研究可以为理解和把握后冷战时期历史运动规律、应对现实国际问题提供必要的战略性思考和历史借鉴。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把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

① 关于“新冷战”问题的集中讨论，见《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5 期“热点聚焦”栏目。

前　言

这本自选集收集了我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发表的20篇与冷战有关的论文，是我研究冷战与中国外交之关系的部分学术成果，当然也是我自认为比较有心得、价值的部分。在编选本文集时，我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论文，而是将它们分成为“冷战与中国外交”、“中苏关系”、“抗美援朝决策”、“地区问题”、“中美关系”等5个专题，每个专题约3—4篇论文。做这样的分类主要是为了便于读者在阅读时能更容易地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有关的内容。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不同时间针对冷战与中国外交之关系的不同问题撰写的论文，其内容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重大事件的，有这样的机会将它们分类组合一下，还可以大致看出各组中的论文的内在联系。这种编选方式也的确反映了本人这些年来研究时的主要关注和研究视角，特别是对冷战时期中国重大外交决策的关注。我一直相信，做大致分类的案例分析对于最终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研究架构和分析模式是不可缺少的工作，这也是我现在坚持做案例研究的目的和动力之一。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冷战历史、特别是冷战与中国外交之关系的历史，是我学术研究工作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近5年来，我的研究工作的大部分是围绕冷战与中国外交这个领域展开的，而且比较多地侧重于研究冷战时期的中国重大外交决策。2007年9月间，我应邀到日本新潟大学做过一次系列讲座，题目是“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2009年春夏，又在东京大学开了这门课程，为东大的硕士研究生讲授相同的内容。这两次授课的内容包括8个专题，除了总论之外，涉及7个冷战时期中国重大外交决策的案例。承蒙新潟大学真水康树教授真诚与慷慨的帮助，这些授课内容经他编辑翻译成书，已经在日本出版，书名就是《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2010年夏天，我又应邀到新潟大学做了第二次系列讲座，

题目一样，内容则是另外 6 个冷战时期中国的重大外交决策案例。按照真水康树教授的计划，这次讲座的内容也会编辑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其中有两个部分已经在新潟大学的法政杂志上发表了。现在这本自选集的内容只包括了我研究冷战时期中国外交决策案例的部分内容。文集涉及的这些案例固然重要，但远不是全部。还有不少没有涉及的案例，它们同样很有（有的甚至更有）研究价值，但没有或难以见诸文字。在中国做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学术环境有实质性的改善，包括更为开放的档案管理制度和更宽松的学术环境。我的这些研究成果能用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好处是观点集中鲜明一些，不足是受篇幅限制，无法展开论述。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限制，一些重要的案例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环境中，还是只可深入研究却不能著书出版的。这种局面其实大不利于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长此以往受其累者是中国学术和教育，希望这种局面能改变得更快一些。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还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不少学者都渴望并疾呼要建立“中国学派”，其实不妨静下心来从扎实的案例研究着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这些论文是在 10 来年里先后发表的，这期间中国学术界的发展进步是明显的，尤其是对学术规范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与国际标准基本接轨了。这种积极的变化对编辑这跨越 10 来年的文集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就是在注释的要求上，早年发表的论文中的注释提供的信息同近两年发表的相比，就不够充分完整。我在编选时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但毕竟时间过了很久，难免有没有做到之处，还请读者谅解。另一方面，这些年不断有相关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出来，较早发表的论文中某些在没有那么充足的历史档案的条件下做出的判断，是需要进行新的更精确的界定，有的甚至需要重新思考。这是做当代历史研究最难以应付却又很难回避的问题。我对较早发表的论文中的某些判断做了文字上的修订，以便使之进一步精确化，但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改动。其实就算是现在有比较多的档案的条件下，我写完一篇论文也还是会心中默念：让时间来检验它的立论的可靠性。需要说明的是，个别论文的标题做了一些改动，目的或是因为文字表述更准确顺畅，或是为了论文观点更突出、醒目。这点改变对论文的内容没有任何影响。

自选集的最后一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经线》是比较宏观地梳理和论述建国 60 年来中国外交的基本线索和基本架构，时间上有些超出了冷战史的范围。不过，这篇论文涵盖的 60 年中，有 40 年属于冷战时期，而且它的很多内容都是论述有关冷战时期的问题或与冷战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可以

提供一个更宏观的背景，有利于深化对40年冷战时期中国外交中一些重要事件的理解。所以收录在文集末篇权作为结束语。

最后，在此对沈志华先生、九州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的努力才使这套自选集能够出版，而本人也才有机会将自选集加入其中。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读过这本自选集后能有所收获，今后授课时也可以有内容比较集中的著作推荐给同学阅读，更方便他们的学习和研究。

牛 军

2012年5月16日，于北京闲庐

目 录

中苏关系

抗美援朝决策

地区问题

中美关系

代 结 语

冷战与中国外交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东亚冷战的前奏

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曾经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包括国共内战的爆发、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和中美走向对抗，等等，均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这主要表现在有关成果多数集中于抗战结束到1946年。对此后不同阶段中美苏国共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分别展开的，包括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国共关系等等的分别研究。迄今为止，只有台湾学者邵玉铭曾经在80年代专文系统地论述整个这一时期的三国四方关系。[①] 由于当时历史档案的欠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该文中一些重要观点至少也是需要调整和补充的。本文的目的是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疑问，进一步探讨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关系的特点和是否存在避免中国内战的机会，冷战发生与中国内战爆发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等。

一、“蒋（介石）之下的和平”：机会是否存在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东亚政局正处于大变动之中，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和国共关系等等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团乱麻千头万绪，其中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能否在中国实现“蒋之下的和平”，美苏国共关系就是围绕这个问题

① 邵玉铭：《抗战胜利至大陆沦陷前美苏与国共四角关系之研究与检讨》，《传记文学》（台北），第37卷第5、6期和第38卷第1期（由于当时查阅历史档案的限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该文难以避免地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

展开的。“蒋之下的和平”包含两个内容，其一是战后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和蒋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其二是有没有以及通过什么方式避免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美苏国共均面临着两个国际协议，即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议和苏联与国民政府达成的中苏同盟条约。在这两个国际协议的背后是美、苏和民国政府间的一系列外交折冲，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试图为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做出它们均可以接受的国际安排。至少美苏领导人当时还是认为，那种安排的结果最终会对东亚政治格局和大国的战略利益产生至关重要和有益的影响。实际情况表明，两个国际协议中的各种安排能否实现，的确取决于中国政治形势如何发展。

对于美国来说，战争后期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使它感到有必要调整以往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一度相信，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战后可以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一道屏障”，还可以对亚洲的革命运动起“限制”作用。[①]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的成败与能否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用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戴维斯的话说，就是“也许唯独蒋介石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②] 然而到战争后期，美国面临的情况却完全相反。

首先是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严重危机，民国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军事失败遭到盟国舆论的普遍批评。蒋介石虽然面临内外危机，但除了继续保存实力准备内讧，仍然无意改弦更张，励精图治。其次是中苏关系因为新疆问题而严重恶化，双方在那里几乎发生军事冲突。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支持，蓄意将苏联在新疆的行动与中共联系在一起，声称中国有可能被苏联和中共里应外合地“赤化”，美国也将因此而在“东西方两败俱伤”。[③] 这时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正与苏联讨论在东亚的军事合作，美国领导人非常担心中苏关系恶化破坏其战略安排。

国共关系日益紧张显然使美国更感到棘手。1943 年夏季以后，国共斗争愈演愈烈，几乎酿成新一轮军事冲突。特别是苏联引人注目地利用舆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对中共表示同情。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对苏联的举动极为关注，认为苏联的反

---

① Sumner Welles,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50, p. 186.

② John Paton Davies, *Dragon by the Tail: American, British, Japanese, 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 1972, p. 299.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 1 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年版，第 167—171 页。

应增加了国共矛盾的复杂性，中苏关系不论在战时还是战后，都会因国共问题而遭遇极大的麻烦。[①] 这种局面使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是战后“最有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国共内战甚至会在战后酿成美苏之间的冲突。[②]

显然，不论是从打败日本，包括使中国军队集中力量抗战和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还是从战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来看，美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因为那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一些美国外交官曾经认为，中共领导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更类似于民主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③] 不过在美国决策过程中，他们的这些判断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决策者们看来，重要的是中国不能因为内战而削弱对日作战的能力，以及据他们分析国民党不可能靠武力打败中共，更何况内战一旦发生，后果可能还不仅止于此。主要是根据对日战争的需要和对国共力量对比的分析，美国政府从 1944 年夏季开始直接积极地插手国共矛盾，试图找到既能维持蒋介石的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总之，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争端，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他们的调处方案都经历了调整的过程。赫尔利是从接受中共的“五点协议”转向支持国民党的“三点建议”。马歇尔是从支持政协决议转向要求蒋介石允许所谓“自由派”参加政府。这些变化是造成国共谈判起伏分合的相当重要的原因。

美国决定介入国共纷争时，它的有关政策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基于对国共斗争和中苏关系的担忧，美国领导人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准备用来促使苏联对日作战而让出的“红利”，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变成了限制苏联向东扩张的界限，即美国将承认苏联在东亚获得安全保障和某些优越的权益，但是苏联必须接受美国的对华政策，承认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并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从 1944 年 6 月到战争结束前后，美国方面为达此目的而做的努力几乎是不遗余力的。先后被派到中国调处国共矛盾的赫尔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无不将与苏联协调政策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将取得苏联的支持作为调处成功的必要条件。[④] 尤其是赫尔利将全部赌注押在苏联的立场上，相信只要苏联承诺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共除了妥协

① “The charge in China (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2, 1943; “The charge in China (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7, 1943; U.S. State department edited,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FRUS*）, 1943, China, pp. 314–316.

② Sumner Welles,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p. 151.

③ 关于美国外交官的观点可参阅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75—194 页。

④ 有关司徒雷登的看法可参阅 A.M. 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译，新华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39 页。

将别无选择。[①]

苏联大约是在1943年秋季表明它将参加对日战争。斯大林十分清楚苏联参战后可能遇到的那些问题，包括一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和一个像火药桶一样随时会出现爆炸局面的中国。苏联领导人在考虑其战后的东亚政策时，居中心的是如何处理对美和对华这两个相互纠缠的问题，如何应付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则是第二个层次上的问题。苏联领导人在战争后期考虑国共问题时，基本上沿袭着抗战初期的思路。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对国共问题没有而且也不准备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苏联与美英在战时是同盟。斯大林深知美英的扶蒋立场，它们绝不会允许中共夺取政权，苏联如果支持中共采取激进的革命路线，肯定会破坏它与美英的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和蒋介石将改善中苏关系与解决国共争端联系在一起，并将中共描述成苏联在中国的工具，苏联为了追求其战略利益，不得不一再声称，它与中共不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其他方面，已经没有什么联系。[②]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非常清楚中苏关系中的问题和国民政府的亲美反共立场。不过在美苏合作的大背景下，苏联固然不能支持中共推翻国民政府，蒋介石也不敢违背美国的意愿与苏联对抗。这种复杂的局面使苏联试图造成一种内外环境，中立国民政府，防止蒋介石过分反苏。在这个框架中，国共问题成为苏联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砝码。

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在战争后期远不能说是融洽的。在斯大林看来，中共越来越像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追求民族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政党，对苏联的忠诚度不够高。从国共力量对比的现实考虑，中共的实力也不足以与得到美英支持的国民政府抗衡，中共如果要用激进的手段夺取政权，只会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③]在苏联的有关政策中，不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与中共的关系与同美国和蒋政权的关系相比，都不能算是特别重要的。

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从1944年夏季到战争结束后一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几乎对每一个前往莫斯科的美国代表说明，他们将支持美国的有关政策和调处努力。在同国民政府代表谈判时也声称，“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蒋

---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164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0页；*FRUS*, 1944, China, Vol.6, p. 799.

③ 瓦·伊·崔可夫著：《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万成才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A.M. 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第258、298—299页。

介石谋求军令政令统一是“正当之愿望”，但应用政治方式解决，苏联不会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等等。[①] 在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处期间，苏联驻华使馆曾经对中共代表表示冷漠与疏远，尽量避免对中共作出任何承诺。[②]

可以说到战争结束时，苏联政策的主旨是通过与美国和国民政府协调政策来争取自己的战略利益，不愿在国共问题上与美国和国民政府对抗。苏联更在意的是它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得以实现并得到保障，对中国内部问题如何解决远不像美国那样热心，它所坚持的是国民政府不能用武力消灭中共，因为中共毕竟是中国唯一始终高举联苏旗帜的力量，而且支持中共对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至于政治解决的方案与过程，苏联基本上不予关注。

蒋介石处理国共问题的一贯方针就是削弱、消灭中共。在 1945 年 5 月下旬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已经断定，中共“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国民党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解决。[③] 在此之前不久，蒋介石已经下达命令，要求各战区“集中全力”消灭中共军事力量。[④] 不过，尽管蒋介石本人倾向使用武力，但到抗战结束时，他遇到两方面的障碍。其一是国民党内意见并不一致，对武力解决持反对态度的人很有些影响力。[⑤]

第二个障碍更严重。8 月 14 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政府立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其在全中国的统治，包括控制华中和华北被中共军队占领或包围的广大地区，以及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被极大地削弱，并龟缩于遥远的西南地区，蒋介石根本无法实现“分割”、“围困”中共的军事计划，他确实需要时间进行部署，在短时间内无法聚集起向中共军队发动战略进攻的军事力量。

蒋介石需要美国的支持，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包括：美国突出地强调了国民政府接受在华日军投降的合法性，致使中共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驻太平洋地区和驻华美军为国民党军队向华中和华北大规模运兵；美国承诺继续向国民政府

---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 2 册，第 588、602、609 页。

②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03—105 页；A.M. 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第 241—242 页。

③ 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 年版，第 921—922 页。

④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89 页。

⑤ 参阅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 29—30 页。

提供军事援助，等等。[①] 但是蒋介石一定清楚，美国虽然支持他“军令政令统一”，但并不赞成他使用武力统一；苏联更是如此，绝不会接受国民党用武力消灭中共。蒋介石至少也要做出政治解决的姿态和尝试，一方面可以利用中苏条约签订后的政治主动权和优势，迫使中共妥协，同时也可以为未来使用武力造成更有利的政治环境。蒋介石在中苏条约签订当天即电邀毛泽东“惠临陪督”，举行国共首脑会谈，这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的结果。[②]

12月下旬马歇尔来华后，蒋介石同意接受美国的调处，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国共矛盾，其原因同抗战刚结束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相比，并没有根本变化。经过10月中旬以后的国共华北和东北军事冲突，蒋介石再次断定，国民党军队仍然不具备武力消灭中共的必要条件，他还需要时间进行军事部署和争取美国的进一步支持。[③] 国民党中宣部的文件比较贴近蒋的判断，该文件认为美国调整政策有四个目的：(1) 争取美国国内舆论支持政府的对华政策；(2) 促使苏联承担支持国民政府的“道义的及条约的责任”；(3) 运用舆论“有力支持”马歇尔调处；(4) 解决国共争端的条件是“改编中共军队，同时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国民党应“配合此一局势”，继续“用政治方法解除共产党武装”。[④] 此后蒋介石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限制军事行动、恢复国共谈判以及缓和中苏关系等表明，他确实暂时压抑了使用武力的倾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避免大规模内战，争取用政治方式推进民主改革，一直是中共中央处理国共关系的重要考虑。这既是因为中共力量相对弱于国民党，也是因为中共领导人认为，国共关系的发展与国际政治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当苏联与美英结成同盟时，中共就不能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国民党也不能推行反共

---

① 参阅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176页；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3—44页；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s: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Chapter 32。

② 参阅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③ 参阅牛军："Guomindang and CCP Polici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rshall Mediation", *George C. 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 edited by Larry I.Bland, Lexington, 1998, pp. 235–254.

④ 《国民党对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之分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5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号5/6 0453.2100。

的独裁政策和用武力消灭中共。[①]这在当时其实是对中共有利的局面。

1944年期间，国民政府因军事失败面临政治和外交危机，以及赫尔利调处国共谈判失败，一度促使中共领导人考虑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不过从七大制订的有关政策看，中共中央并没有改变基本方针。七大政治报告中公开明确地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过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表明，中共领导人在联合政府的具体形式上至少有三种估计，即：(1)“政府还是独裁的”，中共参加做官；(2)“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实质是蒋介石独裁；(3)以中共为中心。毛泽东虽然强调第三种是发展“规律”和中共的目标，但前两种形式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②]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第二种形式是相当接近美国的基本设想，即建立蒋介石领导的、容纳其他党派参加的政府。

中共领导人在抗战结束前已经基本断定，苏联不大可能像在东欧国家那样，直接援助中共。[③]他们对战后美国是否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关注程度，实际上超过了对苏联政策的关注。毛泽东固然对苏联领导人要求他去重庆谈判感到不满，但真正引起他重视的很可能是斯大林关于内战前途的悲观预言，即所谓“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④]其实不仅斯大林如此告诫中共中央，苏联驻华使馆、东北苏军等等，均相信美国极有可能在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而且结果将是中共遭受毁灭性的失败。[⑤]当然可以设想，苏联是不会为了中共与美国开战的。正是因为受到苏联判断的影响，毛泽东才相信：“在欧洲……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中共如占领南京、上海一类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反之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这种看法显然是中共中央当时决定恢复国共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决定了中共中央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方案，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现在是独

---

①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534页。

② 《对“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03页。

③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7页；《王若飞同志报告记录》，1945年8月3日，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6442/1，4。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⑤ A.M.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第299页；《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年11月12日；《彭真关于友人警告东北绝不能打》，1946年1月26日；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432页。

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①]

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共军队很快在华北和东北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过中共中央仍然认为，今后六个月是向和平过渡的阶段，“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当前争取军事胜利是为了和平更迅速实现。[②] 当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和马歇尔使华后，中共中央很快决定恢复国共谈判，并且认为马歇尔调处的政治方案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军队整编方案也很有些可取之处。[③] 实际上，国共达成的政协决议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在七大设想的联合政府的第二种形式。所以中共领导人一度相信，“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中国有可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④]

从中共在战后参加国共谈判的过程看，其政治方案基本上没有超出七大的设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领导人还没有改变他们思考有关问题的基本逻辑。根据中共领导人在七大期间的估计，首先，苏美英的合作关系还会继续下去，不可能爆发反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很难发动反共内战；其次，苏联可能不援助中共，即“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尽管从理论上说那是“一定要来的”；第三则是可能“出了斯科比”，即美国直接参加反共内战。[⑤] 即使在抗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中共领导人仍然认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⑥] 合乎逻辑的是，既然美苏均承认蒋介石政权并要求和平解决国共矛盾，中共也就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更何况中共是力量弱小的一方，尽可能避免或推迟内战是合理的选择。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避免内战，做出妥协是不可避免的。

---

①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6、398页。

② 《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372页。

③ 周恩来：《中共愿在公正的基础上同美国和国民党继续合作》，1946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2—94页；《毛泽东盛赞政协成就》，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军队整编的方针的指示》，1946年2月8日。

④ 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1946年1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中国人民大学1981年印，第120页。

⑤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第194页。

⑥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456页。

综上所述，抗战结束后国共确实存在过达成协议、避免内战的机会，因为美苏国共都曾经共同接受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国共矛盾的政治安排，国共双方不论当时基于什么理由，至少都有意尝试找到政治解决的办法。

二、内战与冷战

任何机会都是相对于某种条件而言的。肯定国共存在过达成协议、避免内战的机会，是相对于当时内外形势而言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哪些条件变化导致中国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内战对美苏东亚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美苏国共关系的框架下探讨这个问题，其核心就是探讨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的关系，以及国共两党如何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时利用美苏政策的调整。

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同盟条约基本上是在战争时期签订的，当时取得战争胜利是压倒一切的，因此那些国际协议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必定要受到军事考虑的影响。美苏领导人也非常清楚，为打赢战争做出的许多临时安排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所以他们选择的解决办法通常都是权衡战时和战后双重需要的结果。具体到东亚和中国，美苏分别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各种复杂的考虑交织在一起，而它们选择的解决办法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谓“蒋之下的和平”作为一种政治安排，其背景是美苏对各自战略利益的盘算和协调，即双方承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此前提下苏联承认美国在战后中国政治中居主导地位，美国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越权益。[①] 换句话说，美苏解决国共问题的办法是基于对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一旦它们对各自获得的战略利益不满足，或认为对方超越了界限，双方关系必定出现动荡，并冲击为解决国共争端做出的安排。

另一方面，美苏在考虑各自的对华政策时，的确对中国内部问题给予相当严重的关注，但这并不是因为国共争端本身对它们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们的着眼点是避免因国共斗争导致它们之间的军事冲突，并争取在既定的格局中尽可能地限制对方。换句话说，如果美苏认为没有必要和没有可能因为国共争端而导致它们之间的战争，以及不至于因对方利益扩展而严重损害自己的基本利益，其实它们并不

① 参阅《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0—162、165、236—253页；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德语专业1971届工农兵学员译、教师校：《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57页；W. 艾夫里尔·哈里曼和伊利·艾贝尔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出版社，1978年版，第413—414、424、444—446页。

会对国共争端给予特别的关注。

美苏的战略考虑和它们之间形成的既相互限制又相互妥协的复杂关系，比较典型地反映在1946年初中国同时进行的两场谈判，即有美国参与调处的国共谈判和中苏关于东北经济问题的谈判。两场谈判的背后是东北苏军和华北美军事实上形成的军事对峙。

抗战结束后，美军陆续在中国登陆，最多时数量达11万之众，其中大部分驻扎于华北。美军声称驻扎华北的理由是解除那里日军的武装和安排遣返，实际上他们也是在阻止中共受降，帮助国民政府争夺和控制交通要道，后来还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美军甚至不惜利用投降的日军协助保护交通线。美军扮演的角色不仅加剧了中国内战的气氛，而且华北美军不断与中共军队发生军事冲突。11月中旬魏德迈向华盛顿发回相当悲观的报告，声称如果美国帮助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就必须大批增加军队，并冒介入中国内战、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危险。否则除非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蒋介石无法控制东北和华北。①

马歇尔的看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局势的反应。他声称如果中国因为国共内战而四分五裂，而苏联又利用这种形势控制东北，美国就失去了“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自己动手拯救蒋介石，就“不得不接管中国政府”，美国将“承担起无尽无休的义务”，中国也将因此成为“国际冲突的角逐场”。② 杜鲁门政府在反复权衡后，选择通过调处争取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共争端，既是为了挽救蒋介石的危局，也是为了使美国摆脱困境，使美军尽早从中国脱身，避免在中国与苏联发生直接对抗。美国一再向苏联保证，驻华美军在完成遣返日军任务后将撤出中国，尽管尚不能定出时间表。③

苏联10月即开始从东北撤军，但蒋介石撤退东北行营和命令进攻山海关后，苏军迅速南返，并向国民政府东北行营提出撤军前谈判解决东北经济问题。苏军延缓撤军表面上是应国民政府的要求，在国民党军队无力接收时代为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实际上是要防止美军进入东北。当时魏德迈正在中国考察军事形势，苏联方面将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采取强硬的姿态与魏德迈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认为魏德迈

---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91—192；*FRUS*, 1945, China, Vol.7, pp. 650–660, 63–665, 679–684。

② *FRUS*, 1945, China, Vol.7, pp. 763–764；沃尔特·拉弗贝著，游燮庭等译：《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0页。

③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7—323页。

使命“极其庞大，有垄断全（中）国，甚至有侵入东北的企图”。[①]

为了防止美军借机进入东北，苏联一方面采取实力政策，占领交通要道，不允许任何运送国民党军队的美国军舰在东北港口停靠。另一方面苏联也迅速采取措施缓和中苏关系，消除美国干预东北问题的借口。首先，苏联否认曾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在东北的苏军要求中共军队退出大城市，并沿铁路两侧后撤50公里，以及苏军撤出前不得在东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在重庆的苏联驻华使馆则在国共谈判中回避、拒绝与中共代表协调立场；[②] 其次是斯大林向国民政府表示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表示愿意在东北经济问题上有所让步，并重申以往对国共争端的立场，不反对美国的调处努力等。[③] 不过苏联的条件也相当明确，就是不允许美军进入东北，以及国民政府不能奉行反苏政策。[④] 第三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重申以往的有关承诺，即赞成“在国民政府下”的民主统一，以及苏军按时从东北撤军等。[⑤]

总之，美国的目的是通过促成国共妥协、实现中国统一来限制苏联；苏联则试图通过控制东北经济，从根本上阻塞美国向那里渗透的渠道。这种限制与反限制的关系之所以以谈判的方式出现，深层原因包括美苏都不希望因为中国问题而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甚至不希望保持长期的军事对峙，所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发表的有关公报突出强调了双方保证从中国撤军。

国民政府作为唯一同时参加两场谈判的一方，扮演着相当重要但的确有些尴尬的角色。它的真正的悲剧或许就在于，这种角色增加了它自以为在东亚战略中地位特别重要的虚幻感，而它实际上并不具备支配局势的实力和能力。

蒋介石在1945年末决定恢复国共谈判，是有其战略考虑的，包括：(1) 配合美国以争取其在国共斗争中给予有力支持，并利用美国来平衡苏联在东北问题上施加的压力；(2) 缓和中苏关系以便顺利接收东北，并再度造成孤立中共的国际环境，其最终目标包括击败中共，不论是以什么方式。

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的策略是通过政治上的让步，争取马歇尔帮助取消中共军队。同时利用美国对苏联的猜疑，寻找撬动美国政策的杠杆。美国政府本来就对苏

---

① 《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年11月12日。

② 参阅牛军：《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斯大林与毛泽东》，第384—385页。

③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A.M.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第24—25页。

④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21页；A.M.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第27页。

⑤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322—323页。

联在东北的行动相当关注，马歇尔本人甚至将排挤苏联出东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问题是美国并不准备为蒋介石火中取栗。按照马歇尔的设想，实现中国政治统一是阻止苏联扩张的根本办法，否则中共通过苏联的帮助而加强，就会削弱国民政府在东北的地位。[①] 所以，马歇尔要求蒋介石在政治和军队整编等问题上让步，并敦促国民党方面接受中共关于华北全面停战的要求，以便能派遣更多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同时马歇尔也坚决要求中共允许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调动。

蒋介石为了确保关内的军事优势，并不打算将精锐部队悉数送到东北。他的计划是通过缓和中苏关系，利用苏军协助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所以只同意派 5 个军前往东北接收，并准备在中苏经济谈判中作出让步。政协、军队整编等协议上签字后，蒋介石认为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必须不断引导美国给予“回报”，包括在外交上继续抑制苏联和向中共施加压力、允许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使用武力。显然，在马歇尔调处初期，美国与国民政府在诸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

在同时进行的中苏关于东北经济的谈判中，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某种程度的让步，争取苏联保证它能顺利接收东北。1945 年 11 月中旬，蒋介石在撤退东北行营时便指示负责东北经济事务的张嘉敖，如果中苏关系有可能缓和，就同苏方谈判经济合作。[②]12 月，蒋经国访问莫斯科期间进一步向苏联保证，决不将东北作为反苏基地，不在中苏边界驻军，并愿意与苏联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接受苏联在那里拥有“优势地位”，条件是苏联促使中共妥协，并延缓撤军以协助国民党军队接收。[③] 蒋介石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以解决经济问题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而且做出愿意让步的姿态，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回避；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军队攻占锦州后，暂时无力向北发展，不得不暂时争取苏联的协助。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一度出现改善的迹象。苏联将注意力集中于中苏谈判，不仅没有干扰马歇尔调处，还利用自己的影响促使中共下决心停战。中共曾经希望由苏联充当“东北之马歇尔”，但苏联始终拒绝参与。1 月上旬，营口战斗爆发后，马歇尔提出派军调小组进入东北。中共当时接受这个建议也得到苏联的赞成。[④] 由于中苏关系缓解，此前苏联关于不允许东北有大批国民党军队存在和不允许美军进入东北的方针都有所调整。

---

① *FRUS*, 1946, China, Vol.9, pp. 142–143.

② 台湾《传记文学》，第 36 卷第 6 期，第 90 页。

③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 年 12 月 30 日，第 15—23 页。

④ 《中央关于东北停战谈判情况致东北局电》，1946 年 2 月 12 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 年版，第 76 页。

2月中旬以后，中苏关系再次逆转，主要原因是美国公开干预中苏谈判。这固然同美苏关系趋于紧张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国共谈判进展顺利，关内局势相对稳定使马歇尔感到有必要也有机会在东北问题上向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他鼓励国民政府不要向苏联让步，不要害怕苏联拖延撤军。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建议，应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迫使苏军撤出东北。①2月9日，美国分别照会中苏政府，反对只由中苏两方谈判处理日本在东北的财产。②这实际上是支持国民政府抵抗苏联的压力。此后不久，美英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两国舆论开始报道和指责苏联在东北提出新的要求和苏军停止撤出东北等。3月5日，美国务院指示凯南告诉苏联方面，美国希望在国民政府完成接收东北以后再讨论东北经济问题。③

国民政府本来就反感苏联的过分要求，美国给予公开支持无疑促使其放弃合作的方针。1月间，蒋介石通过马歇尔、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等了解到，美国不满意苏联对东北经济的政策。④2月间在重庆等城市爆发了学生反苏示威游行，那里的公众中明显地存在着反苏情绪，这对国民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加之国民党军队在停战后仍然可以调入东北，这一切使蒋介石不愿意再对苏联让步。他指示东北行营，对苏经济合作“只可缩紧，不宜太宽”。他于21日进一步提出两个原则，即（1）不承认苏联将东北日产作为“战利品”；（2）与苏联的正式协议须于接收东北之后再谈。⑤中苏间的缓和气氛开始逐步消失，美国随后采取的行动使蒋介石备受鼓舞。他认为美国舆论谴责苏联“日渐积极”，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几使人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将来临之感矣”。⑥3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照会，拒绝苏联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要求。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国民政府的反苏倾向日益明显，它虽然还不打算全面恶化中苏关系，但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肯定不复存在，中苏经济谈判也不了了之。

中苏关系恶化与国共在东北的关系紧张几乎是同步的。蒋介石不仅敏感地注意到美苏关系趋紧，而且认为马歇尔“对共党阴谋，似有略进一层之认识”，其立场将越来越向国民党倾斜。⑦结果是他在东北问题上越来越强硬。3月11日，马歇尔

① *FRUS*, 1946, China, Vol.9, pp. 427–429.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17页。

③ *FRUS*, 1946, China, Vol.9, p. 1114.

④ *FRUS*, 1945, China, Vol.7, pp. 814–815；*FRUS*, 1946, China, Vol.10, p. 1102.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第1册，第417—418、420—421页。

⑥ 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第14册，“中央日报社”，1980年版，第46、49页。

⑦ 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28页。

提出一项派军调小组进入东北的命令草案，它反映的基本上是国民党方面的立场。4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东北“只有接收主权”，任何人不能借外交困难要挟政府。[①]这等于是公开拒绝中共有关谈判的建议，更重要的是它的基调与马歇尔的草案完全一致，所以美方从未要求蒋介石改变其立场。在四平之战白热化的时刻，蒋介石拒绝了马歇尔的停战建议，声称此刻对中共让步“实无异对俄国妥协”。结果是马歇尔同意再为国民党增运两个军去东北，这对东北形势产生何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②]蒋介石利用美国限制苏联的企图，决心在东北用武力彻底打败中共，而马歇尔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纵容和支持，双方在东北逐步形成战略接合点，这是东北爆发内战的主要原因。

中共领导人对国共谈判以及通过谈判达成的三个协议的态度如前所述，是相当肯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美国已决心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的政策和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均对中共有利，“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③]这种看法同样影响到中共在东北的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在华北和东北取得“有利地位”，甚至取得“自治地位”，是迫使国民党妥协，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④]尤其是在东北取得有利地位，更是毛泽东的长期战略虑，即根本改变中共长期被包围的态势和形成国共合作的条件。[⑤]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由于得到东北苏军的支持，中共中央一度提出夺取整个东北的计划。[⑥]随着中苏关系缓和以及东北苏军的阻挠，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夺取全东北的计划，但仍然认为东北内战难以避免，必须准备在1946年春与国民党军队决战，而且任何与国民党的妥协都必须有美苏妥协的外部条件。[⑦]

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对东北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开始对国民党“采

---

①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四辑，第2册。

② 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55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第5册，第116页。

③ 《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军委关于保卫张家口、承德的部署》，194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94—495、526页。

④ 《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

⑤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34—435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第218—219页。

⑥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第388—389页。

⑦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页。

取和平合作的方针”，暂时不向国民党军队进攻。[①]1月下旬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在东北“力求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②]中共政策变化的原因除了国共关系总体缓和以外，也包括中共领导人对美苏政策的基本看法。首先是在美苏关系紧张的局势下，他们担心即使打败国民党军队，美军“还有可能进入东北”；[③]苏联关于东北内战将“惹起美军入满”的警告无疑加剧了他们的担心。[④]其次是他们相信，“苏联不会助我在东北内战，但可助我与蒋获得妥协”；[⑤]另一方面只要美国认为中共无意独占东北，它也不会反对和平解决东北问题。[⑥]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是有条件的，即国民政府必须承认中共在东北一定的合法地位。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估计，东北中共军政力量已经达到30万人，“如没有一批中小城市在手的根据地，则这大军队势不能存在”。[⑦]实际情况是蒋介石不接受中共的有关建议，同时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不积极向北接收，而是利用苏军缓撤的机会，不断攻占中共控制地区。特别是停战后国民党军队经过调兵遣将，在南满集结了五个军，它们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发动所谓“扇形攻势”。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势，中共中央断定东北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必须给国民党军事打击，否则东北不可能和平，中共在那里也无地位可言。[⑧]

显然，只要国民党不放弃独占东北的政策，中共必定要进行军事反击。苏联当时已经停止援助中共，而且拒绝中共要求，不参与国共解决东北问题的谈判，它能用来影响中共的唯一办法就是声称美国可能直接干涉。但这个理由是否能改变中共军事反击的决心值得怀疑。中共此时在东北已经拥有实在的战略利益需要保护并加

---

① 《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对满洲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

②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58页。

③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第465—466页。

④ 《彭真关于友人警告东北绝不能打》，1946年1月26日。

⑤ 《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第52—53页。

⑥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第57—58页；《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第53页。第77页。

⑦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第57—58页；《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第53页。

⑧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第57—58页；《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第53页。

以扩展，中共中央认为若一味退让将损害已获之战略利益，并“造成党内纠纷”。从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强调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严厉语气表明，东北中共部队中一直存在应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甚至反抗苏军施加的压力的强硬主张，而且相当强烈。另外中共中央也越来越相信，美国和国民政府虽然对苏联不满，但在东北全境大打“均有顾虑”。①

3月上旬，苏军开始迅速从东北撤军，国共仍然无法就解决东北问题达成协议，而马歇尔提出的方案明显有利于国民党。中共中央因此断定，苏军撤退后“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军事冲突即将展开”。② 国民党军队在南满不断攻城掠地，中共军队被迫向北收缩，客观上造成了控制北满的机会。中共中央于3月下旬决定实施控制北满的战略，利用东北停战协议生效和军调小组即将进入之前，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和中东铁路。③

尽管东北苏军表示支持中共的计划，中共中央基于以往的教训仍然要求苏军保证，不要再因为中苏关系缓和而出尔反尔。④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四平中共守军发起攻击，此前中共代表抗议美方向东北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超过协议规定，被美方拒绝，东北局势已无缓解余地。18日中共军队按计划攻占长春，此后相继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

东北军事冲突就像导火索，迅速引爆全面内战。重要的是当全面内战爆发时，美苏国共四方大致廓清了它们的关系和各自的基本政策。如前所述，美国和苏联调整各自的对华政策时，它们的主要目的均包括限制对方在中国取得超出雅尔塔秘密协议规定的战略利益。在美国看来，苏联战后初期在东北的行为有可能破坏双方达成的协议，它将通过支持中共造成中国分裂，并因此有机会垄断东北。美国的成功之处是通过外交压力和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使苏联没能在撤军后合法控制东北经济，不过美国根据自己对苏联在东北意图的估计——它可能来自美国在其他地区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至今没有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采取的行动，造成了美苏和中苏关系紧张，至少间接地破坏了国共谈判的气氛，从而损害了美国的战略目

①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9—91页。

②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2页。

③ 《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3月24日；《中央关于东北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给林彪、彭真等的指示》，194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0—103页。

④ 《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1946年3月5日。

标。苏联固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国民政府同样无法稳定地控制东北。

苏联的政策同样受到在其他地区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的影响。它在东北问题上的一些强硬措施和对国民政府——包括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过度逼迫，主要是因为对美国扩张在华势力，包括美军进入东北等深感担忧。至今无法证明，如果苏联不采取那些措施，美军是否会进入东北。从实际情况看，苏联通过支持中共彻底破坏了国民政府控制全东北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没有达到中苏边境地区，东北长期动荡也使美国无法取得稳定的立足点，虽然还不能证明美国有过那种打算。

另一方面，美苏调整政策的目的也包括双方分别在华北和东北大规模驻军的情况下，通过消弭中国内战来避免它们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局势演变的结果是国共内战未能被消除，但是美苏显然已经不可能被卷入其中。马歇尔 2 月间即向杜鲁门提出，为便于向苏联施加压力，应撤出驻华美军。[①] 苏军撤出东北后，苏联强烈要求美军全部撤出中国，实际上美军撤出也只是时间早些晚些的问题了。随着美苏在中国的军事存在日益削弱，它们都将中国问题放在政策列表中比较次要的地位。美苏关系固然对中国内战爆发有直接的影响，当冷战在欧洲愈演愈烈之时，国共战争成了名副其实的内战。不过美国与苏联分别与国民党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已经具有的战略性质大致预示了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将很难不被纳入到国际冷战体系。从这个角度看，东北内战可以说是冷战向东北亚蔓延的开端之处。

从国共的政策演变的角度看，国共的种种选择及双方关系的发展，固然受到美苏政策的巨大影响，但是它们在进行国内斗争的每个阶段上，无不尽可能地利用了美苏的矛盾。国共在处理各自的对美对苏政策时，往往是非常现实的，但不论在策略上如何运用，它们对国际政治分野的看法和各自的基本选择从来没有改变。随着美苏关系恶化，国民政府感到无法也不愿再向苏联妥协，所以蒋介石拒绝了斯大林对他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中苏经济谈判也不了了之。此后国民政府一心一意地依靠美国的援助来打败国内的对手，尽管美国的援助比它希望的和预期的要少。

中共在应付美苏关系变动中的最大收获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国介入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愿望都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美国不可能在军事上直接卷入。这一判断对中共中央此后的战略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开始公开谴责美国对华政策，并配合苏联外交努力，要求美军尽快撤出中国，可以说中共已经将美国视为国际敌对势力。另一方面，中共的政策明显受到苏联的影响，尤其在东

---

① *FRUS*, 1946, China, Vol.9, pp. 428–429.

北和与战的问题上，不能不考虑苏联的态度，但苏联政策的反复无常也加深了中共决策层对苏联的疑虑。当中共领导人决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时，他们实际上也下决心不再受苏联外交战略的约束，尽管苏联向中共提供的帮助比他们预期的要多。

三、革命中的新格局

从抗战结束到内战爆发，美苏国共关系实际上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从现象上看，国共内战爆发后，美苏对中国局势的关注明显地迅速下降。当国共矛盾演变为争夺国家政权进行殊死较量时，美苏却全神贯注于欧洲和近东地区的对抗。美苏是世界级的大国，它们的对华政策固然受到它们在其他地区的矛盾、对抗、经验等等的影响，但是严格地说它们主要是同国共矛盾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从1947年秋季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攻起，真正影响美苏国共关系变化的主要事态是中共在内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47年春美苏冷战的升级和相关的国际格局的形成等，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必将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将摧毁以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为蓝本的国际秩序，有关国家必将面对一个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国家。1948年11月解放军攻占沈阳后不久，中共中央立即宣布，“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①] 差不多在此前后，美苏均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总的说来，美苏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都是维护它们各自的在华利益。从后来的结果看，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不断胜利发展，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逐步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势力和利益被彻底清除出中国；苏联则相反，其政治影响逐步扩大，直到与新中国结成同盟。苏联固然在客观上占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地理上与中国接壤，美国则远在万里之外。但导致上述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苏同中共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苏联是中共的支持者，不论这种支持达到何种程度和有何种复杂的特点；美国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对者。不过当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剧烈的和根本性的变动的时刻，这种本质的区别大致决定了美苏对华政策演变的方向，至于演变的过程的确是相当复杂的。

随着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政府尽管在公开声明中继续表示支持和平解决国

---

① 《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中国军事形势》，1947年11月14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下册，第311页。

共争端，但它在1947年1月以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表明，其政策已经转向支持国民政府进行反共内战。[①]这项政策几乎立即被中国军事形势的急剧转变证明是注定要破产的。从1947年7月魏德迈使华到1948年末开始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而最终未能实现，再到企图"等待尘埃落定"[②]结果却被逐出中国，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摇摆、矛盾之中。

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突出反映了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特点，即不论从经济、文化等等哪个方面看，美国都缺乏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在某个时期对于美国是否重要，主要取决于它在美国战略棋盘中所起的作用。太平洋战争期间，罗斯福政府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主要是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同样，当蒋介石下决心用武力消灭中共时，冷战正愈演愈烈，同苏联的尖锐对抗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同遏制苏联联系在一起。1947年间，美国政府中对国共斗争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中共如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肯定会站在苏联一边，中共正在为苏联的"目标服务"，而且中共已经表明将"忠于苏联"。[③]正是因为视国民政府为"苏联在亚洲扩张的一大障碍"，美国政府立即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并不断增加向后者提供援助。当后者已经被历史的进程证明注定要垮掉时，美国政府仍然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抢救。

但是即使是为了遏制苏联，中国的重要性也只是相对的。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用美国人的话说："如果我们失去西欧，……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④]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了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只能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不论美国会中亲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帮"和"援华游说团"如何鼓噪"不能忽视中国"，都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国政府的决定。

美国领导人当时对中国的看法同样加剧了美国战略安排的后果。杜鲁门曾经声称：抗战胜利时"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1911年以后"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利遍及全国的中央政府"。[⑤]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战略作用的评

① 可参阅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0—697页。

② 这是一句代表艾奇逊任内对华政策的名言，形容其犹豫观望的态度，参阅《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248页。

③ *FRUS*, 1947, China, Vol.7, pp. 214–215,347–350, 678–682, 693–695.

④ 威廉·曼彻斯特著：《光荣与梦想》，第2册，董乐山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19—220页。

⑤ 哈里·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1页。

价与抗战时期相比已经一落千丈。如果说在抗战期间美国有意与国民政府建立某种有意义的战略联盟，那么马歇尔使华失败则意味着那种战略联盟的设想终于破产。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固然对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发挥遏制苏联的作用有所期待，但是随着国民政府的步步失败，美国政府几乎彻底失望。美国政府内部认为："在可见的将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只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而最糟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即使苏联也"只会把它看作一个巨大的贫民院，避免对它承担责任"。[①]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基本上完成了对日政策的讨论与修订，一项扶植日本的政策开始付诸实施。[②]欧洲优先、贬低中国的战略价值和扶植日本等等，构成了解放战争后期美国考虑对华政策的几个关键性环节。

当国民政府行将崩溃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混乱。想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又无法摆脱国民政府的纠缠；企图通过与中共建立一些联系以便维护住在华利益，包括商业利益、文化联系以及如果可能也保持一些影响（如离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等等，结果却事与愿违。诸多论著分析了造成美国"脱身"不成的原因，不赘述。这里只是强调美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敌视主要源自美国人的冷战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反革命"思想，这两种观念在深层次上决定了美国无法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做出合理的反应。

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框架中，美国人将战后不论哪里发生的革命运动都归结为苏联的"扩张"，各国的共产党都是苏联的"第五纵队"。同样，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决策层即断定，中共的胜利"有利于苏联的扩张主义目的和长期目标"，因此"显然是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的"。[③]既然中国革命也是苏联"扩张"的工具，根据杜鲁门主义的规范，它属于苏联"间接侵略"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有责任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在根深蒂固的"反革命"意识形态影响下，美国人视任何社会革命如洪水猛兽，认为社会革命将造成无政府状态，摧毁或打乱一切秩序，当然也包括美国正在从中获利的国际秩序。[④]从美国有关人士的言论——不论是司徒雷登建议中共在新政权中"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派"[⑤]，还是艾奇逊对"中国又要

---

① *FRUS*, 1948, China, Vol. 8, pp. 146–155.

② 可参阅于群著：《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美国对日政策大论争"部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5—111页。

③ *FRUS*, 1947, China, Vol.7, p. 838, 387.

④ 美国学者称之为"反革命意识形态"，可参阅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Chapter 4 "The Perils of Rev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93–124。

⑤ 《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年6月7日。

回到纷争割据的老路上去”的分析和对新中国将成为“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或“不文明国家”等等的标准的议论[①]——都清楚地表明，那些参与美国政策制订的人们并不理解，中国革命产生于中国社会内部极其深刻的矛盾，以及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民族解放与社会变革的两重性。结果是不论美国政府内部曾经多么认真地考虑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实际上在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方面，美国始终是步步为营的。美国人的言行无法掩饰地流露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蔑视，因而通常都被视为敌视和挑衅性的，其结果是导致美国走上与新中国对抗之路。

苏联同样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在东亚以确保雅尔塔秘密协议划定的格局为基本界限，即巩固对安全缓冲区的影响和争取经济利益。中国内战爆发后，尽管东北苏军与中共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并向后者提供了援助，但很难说那意味着苏联政策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即使在东北苏军鼓励中共夺取北满的战略要地的时期，重庆的苏联大使馆仍然拒绝与中共代表交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的力量如此弱小，很可能在大规模内战中被打败，特别是国民政府得到美国的支持。所以苏联对中国内战的关注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迫使美国撤军和防止美国直接的军事干涉。

当苏联确定中共已经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后，它开始根本改变对华政策，从战略层次上考虑加强与中共的关系。事实表明，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苏联对中国事态发展的理解力远远超过美国，其反应也合理得多。从 1948 年春季起，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明显变得越来越积极。斯大林告诉当时受命负责对中共援助的科瓦廖夫，苏联将尽量帮助中共，只要“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障”。[②] 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到东北后明确向中共方面转达，苏联将向中共提供更多的援助，并有意与未来的中共政权发展关系。

不过，苏联领导人不仅考虑意识形态问题和中共站在“哪一边”，而且必定会认真地考虑和了解，中共取得政权后实行的内外政策将在东亚造成何种新的国际秩序，以及苏联的利益在其中能否和如何得到保障，等等。差不多从 1948 年冬季起，斯大林显然感到有必要全面了解中国形势的发展和中共的内外政策，并亲自掌握对华政策。不过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即遭到中共领导人的坚决抵制。1949 年 1 月 10 日，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就国共和谈问题提出建议，结果遭到中共领导人的

① 见袁明、哈里·哈丁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21 页。

② N.B. 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国外社科信息》，1992 年第 21 期，第 29 页。

拒绝。他经过认真地解释说明以后，才得到中共领导人的理解。[①]很可能是接受了这次教训，米高扬在会见中共领导人时出言特别谨慎。

这一时期苏联最有意义的决定是立即派遣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 1 月前往西柏坡，以及 7 月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刘少奇率领的中共高级代表团。通过两党高层互访，苏联与中共中央就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取得了相当一致的意见。在协调政策的过程中，苏联不仅基本上保全了它的既得利益，而且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其结果是它与新中国结成同盟。

与美苏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同时，中共中央开始为新政权制订对外政策。从中共领导人面临的客观形势看，美苏政策的调整或多或少地留给中共领导人一些选择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共政策的研究应该从中共的指导思想和中共对有关事态发展的反应过程两个层次加以分析。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主要还是从革命者的角度认识有关问题的，所以必定要以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为指导并在中国革命运动经验的影响下，制订对外政策和处理与美苏的关系。他们历来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它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不论当时是否发生美苏冷战，上述理论思想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共领导人对美苏的态度。实际情况是，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几乎立即接受了苏联关于“两大阵营”的观点，并明确表示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包括“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美国的帝国主义“奴役计划”。[②]“一边倒”的确既形象又典型地揭示了中共领导人的基本倾向和基本选择。

不过确切地说，“一边倒”更多的是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③]它所要阐述的不仅是在美苏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处理与美苏关系的一般原则，而且包括着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的基本设想。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正开始考虑如何建立新的政权。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如何处理与美苏的关系是同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共与苏联高层互访和沟通表明，如果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做到基本协调，后来的苏联与中国结盟以及中国成为苏联阵

---

① 参阅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58—1260 页。

③ 参阅章百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3 页。

营的成员等，都是不可能的。[①] 反之，美国不仅在行动上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同时还企图干预未来中国政权建设，这是使中共领导人下决心停止与美国方面接触的关键性原因。[②]

需要指出的是，在美苏尖锐对立的冷战格局中，中共对苏联和对美国的政策必定要相互影响，问题是这种相互影响会达到什么程度。至少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在两个阵营中决定站在哪一边是政治原则，但政治原则与对外政策毕竟是有区别的。因此中共领导人对有关事态的反应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从这个层次上看，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维护中国革命运动的成果，争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他们当时衡量外部政治势力是敌是友的首要标准。对美国如此，对苏联亦然。毛泽东在决心彻底推翻国民政府的时候，不仅强烈谴责美国援助蒋介石，而且尖锐批评苏联人恐美媚美的精神状态，并要求坚决肃清其在中共党内的影响。他将这两者同样视为夺取革命胜利的障碍。[③] 在 1948 年末和 1949 年初相继发生的两件事情再次证明，在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美苏使用的标准是有内在的统一性的。

其一是 1948 年 12 月初中共中央接到报告说，一个自称与马歇尔等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告诉中共代表，美国承认中共政权的条件是新政权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在上海、青岛等地驻军。毛泽东对此反应强烈，此后挫败美国的此类“政治计划”成为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的问题。[④]11 月中旬中共军队封锁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后，中共中央曾经设想新政权有可能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⑤]4 个月后，中共中央确定了不急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交的被称为是“不承认”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美国的上述立场显然是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

其二是发生在 1949 年 1 月中旬的斯大林建议中共中央进行和谈。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直截了当地予以回绝。他告诉斯大林：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共不必再采取迂回的方式争取胜利。他还修改了斯大林给国民党政府的复电，这种勇敢举动在苏联阵营中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⑥]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维护革命成果的决心。从后来的发展看，斯大林显然接受了教训。在涉及中国革

① 《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7 月 4 日；《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信》，1949 年 7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04—424 页。

② 《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 年 6 月 7 日。

③ 《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存，编号 6512/2，5。

④ 《对“雷文和谈话摘要”的批语》，1948 年 12 月 4 日。

⑤ 《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1948 年 11 月 23 日。

⑥ 参阅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第 191 页。

命战略和重大政策等问题上，他对中共领导人的决定、方针和政策等等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这是苏联与中共关系能够比较顺利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

美国正相反，5、6月间司徒雷登在与中共代表接触时，仍然痴心不改，继续要求中共接受美国的主张，包括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新政府中要接纳“民主开明人士”和不与苏联结盟。① 正是美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干预和从中表现出来的态度，使中共领导人宣布他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②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共领导人立即予以猛烈地批判，中美走向对抗由此开端。值得指出的是，此时刘少奇正从莫斯科满载而归。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处理与美苏关系的宗旨就是挽救自己的覆灭，其努力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继续争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阻止美国从国共内战中脱身。总的说来，国民政府的努力效果不佳，只要是美国政府希望做的，国民政府都未能阻止，如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不再向国民政府提供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编制和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等等。美国之所以没有最终抛弃国民政府，固然同后者在美国的游说有关。但根本上与其说是国民政府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与中共关系变化使然，即美国与中共对抗的需要才使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得以延续。

其二是使中国内战国际化，利用国际力量的介入来阻止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由于美国有调处失败的经历，而且在内战中是国民政府的支持者，已经失去调处的资格，国民政府多少对苏联寄予希望。早在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时，蒋介石即表示要加强中苏关系。国民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也因不满于美国援助不力，声称寻求苏联帮助和出面斡旋国共冲突。③1948年初，南京一度风传苏联有意调处国共内战。1月7日，张治中会见奉召即将回国的苏联武官罗申，提到改善中苏关系和希望苏联“帮助中国达到和平的目的”。罗申表示将向国内报告。④ 国民党方面随后告诉美国驻华使馆，苏联有可能在国共间斡旋。⑤ 罗申返回中国后，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大使，更使上述说法增加了某种可信性。1949年1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函美苏英法，呼吁国际调停。国民党领导人肯定清楚，除了苏联，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影

---

① *FRUS*, 1949, China, Vol. 9, pp. 22–23;《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

② 《中共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6月30日。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30页；*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edited by 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Westview Press, Inc., 1981, pp. 176–177.

④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762页。

⑤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306—307页；

响中共的政策，所以他们真正寄予希望的就是苏联。在照会发出之前，国民党方面已经与美国大使馆探讨，以美国承认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换取国共“隔江而治”。[①]如上所述，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苏联明确告诉国民政府，它拒绝居间调停国共冲突。这一事件在中苏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苏联不再将国民党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对手。苏联与中共的战略合作关系已经明朗，国民政府与苏联彻底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了。

事实表明，当中国革命进入最后胜利的阶段，支配美苏国共关系的主要事态是中共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以及由此对东亚国际政治造成的冲击。美苏在中国的利益和影响基本上取决于它们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态度，以及试图和实际上与中共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中共的胜利则不可避免地使围绕中国展开的国际关系带上强烈的革命色彩。

结　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苏关系从同盟到敌人的变化和它们各自的对华政策的调整，均对中国政局、特别是对国共关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不过国共关系的演变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共两党各自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判断和有关的政策决定。它们不论在处理与美苏关系的哪个阶段上，都是以利用外部力量以便在国内斗争中取得有利地位为出发点和首要考虑的。总而言之，当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结束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对中国形势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程度不同，总的说来是有限度的和逐步弱化的。这表明当时大国干预中国事务的能力和愿望都有限，美苏之间在中国有限的相互遏制使国共可以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实力和能力一竞雄长。正是它们的斗争的结果（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从根本上影响了东亚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

（《历史研究》2002年第二期）

① 《中国近代对外资料选编》，下卷，第二分册，第484页。

论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它们的不足之处是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不会是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些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一、"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①] 有关的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未来新政权的外交政策。在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②] 从产生

① 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论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② 章百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并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目标，即通过激进的手段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屈辱地位和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对外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美国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美国等国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做出了不少规定。[①]

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明确并进一步阐述了"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②]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

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③]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话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其中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④]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了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

①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6页；《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9页。

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8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③ 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48期，第15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2—1473页。

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的总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美国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的研究成果详尽地提示了从1948年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指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思想及其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的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订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的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①]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党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法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②]但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析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07—109页。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3页。

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①] 毛泽东这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做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 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导致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②] 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③] 自 1942 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④] 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⑤]

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和他们的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66—672、681 页。杨奎松在他的论著中详细地分析了毛泽东当时提出上述论断的背景，见《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27—337 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 年 4 月 24 日。

③ 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 年 7 月 9 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34 页。另可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89 页。

④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 4—10 页。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396 页。

⑤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 年 10 月 17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61—1162 页。

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①] 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②] 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③] 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

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 1942 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包含的重要观点之一便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④] 不过它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 年 9 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⑤] 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⑥]

大约从 1948 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⑦] 四个月后，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⑧] 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他们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订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人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

---

① 《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 年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370—372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发布停止内战冲突的通告》，1946 年 1 月 10 日，《新华日报》，1946 年 1 月 12 日。

③ 毛泽东：《关于政协成就和当前任务的谈话》，《新华日报》，1946 年 2 月 9 日。

④ 关于“中间地带”思想的评价可参阅拙作《毛泽东革命外交战略的起源》，《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6 期，第 14—16 页。

⑤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第 5 页。

⑥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58—1260 页。另参阅《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446 页。

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 年 7 月 1 日。

⑧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48 年 11 月 1 日。

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发展趋势的总的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②] 因此可以说，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一边倒”方针的突出特征。

“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一位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③]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研究界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④] 新公布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⑤] 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⑥] 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央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

---

① 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第 15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72 页。

③ 章百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第 63 页。

④ 参阅刘建平：《苏共与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确立》，《历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

⑤ Andrei Ledovsl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ern Affairs*, No.2,1995; “The Moscow Visit of a Deleg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June to August 1949”, *Far Eastern Affairs*, No.5, 1996.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7 月 4 日；《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信》，1949 年 7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18、29—34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04—424 页。

⑥ 《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信》，第 29—34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9—424 页。

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美国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而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①] 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②]

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应有这样的气概”。[③] 具体到与美国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④] 在他们看来，唯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 1948 年 11 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是他们逐步改变了这种想法。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 12 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⑤]

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

---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第 1435 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89、197 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 805—806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30 页。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546 页。

⑤ 毛泽东：《对〈雷文和谈话摘要〉的批语》，1948 年 12 月 4 日；《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47 页；《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1949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第 152—155 页。

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①]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②]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③]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它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二、三大决策与新中国外交的内在矛盾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们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

---

①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1页；《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号6512/2，5。

② 《将革命进行到底》，第1374页。

③ 参阅《论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第104—105页。

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①] 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最终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决策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内向性”。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订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 19 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②] 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从缔结中苏条约到出兵抗美援朝，新中国的外交决策一直受到“内向性”和“外张力”的影响。这两种因素在历次决策中所起的作用的确是不同的，不过从总的趋势看，这一时期外交决策的发展表现为“内向性”受到“外张力”的牵引和抵制“外张力”的过程。

新中国第一个也是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 1945 年 8 月的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

---

①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可见周恩来：《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1951 年 4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4—37 页。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 年 11 月 16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130—135 页。

② 徐昕的《晚清中国外交：历史冲突中的失落与更新》和章百家的《20 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均涉及这一命题。见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挑战》，重庆出版社，1992 年版。

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①] 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他们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在建国后不久访苏时，有待他解决的问题主要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②]

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托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毛泽东当时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现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③] 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④] 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问题的。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⑤] 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⑥] 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

---

① 《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第15—16页。

②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③ 毛泽东：《周恩来赴苏参加谈判及签订条约》，1950年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2页。

④ 《毛泽东与维辛斯基谈话纪要》，1950年1月6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第10页。

⑤ 《周恩来赴苏参加谈判及签订条约》，第122页。

⑥ 刘少奇：《关于党派协商会议等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1950年1月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40页。

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①]

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②]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青年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③]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当时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它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做出有关决策的重要因素。

与苏联谈判签约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做出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本节开始时已经指出，“外张力”是一种产生于革命运动本身的向外扩展革命影响的冲动力。刘少奇为援越抗法起草的批示比较典型地展示了这种冲动力，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④]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做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赓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⑤]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做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⑥]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

①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3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第20—24页。

② 毛泽东：《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1950年4月11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1—132页。

③ 刘少奇：《中央关于向群众解释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电报》，1950年3月30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501—502页。

④ 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89—1969》，下卷，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版，第245页。

⑤ 刘少奇：《军委关于援助越南问题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年12月12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65页。

⑥ 《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2月24日，第186—187页。

作战。[①]到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几乎所需的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到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②]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批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③]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和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④]

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⑤]

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得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49年7、8月，开始允许朝军人回国。[⑥]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

①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668页。

② 刘少奇：《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86—187页。

③ 毛泽东：《关于同意与越南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年1月1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④ 可参阅 Zhai Qiang, "Transplanting the Chinese Model: Chinese Military Advisers and the First Vietnam War, 1950–1954",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57, No.4, October 1993, p. 692,。

⑤ 《刘少奇年谱 1898—1969》，下卷，第256页。

⑥ 刘少奇：《军委同意第四野战军中朝鲜官兵回朝鲜的电报》，1950年1月11日、2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49—250页。

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①]

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②]8月26日，周恩来在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明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③]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的类似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后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④]

毛泽东的决定很快便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时间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③ 周恩来：《充分准备，出手即胜》，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9页。

④ 毛泽东：《关于决定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9页。

平)”。[①] 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一些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担忧，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 10 月 5 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专门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②] 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 10 月 11 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说明了另一个对中国来说是更为严重的后果。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一旦北朝鲜陷落，北朝鲜政府和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③] 一旦出现斯大林所说的最后面一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④]

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 10 月 13 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 10 月 13 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他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⑤] 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

①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史达林电》，1950 年 10 月 3 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的解密文件》，中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版，第 576—577 页。

② 《史达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1950 年 10 月 8 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的解密文件》，中册，第 591—592 页。

③ Alexandre. Y Mansourov, “Stanlin, Mao, Kim and China’s K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en in The Cold War in Asi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5/1996).

④ 8 月下旬中国领导人曾考虑过迁移东北南部地区的工业设备，但他们最终认为大规模迁移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第 74 页。

⑤ 毛泽东：《我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1950 年 10 月 13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44 页。

大多数人的团结”。[1]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贷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2]

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3]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这最明显地反映在中国领导人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的政治口号之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唇亡齿寒，户破堂危”。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到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到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或被解释为是“内向”之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含义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从内战后期为新中国制订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新中国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

①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第86页。

② 《罗申关于毛泽东决定出兵等问题致史达林电》，1950年10月13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的解密文件》，中册，第597页。

③ 参阅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8—33页。

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不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这一特点。① 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反对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 年 1 月至 3 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1 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②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 月 30 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③ 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它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 9 月 29 日政协会

① 可参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772—776 页；《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 年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318 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

②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第 44—49 页。

③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60—1461 页。

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①]

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项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家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们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方针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他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③]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④]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595—596页。

② 《周恩来传1949—1976年》，第48、190页。

③ 刘少奇：《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8月1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40页。

④ 《论人民民主专政》，第1472页。

任”。[①] 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视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②] 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 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 2 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 22 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③]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他们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1952 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 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中共中央原准备 1950 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 1952 年 9 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 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 44%，比原计划超出 14 个百分点。[④] 根据周恩来在第 109 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 年财政支出的 50% 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 30% 以上。[⑤] 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 年 8 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中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

① 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 年 11 月 16 日;《在北京各界庆祝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成功大会上的讲话》，1949 年 11 月 23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130—139、145—150。

② 缅甸总理吴努 1954 年访华时的谈话比较典型，他说缅甸曾经对新中国有恐惧感，他本人曾经宣扬在中国“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1954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96 页。

③ 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1 年 2 月 28 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60 页。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 年 2 月 18 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 34 页。

④ 《斯大林与周恩来谈话记录》，1952 年 9 月 3 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290 页。

⑤ 《周恩来传 1949—1976》，上卷，第 92 页。

开始五年建设”。[①] 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②]

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重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 1952 年开始酝酿，到 1954 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③] 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 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 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在这项政策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十分关键的。

首先，新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及其建立的军事同盟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中国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从 1952 年开始，他们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分别由美国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组成的，但是资本主义阵营

---

①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第 255 页。

②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第 304 页。

③ 关于两个目标可参阅谢黎：《简论周恩来对欧洲资本主义地带的外交战略思想》，裴坚章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43—244 页。

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①]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②]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③]这一今天看来是如此简单的结论在当时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在建国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内战爆发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这是导致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国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新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提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④]

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边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正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

①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1952年4月20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2—5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19—420页。

②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59—160页。

③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第52页。

④ 有关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政策可参阅《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第七章《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方面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的难以实现的要求。[①] 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成功的外交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②] 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邻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结 论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点是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上和不同的事件中的，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

① 有关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政策可参阅《周恩来传 1949—1976》，上卷，第七章《日内瓦会议》。

② 《周恩来传 1949—1976》，上卷，第189页。

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被当作是初步尝试，如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便可以说它达到目的了。

（《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随着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不断深入，1962 年间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等，明显地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①]有关论著强调 1962 年中国外交决策的内外环境均出现罕见的严重局面，指出中国周边那些层出不穷的事件及其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共存的现象，并将它们置于中国对外政策演变的框架范围内加以分析，断定上述现象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②]由此理应提出并予以清楚回答的问题是，这两种情况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和联系？进一步说，两者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方面，哪一个因素是更具决定性的？显然，仅仅罗列现象和描述过程是不够的。

本文的目的是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或者说是引发的疑问，探讨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持续变动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特点，并在此探讨的基础上确定 1962 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主要原因、特点及其在 60 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发展中的历史位置。论文包括三个主要部分：50 年代末中国对外关系动荡造成的深层影响、1960 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主要原因、1962 年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性质。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章百家著《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和李捷著《60 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均见姜长斌和罗伯特·罗斯编：《1955—1971 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版。

② 章百家：《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第 190—191 页；李捷：《60 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第 264—270 页。

一、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缘起

在展开探讨上述问题时，本文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命题。第一是中国对外政策在1962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即使不是向“左”方向发展的转折点，至少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这里首先需要澄清所谓中国“左”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因为“左”或“极左”概念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定义上的差别，特别是冷战时期推动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各种因素彼此交织，纷繁复杂，一些看上去“激进”的政策行为未必同出一源，一些被称为“温和”的政策也未必完全源于务实的思考。

“左”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简单地说，就是指追求超越时代或高于现实可能的目标，这一点延伸到中国对外政策领域，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而已。本文所谓“左”或“极左”的对外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理论上对列宁的所谓“时代”学说持教条主义的态度，对纷繁复杂且迅速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不肯进行具体分析，只是简单地断言当时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并因此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和意义，实际上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①

第二，以“中国革命中心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如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等等。②“中国革命中心论”反映出对当时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影响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从深层上看，也多少涉及历史上的“中国中心观”。

第三，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地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③

①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节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年11月7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67年8月15日。

②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

③ 《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第四，在具体政策上，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搞“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在此不赘述。

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标准，可以说中国“极左”对外政策大致形成于“文革”开始的时期。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准确一些的历史标志，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第二个命题是，19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处在演变过程中的。所以要探讨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就必须首先探讨1962年以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状况。

自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的探索和良性发展的状态。至中共八大召开，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积极努力，中国领导人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他们明确地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①]但是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动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50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便形成的领导（苏联）与被领导（中国）的关系，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的冲击下，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这方面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误。[②]其二是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其三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的活动反映了这种情况。[③]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352页。

② 有关情况可参阅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8、61—6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1997年版，第630—631页；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262页。

③ 可参阅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的有关部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苏联领导人当时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强调了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①]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方面是，在经历了苏共20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这一点，即过去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之那种“猫鼠关系”、“父子关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②]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苏联领导人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人的态度，并斥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很难想象，1958年夏毛泽东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两个问题上，会如此怒不可遏。他说苏联的要求使他“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③]

中苏关系的变化其实也就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种提高达到了什么程度？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领导人能否迫使苏联按照他们自己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解，改变其态度和政策？进一步说，中苏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当这个条件被改变以后，中苏同盟该如何维系？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或者说苏联是否接受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准则？当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除了抗日战争后四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外，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历史没有提供任何结盟的经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以往处理国际共运中的党际关系、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同路人”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系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应付中苏同盟中出现的复杂情况的。事实表明那是远远不够的。反之，苏联在结盟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它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对盟友施加惩罚是维护同盟的必要手段，当然使用不当也会损害甚至摧毁一个同盟。

中苏同盟或更广泛地说一种全面发展的中苏关系，是当时中国全部对外关系的

---

① 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第359—360页；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第442页；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关于“父子党”、“猫鼠党”的说法可见毛泽东：《同苏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4页。

③ 毛泽东：《同苏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第331页。

一块巨大而且关键性的基石。一旦这块基石被动摇，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会出现全局性的不稳定，甚至国内政局也会随之动荡，这一点被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

由于中苏同盟破裂后两国长期敌对的影响，当时中苏同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作用被长期和普遍地低估了。中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冲击之大，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未曾料到的。他们当时对同盟动摇后处理中苏关系应遵循什么准则，表述得并不那么清楚，而且肯定也没有被苏联方面清楚理解并接受。在这样的基础上应对中苏关系恶化，必然是相当吃力的，而且肯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应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独特方式，以及这种独特方式所反映出来的他们对同盟关系的理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从处理同盟国关系的角度看，有很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苏同盟开始动摇后不久，中国的国内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趋势。从1957年春夏开始到1959年，中国国内发生了两个重大的事件。其一是1957年春的所谓“民主整风”，即中共中央为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其目的是用“民主整风”的方法，解决当时社会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党的部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其二是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大国如英国、美国等，并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不论是“整风”还是“大跃进”，都以失败结束。前者导致了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后者导致了三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严重地加剧了中共党内的紧张气氛。这两场运动失败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它们失败本身。就对中国对外政策的长期影响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持续进行的党外和党内斗争与压制不同意见，大致确立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即无论效果如何，只要是推动激进的变革，追求充满激情的目标，就是“政治正确”。任何务实与理性的思考和政策，只有在战术的范围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而且通常很快就被新的更强烈的激情所淹没。这种“宁左勿右”的政治价值观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得以确立，使中国对外政策中任何趋向务实与稳定方向的调整，都很可能是困难的并难以持久。

到1959年夏季，“大跃进”实际上已经露出败相，中国领导层出现了要求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呼声。但是毛泽东将中共党内的批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将

党内出现不同意见视为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①] 与他共同浴血奋斗二十多年的彭德怀因此被钦定为只是一位暂时的“革命同路人”，并终于被彻底打倒。

值得注意的是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几乎同时，中苏关系也开始走向危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7月间在波兰关于公社的讲话是对人民公社运动的暗讽，他几乎因此下决心与苏联公开决裂。在毛泽东看来，《内部参考》上登载的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火上浇油，而且是与彭德怀等人“内外呼应”。他立即部署最快在当年秋季、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②] 后来经讨论未获同意，才没有付诸实施。[③]

赫鲁晓夫很可能并不了解毛泽东的愤怒，他在随后的中印边界纠纷中扮演了堪称愚笨的角色。特别是他访问美国以后，专程绕道北京，试图说服毛泽东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需要改弦易辙。[④] 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⑤] 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他谴责赫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说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⑥] 此次中苏首脑会晤实际上成了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此时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加剧。1959年夏季由于印度坚持其对中国的领土

---

① 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959年8月15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47、451页。

② 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7月29、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2页；毛泽东：《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1959年8月9日；《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1959年9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62–463、504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④ Alan J. Day edit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The East Press, 1985, pp. 14–15.

⑤ 《前苏联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8期，第19—20页；《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0—164页。

⑥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见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侵蚀，双方先后在朗久和空客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中印边界局势急剧紧张起来。中印关系紧张无疑增加了中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困难，而且间接损害了中苏关系。

中印边界冲突毋宁说是中国周边关系开始恶化的一个先兆。到1960年夏季，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边界事件，从此中苏边境地区不再安宁。与此同时，印度支那地区因老挝局势动荡而趋于紧张，特别是美国明显在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直接干涉。

不论是由于何种原因，伴随着“大跃进”的进程，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确从1959年夏季开始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似乎是在几个方向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显然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①]

二、1960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原因

从1959年11月开始到1960年上半年，中国领导层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反复讨论“国际问题”，以便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②]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决定采取稳妥应对的方针。根据吴冷西的回忆，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基本确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③]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中共政治局常委多次开会，肯定了一月会议的精神并讨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出现了相当务实稳妥的局面。

首先是在中苏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不仅决心避免破裂，而且要争取“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甚至要“赖着跟他（赫鲁晓夫——作者注）搞团结，赖着不分裂”。[④]正是这个决定促使中国领导人在经历了与苏共中央几个月的争论，特别是经历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尖锐冲突和苏联撤退在华全部专家后，仍然在年底的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与苏联领导人达成谅解，即“有什么事情一起来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34页。

② 有关这些讨论的情况目前还无法得到档案的证实，但是一些重要的出版物披露了曾经进行过大量的有关讨论以及讨论的内容，如《周恩来年谱》中卷的有关部分和《十年论战》上卷的有关部分，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48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41页。

商量，避免冲突”。[1] 会议以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到1961年，苏联甚至决定再次向中国转让如制造米格–21战斗机一类的先进军事技术。[2]

缓和中印边界局势是这一时期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因为中印边界冲突的解决关系到整个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大局和总政策。1959年间，中印关系在西藏叛乱和边界冲突的影响下，极度恶化。中国领导人认为印度的政策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印度方面利用中印边界局势制造舆论，企图配合西方的“反华浪潮”，所以中国必须予以坚决反击。不过经过8月边界军事冲突后，中国决策层显然既不希望中印关系继续恶化，也不希望中印边界冲突成为政治议题的中心。在9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了解并讨论了中印边界的情况后，中国领导人决定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3]

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两天，中国已经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有关情况，但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在中共8日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以塔斯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明不赞成中国的立场。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他们认为苏联那样做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4] 不过毛泽东不久仍然决定，停止与印度辩论边界问题，并指示媒体亦停止一切相关的报道。[5]

当中国领导人决定“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时，他们必然要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找到办法。在1月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确认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并进一步提出用“互谅互让”办法，即“我们做点让步，印度也做点让步”，从而达成妥协。会议还决定派周恩来访问印度。[6] 这时驻守中印边界的中国军队接到命令，在中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实行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等措施，总之就是尽可能避免军事冲突。[7]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即着手准备访问印度，并拟订了《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问

---

①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见《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474页。

②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89—390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10—212页。

④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15页。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48页。

⑦ 雷英夫、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

题会谈的方案（草案)》。根据周恩来当时的估计，访印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也不可能破裂，最有可能的是取得某种有限的协议。他建议应采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但不怕拖延解决的方针，将访印的目标定为进一步缓和两国关系，为未来继续会谈和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准备条件。[①]周恩来的建议获其他领导人同意。4 月 19 日至 26 日，周恩来访问印度，结果证明中国领导人的估计基本上是准确的。通过周恩来这次访问，暂时缓和了中印关系，使中印边界形势平静下来。

缓和中印关系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决定尽快解决与所有邻国的边界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被置于首要的地位。[②]不过与印度谈判的搁浅并没有减缓中国与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很有可能还起了促进作用。

在 1 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全面讨论了与所有邻国的边界问题。可能是受到中缅边界谈判比较顺利完成和中印发生边界冲突的影响，他们制订了基本方针，概括地说就是尽快和有步骤地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所谓有步骤就是安排了大致的顺序，即当前抓紧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同时尽快解决中朝、中蒙的边界问题；加快解决与缅甸、尼泊尔和老挝的边界问题；中越边界因越南还在与美国作战，可以暂不解决；与苏联的边界线最长，问题比较复杂，但也要争取解决。[③]

与周恩来准备访问印度同时，中国也开始着手解决与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从后来的情况看，尽管中印边界问题未能解决，中国还是基本实现了 1 月政治局常委会的设想，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等签订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1964 年中国开始与苏联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由于受到中苏论战和双方关系全面恶化的影响，谈判无结果而终。

在印度支那地区，随着紧张局势逐步升温，中国对该地区的政策面临着进行调整的外部压力。当时中国需要处理的是两个问题，即是否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和如何解决老挝危机。相比较而言，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更关注的是老挝危机，而不是越南的局势。

1959 年和 1960 年，在越南南方局势急剧变化的压力下，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开始改变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后执行的加强北方建设、争取和平统一的战略方针，认

①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302 页。

② 中国领导人曾因为周恩来访问印度，推迟了与蒙古进行边界谈判，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295 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 248 页。

可并越来越明确地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①]1960年9月召开的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加强解放南方的武装斗争的政策。

越南劳动党的政策转变和越南南方武装战争的发展，使中国面临着相当复杂的情况。中国在1958年曾经比较明确地表示，越南劳动党应将巩固和建设北方作为首要任务，在南方则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②]现在中国不得不在既要维护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又要防止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同时还要支持传统盟友等相互交织的矛盾中做出选择。从随后中国有关政策的演变过程看，中国这一时期是逐步对越南形势做出反应的。

首先，如何应对越南南方的形势当时还不是中国外交中特别重要的议程，那里局势虽然出现动荡但并不严重，对于中国它甚至还不如老挝问题那么严峻和直接。有北越作为屏障，美国当时在越南南方相当有限的介入并没有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威胁；其次，越南劳动党的政策也是逐步发展的，至少在1960年还没有导致那里的局势出现剧烈的变化；第三是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也不可能完全与中国领导人既定的大方针背道而驰。

正是上述这些因素使中国领导人在涉及越南是否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时，一方面迅速对越南加强在南方的武装斗争表示支持。《人民日报》在越南劳动党三大期间即发表社论，公开表示支持越南劳动党三大确定的支持南方武装斗争的政策。[③]12月，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成立，中国立即给予承认和支持。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希望越南劳动党完全放弃政治解决的选择，甚至不希望越南南方的战争规模太大，导致美国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他们一再向越南领导人强调，既“一定要解放南方”，又要注意斗争策略，注意农村与城市的区别，斗争“策略上可以灵活”，要“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④]直到1961年中期，中国在公开场合仍然明确表示，支持越南根据日内瓦协议“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⑤]这类公开宣示不能被认为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它们表明，中国领导人至少不希望越南劳动党这时完全放弃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

---

① 参阅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6—75页。

②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7页。

③ 《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新里程碑》，《人民日报》，1960年9月12日。

④ 参阅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天地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7页。

⑤ 《周恩来总理在欢迎越南范文同总理的国宴上的讲话》，1961年6月12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1）》，第8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181页。

这一时期中国坚持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立场和努力，更能反映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特点。这首先是因为老挝与中国接壤，美国在老挝的军事介入比它在南越的干涉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要直接得多；其次是当时老挝局势显得更复杂更紧张。这两个因素使中国领导人更关注老挝问题，为控制那里的危机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对老挝问题的政策比对越南的政策要稳定清晰的多。中国在这一时期积极促成了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为最终签署《关于老挝中立宣言》及相关的议定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

强调这一行动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其结果缓和了印度支那的形势和延缓了美国的介入。从中国领导人处理老挝问题的过程看，他们几乎是在复制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时期处理此类问题的思路、对形势的判断和选择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的一个部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决定更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政策延续性，而且这种延续性这时还是中国政策的主要方面，尽管它开始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即使在美国被认为正开始加强对印度支那的干涉时，中国领导人也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进行了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只是相当有限的试探，它也可以表明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决心与力度。

在 1960 年初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也确定了处理对美关系的基本方针：“谈而不速，谈而不破”，即继续与美国谈判，既不破裂，也不急于建交。[②]这一方针指导下的中国对美政策表现出一定的弹性。毛泽东本人在 1 月初对一份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出现变动的报告明显表现出兴趣。该报告认为，美国基于若干理由，今后有可能增加与中国的接触，并利用华沙会谈进一步试探。[③]迄今为止没有历史文献揭示毛泽东是否和如何进一步思考有关的问题，不过后来的一些发展表明，他很可能并不只是感兴趣而已。当然，中国领导人的决定也同美国正在举行总统选举有关，它毕竟为了解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可能出现调整以及美国未来的政策执行者，提供了一个窗口。

1960 年 5 月，周恩来在与蒙哥马利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只要美国宣布愿意从台湾撤军，中美即可以开始谈判。[④]8 月 30 日，周恩来

---

① 《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 年版，第 2—11 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 247 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第 3—6 页。
④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321—323 页。

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在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上，提出了比以往更富灵活性的建议，即美国首先必须承诺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何时和如何撤出，可以随后讨论。①10月18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全面阐述了中国在裁军、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核试验和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并介绍了有关中苏分歧的情况。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出对肯尼迪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了如指掌，因此很有可能的是，他的谈话是有准备的和有的放矢的。②四天以后，毛泽东亲自接见斯诺，同他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电视辩论的内容。他明确告诉斯诺，中国会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会主动向美国开战，并且“要谈判解决”台湾问题。③

从历史上看，中国领导人会见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如此频繁地与斯诺讨论中美关系，显然是在为与美国的新领导人打交道进行试探，尽管通过这样的渠道是否有效是很值得商榷的。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方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他的表态当然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④此后不久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访问缅甸时表达了同样的信息。⑤将这些行动同“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的方针结合起来考虑，至少可以说，稳住甚至争取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上种种表明，从1960年上半年开始，中国领导人的确认真地希望，通过积极推行务实温和的对外政策，能够稳定中苏关系和改善周边环境，并创造一个“外交新局面”。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是，除了经过庐山会议反右倾在组织上造成的暂时团结外，在这个时期是什么原因促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能够一致同意，在面临“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全面推行务实灵活的对外政策？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后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向“左”转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罗列出相当多促使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因素，包括八大方针的持续影响、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是以缓和为主、他们对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印度的尼赫鲁等的看法仍然是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如认为赫鲁晓夫还不是完全

①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New York, Randon House, 1962, P. 91.

②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pp. 159–161.

③ 毛泽东：《同斯诺谈台湾问题及其他》，1960年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454页。

④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

⑤ 《人民日报》，1961年4月3、6日。

的修正主义者，尼赫鲁还有进步性，等等。[①] 这里要强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本人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希望“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他的一些主张得到了其他领导人在不同层次上的认同。事态的发展表明，毛泽东的思路可能最能解释后来的变化，尽管它未必合乎常理。

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文献分析，毛泽东大致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调整对外政策的。首先是他希望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较快地消除国内经济中已经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成“大跃进”。

尽管1959年夏季已经出现了“大跃进”肯定失败的征兆，而且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承认出现了困难，并认为有必要对一些政策进行检讨和调整，但是他们当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征兆所反映的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宁左勿右”的政治倾向严重削弱了许多人的洞察力，也使各地区干部宁愿浮夸虚报，结果是为反右倾政治斗争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上下一片凯歌飞扬，掩盖了形势的严峻程度。[②]

1959年农业方面首先出现的衰退被隐瞒，1960年的元旦社论相当典型。它声称1959年不仅“工业总产值大大超过了国家的计划”，而且“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仍然取得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生产总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既然形势如此令人鼓舞，人们当然“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决心和信心”。[③] 毛泽东在年初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国内形势是好的”，中国“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④] 正是基于对国内的“大跃进”信心满满，他再次提出争取“10年、15年”的和平建设。[⑤]

其次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看得相当严重。在1959年12月于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⑥]1960年3月，毛泽东又一次专门提出国际上“所谓大反华”问题。他在一份有关中国在巴基斯坦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31—233、201—202页。

② 范荣康的回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气氛是如何扭曲人们对形势的判断的。范荣康：《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下)，《百年潮》，2002年第8期，第38—39页。

③ 社论：《展望六十年代》，《人民日报》，1960年1月1日。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43页。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1页。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35页。

举办展览的电报上所做的批示中提醒说，要认识“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并“做出充分的精神准备”。[①]

毛泽东认为，之所以出现“国际反华浪潮”，就是因为中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纯洁性。面对可能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要打退反华浪潮，“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他号召“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用他当时的话说就是“如果给我们40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形势将起大的变化”。[②]

毛泽东自己相信并告诉他的同事，尽管需要对某些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但“大跃进”必将取得胜利，而且中国也只能通过迅速实现“大跃进”的设想，才能抵御愈演愈烈的“反华浪潮”和其他的外部压力。因此毛泽东等一度希望排除任何来自外部对“大跃进”的干扰，这种干扰在当时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特别是1960年上半年中苏关系明显恶化，苏联突然撤退全部在中国的专家，不仅立即给中国带来直接和巨大的经济困难，而且打击了中国干部队伍的士气。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讨论局势和处理中苏关系，中共政治局会议有时无法讨论既定的经济议题。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安定国内的人心。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介绍，1960年7月14和15日，周恩来向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作有关中苏关系的报告，其中心就是告诉他们，不要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而“灰心”。[③]由此可见，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当时不调整对外政策，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克服困难，实现“大跃进”的目标。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大跃进”的成败及其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是最终决定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走向的首要因素。澄清这一点不仅有利于说明，当时仅仅调整对外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对外关系动荡的问题，而且对理解后来对外政策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1962年的对外政策向左转

1960年初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固然有其积极的效果，但是国内经济，首先是

① 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1960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1996年版，第95页。

② 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第94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34—235页。

③ 参阅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587页。

农业的严重衰退及其给对外政策带来的压力，却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特别是出乎毛泽东的预料。1961年的社论显示了建国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分量增加，而且也务实得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①] 国内经济严重衰退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要求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压力。

首先是经济衰退在深层次上改变了1960年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动因。如上所述，中国领导层在1960年初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主要是基于他们对“大跃进”虽然面临困难但仍然会达到其目标的信心，其目的是给“大跃进”创造国际条件。1960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则证明，对外政策调整的初始动力是没有基础的。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对外政策调整的方向并没有改变，但其目的已经自动地转向帮助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是要创造“大跃进”胜利的奇迹。

其次，国内经济衰退造成的困难在客观上形成了要求对外政策更加务实的巨大压力。由于农业和部分轻工业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相当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向苏联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请求推迟偿还1960年所欠债务，压缩同这些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并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②] 这种情况自然要求中国要尽可能地稳定而不是恶化中苏关系，其中就包括了妥协的必要性。

此外，农业连续两年歉收，也迫使中国政府开始向非苏联阵营的国家寻求粮食进口，同时与西方国家在其他领域的贸易也出现了发展的趋势。1960年8月，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逐步恢复1958年中断的日中贸易的“贸易三原则”，11月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1961年中日贸易逐步恢复。[③] 中国领导人甚至认真考虑了签订协议，从美国进口粮食。[④]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对外政策的一些重要方面。例如可以合理地推论，在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甚至影响到偿还外债的能力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援助必然需要压缩，这也间接地涉及到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因为中国当时的外援主要是为了支持革命运动的。

① 社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人民日报》，1961年1月1日。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94页。

③ 周恩来：《关于促进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1960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版，第289—291页。

④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85页。

到1961年末，经济形势更加严峻，继农业和轻工业之后，重工业也出现大衰退。中国经济出现未曾料到的严重衰退，进一步凸现了1960年对外政策调整的力度和程度的明显不足。更何况1960年初中国领导层虽然提出了“开创外交的新局面”，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但是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导致对外关系动荡的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有可能没有被认识清楚。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认识清楚了，也未必能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且不论其原因为何）也形成了需要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压力。

首先是中苏关系虽然出现缓解的趋势，但是仍然相当脆弱。经过1959年夏到1960年上半年的冲突和莫斯科会议前后的妥协，中苏关系从形式上看有所缓和。1961年上半年双方的经贸、科技和军事技术合作都在恢复或发展。4月间，中国与苏联签订了新的贸易议定书，虽然其中规定的贸易额比上一年度少（主要是受中国经济状况的影响），但两国正常的贸易关系毕竟重新开始了。[①]双方在国际事务上采取了相互协调的态度，相互通报有关情况，一些高层互访也在安排之中。[②]中苏双方都对这种情况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苏联方面认为中苏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方也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妥善解决。[③]

中苏关系暂时缓和是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重要成果之一，不过当时的调整并没有能解决中国对苏政策中的深层问题。从1960年初中国领导层的讨论看，他们固然为缓和对苏关系的合理性，作了种种理论方面的阐述，其中迫于眼前利益的考虑也是一目了然的，他们对苏联政策的认识有不少是基于对当前利害关系的分析。[④]事实也表明，当时中苏关系是不可能在解决意识形态斗争的胜负后得到发展，却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继续缓和。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苏关系的缓解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经过最初的意识形态争论以后，双方如果能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还是有可能保持中苏关系的基本稳定的。

---

①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5页。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5页；“Record of Conversation, Chervonenko and Zhou Enlai”, June 25, 1961, Westad, Odd Arne, ed. ,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69–374.

③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7页；周文淇：《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531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40–248、271—273页。

但是，中国领导人很可能还没有理解，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而非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一致解释的基础上。按照毛泽东当时的逻辑，中苏关系之所以还有缓和的余地，是因为苏联党还没有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挽救的。他总是以为，必须通过斗争、特别是分清理论是非，才能达到中苏团结。为了取得这方面的胜利，中共领导干部也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①]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克制只是表现为暂时不点名（如1960年春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的三篇文章）或不直接批评（如1960年莫斯科宣言中对如何评价苏共20大的处理方式）等。这种指导思想决定了这个时期中国不可能终止同苏联的意识形态争论，只不过争论时起时伏而已。这种状况一直是造成中苏关系难以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1961年春，双方又因为应如何对待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发生了分歧。中国有关部门曾经建议，应在苏阿冲突中保持谨慎，以免严重损及中苏关系。[②] 但该问题仍然成为中苏关系再次恶化的导火索。中国领导人严厉批评苏联对待阿尔巴尼亚的做法，因为他们认为那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③] 在10月中旬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中苏在苏阿关系上的矛盾迅速激化，其背后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即中国领导人不赞成赫鲁晓夫在诸如斯大林问题、和平共处等问题上的政策，并认为苏联领导人攻击阿尔巴尼亚是指桑骂槐，攻击中国。[④]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关系虽然没有立即恶化，也是暴风雨即将来临。

更为严重的是，1962年春夏之交，中国领导人曾经预见到的苏联制造边界事端的情况发生了，在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迄今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苏联决策层直接策划了这次事件，但它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关系趋于恶化有关，应是合理的推断。[⑤] 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中苏边界地区出现了紧张气氛。中国实际上面临着再次调整对苏政策的压力。

其次是如何应对印度支那地区日趋紧张的局势。如前所述，中国当时在印度支那地区仍然是将防止美国的大规模军事介入作为首要目标的，维持地区稳定和支持那里的革命运动，都要受到这个战略目标的制约。但是就中国已经开始实行的支持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41—243页。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15—116页。

③ 《周恩来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0年10月20日。

④ 参阅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页。

⑤ 近年来国内有关"伊塔事件"的最详细考察是李丹慧著《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见《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480—509页。

越南南方解放斗争的政策而言，已经出现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援助的责任。

除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的不干涉其他党的决定外，当时主要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他们的选择方向。其一是在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中，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理论原则导致他们无法不支持越南南方武装斗争。当他们坚持认为武装斗争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必由之路时，要他们不赞成、不支持一场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人民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其二是中国领导人在当时曾经设想，与中国周边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蒙古、北朝鲜和北越）建立一个联盟体系。为达此目的，毛泽东提出设想中的协议可以包括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条款。[①] 根据这种考虑，当北越提出请求时，提供支持和援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客观情况看，中国领导人中的确存在着援助越南统一战争的冲动，但这种援助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受到美国加强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的巨大影响。1960 年底老挝内战升级，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1961 年初肯尼迪政府一上台，就将应付老挝局势作为重要议程，并从所谓“遏制中国”的战略高度，决定进行军事干预。[②]3 月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中国南海，驻日本冲绳和泰国的美军宣布进入战斗状态。此后不久，美国在越南南方发动了“特种战争”，美军开始直接参加作战。

美国加强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感到，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1962 年初中国政府公开指出，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军事行动对中国安全构成了威胁，认为美国的干涉“直接针对着越南民主共和国，而间接则针对着中国”。[③] 中国领导人更加相信，只有通过增加对北越的援助，才能打败美国的军事干涉。[④]1962 年 5 月，肯尼迪政府宣布美地面部队和空军进驻泰国，中国立即做出了极强硬的反应，公开号召将美军“赶出东南亚”。[⑤] 此后不久，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 230 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

可以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介入使中国加强援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

---

① 毛泽东：《对缔结中蒙合作友好条约问题的批语》，1960 年 3 月 21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第 88 页。

②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edited,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4, p. 154;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 1962, p. 214.

③ 《外交部关于美国对越南南方加紧武装干涉的声明》，1962 年 2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2）》，第 9 集，第 263 页。

④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59 页。

⑤ 社论：《把美国侵略者从东南亚赶出去！》，《人民日报》，1962 年 5 月 19 日。

其程度与美国干预升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这时中国领导人对其他国家的外援还可以“量力而行”，在越南实行这个原则确实越来越困难了。[1]

从1962年中国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行动看，中国领导人选择的策略是与苏联配合，通过政治方式解决老挝问题，防止美国在与中国边界接壤的地区进行直接军事干涉；同时增加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挫败美国在那里的“特种战争”。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在逐步加强，其中支持越南南方武装斗争却使中国的有关政策不得不直接面对两个问题并有必要做出决定。第一是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是否会引起美国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甚至造成朝鲜战争中曾经出现的局面，即美军越过17度线，中国被迫直接参战？第二是中国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是否应该以及能否负担如此沉重而且还在与日俱增的对外援助？

第三是中印边界冲突进一步加剧。1960年4月周恩来访印后，中印边界出现过短暂的平静。从1961年4月起，印度开始实施“前进政策”，随后于年底对中国边疆领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蚕食。作为对印度侵犯行为的反应，是年末中国对印度的谴责明显尖锐起来。中国舆论批评印度挑起边界纠纷，是在配合美国在国际掀起的“反华逆流”。《人民日报》甚至公开点名批评印度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不分青红皂白，丧失了应有的政治立场。[2]

1962年初，由于印军不断侵入中国领土，解放军开始恢复在边界地区巡逻，并逐步展开反蚕食斗争，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给印度的照会中正式警告对方，如拒绝撤出其侵略据点并继续其军事挑衅，“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3]根据中国决策层当时的设想，还是要争取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从2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的指示和5月6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的《关于恢复边境巡逻的具体措施和边防哨卡处置情况的原则》等命令的内容看，中国领导人几乎设想出了可以用来避免军事冲突的所有办法。[4]

1959年夏印度军队在边界挑起军事冲突，造成解放军官兵伤亡，已经在解放军中引起极大的愤怒。毛泽东在1959年9月提出中印军队各自后撤20公里，以便

---

① 如周恩来在援助蒙古谈判的批示中明确地说，要“量力而行，凡无把握者概不承担”，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478页。

② 社论：《尼赫鲁策动的印度反华运动的真相》，《人民日报》，1961年12月7日。

③ 《外交部就印度军队连续入侵新疆地区并设立新的侵略据点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1962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9集，第38页。

④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127页。

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以及后来单方面后撤军队等等，同解放军中已经形成的“怒不可遏”的强烈求战情绪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不将双方军队分隔开，军事冲突就很难避免。[①]从逻辑上讲，只要印度不放弃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并企图诉诸武力，在中国内部特别是负责边防的军队，就必然会提出进行军事反击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国决策层必然要面对来自内部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并且最终要做出是否诉诸战争的决定。

除中苏边界、印度支那和中印边界出现紧张形势外，在东南沿海也出现了紧张气氛。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试图利用大陆的经济衰退，发动军事反攻。由于台湾与美国存在军事同盟关系，蒋介石的军事准备对东南沿海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解放军于5月开始战备动员，在有关地区进行军事集结并提前开始征兵工作。中共中央于6月间专门发布战备动员指示，要求加强在东南沿海的战备，以打败蒋介石军队可能发动的“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②]东南沿海备战与中印边界的反蚕食斗争结合在一起，在解放军中造成了高昂的士气，而且当时解放军已经完成了作战的充分准备。[③]

经济衰退造成的压力和对外关系面临的严峻局面，终于导致中国领导层内出现全面系统地检讨对外政策的声音。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全面检讨一个时期以来的政策。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对外政策问题，不过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实际上为对外政策确定了基调。他在书面报告中照例提出，中共在取得国家政权后，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④]但在随后的一次补充发言中，他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⑤]刘少奇的这段讲话表明，当时中国领导层（包括毛泽东本人）一致同意，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这等同于履行“国际义务”。这很可能是有针对性的。

刘少奇讲话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于2月27日写给周恩

---

① 雷英夫、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第218—219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1962年6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481—484页。

③ 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56页。

④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5册，第61页。

⑤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第86页。

来、邓小平、陈毅等一封信，阐述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这封信至今仍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其内容已经被有关的研究成果广泛引用。此后王稼祥又陆续起草了一些报告，就有关对外政策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建议。迄今为止，在已经公开或被披露的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只有王稼祥的信和有关报告全面系统地检讨了对外政策。

综合起来看，王稼祥的建议可以分为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试图全面、深入和系统地检讨以往对外政策涉及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包括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对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基本判断、对战争、和平与革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对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理解，等等。其二是关于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①

就第一方面的内容而言，王稼祥提出的问题用当时的话语来评估，已经达到对某种“外交路线”构成根本性挑战的程度，这可能是后来毛泽东严厉批评王稼祥提出的观点的主要原因。对于毛泽东来说，从来都是具体政策可以讨论，而深层的基本的理论思想则不容置疑。

关于第二方面的内容，那些建议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是基本的外交策略原则，第二层次是处理一些具体问题的原则。从后来的情况看，那些策略原则至少在当年夏季以前是与中国领导人的具体做法相吻合的。至于针对具体问题的建议，有的在随后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是难以行得通的，如他建议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要采取新措施打开僵局。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决策层不得不下决心使用武力驱逐入侵的印度军队。有的是后来从未被否定的，如在印度支那地区避免爆发“朝鲜式的战争”，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几乎尽了最大的努力。②

不论是刘少奇的讲话还是王稼祥的建议，都产生于共同的国内外背景，它们在原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即主张实行更加务实稳妥的对外政策，为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毫无疑问，随后出现的堪称险恶的国际形势影响了此类政策的贯彻，迫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采取一些坚决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应对周边

① 关于王稼祥的信的内容可参阅李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656—657 页；张沱生：《难能的探索，可贵的努力——试论王稼祥对党的国际战略思想的贡献》，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70—183 页。其他有关报告如《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和《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等，见《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② 关于王稼祥对具体问题的建议，可参阅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 486—489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下），第 656—657 页；《难能的探索，可贵的努力——试论王稼祥对党的国际战略思想的贡献》，第 176 页。

的压力。

如前所述，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正在恶化，一些情况的发展趋势显然不利于中国对外政策沿着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此外，王稼祥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建议，在逻辑上固然是合理的，但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已经被证明很难行得通。尽管如此，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周边环境的恶化及其达到的程度，并没有严重到足以迫使中国决策层根本改变1960年初开始实行的、1962年初被王稼祥进一步明确地提倡和发展的对外政策，那些事件也不能被证明是当时促使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外政策的主要理由。

6月间，肯尼迪政府通过华沙的大使级会谈，向中方表示美国无意支持台湾当局军事反攻大陆。[①]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当局的军事行动只能是相当有限的。新疆伊犁事件主要是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至少在11月以前，并没有特别使中苏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也不是后来严重地冲击中苏关系的主要原因。[②]中国领导人当时也认为，除了要严厉谴责苏联方面的挑动外，中国自己的有关政策也是需要检讨和改进的。[③]在印度支那地区，美国军事介入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总的说来还是间接的，尽管从后来发展的趋势看也是很严重的。7月间包括中美在内的有关国家还就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达成协议。最严重的中印边界问题，即使在10月升级为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也是有限的和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中共中央在中印边界反击战结束后发出的《关于结束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表明，中国决策层当时认为，危机已经过去，可以一面寻找与印度重开和谈的机会，一面继续抓紧国内的各项工作。[④]

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发生的种种事件如果说对中国对外政策有影响的话，它主要是在中国内部造成了一种政治气氛，使主张改变1960年以来那种相对务实的对外政策的激进主张，比较容易引起共鸣和得到支持。当然，恶化的国际环境很可能也影响到毛泽东的心理状态。从他在1961年发表的诗词中，仍然可以读到一种堪称高雅的自信，如“无限风光在险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等脍炙人口

---

① Kenneth T. Young,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8, pp. 250–251.

② 有关交涉情况的比较详细的介绍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248页。

③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475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下），第770—771页。

的诗句所表露的那样。[①]1962年底及以后的诗词则反映出他对国际环境造成的压力的感受和愤怒，如“七律……冬云”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著名的诗篇。[②]

总之，导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批评所谓“三和一少”、并因此开始改变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因，还需要从中国国内政治带有全局性的重大事件中寻找，这个事件就是围绕对“大跃进”的评价展开的矛盾。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是在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检讨中央的错误和决定全面改变政策，直接导致了对“大跃进”的怀疑甚至批评。[③]在2月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和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层形成的主流意见是，承认经济衰退的严峻程度，必须做出改变经济政策和大规模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决定。[④]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七千人大会以来的政策调整是为了解决经济衰退问题，但政策调整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涉及到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等比较敏感的政治领域。这些领域中新政策的落实，的确引起了整个社会政治气氛的明显改善。在这样的气氛中，对以往错误的认识和批评必然更加深入和尖锐，王稼祥就对外政策提出建议也属于其中一部分。一些在党内斗争中因提出不同意见而遭受打击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彭德怀等，必然要提出申诉。

“大跃进”因经济问题兴起，进而冲击到各个领域；现在它因经济问题而衰落，必然也冲击到各个领域。其结果如同搞“大跃进”引起党内矛盾尖锐一样，（实际上）否定“大跃进”也引起了党内矛盾的尖锐化。七千人大会上就存在对“大跃进”的不同意见，所谓不同意见包括肯定和否定“大跃进”的意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党内的分歧，特别是毛泽东如何看待否定“大跃进”的意见。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已经展现了他的基本逻辑。他一方面将发扬民主作为讲话的基调，同时提醒与会者必须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要考虑自己站在哪一边的“根本立场问题”。特别是他针对当时的国际环境，提到帝修反、蒋介石、地富反坏右等都在骂中国。[⑤]这毋宁说是给批评“大跃进”划出一道含糊不

---

① 《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② 《毛泽东诗词选》，第116、118—119页。

③ 张天荣：《一九六二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20—21页。

④ 参阅《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第683页；谢春涛：《大跃进狂潮》，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237页。

⑤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5页、9—10页。

清的界限。只有理解了批评可以但必须有限这个界限，才能理解他从当年8月起开始的反击。他显然认为，党内对“大跃进”的否定已经超越了界限，必须彻底纠正。

1962年8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准备进一步讨论经济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完全推翻了原定的议程，提出要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并尖锐谴责了前一阶段那些明确否定“大跃进”的观点。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观点，将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并指责刘少奇等人的所谓右倾就是“中国的修正主义”。[①]最严重的后果是会议发表的公报包括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那段著名表述。[②]

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所谓“三风”的批评中，有两个观点是关键性的。其一是党内对“大跃进”及其后果的批评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其二是“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即他们是相互勾结的。[③]这在逻辑上决定了他在考虑对外政策时，很容易将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不同意见，特别是那些理论层次上的意见，同所谓“修正主义”问题联系起来。

正是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了王稼祥建议中的观点。迄今为止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毛泽东本人当时已经读过王稼祥的信和报告。一些论著的描述和介绍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毛泽东是否对当时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如果不满的话，都包括哪些方面，还是一切均不满意？他的不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等等。[④]有间接的历史记录表明，导致毛泽东当时批评外交工作的直接事件是他认为，在7月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和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接受了会议起草的那份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这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⑤]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王稼祥联系上述事件，就外交工作

---

① 《60年代的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第267—270页；《周恩来传》，下册，第990—994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1962年9月27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166页。

③ 《对“外事简报”第一三七期的批语》，1962年9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99页。

④ 有关这个事件的描述和评论可参阅：朱仲丽：《所谓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的真相》，《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74页；张沱生：《难能的探索，可贵的努力》，第181页；章百家：《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第191页；李捷：《60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第274—276页。

⑤ 《王稼祥年谱》，第490—491页。

作了检讨发言。此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又点名批评了王稼祥。

不过将王稼祥的建议同所谓“三风”联系起来的最直接原因，很可能与9月14日外交部负责人在华东组的发言有关。他当时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对陈毅的这一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①] 此后“三和一少”同“三风”一样，开始被列入批判对象。很有可能的是，该负责人同其他一些中国领导人一样，此时并不理解毛泽东批评“三风”的根本用意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他的发言还是基本肯定了1960年以来的对外政策，即一方面认为进行斗争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斗争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②] 关键在于“一股风”三个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对反对所谓“三和一少”的赞扬，是同反对“三风”联系在一起的，对他来说，这不是哪个具体政策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指导思想，即对外政策应该服务于什么目的。这是问题的症结与严重性所在。

正是因为毛泽东批评“三和一少”是与批评“三风”联系在一起的，而所有这些批评又是上述两个观点的合逻辑的产物，所以说八届十中全会实际上改变了1960年以来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当然，指导思想的改变要贯彻到具体的对外政策中还有一个过程，就像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被最终贯彻有一个过程一样，而且它们实际上也是基本同步的。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还不能将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中印边界反击战和其他一些外交方面的决定，简单归结为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改变的结果。

结 论

1962年的中国对外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结构性的矛盾的影响。当时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矛盾。第一个层次是国内经济衰退要求对外政策向更加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同时周边环境恶化迫使中国至少要在某个方向或局部做出强硬的反应（如中印边界冲突）。第二个层次是中国领导层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退方面，明显开始出现不同意见，那些不同意见的出现及其争论结果等，也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不仅如此，这两个层次的矛盾都不是1962年突然出现的，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88—189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88页。

它们各有其演变脉络，而且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的。本文的论述表明，相比较而言，第二层次的矛盾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无疑是主要的，它是导致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这时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主要不是起因于足够严重的外部环境变化或外部冲击（如世界大战、大规模外敌入侵或其他威胁到国家根本利益的事件），也不是全面检讨对外政策各个方面的结果（如中共八大前和 1960 年初的情况），它主要是被国内政治变化所带动、是从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转变开始的。正因为如此，在研究它对此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时，有几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其一是指导思想的变化有可能是逐步贯彻到具体政策中的，这个过程从逻辑上说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联系密切，而且很有可能国内政治仍然在发挥主要影响；其二是指导思想的变化在对外关系的各具体方面，不大可能都有程度相同的体现，在某些方面甚至会受到以往政策的较大牵制；其三是在某些具体的领域，指导思想的变化甚至有可能不会被贯彻。因此，对 1962 年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仍然有必要做具体、细致和深入的考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1962 年是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告别冷战”：中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涵义 *

本文的目的是论证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最终“告别冷战”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告别冷战”就是指中国退出冷战，它至少包括三层内容，即：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逐步摆脱在国际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的桎梏；中国的对外政策逐步转变为在冷战中保持中立；中国对外关系逐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一种超然于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态势，其突出的表现是经过四十年的反复后，中国终于能够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正常关系。

在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分析领域的话语中，“冷战思维”这个概念通常是指美国或苏联有关冷战以及相关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一套概念和逻辑。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虽未使用“冷战”这一概念，但这并不等于冷战的大环境对中国对外政策没有影响，只是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认识和论述带有“中国特色”。中国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基本形成了对国际冷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认知，以及构成并表达这种认知的逻辑和一套概念体系，这对后来的中国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大致包括：对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的认识——美国与苏联的对抗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先是美国，后是苏联相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冷战时期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构成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对中国在东西方对抗中的地位的认识——或者是“非杨即墨”，或者是“两个拳头打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一方结合，反对另一方，“两个拳头打人”的状况在1980年代以前只持续了四五年；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认识——美国或

---

* 本文曾提交“冷战转型：1960—1980年代的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12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修改意见。

苏联总是"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国防必须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并在外交上争取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对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由于断定面临来自外部的颠覆、"和平演变"的威胁，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必须是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里只是简单地概括而已，全面和系统地梳理并分析中国在国际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还是有待进行的工作。[①] 所有这些重要的观念与中国领导人应对冷战的各种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也是需要专门探讨的。

1990 年代初，冷战随着东欧国家发生巨变和苏联解体而突然结束。在这个堪称天翻地覆般的世界大变局中，中国克服了内政外交方面遇到的巨大困难，比较稳定地度过了那个时期，并从 1993 年再次迈开了迅速发展的步伐。中国外交能够比较稳定地过渡到后冷战时代，主要取决于中国决策层制定的内外政策，正是那些内外政策使中国能够处于一种相对超然的国际地位。甚至可以做这样的推论，即使冷战不像后来那样突然结束，中国也不再可能、更重要的是不会再有任何意愿，继续在美苏的角逐中扮演活跃的角色。不论是从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本质，还是从中国对外关系的状态等哪个角度看，都是如此。这个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将近十年才得以基本完成。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而且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在冷战即将结束的前夜，中国与苏联在 1989 年 5 月 18 日签署《中苏联合公报》，实现了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以中苏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超然于冷战的外交态势基本形成。

之所以说中苏关系正常化特别有象征意义，首先是因为中国卷入冷战与中苏关系直接相关。1950 年 2 月 14 日，中国与苏联签署同盟条约。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并不仅仅是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中国与冷战的关系的角度看，中苏结盟同其他一系列事件结合在一起，推动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冷

---

① 例如，毛泽东在 1950 年代中期就开始强调"中间地带"的重要性。60 年代中期针对世界政治中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两个阵营内部的变化，他认为世界政治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沿着这些观察和思考，毛泽东在 70 年代中期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也有称其为"理论"的）。还有毛泽东一再提到过、而且很可能他也认为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亚非拉"革命风暴"，这个"风暴"的极端重要性被描述为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等等。参见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1954 年 8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58—159 页；《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 年 8 月 12 日，《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14 日，第 1 版；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纲要》，萧延中主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 年版，第 80—87 页；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1—153 页。

战，并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便站到了东亚冷战的最前沿，作为苏联的盟友并长期与美国对抗。历史就是如此地富有戏剧性：中国是通过同苏联结盟而卷入冷战，在四十年后又通过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而退出冷战。当冷战终于结束的时候，中国已经自外于这场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并为自己找到了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的基石。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对过去一些重要结论的再思考。

其次，1980 年代中国对苏联政策的转变，几乎是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同步进行的。中国对苏联政策的每一次重要调整，并非像很多论著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基于早已确定的方针而对苏联对华政策变化做出随机和简单的回应。中国领导人在每个阶段做出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他们对中国对外政策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反思。换句话说，中国对苏联政策变化主要是中国决策层一些重大认识变化的结果。至少从 1982 年夏季以后，是中国主导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然，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肯定中国的政策在每个阶段和每个方面都是合理的。这类的分析需要更多的档案开放，并对中苏双方的政策进行比对。

中苏关系正常化之于中国对外关系特别重要，毋庸赘述。不过对此虽多有论证，尚无在中国外交与冷战之关系的视角下的分析。国内有关 1980 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专门论著数量不多，主要成果差不多都反映在教科书中。其中涉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内容多为描述中国政策的发展过程，并将这个事件作为一个成功的行动加以赞扬。这些成果都将中苏关系正常化置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之下，不过它们也都凸显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最初决定改善中苏关系差不多是“不失时机地”对苏联的行动做出回应，至少主要是这样。特别是它们均未分析如下一些问题：中国对苏联政策调整之所以时间较长的原因；中苏关系破裂的经验以及 1970 年代强调苏联威胁遗留的影响；在冷战背景下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之间难以避免的互动；以及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的认知变化，等等。[①] 这些问题正是本文试图论述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并非中苏关系正常化所涉及的全部问题。

（一）

1979 年 4 月 3 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宣布，1950

① 曲星：《中国外交 50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61—470 页；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75—384 页。其他不一一列举。

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将不再延长。同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向苏联建议举行双边谈判，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此后中国政府于7月同意首先在莫斯科举行副部长级谈判。与以往谈判的姿态相比，不以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先决条件和同意首先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至少显示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而且基本可以肯定这是最高决策层的决定。不过从后来的发展看，对苏政策变化很可能仅仅是国内政策变化所带动的一个结果。有外交官回忆说，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以后，中国领导人就“明显感到，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国际环境。[①] 这一回忆将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调整对苏联政策的时间提前到1979年初，对此需要经过认真考察才能确定。

如同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许多阶段一样，这一时期主导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苏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中共中央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以改革开放为方向的国家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开始相继发生变化。简而言之，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重视已经长期执行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其中包含的一些主要问题的重大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客观上至少也需要相辅相成，对外政策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对于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同样也是根本性的。根据中国领导人长期一贯的思维逻辑和论述框架，如果他们不能合理和有说服力地论证诸如“时代”、“形势”、“格局”、“力量对比”、“外交基本方针”等认知结构中的基本概念，并提出和有效地执行相应的政策，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也无法确定并得到广泛支持，至少也会比后来看到的要困难得多。

中国对外政策演变的历史已经证明，那种主要是由国内政策重大变化而引起的对外政策转变，通常都是滞后的，而且并不会立刻反应在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对外政策在时间上是同十年“文革”的极左外交相连接的。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一样，在对外政策领域也必须清除此前极左外交的影响，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新的政策。实际情况表明，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是缓慢实现的，落后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剧烈变化，相关认知框架的变化更为缓慢，而对苏政策的转变可能是其中最为滞后的。

---

① 李凤林：《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第32页。

中国极左外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一种教条、僵化甚至极端的态度；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基本估计和对中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估计过高；否认或不重视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在政策上"四面出击"和四面树敌；等等。[①] 当时在这种框架中勾画出来的世界基本图景，必然是极度紧张和充满战争危险的。特别是对国际紧张局势的认知同国内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紧张环境互相促进，互相强化，造就了70年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即保持高度的警惕和紧张的战争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世界战争或大规模的外敌入侵。

正是上述战略及其赖以产生的思维方式，导致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将相当大的精力用于建立和维护所谓"一大片"、"一条线"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政策。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对那个时期的这些政策进行更深入的审视和反思。从后来中国领导人认识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看，毛泽东谋求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很可能是建立在误判苏联威胁的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很可能也是导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改变对苏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做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轨道上。这一重大决定对中国领导人改变对外政策的影响至关重要。根据中国战略思维的基本特点，其影响至少包括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第一是需要回答，是否会有相对比较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在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适当调整了对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认为"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意即有可能推迟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此一调整得到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当时据此说明，"五年以内打不起来"。[②] 不过很难证明中国领导人在此问题上的共识达到何种程度，不少资料表明，他们仍然认为中国面临着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安全威胁。事实上，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以及随后中国政府的主要媒体发表的评论看，中国领导人明确地表示，他们相信存在着大规模战争

① 参阅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91页；参阅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

的危险。[1]特别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这种看法在1980年代初一度迅速强化。

随之而来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存在战争危险和严重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能否通过制定和执行恰当的战略和政策，塑造一个适应中国发展战略的安全环境和对外关系结构。中苏关系紧张和对苏联威胁的严重担心，是中国决策层在1970年代初断定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大规模外敌入侵不可避免、甚至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等的重要原因。那时中国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战备，就是为了应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当时差不多都对苏联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怀着深刻的警惕。有关著作对此多有着墨，在此不展开论述。

观念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人们的认识经常落后于现实。1970年代初在中国形成并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对苏联威胁的估计，不可能迅速消退。直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的思路是，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通过执行适当的对外政策，为中国赢得一段发展经济的和平时期。结果是这个时期中国外交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却趋向严峻，认为苏联威胁至少是没有减轻，中国甚至面临苏联入侵的威胁。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称："苏美两家是新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2]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述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试图在中国政局转换的时刻，从理论上肯定毛泽东后期对外政策的权威性。[3]"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从提出起，就同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有直接的关系。[4]

由于仍然认为苏联威胁既很严重又很危险，中国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在1973年2月到1974年1月相继提出的所谓"一条线"、"一大片"战略，这也被称为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5]最具代表性的是，邓小平在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和加紧经济建设。其中的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反

---

①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人民日报》，1977年8月13日，第1版。

②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③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

④ 参阅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纲要》，第80—83页。

⑤ 参阅张清敏主编：《对外关系读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曲星：《中国外交50年》，第376页。

对苏联。[①]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的担心程度仍然非常之高，并且他们确实在认真准备应付这种威胁。显然，中共中央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移虽然带动了对苏政策变化，但远不能说这个变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重大的。中国领导人为了确保工作重心顺利地转移，甚至有可能宁愿用更多的外交和其他资源来防范所谓的苏联威胁，以取得稳定的国际环境。历史进程的戏剧性也许正在于此。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即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很可能同样导致了中国对苏政策转变的滞后。从历史上看，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便决定"一边倒"向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当时宁愿选择苏联式的发展模式。1949 年夏季，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之所以能够为中苏同盟奠定基础，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决心要"走俄国人的路"。很多研究都将注意力放在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上。实际上在四十多天的访问中，刘少奇只同斯大林会晤了六七次，其余有不少时间是在参访苏联政府、企业等等。人们能看到的是他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和贷款；但是无法直接看到的是他已经装在脑子里的苏联发展模式，但这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因为后来新中国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开始国家重建的，其影响、包括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至深且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进程看，中国领导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与 1949 年正相反，实际上是从否定苏联模式而开始了改革的长征。这既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也是当时一些重要事件造成的。从目前能够获得的资料看，1978 年夏季中国派出的大批出访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访问团。该团于 1978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5 日考察了西欧五个国家，随后撰写了详细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谷牧的汇报。此后，邓小平本人又专门听取了谷牧汇报，并做出指示。在 7 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中国领导人再次讨论了如何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②] 会议讨论的详情现在还不清楚，对本文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会议确定的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决定了当中国领导人开始推行现代化战略的时候，很难从积极的方面对中苏关系予以重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重新肯定向西方学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它的确导致中国领导人对处理中苏关系的关注程度不高，但另一方面也清

①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39—240 页。

② 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第 5—6 页；曹普：《谷牧与 1978—1988 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百年潮》，2001 年第 11 期，第 6 页；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 年第 2 期，第 11 页。

除了改变对苏政策的一个巨大障碍，为改善中苏关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逻辑。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中国以往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甚至否定。由于毛泽东后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同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必然导致重新评价论战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伴随着对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国报刊逐步开始公开讨论所谓“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并批评对待社会发展道路的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中国没有垄断真正的社会主义称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实行自己的政策”，“不应用抽象的原则性的名称把这个或那个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等等。[①] 显然，当中国领导人以开放的姿态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时，他们已经为终止中苏意识形态论战提出了合理的逻辑。而且随着对“文革”的否定，他们也逐渐终止了对所谓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些基本的变化对改变对苏政策是极为重要的，它们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不可能再将意识形态争论作为中苏关系的内容，当然意识形态争论更不可能再成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障碍。这些变化此时只不过还没有延伸到对苏政策的思考之中。

可以说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从两个关键的方向上，决定了中国对苏政策转变的进程和时间表。总的看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显然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思考，有间接的资料表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参与了决策的过程。[②] 不过，中国这时采取的外交行动很难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推断，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花足够的精力考虑相关的问题，与他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情况相比，尤其如此。中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止后，向苏联提出为重新规范两国关系签订新的协议。但1979年9月开始的谈判表明，两国间并不存在解决问题的基本气氛。谈判很快便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不了了之，尽管这些谈判在缓和中苏关系的气氛上起了一些作用。总而言之，直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中国对苏联的政策仍然受到毛泽东后期处理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影响。

当然，苏联这个时期的扩张行动和对华政策，同样是影响中国有关政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苏军入侵阿富汗，加剧了中国的不安全

---

① 《人民日报》，1979年3月9日，转引自王奇：《二战后中苏（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② 参阅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254页。这本纪实性传记描述了中国主要领导人参与对苏谈判决策过程的具体情况和他们的主张与态度，书中包含了对王幼平本人的采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其准确性和可靠性需要用未来公开的历史文献印证。

感，导致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的判断明显趋向严峻。[①] 随后中国展开了一些重大行动，包括参加对苏联的制裁，如不出席莫斯科奥运会等；1981 年夏季在华北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为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做出更为坚决和巨大的努力；最重大的行动是在中越边境发起自卫反击战；等等。

(二)

尽管中国领导人从 1979 年开始缓和中苏关系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从这时起到 1980 年代中期，中国的内外形势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对中国对苏政策产生了潜在的或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导致在 1982 年 9 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新的对外政策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决心迈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诚如上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决定了中国有必要缔造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共中央工作重心转移的依据和成败，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更为直接的因素是，从 1960 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增加的国防费用，已经对发展经济构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 1968 年军费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 26.11%。在最高年份的 1975 年，军队数量达到 610 万。[②] 邓小平在 1975 年主持军队工作期间，就提出过裁军方案。到 1976 年底，解放军总人数已经比 1975 年减少了 13.6%。[③] 不过 1979 年的国防费用仍占财政支出的 17.3%。[④] 邓小平在 1980 年 3 月明确提出，中国"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在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⑤] 实际上在"文革"后期，已经有过军队交回部分军费以帮助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情况。[⑥] 显然，不论是国家战略的转变，还是经济建设面临的实际困难，都促使中国领导人切

---

①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第 239—240 页。

② 参阅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36 页；另参阅何树栋主编：《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体系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90—191 页。该书称 1975 年中国军队人数达到 660 万。

③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4—15 页。

④ 参阅张星星：《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22 页。

⑤ 邓小平：《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1980 年 3 月 12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69 页。

⑥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第 384 页。

实思考诸如“战争”、“威胁”等的真实程度。

目前尚无法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相关思考和讨论的主要档案文献，随后围绕所谓“时代”主题的讨论或争论的过程，还无法被清楚地描述出来。不过可以大致确定，中国决策层一直在或者说不得不关注和认真地思考“战争”与“时代”等被认为是把握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

1977年8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时说，他在1975年已经谈过未来五年内不可能有战争，现在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传达。不过他还是认为需要“提高警惕”。[①] 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推断，他希望通过随后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战争问题做出比较明确的判断。目前还无法了解后来军委扩大会对战争问题的讨论和决议。从已经公布的邓小平在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看，他一方面认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同时仍然强调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②] 此前不久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有关决议表明，中国领导人这时并没有改变持续了十年之久的看法，即存在着发生苏联对中国大规模入侵的危险。

从一些间接的资料推断，中共十二大前后中国领导人才逐步达成这样的共识，即不论是世界大战还是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在未来较长时间里都是不可能发生的。[③] 确切一些地说，1982年前后，中国领导人的有关认识基本回到1956年中共八大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④] 尽管这类结论这时尚未被直接联系到对“苏联威胁”的重新认识，其中的逻辑是清楚的，即所谓的“苏联威胁”至少也是被明显地夸大了。

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和威胁认知的变化，与中国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特别是与苏联关系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1970年代初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主要因素，是对付苏联扩张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共同利益。随后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将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1978年卡特政府终于下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191页。

②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第80—81页。

③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9页；张震:《张震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03页。

④ 可参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352页；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417页。

决心迈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领导人显然高度重视中美建交谈判，尽管国内事务的议程已经极为紧张，邓小平仍然亲自过问每一轮谈判情况，并做出具体指示。由于中美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尖锐对立，谈判非常艰难。邓小平在谈判的关键阶段下决心，必须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他在1978年11月27日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说，最重要是不要错过时机。[①]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三次会见美方代表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讨论双方争执不下的售台武器问题和中美建交草案等。由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中美双方最终签署了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从历史的过程看，如果没有对抗苏联扩张威胁的共识，中美在当时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迅速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至少也是很困难的。不过，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未能消除中美双边关系中那些带有根本性的矛盾。中美建交后不久，1979年4月美国国会提出并由美国行政当局批准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表明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能量相当大。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即宣布，将采取所谓"双轨"对华政策，一方面表示继续发展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声称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出售高性能的FX系列战斗机。这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的波动。里根政府的行动使中国领导人断定，中美关系正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们决定采取逐步升级的对抗措施，遏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②] 中国政府相继取消了军事领导人的访美计划，并公开谴责里根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邓小平亲自向美国提出警告。[③] 这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好具体准备，不惜采取使中美关系降级的行动。除台湾问题外，中美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是矛盾冲突层出不穷。

正是中美建交后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导致中国决策层在1980年代初下决心，与美国拉开距离。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阶段上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即不能过高估计中美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合作对中美关系的推动作用，否则难免付出过多的代价。

正当中美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矛盾急剧升级、双方在进行意志较量的最紧张时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3月24日在塔什干发表了有关对华政策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第441页。

② 参阅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238页。

③ 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

的讲话，明显透露出苏联对华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勃列日涅夫特别强调：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从未威胁中国的安全，苏联从未对中国有任何领土要求。[①] 在此讲话之前，苏联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以表明其有意改善中苏关系。

根据钱其琛的回忆，邓小平立即注意到勃列日涅夫释放的信息，并指示外交部在两天后做出积极的回应。钱其琛在回忆中介绍了邓小平上述决定的重要背景，认为中方立即做出积极反应，是因为中美关于售台武器的会谈“取得了新的进展”，“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②] 从实际情况看，这时中美之间还没有就谈判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取得进展，钱其琛的回忆可能在时间上有些大而化之了。当时邓小平要求立即做出回应，推测其动机或是为了做出试探，或是为了利用缓和中苏关系的姿态，向美国施加压力，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不过钱其琛的回忆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在当年盛夏决定采取重大步骤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相信，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有利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③] 如果回顾中国以往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应该承认这个认识非常重要。

毛泽东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决定与苏联结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应付与美国的对抗。1969 年秋季毛泽东下决心缓和中美关系，是因为极为担心他认定的苏联威胁，他甚至有可能认为，紧张的中苏关系是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条件。邓小平在 1978 年末下决心完成与美国的建交谈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相信，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有必要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④] 他在 1979 年 1 月访美期间，在公开场合反复谴责苏联的对外政策，并呼吁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联合战线。显然，中国领导人很长时间里都相信，在美苏冷战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中国的对外政策是“非杨即墨”，很难做到左右逢源，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领导人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开始，就已经从根本上逐步改变其以往在冷战影响下形成的战略思维方式。

或许这个时期中国缓和中苏关系的过程并不那么跌宕起伏，实际内容并不像中美关系那么丰富多彩，但从中国对外政策转变的角度看，的确意义重大。到 1982 年盛夏，邓小平显然在用新的思维考虑如何同时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中美 5

①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授勋大会上的讲话》，1982 年 3 月 24 日，《参考资料》（下），1982 年 3 月 25 日，第 9—10 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4 页。

③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4 页。

④ 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1979 年 1 月 1 日，《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55 页。

月开始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举行谈判，到8月17日双方签署了“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公报中再次声明，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承诺，对台军售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做最后解决。[①]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中的承诺，但其政策毕竟还是受到极大的限制。“八一七”公报的签署使中国领导人确信，“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②]因此在8月10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签订前一周，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衔命前往莫斯科，向苏联方面口头转达了中国将认真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立场和条件。[③]中国从此开始贯彻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政策。

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时期同时处理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实践，很可能对中共十二大确定新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实践证明，在冷战的两极尖锐对抗中，中国是可以左右逢源，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建立正常或缓和的关系的，而且这对中国很可能更为有利。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提出并逐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将其正式写进了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从此决定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调。[④]这项政策显然包含着中国领导人对以往30年同时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的基本经验。

这里所谓的建国后30年的基本经验，其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认识冷战和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处理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等，包括与苏联结盟和对抗、与美国对抗和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与美国建交前后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要经验。中国领导人显然不打算继续在冷战中扮演过去那样的积极角色，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在两极格局中争取一个超然的能够自主行动的地位。

中共十二大后，中国几乎是立即开始了与苏联的正式磋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苏冷战在这个时期有加剧的趋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因中国改善中苏关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0—431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③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8页。

④ 这项政策最初是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赵紫阳在1984年5月1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和1986年3月25日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全面阐述了这项政策，并在后一个报告中正式完整地使用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概念。见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9月1日，《当代中国外交》，第452—458、472页。

系而受到影响。中国领导人这时的确有意“与美国拉开距离”。所谓“与美国拉开距离”，包含着对美国的不信任、在战略上防止被美国所利用，等等。但是，“八一七”公报签署后，中美关系到1980年代中期甚至有跃进式的发展。这表明，“与美国拉开距离”显然是有限制的。它主要是指在战略上使中国避免被美国利用，避免成为美国的“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不再重视和不想发展中美关系。更何况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是建立在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上的，但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迅速超出了战略合作的范围，在广泛的领域获得全面的发展。这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多大程度牵制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需要专门探讨的。

在这个阶段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当邓小平决定为改善中苏关系采取一个大的动作时，也提出了中国的条件：苏联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清除所谓的“三大障碍”，即苏联必须先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和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等。尽管在后来的谈判中，钱其琛曾利用私人交往的机会，向苏联方面强调了中方的诚意，但后来的发展表明，以清除“三大障碍”作为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成为中苏关系难以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有资料表明，1970年代末中国决定终止中苏同盟条约时，邓小平就表示过，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只是边界问题，主要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及苏联在中苏边界和中国邻国的军事部署构成了对中国“实实在在的威胁”。[②]不过还没有资料能证明，在与苏方谈判时，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了与此相关的具体要求。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即以清除“三大障碍”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既反映出他们处理中苏关系时，已经不打算在进行意识形态争论；也表明他们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仍然将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军事部署等，视为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当然涉及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考虑。另一方面，由于中美关系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中国领导人可能相信自己处在一个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上。何况外交部本来就认为，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证明，苏联在阿富汗已经“力不从心”，对外政策“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③]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准确反映了苏联缓和中苏关系的动机，中国领导人从中得出的结论除了应该利用此机会改善中苏关系以外，很可能也包含着有必要向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6、15—16页。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原因，此不赘述。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第557、559—560页。

③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苏联提出比较高的条件。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但中国调整对苏政策的确改善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即在处理对美关系中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较多的筹码，尽管这未必是中国领导人的初衷。中国调整对苏联政策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这是19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又使中国处理对苏关系时，处于有利的地位。中共十二大的新对外政策带来如此明显的好处，中国领导人不会体会不到。

(三)

1985年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关键性的一年，其标志是当年秋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改变。从目前中国公布的历史文献中可大致得知，邓小平在1985年春开始重新考虑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1985年4月18日，邓小平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首次提出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苏联可以先做说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条。① 在六个月以后，即10月9日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邓小平请后者给苏联新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带口信，进一步提出，在"三大障碍"中，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谅解，就可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② 中国领导人如此大幅度地调整对苏联的政策，其原因值得深究。

有论著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一事件为中苏关系正常化注入"新的生命"。③ 这一观点需要商榷。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的确可以看做苏联内外政策将发生根本转变的前兆。戈尔巴乔夫在当选苏共总书记的当天就表示，希望并相信中苏关系会改善。在3月莫斯科举行的契尔年科的丧礼上，戈尔巴乔夫向前往吊唁的中国副总理李鹏表示，希望中苏关系能获得"重大改善"。④

如果与其前任相比，戈尔巴乔夫的上述谈话并无特别之处，只是表明了他将继续前任的对华政策而已。例如，在1983年春季的中苏第三轮政治谈判期间，国际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第104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登载该谈话内容时，删去了这一部分。见该卷第11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第1085—1086页。

③ 苏起：《论中苏共关系正常化》，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19页。

④ 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丛书编委会：《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舆论已经注意到，中国正关注着美苏关于欧洲削减中程导弹部署的谈判，并担心如果美苏达成协议，苏联有可能把从欧洲削减的中程导弹转移部署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从而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①]同年8月26日，安德罗波夫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美苏一旦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苏联将削减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并加以销毁，而不会转移到其他地区。他明确说这样中国就没有理由担心了。[②]中国领导人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长期认为"大国妥协，牺牲中国"几乎是不会改变的规律。客观地说，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对于消除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疑虑，是会有积极作用的。当然实际情况如何，需要更多的历史文献来验证。这里只是要说明戈尔巴乔夫对华政策的延续性。

如果遵循时间的顺序，前述邓小平4月间与希思的谈话，可以看作对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回应。不过，邓小平在发表这番谈话的前一天，还在同到访的比利时首相弗里德·马尔滕斯谈到"霸权主义"对欧洲的威胁。[③]他在与希思的谈话中也明确表示：消除"三大障碍"可以有先后，但都要消除，因为那样做"就是要解除对我们的威胁"。[④]这些谈话表明，在推动中国领导人调整对苏政策方面，苏联政局变化和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和有限的。

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心进一步改变对苏联政策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在中国的内部，主要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新发展，特别是中国领导人这个时期对涉及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自1978年以来从未中断，积累到1985年夏季则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主题的思想。[⑤]这是中国领导人在认识"时代"问题上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彻底否定了中共在所谓"时代问题"上长期坚持的主要观点。与此相联系的是，继1983年军队精简机构之后，中国决策层大致从1984年春夏开始，酝酿实施规模达百万人之众的大裁军。[⑥]是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宣布裁军一百万的

---

① 《纽约时报》，1983年3月2日，转引自《参考资料》（下），1983年3月4日，第4页。

② 《里·理安德罗波夫答〈真理报〉记者问》，塔斯社，1983年8月26日电，转引自《参考资料》（下），1983年8月27日，第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第103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第1041页。

⑤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⑥ 张震：《张震回忆录》（下），第269页。

决定，并为此阐述了不可能爆发大战争的观点。[①]这一计划的确大大早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和苏联政局的变化。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百万裁军方案和精简后的军队改革和编制。这样内容和规模的会议，不大可能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3月才开始筹备的。这次会议做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国防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虑其轻重缓急；实行百万人大裁军；在对外政策方面，彻底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确定不再以"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为基础，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

会议期间，邓小平明确地概括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思考和结论，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这次会议的决定，对中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在6月4日与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说，经过几年仔细观察和思考，中国决策层已经完成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这句话可以被合理地延伸为，苏联的威胁也并不像以往被认为的那么严重。第二个转变是放弃反苏统一战线政策，不在所谓"美中苏大三角"的思维框架中，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②]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意义重大，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退出冷战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以反苏国际统一战线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基调，并希望在建立多元世界政治秩序的认知基础上，推进中苏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甚至明确承认，毛泽东后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缺陷"。[③]

另一个需要重视的因素是，在这个时期邓小平大致形成了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划，即争取经过七十年的努力，在21世纪中期使中国的发展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说中国"希望有七十年的和平"。[④]这种对未来的思考很有可能是促使邓小平本人下决心根本改变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关键性动力。

---

① 邓小平：《裁减军队，提高军队素质》，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军事文选》，第3卷，第266—267页。

②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第1076页。

④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另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第1057、1059页。

所有上述可以说是根本性的认知变化，必然会影响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思考，后来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迄今还无法得到足够的历史文献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因此，那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一事件为中苏关系正常化注入“新的生命”的看法，至少是片面和简单的。

除了上述中国内部的变化外，1984年初到5月初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机会，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进一步明确的承诺，从而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扩展创造了更宽松的政治环境。①5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双方的军事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根据前述钱其琛回忆的逻辑，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会使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正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可以更加主动和自信地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当然，他们很有可能更加感到从容不迫。

在10月9日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时，邓小平请他转告戈尔巴乔夫，在“三大障碍”中，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谅解，“而且能够办到”，就可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② 这一让步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中国领导人的确已经不再视苏联为威胁。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坚持苏联应与中国达成谅解，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点是值得深入分析的。

邓小平10月9日的口信肯定不是简单地谈判策略，更不会是一时兴起。至少他本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包含着战略思考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已经将关注的焦点从解除苏联威胁，转向集中力量遏制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他们有意通过改善中苏关系，为根除印支地区紧张局势，维护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创造有利的条件。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主要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地区战略利益。可以设想，如果在改善中苏关系的同时，利用苏联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印支地区冲突，中国的周边环境将获得全面性的改善。后来中苏政治谈判之所以持续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苏难以在越南撤出柬埔寨问题上达成谅解是主要原因。

根据《邓小平年谱》的相关记载，齐奥塞斯库于10月22日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戈尔巴乔夫表示会认真考虑。③ 但从这个时期中苏交往的情况看，这一情况很可能没有立即反馈到中国。另一种可能是

① 参阅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53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第1085—108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第1086页。该页注释提供了这一信息。

戈尔巴乔夫的表态被认为是不清楚的。11 月 4 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邓小平的谈话，其中包括分先后解决"三大障碍"的内容。[①]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方面这种公开和直截了当的反应，两天后中方即接到苏方通知说，收到邓小平的口信了。[②]随后不久苏方又提出，立即在远东某地举行中苏峰会。苏方对邓小平口信的反应和实际上继续坚持不解决"三大障碍"的立场等均表明，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准备好为中苏关系正常化采取实质性的步骤。根据钱其琛的回忆，中苏政治谈判直到 1986 年春，也未能在"三大障碍"上取得实质性进展。[③]

有间接的证据表明，导致戈尔巴乔夫无法为改善中苏关系做出重大决定的原因，主要是他在苏联国内面临巨大的困难。1985 年 12 月间，李鹏访问欧洲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期间，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会见李鹏。根据中方参加会见的人士回忆，戈尔巴乔夫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主要谈了改善中苏关系与苏联国内改革两个问题，而且他花了很长时间谈的是苏联改革面临的国内阻力。[④]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这次会谈向中方清楚地表明，他对改善中苏关系是真心诚意的，但此时在苏联国内还不具备采取实质性行动的必要条件，他的主要精力也无法集中到中苏关系上。直到 1986 年 2 月苏共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才巩固了其政治地位，他试图推行的改革也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在这个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于 7 月 28 日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在中苏和中蒙边境撤军、阿富汗撤军等方面，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并愿意同中国认真谈判，以解决中苏边界遗留问题。[⑤]

中国领导人这时显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有诚意改善中苏关系，但他的谈话模糊了双方矛盾的焦点，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已经改变了的地缘战略关切。简单地说，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关切中，首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所谓的"苏联大兵压境"，而是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而彻底消除印支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有利于中国实现其在印支地区的战略利益。8 月 13 日，中国外长吴学谦奉命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告诉他中方不满意戈尔巴乔夫

---

① "An Interview with Deng Xiaoping," *Time*, November 4, 1985, p. 40.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23 页。

③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23—24 页。

④ 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第 308—309 页。

⑤ 戈尔巴乔夫：《在授予符拉迪沃斯托克列宁勋章大会上的讲话》，1986 年 7 月 28 日，《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30—432 页。

忽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通过齐奥塞斯库转话的核心。[①]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时，重申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②]

随后的中苏政治谈判持续到1989年春，在此过程中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双方解决问题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也日益宽松。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始终坚持1985年秋季确定的立场，即将解决越南撤出柬埔寨作为优先的和不可妥协的条件。1989年1月6日，越南外交部宣布，越南军队至迟到是年9月，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2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达泽访问北京。经过一番曲折的努力，苏联方面终于在印支问题上做出让步，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了《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并宣布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间表。

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如期访问北京，中苏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其未来将遵循的准则，做了概括地说明。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四十年的曲折反复，终于能在冷战中同时与东西方对抗的两极建立并保持了正常化良好的关系，尽管由于冷战的突然结束，这一状况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从中国与冷战的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逐步将中苏关系置于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不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基础上。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相比，其突出特点是中国并不谋求与苏联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关系。也许中国领导人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每个阶段、每个问题上，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做着退出冷战的选择，但中苏关系正常化本身就是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摆脱在国际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的结果。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的确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些根性变化，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已经超越了上述思维模式的基本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也是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一个起点。

本文的论述也部分地证明了，中国之所以能退出冷战，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决心退出美国与苏联两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竞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走俄国人的路”（追随苏联的发展模式），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5页。

②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7页。

在对外政策领域则选择了“一边倒”和中苏结盟。不论如何评价，那毕竟是中国发展战略与对外政策的第一次根本性的协调。此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动荡与波折，中国领导人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它们结合在一起，标志着自195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政策终于又一次实现了根本性的协调，其结果就是本文的命题:“告别冷战”。

（《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中苏关系

论中苏同盟的起源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导致1950年代中苏结盟的历史原因。由于中苏同盟的形成及其演变对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多年来学术界为研究中苏同盟及其有关的问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和俄罗斯开放前苏联的档案，学术界开始重新探讨有关的问题，并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新披露的历史文献和富有启发性的新研究成果，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中苏同盟的起源做出更为全面的解释。

（一）

回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对于理解战后双方关系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坚定地站在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并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维系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在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是中共中央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如何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一再发生分歧。从1937年11月王明自莫斯科飞抵延安起，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分歧便以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展开。直至皖南事变发生，中共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这场斗争才基本结束。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一度拒绝了苏军统帅部关于组织

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发动进攻的要求。[1] 共产国际领导人为此指责了中共中央，但他们已不再能像以往那样使中共中央改变其决定。这一时期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并不是一概不赞成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有时甚至还给予支持，但这并没有改变双方分歧的实质，即中共中央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如何维护中共党的利益；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出发点则是如何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

其次是维系双方关系的意识形态纽带被削弱。由不同的战略利益引起的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策略分歧，使苏联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不满逐步发展为对中共的性质产生了怀疑。1940 年秋，斯大林向崔可夫陈述了他对中共的看法，即中共主要依靠农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必然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打上“农民阶级”的“烙印”，以致它对“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2] 中共的整风运动加深了苏联领导人的成见。[3]1944 年 6 月间，斯大林在与美国官方代表的谈话中称，中共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他们就会忘掉这种（共产主义）政治倾向”。[4]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中共不过是一个爱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实际上没有多少实力。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共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地信仰共产主义，并非常尊重苏联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从实际经验中认识到，生搬硬套苏联的理论、经验和政策，将给党带来极大的危害。在思想方面，如不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就不能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在组织方面，如不清除王明等人的影响，中共中央与苏联的分歧将会不断引起党内斗争，甚至导致党的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毅然发动整风运动，标志着中共中央决心从根本上调整党与苏联的关系。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直至 1944 年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已相当冷淡。这一时期它们都在根据自的判断和自己的需要自行其是。1945 年春，由于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和苏联明显地表现出将参加对日战争，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是苏联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终与美英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它的对华政策基本

---

① 《我军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1941 年 7 月 2 日；《帮助苏联红军我们决取广泛游击战的方针》，1941 年 7 月 15 日；《八路军新四军仍立足长期斗争方针》，1941 年 7 月 18 日。

② 瓦·崔可夫著：《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万成才译，新华出版社，1980 年版，第 34 页。

③ 《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内状况致毛泽东的信》，1943 年 12 月 22 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61 页。

④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 June 22, 1944,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1944, Vol.6, The Far East, China, pp. 799–800.

明朗。在苏联当时的对华政策框架中，与处理对美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相比，中共对于苏联领导人实在不能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只是在如何保持中国政局稳定和必要时可以被用来制约国民党政府这个层次上才被考虑到。

与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形成对照的是，从1945年春季开始，中共中央越来越关注苏联的政策和考虑如何发展党与苏联的关系。在苏联宣布中止《日苏中立条约》的13天后，毛泽东批转了中共晋察冀分局关于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的指示。这项指示的核心就是将战略发展重心从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转向在华北和东北配合苏军作战。[①] 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战后的作用，并在大会期间第一次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他经过长期考虑的争取东北的计划。[②]

不过确切地说，七大期间中共中央至多是确定了，或者说是在重申争取与苏联合作的原则。实际上中共领导人已经了解到苏联参战后不会直接向中共提供援助。因此毛泽东在热情赞扬苏联的同时也告诫全党，要对得不到苏联援助有所准备，要靠自力更生。[③]

七大以后远东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苏谈判开始后，中共中央终于确定了有可能与苏联合作的范围——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8月3日，一直在重庆负责外事工作的王若飞在延安作形势报告。他提醒与会者苏联将与国民党政府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但苏联的妥协也不会超过两个界限，其一是苏联不会允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亲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苏联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尽管它可能不愿援助中共。[④] 王若飞的报告基本上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即在促使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和防止中国内战方面，苏联与中共有共同的目标，中共在发展自己的力量时不至于受到苏联的限制。

在抗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和中共之间关系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一方面是苏联在制定其对华政策时，将中共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是处理

① 《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配合苏联作战准备工作的指示》，1945年4月18日。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第18页；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③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第197页；《赫尔利、斯大林谈话情形》，1945年5月7日。

④ 《王若飞同志报告记录》，1945年8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存，编号：6442/1。

对苏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中共中央重大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中共面临的现实是他们只能在既定的和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得到苏联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也还要经过努力才能实现。

（二）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斯大林便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中共与国民党谈判解决国共两党间的矛盾。斯大林的电报揭开了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帷幕。中共与苏联的政策最初像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很难发现有多少共同点。苏联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上的条款变成现实的格局，以及如何维护它在这个格局中的利益。斯大林给毛泽东打电报就是在履行苏联在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交涉中承担的义务，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共承认美苏之间的谅解。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考虑党的战略和策略时，主要是依据他们对战后美苏关系发展趋势的判断，而非对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的了解。1942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此后，毛泽东一度认为，美英苏的战时合作在战后会维持下去，受其影响国共在战后可能继续合作，中国有可能走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①]此后尽管国共关系时紧时松，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也起伏不定，毛泽东从未根本否定过这种估计。毛泽东当时设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是苏联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和美苏在战后继续合作；其二是中共的力量获得一定的发展。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两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在国际上，苏联的军事胜利的确是令人鼓舞的，但在美国加强援蒋时，中共却得不到苏联的直接援助。在国内，中共的实力尚不足以阻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在决心利用日本投降之机争取使党获得强大实力地位的同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蒋介石发动内战，而且他倾向于认为，制止内战的关键还是要有美苏之间的妥协和它们对国民党的压力。[②]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9页。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35页。

② 《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230页。《毛主席在日本投降时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存，编号：人：721/7.1 。

然而国际压力的方向却是对着中共的。先是美国公布了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号命令”，使国民党政府得到国际承认的受降权。随后是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美国方面则以出面担保毛泽东安全的方式给予支持。这时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向蒋介石妥协。这种无异于落井下石的做法当然要引起毛泽东的愤慨。[①]

中共中央最终还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劝告。毛泽东在冷静分析形势后认为，中国在东方对于美国犹如欧洲的希腊对于英国，为其所必争，“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必不能实现，因此苏联不可能公开援助中共。这就决定了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②]据此中共中央决心做出相当大的让步，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中共领导人认真争取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并不等于他们认为肯定能达成协议。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时，更多的是依据对美苏对华政策的分析，而且他清楚地知道中共面临的困难。这决定了他一方面决心改变七大制订的联合政府的方案，准备在政治上作更多的让步；另一方面对谈判的结局持相当保留的态度。[③]进一步说，在毛泽东对战后国共妥协的构想中，中共必须将主力向华北和东北集中，造成控制大片根据地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局面。这种构想本来就与得到苏联的支持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在赴重庆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大致确定了向北收缩力量和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从这种战略布局看，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谈判，可能也包含着协调与苏联的关系，以换取苏联在更大的战略方面的支持。正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

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提出了夺取东北的战略方针。[④]战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转机。战争期间，苏联主要是通过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协调政策来实现它在东北的目标，即在与苏联东面接壤的地区造成一个安全缓冲带，防止其他大国势力进入，以致战后形成对苏联安全的新威胁。苏联在与美国和国民党协调政策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过中共这个因素。甚至在苏军制订对日作战计划时，也未考虑如何与控制着大片华北和东北接壤地区的中共军队合作，以致苏

---

①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著：《苏南冲突的经历》，达州译，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98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②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5年8月23日。

③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④ 刘少奇：《目前形势与战略部署》，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372页。

军参战后在华北和东北不同地区对前往会师的中共军队做出了相当混乱的反应。直到9月上旬中共军队到达沈阳后，当地苏军还要向莫斯科请示政策。[①]

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苏联最初持谨慎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担心中共的行动会影响苏联与美英的关系。[②]一些地区的苏军对前往接应的中共军队表示友好，不过是他们长期接受政治教育的自然反应。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前往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即在苏军撤出之前，中共军队不要开入东北，已进入大城市者请自行退出，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由中国自行解决"。[③]

然而时隔不久，苏联开始调整它在东北的政策。苏联政策的变化主要是由美国的行动引起的。美国由于担心苏联会利用中苏条约完全控制东北，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④]加之9月11日开始的伦敦外长会议未就对日管制问题达成协议，而且美军开始在华北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这些情况导致苏联大幅度调整其东北政策，其主要表现就是全力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0月初，苏军向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议，抽调20—30万军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苏军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迅速派人"接收工业中心及城市工业"，苏军并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党的中心移到此间"。[⑤]

苏联东北政策的变化对中共的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苏联出兵东北后，中共中央由于无法确切了解其政策，迟迟未下全力争取东北的决心。9月中旬苏军代表访问延安后，中共中央虽然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但它当时的设想只是军队抢先进入东北或部署在靠近东北的地区，而且进入东北后部队应布署在东北的东部、西部和北部，控制苏军未驻扎的乡村和一些中小城市，大发展的时机是在苏军

①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著:《毕生的事业》，下册，柯雄译，三联书店，1977年版。谢·马·什捷缅科著:《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下册，洪科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另见《程耿关于我军已与苏联红军会师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8月17日。《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

② Sergei N.Goncharov, 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Korean War*,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0.

③ 《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14日。

④ *FRUS*, 1945, China, Vol.7, pp. 973–974, 979–980, 981.

⑤ 《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8日；《辰兄态度积极关系皆好》，1945年10月25日。

撤出以后。[①]

至10月下旬，在东北苏军的鼓励下，中共中央下决心“竭尽全力，霸占东北”，准备在南满和热河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性决战。[②]为此中共中央进一步向苏联方面提出推迟苏军撤出东北及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港口登陆和接收政权等要求。[③]苏方尽管表示推迟撤军有困难，但同意在撤军前不准国民党军队空运长春。另外，苏军还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通讯器材和运输工具，允许中共军队在国民党军队登陆地区自由行动，在长春除市长外，政府部门领导人均可由中共更换。[④]苏军从营口和葫芦岛撤出后，即协助中共军队占领两地区，致使国民党军队一直未能在那里登陆。

这一时期中共与东北苏军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苏联为了巩固它在东北的实力地位，除了支持中共争夺东北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共要实现其争取东北的计划，没有苏联的认可和支持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此后尽管苏联一再调整其东北政策，但中共与苏联在这一地区形成的战略配合关系从未根本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关系的发展，是战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此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块基石。

（三）

中共与苏联在东北形成的战略关系毕竟是局部性的，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双方面临的外部压力，一旦促使双方合作的外部因素发生变化，它们的关系必定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1945年1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由于接收东北受阻，蒋介石决定中断与苏军的谈判。此时正值魏德迈来华视察形势，致使苏联怀疑蒋介石在东北的外交行动受到美国的指使。苏联方面认为，美国表面上不介入国共斗争，“但内部任务，极其庞

① 《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99—301页。

② 《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关于11月份作战部署的指示》，194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365、394—396页。

③ 《要求苏联红军再留驻热河两个月》，1945年10月25日；《与国民党会谈方针及要求苏军缓撤》，1945年10月26日。

④ 《在彼所知情况》，1945年11月6日。

大，有垄断全（中）国，甚至侵入东北的企图”。按苏联方面当时的估计，美蒋全力争夺东北尚需两个月时间作准备。[①]

苏联显然不希望在东北与美国形成对抗的局面，所以它立即采取行动缓和中苏关系。在国民党东北行营宣布撤退第二天，苏联即向国民党政府表示希望继续谈判解决接收东北。12 月中旬，斯大林向访苏的蒋经国说明，苏联无意介入国共斗争，不过国民党政府必须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并绝不允许美国人进入东北。[②]

苏联在缓和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的同时，也开始限制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1 月 20 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说，上级已经决定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国民党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 50 公里以外，并不得进入苏军驻扎地区，苏军撤出东北前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还声称，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此后不久，苏军进一步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握的政权，并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③] 这表明苏联已决定用直接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政策取代帮助中共控制东北。

对于苏联政策的变化，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是复杂的。在接到苏军通知前，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东北外交形势的变化，认为中苏关系“处于危机之中”，东北局必须有所准备。[④] 在获悉东北苏军的要求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东北局，对苏军的决定“只有服从”，同时应争取苏军尽可能推迟国民党政府进入东北的时间，并让中共继续控制锦州至山海关地区。[⑤] 这时中共中央毕竟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虽然已无法独占东北，但仍有可能在苏方的帮助下，在东北大城市取得一部分政权。东北局也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⑥]

一个偶然事件加强了中共中央的信心。11 月 29 日，国民党东北行营要员张嘉

---

① 《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 年 11 月 12 日。

② Donald G.Gillin and Ramon H.Myers edited,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Hoover Press, 1989, pp. 126–127.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 年版，第 124 页。

③ 《满洲不准作战》，1945 年 11 月 20 日；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 年 11 月 30 日，《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21 页。

④ 《在苏军预定方针不变情况下重新部署力量》，1945 年 11 月 13 日；《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19 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429—430 页。

⑤ 《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铁路线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2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431—432 页。

⑥ 《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28 日；《东北局关于撤出大城市后工作任务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447—448、434—436 页。

敖在重庆会见董必武，要求中共让出北宁路。中共中央据此推测，苏联在东北一方面是要阻止美军进入东北，另一方面是便利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中央于12月上旬指示东北局，要争取苏联出面促成国共合作接收东北大城市。[①]

在如何理解苏联改变政策的动机方面，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这时都较多地强调了苏联与美蒋斗争的一面。他们认为，苏联改变政策主要是为了同美国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斗争。这是中共中央一度指望在苏联帮助下取得或部分取得东北大城市的主要原因。当时处于东北前线的陈云、高岗和张闻天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在11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苏联政策的目的是“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苏联在东北对国共的政策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中共在东北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②]他们对苏联政策的目的分析尽管仍然是不全面的，但毕竟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即苏联的政策是为其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中共服务的。

随着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恢复，12月下旬，美苏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就中国问题达成协议，中共中央终于认识到，苏联限制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并不是一般性的和临时策略行动，中共不仅不能独占东北，也不能再指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在东北大城市“插足”。12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工作的重心转向在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③]

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从形式上看是中共在苏联改变政策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作出的选择，但从更深层次上考察，可以说它包含着中共领导人在认识对苏关系方面的新发展。苏联一再不顾中共的困难自行其是，使中共中央不能不从极为现实的角度考虑与苏联的关系。

在1946年初的国共谈判中，由于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介入，中共中央多次设想邀请苏联参加国共谈判。在中共中央看来，苏联不过是可以在谈判中用来平衡马歇尔和向国民党施加压力的一个因素。中共领导人对邀请苏联参加国共谈判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互相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

① 《中央关于再开谈判之门给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12月1日，中央统战部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央关于争取我党在东北的地位及策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474—475页。

② 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见《陈云文选》第221—224页。

③ 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182页。《刘少奇关于应以主要力量建立东、西、北满根据地致彭真电》，1945年12月2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512—513页。

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①]

2月中旬，国共谈判转入讨论东北问题后，中共中央不再认为苏联参与谈判是必要的了，因为苏联为了表示其公平，“可能要我对国民党作更多的让步”。[②]3月间，由于美英和国民党政府掀起反苏浪潮，苏联在东北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又趋强硬，中共中央立即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东北苏军将部分地区交中共接收。鉴于以往的教训，中共中央告诫东北局务必交涉清楚，因为“将来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时，可能再对蒋表示好感”。[③]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一直对苏联的政策采取配合和适应的方针，除了策略方面的考虑外，也同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对战后国际形势的看法有密切的联系。他们认为美英苏战时结盟形成的“世界新秩序”在战后将继续下去。在这个“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与之相联系的是各国的内部问题也将通过妥协来解决。[④]抗战结束后，中共领导人认为，战后国际问题的中心是美苏之争，中国的国共斗争是美苏斗争的反映。[⑤]可以说中共领导人一直是在美苏合作格局的前提下考虑党的战略的，使党的政策不断适应苏联政策的变化则是这个大思路的必然结果，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苏联政策经常是对中国革命的束缚。

1946年春，伴随冷战格局的形成，美苏在东北的斗争也进一步尖锐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决不甘心东北由国民党政府一家独占。苏军在即将撤离时建议中共可在长春路“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军撤出后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⑥]苏联的支持对中共领导人正是求之不得的，但他们也深知东北问题“中外瞩目”，而且国共谈判正处在关键时刻，一旦在东北夺取大城市，必须考虑其后果和国际上的反应。

4月间，正当国共争夺长春之战白热化之际，毛泽东在一份仅供党内部分领导

① 《中央关于提议英国苏联参加国共谈判问题的指示》，1946年1月3日。

② 《中央关于东北停战谈判情况致东北局电》，1946年2月12日，见《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7—78页。

③ 《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1946年3月5日。

④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

⑤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456页。

⑥ 《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的指示》，1946年3月2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0—101页。另见《可把我不占沈阳不断电源作为同国民党谈判资本》，1946年3月18日；《速向苏方交涉力争我接管长，哈，齐》，1946年3月26日；《彭真关于苏军撤退日期致李，黄电》，1946年4月3日。

人传阅的文件中指出，美苏妥协仍是一种总的发展趋势，但它们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各国人民必须“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更重要的是美苏妥协只能是各国人民对美斗争的结果。[1]按照他的看法，各国人民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是合乎逻辑的。8月至11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中，根本修改了他以往对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苏之争，而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美国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因此处于“中间地带”国家中的人民革命不论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还是对于保卫苏联，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的方针就是“战争的方针”，以战争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2]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主要是针对党内不同意见和为党制定政策而提出的，但不能因此低估其当时苏联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分歧，以及毛泽东在谈话中将以中国为代表的民族革命运动置于超过苏联的战略地位之上，对以后双方关系的潜在影响。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重新估计表明，中共中央已经不再认为美苏关系对中国政治形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共不仅将摆脱美苏格局的束缚，而且将不再受苏联外交战略的束缚。

（四）

中国内战爆发后，苏联最关心的是防止美国的介入。苏联一面利用一切场合揭露和抨击干涉中国内政，一面向美国表示，苏联仍有意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1946年12月，斯大林告诉罗斯福的儿子说，苏联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和美国实行共同的政策”。[3]莫洛托夫给马歇尔的一封信表明，斯大林所谓的“共同的政策”，就是指1945年12月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4]这一时期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不可能在内战中取胜。

当中共领导人下决心以战争手段彻底打败国民党时，他们实际上也是下定决心

①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84—1185页。

②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1194页。《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6年11月21日。

③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④ A.C.阿尼金著：《外交史》第5卷，（上册），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86页。

要为维护中国革命的利益，打破远东以美苏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这时毛泽东对苏联与美国搞的雅尔塔体系已经极为反感，对苏联总是要求中共为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而对国民党妥协肯定十分不满。1947年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政治小组讨论会的发言中，重申了他在1946年4月提出的观点，并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右倾”，认为法共和意共热衷走议会道路是导致那里的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他还表示特别赞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认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上了波茨坦和雅尔塔协议的当，只有南共坚持武装斗争才取得了胜利。[①]毛泽东这时或许并不知道法共和意共的政策与苏联有直接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这番评论都构成对苏联的批评和挑战。在12月的中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要“靠自己，不靠外援”。[②]

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导致苏联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共的关系。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会见南共代表时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他在判断中国形势方面犯了错误，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共领导人是对的。[③]同年春季，苏共中央决定接受中共的请求，帮助修复东北的铁路。5月间，斯大林告诉受命前往援助中共的科瓦廖夫，苏联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共，只要“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④]苏共中央的决定和斯大林的谈话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说在此之前苏联与东北中共控制地区保持贸易联系是地区性的和策略性的行动，那么此后对中共的援助则是带有战略性的考虑了。苏联铁路专家小组为东北铁路交通的恢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共东北部队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说苏联在东北及时向中共提供包括武器装备在内的各种援助，成为此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前后，毛泽东显然认为需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了，因此他向斯大林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设想。尽管这一设想由于双方的种种考虑在内战期间始终未能实现，但它毕竟表明了中共领导人加强与苏联的关系

---

① 《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存，编号：6521/2.5。

② 《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存，编号：6521/2.5。

③ 德迪耶尔著：《苏南冲突的经历》，第98页。

④ N.B.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21期，第29页。

的迫切愿望。[①]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加紧与苏联发展全面关系的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后，中共中央迅速于7月10日通过决议，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②]11月1日，刘少奇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提出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的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③] 刘少奇的文章即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也是在向苏联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这一时期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东北局在处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政策上，也在相当程度上考虑了苏联方面的要求。

11月初，东北全境解放。此后，斯大林显然感到有必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共党内的情况及其各项政策。据科瓦廖夫回忆，1949年1月他从莫斯科重返中国后，他的任务已经从组织对中共的技术援助转为向斯大林报告中国局势和中共党内的情况，并保持斯大林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联系。而且从这时起，斯大林开始亲自掌握对华政策。[④]1月14日召开的苏共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访苏的问题，斯大林在会议上决定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⑤]

1月31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在随后的三天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米高扬则立即将谈话内容报告斯大林，并向中共领导人转达斯大林的指示和意见。从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情况看，双方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 中共的战略和各项政策。毛泽东有针对性的指出，解放军不久将打过长江，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不大。中国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在对外政策上“一边倒”，在经济建设中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米高扬对于中共的基本政策没有表示异议。(2) 毛泽东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共中央与王明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以消除苏联的误解。米高扬在此之前已得到指示不会见王明，这表明了苏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不介入中共党内斗争的立场。(3) 毛泽东在东北口、新疆和外蒙古等问题上婉转地转达了希望苏联改变其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奉行的政策。米高扬则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阐明了苏联的原则。在东北港口问题上，米高扬转告毛泽东，斯

① 关于毛泽东访苏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见《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66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75页；Andrei Ledovsk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 Affairs*, 1995，No.2。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年7月1日。

③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948年11月1日，《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④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第9页。

⑤ Andrei Ledovsk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p. 77.

大林认为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共掌握政权后，苏联主张签订对日和约后从旅顺撤军，如中共不赞成，苏联亦可立即撤军。关于新疆问题，米高扬表示苏联不支持那里的独立运动。关于外蒙古问题，米高扬转告毛泽东，斯大林主张维持中苏条约的决定。[①] 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的会谈表明，双方在中共的现行政策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涉及未来双边关系上的分歧并未解决。

中国学术界对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争论最多的问题是，米高扬是否代表斯大林劝阻中共不要打过长江。近年来俄罗斯公布的有关档案已使这一问题基本上得到澄清。1月10日，即在苏共政治局决定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前，斯大林将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建议转告毛泽东，并附上苏联草拟的给国民党政府的复文。复文称“苏联政府一向主张中国停战建立和平，但在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中共）的意见”。斯大林还附上一份为中共拟就的答复，在其中强调了中共希望和谈，但反对美国参与调处。13日，毛泽东复电斯大林说，而苏联的答复会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参与调处“是适当的事”，国民党也会以此为借口指责中共“是好战分子”，而且此时接受国民党的和谈建议，会在革命队伍内部引起思想混乱。毛泽东据此修改了苏联给国民党政府的复文，要求苏联明确表示不参与调处。在毛泽东复电以前，斯大林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二封电报，解释他前电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在接到毛泽东13日的电报后，斯大林立即打电报向毛泽东详细解释了他的看法。他估计中共如同意谈判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其一是在没有外国参与的情况下，国民党会拒绝谈判，如此它将承担战争责任；另一种情况是国民党同意谈判，那时中共可提出自己的条件，估计国民党是不会接受的，这样中共仍可取得主动。斯大林还表示这只是建议，毛泽东接受与否都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同一天毛泽东根据斯大林11日的电报，复电称完全同意斯大林的意见。15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这件事结束了。”[②]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表明，米高扬没有必要再与中共领导人讨论解放军是否过江的问题了。当然，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证明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在斯大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75—378。另见 Andrei Ledovsk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p. 78.

② “Stalin to Mao Zedong”, *10 Januaary, 1949*, p. 27; “Mao Zedong to Stalin”, 13 January, *1949*, pp. 27–28; “Stalin to Maozedong”, 11 January, 1949, p. 27; “Stalin to Mao Zedong”, 14 January, 1949, pp. 28–29; “Mao Zedong to Stalin”, 14 January, 1949, p. 29; “Stalin to Mao Zedong”, 15 January, 1949, p. 29. 以上电报均见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hereafter *CWIHP)*, 1995/1996, Issue 6–7; “Cable, Terebin to Stalin (via Kuznetsov)” , 13 Janurary, 1949, *CWIHP*, Issue 16, p. 129.

林草拟的给国民党政府的复文中，透露着他真正关心的问题，即防止美国的介入。根据他的一贯看法，国共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避免美国干涉的最好办法了。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方针就是要争取国共“两分天下”、“隔江而治”，而和谈是达此目的的唯一手段。在这种背景下笼统地提出“停战”与“建立和平”，其后果可想而知。说斯大林不理解中国政治形势的复杂性是没有道理的，他这样做多半是对美国可能的干涉过于担忧了。

以上对斯大林的评论毕竟是推测。不过不论斯大林对中国政治的复杂性是否理解，中共领导人肯定知道此时一般性地谈论和平的后果。而且根据他们战后与苏联几次介入国共斗争的经验，很容易认为苏联是又一次要求中共妥协，而其含义只能是与国民党“划江而治”。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要告诉斯大林，用什么方式决定中国的前途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和中共不必再用迂回战术了。毛泽东一再向米高扬强调，解放军可以不费力地打过长江，而且美国不可能进行军事干涉。这表明他确实认为——也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曾经有意阻止解放军打过长江。

米高扬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苏联方面，这种积极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极大地增加了对中共的信任。中共领导人在制定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他们在处理与美苏任何一方的关系时，必定会受到另一方的牵制。一旦中共决心密切与苏联的关系，它就必须准备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付出代价。而恰恰是在这一敏感的问题上，斯大林主动给了中共回旋的余地，即赞成中共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和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指示科瓦廖夫转告中共领导人，苏联无意干预中共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①]4月间，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为了防止美国在中国制造分裂，中共应提出以其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为条件，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②]

1949年初是中共领导人开始为未来的新中国设计外交蓝图的重要时期。在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必忙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忙的是与苏及新民主主义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不过这还仅仅是一种设想，会议通过的决议基本上没涉及外交问题。中共中央在会议后发布的有关指示也主要是针对如何处理西方国家外交机构的问题。米高扬的访问及

---

① “Stalin Cable to Kovalev, re. Trade 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 March 15, 1949, *Uncertain Partners*, pp. 230–231.

② “Stalin Cable to Mao, re. the Pricinples of Establishing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949, *Uncertain Partners*, p 231.

随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促使中共中央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在3月初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热情洋溢地称赞苏联对中共的帮助和支持，称“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①]他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实际上宣布了新中国的外交将“一边倒”。[②]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与苏联结盟的政策。

这时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不影响它与美国的关系。但是这种影响达到什么程度和导致什么后果，还取决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处于何种状态。在中共领导人的观念里，在美苏尖锐对立的世界格局中，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须决定自己站在哪一方。但政治原则毕竟不是外交政策，它们是可以区分的。新中国与美国可以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只不过要排在苏联的后边，而且美国必须放弃敌视中共的政策，并以被认为是平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内战爆发后，中共对美国实行的基本上是一种防范政策，即防止美国的军事干涉。中共领导人实际上认为美国既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对国民党的援助也相当有限。直到1948年11月在处理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时，中共领导人并不认为，取得全国政权后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可能的。[③]但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同美方的接触等，使中共中央对美政策越来越强硬。

12月间，一位叫雷文和的美国记者告诉中共代表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美国政府有意承认新中国，条件是政府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在上海和青岛的驻军权。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认为美国政策已从单纯支持蒋介石转变为一面支持国民党进行军事抵抗，一面在革命队伍内部组织反对派，故必须粉碎美国的“政治计划”。[④]1949年1月8日中共政治局通过的决议特别强调要警惕美国的两面政策，击破“帝国主义的阴谋”。[⑤]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代表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数次会谈。双方在交往中讨论了美军撤出青岛、美国与未来新政权的关系，甚至还

①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7、548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4—1435页。

③ 《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问题给东北局电》，1948年11月23日。

④ 毛泽东：《对“雷文和谈话摘要”的批语》，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4页。

⑤ 《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7—18页。

探讨了司徒雷登访问北京的可能性，但最终未能为双方关系找到缓和的途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司徒雷登在会谈中表示，美国在国民政府彻底垮台之前，还不可能承认中共政权，但同时又提出希望未来中国的新政府“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在会谈期间，司徒雷登还在南京外交界传布他已经与中共方面建立了联系。[①]他的这些言论和举动引起中共领导人的警惕和反感。美国方面一再对未来中国的新政府中是否有反对派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只能推动中共中央更坚定地实行与苏联结盟的政策。如果说司徒雷登与中共代表的接洽给中共外交政策带来了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中共与苏联结盟带上了更鲜明的与美国对抗的色彩。

（五）

解放军打过长江后，中苏结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5月间中共中央即决定刘少奇组团访问莫斯科。6月31日，在刘少奇前往苏联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重申新中国将坚决“一边倒”向苏联阵营。[②]早在4月8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一次谈话中就已经详细地阐述了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③]他选择在刘少奇访苏前公开予以发表，显然也是为了进一步消除斯大林的疑虑。

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起草了一份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从报告的内容看，中共代表团至少希望在下列问题上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即：(1) 使苏联了解并赞成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大政方针；(2) 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方面与苏联协调；(3) 新中国成立后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尽快予以承认；(4) 在实现中国统一的斗争中得到苏联的帮助，包括解决新疆和台湾问题；(5) 争取苏联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6) 废除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间的中苏条约，代之以新的中苏同盟条约；(7) 确定处理中苏两党关系的原则。[④]

斯大林对凡是涉及中国国内政策的问题，基本上表示赞成。在处理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强调要平等和互相尊重，并称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领袖”，苏联和欧洲共产党人应向中共学习。对于中共希望得到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斯大林

---

① 《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年6月7日。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2—1473页。

③ 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资料》，第48期，第152—155页。

④ 前引《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8—403页；另可参阅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7—79页。

也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唯独在外交方面，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的答复相当复杂。他明确表示一俟新中国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但在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问题上，斯大林一方面承认该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另一方面对该条约涉及的有关问题——如苏联在旅顺驻军和中东铁路等等，他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和试探性的。[①]

刘少奇对苏联的访问使中共在建国前基本完成了与苏联结盟的准备，剩下的就是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是否签订新条约了，而这正是双方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它不仅摧毁了这一地区以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且迫使有关各国面对一个在战火中崛起的新型的革命国家。苏联要与新中国建立同盟关系，势必要进行两方面的调整。首先苏联需要理解，中共在中国革命中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中国革命的胜利对远东国际格局意味着什么？斯大林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前所未有的热情赞扬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理解力要比美国领导人深刻得多。其次，苏联必须重新考虑如何处理它从以往的国际格局中获得的好处。与新中国结盟苏联将得到的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关键是苏联是否情愿放弃它在东北获得的权益。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显然不如向中共领导人赠送“马克思主义领袖”这类头衔那么慷慨痛快。

中共领导人对处理1945年的中苏条约的态度也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早年都走过一段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道路。促使他们决心“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宣布放弃沙皇统治时期在中国侵占的土地和攫取的一切特权。对于他们来说，“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从当时中共报刊的评论看，对于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共领导人很难说是满意的。那些评论文章对该条约表达了赞扬之词，但都是有范围的，即对条约的肯定基本上是说它在维护远东和平方面有积极的意义。[②]后来的发展则清楚地证明，中共领导人对涉及中国利权的条款基本上是持否定的立场，这才有了修改条约的问题。

当中共领导人决心与苏联结盟时，他们对苏联在此问题上将持何种态度并无掌

① 前引《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8—403页；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第77—79页。“Stalin Remark to Liu Shaoqi, re. Creating a Union of Asian Communist Parties”, July, 1949, *Uncertain Partners*, pp. 232–233。

②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17日、8月27日社论。

握。苏联在战后的表现使他们有理由怀疑，斯大林是否会真的履行总是挂在嘴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解放军过江前，中共领导人已经在向党外人士打招呼，告诉他们“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①]所谓“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只能是中苏条约了。中共领导人做这种准备本身就表明，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苏联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是不信任的。

刘少奇访苏期间曾就处理中苏条约问题向斯大林提出三种解决方案，即一是保持该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二是废除该条约，重订新的中苏条约；三是两国政府换文，说明暂时维持该条约的现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签新约。刘少奇同时还提到蒙古和战后苏联从东北搬走的厂矿设备问题。斯大林除许诺重订新约外，对签订新条约的原则、时间和有关的具体问题均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这使条约问题成为后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的焦点。

12月16日，毛泽东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便与斯大林会谈，讨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在会谈中称，目前不宜改变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否则会牵涉到千岛群岛。他建议就旅顺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即可。在毛泽东坚持要废除中苏条约后，斯大林才表示两年后可对条约做大的修改。[②]22日，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两个方案，即：(1) 周恩来来莫斯科解决中苏条约问题；(2) 双方广泛讨论有关问题，不必达成协议。[③]但在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斯大林避而不谈毛泽东的建议。显然斯大林这时根本无意解决中苏条约问题，其原因无非是既不愿改变远东地区（包括外蒙古前途在内的）既定的格局，也不愿失去苏联从这个格局中获得的权益。

直到1950年1月2日，苏联方面的态度出现了关键性的变化。当天毛泽东在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谈时提出三个供苏方选择的方案：(1) 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 由两国通讯社发表简短的公报，说明双方在重要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3) 发表一项共同声明，说明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个方案最好，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谈判。[④]毛泽东在会谈后立即电告周恩来准备赴苏谈判，不过

①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1页。

②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

③ 前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第32页。

④ 《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2日、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97页。

他这时对新条约的内容持相当保守的估计，认为与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只是“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①]

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确定了新条约的基本内容。此后谈判进入具体讨论阶段。一些间接的资料表明，双方在新条约的关键问题上，如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等等，进行了有时甚至是尖锐的“讨价还价”（毛泽东语）。此外斯大林还以提供军事援助为由，坚持就东北和新疆限制其他国家进入达成一项《补充协定》。[②]最后达成的协议对于双方肯定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它是一系列协调和让步的结果。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同盟友好条约》，以此为标志中苏同盟终于诞生。

综观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及新中国领导人与斯大林谈判的全部过程，可以说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并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完成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使双方关系达到了最高潮，为以后10余年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历史的进程也表明，苏联领导人的行为也在中苏结盟的同一时刻为后来中苏同盟破裂埋下了种子。

（《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① 《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11月2日、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95—96、97页。

② 前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1—25页。另见《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1956年3月31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1—22页。

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

（1957—1959）

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苏同盟破裂的研究出现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强调毛泽东个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各种因素中，"领导人（也包括苏联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①] 其二是有关的论著证明，以往将毛泽东改变对苏政策主要归结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反对苏联控制（较早的论著一般都如此强调）等等，至少也是过于简单了。它们更强调毛泽东选择的国内发展战略与他对苏联的态度和政策变化等等之间的关系，[②] 或者是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或革命理念与赫鲁晓夫路线之间的根本冲突。[③] 这些分析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基本上都将毛泽东的有关政策视为理论或理性思考的结果。

如果将以往的历史研究类成果作为一个出发点，便可以发现1957年到1959年可算是独特的时期。从毛泽东探索中国发展战略的角度说，它是毛泽东背离中共八大既定方针的开端；从毛泽东后来用以指导对苏政策的理论的发展脉络看，它又是刺激毛泽东进行他那独特的思考并逐步形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初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精神兴奋，经常斗志昂扬，但在推动他的事业时，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挫折。最初是试图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尝试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却以发动"反右派运动"而结束。其次是试图超越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动了

---

① 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② 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载《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章百家：《毛泽东与中苏同盟和中苏分裂》，提交"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1997年10月。

③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大跃进”运动，然而到1959年，“大跃进”至少败象已露，最终在庐山会议上酿出“反右倾”斗争。国内这些重大事件与莫斯科会议、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中印边界冲突、核武器合作、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华等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思考的复杂背景，而毛泽东在这种背景下的思考和行为，仍然存在着诸多需要分析和解释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在思考和处理不同问题时，那些既定的概念是如何与中苏关系中复杂多变的现象联系起来的？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现象，他得出的结论会与那些与他信奉同样理论的人不同？

针对上述疑问，本文试图通过分析1957至1959年间导致后来中苏同盟破裂的事件以及毛泽东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揭示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精确定义的概念，它包含了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观察和他对世界政治本质特征的感受，大体说来有三个方面：(1) 认为紧张与冲突是世界政治最基本的特征；(2) 对威胁特殊的敏感；(3) 迫切追求激烈的变革或跃进。这种“危机意识”更像是概念与经验、感觉的混合物，它区别于理论思想，没有系统和明确的框架，但在强化理论思考和判断形势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危机意识是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形成和强化的，并植根于他的内心深处。它经常作为一种潜意识，形塑毛泽东思考和理解国际事务的前提，从而对他制定外交决策，包括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①

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确实一度向更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方向调整。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密切之后，中苏关系便开始出现新的裂痕，至1959年末，同盟的破裂实际已经无可挽回了。在这一急剧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的有关决策，包括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与苏联的分歧、反对苏美缓和发动“大跃进”等等，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那些重要决策的产生直接涉及到他那独特的危机意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涉及的重大事件中，危机意识并不总是影响毛泽东思考和决策的唯一主观因素，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观因素。

一、“原子弹”——危机与裂痕之一

斯大林逝世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重要的调整时期，在斯大林时期积累的矛盾和怨愤终于有了化解的可能，而且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确实一度向更符

① 关于毛泽东“危机意识”的缘起可参阅拙作：《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探源》，《国际政治研究》，1995年第1期。

合毛泽东愿望的方向调整。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密切后，中苏关系便开始出现新的裂痕，其原因直接涉及到毛泽东那独特的危机感，即对外部军事威胁的敏感和对国际形势能否缓和深刻怀疑。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观念中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缓和与稳定即使不是虚幻的，也是相当有限的。抗战结束前后他一度认为，世界有可能真的出现缓和和稳定，大国之间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将长期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各国内部斗争的缓解。然而美苏冷战和中国内战几乎同时爆发使他终于得出结论，在世界政治中，只有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和各种各样的危机，才是绝对的，而且通常需要通过剧烈的革命，才能消除危机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1946 年“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标志着缓和已经从毛泽东心中永远消失了。①其二是当革命运动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存在时，帝国主义国家将同有关国家的反动派公开“站在一个”极端，用分化革命队伍或直接出兵干涉来反对革命。②建国以后一个时期里，这两种看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毛泽东对国际问题和中国安全环境的思考。

建国初期的历史似乎在证实毛泽东的上述看法。新中国刚刚成立，便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兵戎相见。在三年战争期间，美国一再发出扩大战争的威胁，还加紧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体系。这一切使毛泽东相信：“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③50 年代中期，毛泽东确曾在与外国人会谈时，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过在他看来，那更多的是用来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的策略，而不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美英都不会接受。④他在党的会议上提醒全党：“帝国主义势力还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发事变，……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⑤

---

① 参阅牛军：《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探源》。

② 毛泽东：《矛盾论》，1937 年 8 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21 页。

③ 毛泽东：《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955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 136 页。

④ 毛泽东：《和平为上》，1955 年 5 月 26 日；《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1954 年 12 月 11 日，《党的文献》，1992 年第 1 期，第 27、29 页。

⑤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 年 3 月 21 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41 页。

毛泽东决心与苏联结成同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担心新中国将面临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所以需要苏联在维护中国安全方面承担义务，尽管中国有可能要为此而付出较高的代价。经过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美国海空军先进技术兵器和战术核武器的攻击威胁，中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是难以防御的。所以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军队领导人制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并决定裁减军队，以便节省下经费，用于发展技术兵器，包括核武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考虑同对强大国际地位的强烈追求结合在一起，成为推动中国领导人决定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动力。

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要迅速取得和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事实表明，正是发展诸如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等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的重要诱因，其中最典型的是双方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苏联方面对中国迫切发展先进武器、特别是发展核武器的态度，引起毛泽东产生强烈反应。

在整个 50 年代，中国曾经三次面临美国直接和赤裸裸的核威胁。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后期，中国领导人因此而命令在大城市准备防空洞，并计划迁移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其他两次核威胁发生在 1954—1955 年和 1958 年的台湾海峡危机期间。[①]正是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产生了迅速获得核武器的迫切愿望，建立有限的核打击力量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解放军“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②]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从两个方面考虑发展核武器的。一方面如上述是中国军事安全的需要。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在毛泽东看来，拥有核武器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他认为帝国主义“看不起是我们因为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因此中国“应该有原子弹并尽快发展氢弹”。[③]如果考虑到每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核威胁，毛泽东除了表示无所畏惧以外，只有依靠能否靠得住尚有疑问的苏联盟友提供保障，便可以推测他内心的焦虑和屈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核武器实际上被认为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尊严的重大利益，而这直接涉及到毛泽东独

---

① 可参阅姜长斌、刘建飞：《接触与开放：架起中美相互理解的桥梁——从美国几次制订核打击计划谈起》，《国际经济评论》，2000 年第 1–2 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71 页。

③ Tracy D. 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 “Anna Louise Strong: Three Interviews with Chairman Mao Zedong”,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85, p. 503.

特的国家利益观。

如果说战争年代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在危机和战争的环境中保存和推动中国革命运动，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关注中则包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即如何在复杂和危险的环境中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被清楚定义出来，不过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存亡、兴衰、荣辱。"[①]它们包含了国家的安全、发展、国际地位和威望等等内容，毛泽东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及其在不同时期如何权衡轻重缓急，是相当复杂的题目，在此不赘述。这里只是指出，这种复杂的国家利益观是决定毛泽东如何衡量形势和危机程度的重要坐标，也是他进行外交和安全决策的宏观目标。由此才能理解拥有核武器对毛泽东的含义，以及为什么毛泽东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将中国置于苏联核保护伞下的安排。

显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试图取得苏联的帮助。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第一次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赫鲁晓夫 1954 年 10 月访华期间。在 10 月 3 日的会晤中，可能是因为认为已经向中国领导人做出了足够的奉献，赫鲁晓夫主动询问毛泽东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告诉他："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能提供帮助。赫鲁晓夫没有做任何承诺。他劝告毛泽东放弃这个打算，因为中国没有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工业基础和财政能力，暂时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②]苏联在核武器上的保留态度使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相信，苏联不可能事事满足中国的要求，他们还会"在某些方面留一手"。[③]

不过，后来的发展证明，在随后的两年里，苏联不论是基于何种理由，还是向中国提供了至今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援助。苏联与中国相继签订了合作开发铀矿的协议和苏联帮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议，当然当时都宣布这些技术是用于"和平的目的"。[④]直到 1957 年，苏联领导人同意向中国提供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资料和模型。9 月间，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此时赫鲁晓夫刚刚在同反对莫洛托夫等人的斗争中占了上风，特别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

① 最能反映这种观念的是毛泽东在 1935 年 12 月发表的一段演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61 页。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 年版，第 572、573 页。

③ 《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 626 页。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6 年 9 月 16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183 页。

④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0—21 页。

议。毛泽东则利用了赫鲁晓夫的困难，直到中苏双方代表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他才正式宣布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①]

已经出版的有关论著表明，中国的要求大致包括原子弹、导弹和核潜艇等方面的技术。苏联同意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是拒绝提供研制核潜艇的任何资料。[②] 对于协议涉及的重要项目，苏联没有就实施的具体时间表做出承诺，事后又一再拖延。苏联当时很可能并没有打算完全满足中国对核技术和设备的要求，尽管它派出了专家并提供了 2 枚短程地对地导弹作为样品。

上述背景对于理解毛泽东在 1958 年发生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等问题上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就苏联方面的那两项要求本身看，未必比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做法更带有所谓的“不平等”色彩，但是毛泽东表现出特别难以容忍。除了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中苏关系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外，苏联在先进武器和生产技术上的政策确实使毛泽东有理由非常不满。他痛斥苏联人“看不起中国人”，以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并声称“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③] 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前往北京平息毛泽东的愤怒，但是他的辩解是无济于事的。苏联领导人既然无意按照毛泽东的愿望，提供核武器和核潜艇的制造技术和设备，他们也就无法抹平已经出现的裂隙。[④]

1959 年 6 月，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举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苏共中央于 6 月 20 日通知中国，为了避免影响谈判进程，已决定暂缓按照协议提供有关的模型和资料，两年后再根据形势做出决定。[⑤] 与此同时，苏联的核专家以休假为由全部回国，而且再也没有返回。这些再次间接地证明，苏联在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从一开始就是相当勉强的。在讨论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以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相信，苏联即使在两年以后也不会执行有关协议，他们决心克服种种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中国成为核国家。[⑥]

① 《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第 78—79 页。

② 《当代中国核工业》，第 32 页。

③ 《同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 年 7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22—333 页。

④ 赫鲁晓夫访华情况可参阅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14 页。

⑤ 《当代中国核工业》，第 32 页。

⑥ 《当代中国核工业》，第 36、565 页。

二、“美苏缓和”——危机与裂痕之二

1959年6月，苏联决定延缓执行有关核技术协议。这一决定对中苏关系的消极影响不仅限于损害了中国的军事战略，而且还震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之一，即大国妥协的结果往往威胁到中国的利益，以及损害革命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上政治舞台的，在他眼里的世界危机四伏，一方面是列强侵略和压迫弱小民族，同时它们之间也是相互攻伐不断，到处都是矛盾、动乱和冲突。[①] 此后的经历在不断加强而不是削弱他对世界政治的那种基本感受，即在国际政治中，对立、矛盾和斗争普遍存在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不论是中国近代的历史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经历都使他相信，大国间的对抗而不是妥协，使中国有更多的机会从中获利，因为中国是一个弱国。在他看来，1840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还能够保持“半独立的地位”，部分地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则是阻止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单独占领中国的重要因素。[②]1920年代中期，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妥协和《九国公约》的签署导致它们结成联盟，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障碍。相反，1930年代列强之间矛盾的增长则成为中共及其军队和根据地还能够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③] 因此毛泽东认为，不论是为了应付战争还是推进革命，都必须研究和分析世界争执中的各种矛盾，以便在利用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建立各种同盟关系。[④] 从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在对华政策上的妥协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中国利权的丧失，而且经历了被大国孤立，甚至遭到苏联的冷遇。总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促使毛泽东对“大国妥协牺牲中国”的可能性极其敏感、警惕和反感。

无独有偶，就在苏联单方面宣布暂停执行国防新技术协议后不久，苏联在中印边界军事冲突中的态度又一次激怒了毛泽东。自1959年3月起，中印边界紧张形势加剧。尽管中国做出了外交努力，试图缓和中印关系，8月25日，双方军队还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341页。

②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42页。

③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143—150页。另见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1页。

④ 《矛盾论》，第314—317页。

是在郎久地区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从此以后，中印边界的紧张形势有增无减，直至 1962 年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处理中印冲突的基本认识，对于分析他后来对赫鲁晓夫的强烈谴责是重要的。从 1959 年 3 月西藏地区发生叛乱起，中共中央就认为，美国、英国和印度介入了这次叛乱，尤其是印度在美英的支持和鼓励下，扮演了特别积极的角色。4 月初，毛泽东建议发动一场宣传攻势，揭露印度介入西藏叛乱，支持达赖集团的行动。在 4 月 22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决定必须要公开谴责印度的扩张主义。4 月 25 日，在给主观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和吴冷西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强调应该公开批评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只是还不要点尼赫鲁的名字，以便留有余地。[①]

由于断定印度的政策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印度还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和鼓励，毛泽东认为必须坚决予以反击，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因此他也就对苏联被认为是偏袒印度的立场尤为不能容忍。

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便表明不赞成中国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强硬政策将增加尼赫鲁在国际上推行中立政策的困难，而这种中立政策被苏联领导人认为是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又将这一事件与赫鲁晓夫即将访问美国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反击印度的军事行动不利于苏联推行缓和政策。苏共中央因此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严重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向中国施加压力。9 月 10 日，苏联不顾中国领导人已经表明了的反对态度，以塔斯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明了不赞成中国的立场。[②]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相当严峻的。他们认为那是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③]

9 月 25 至 27 日，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他执政后的第一次会晤，这是苏共在 21 大以后推行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尽管会晤并没有取得多少重要成果，赫鲁晓夫仍然热情宣扬，称之为打破了“一直僵持的冰块”，是“道义上的巨大胜利”。[④] 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在会晤中与艾森豪威尔讨论了中美关系，并暗示苏联愿意居间调停，说服中国释放拘押的美国人犯。在遭到艾森豪威尔的反对后，

---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 年版，第 75 页。

② 《前苏联国家新披露的有关 1959—1962 年中印关系的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8 期，第 18 页。

③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 年 9 月 6 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 71 页。

④ 尼·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李文政译，东方出版社，1988 年版，第 622—633 页。

赫鲁晓夫只是表示，他不赞成使用武力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①]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曾经授权赫鲁晓夫居间调停中美关系，但赫鲁晓夫的作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他们对“美苏妥协牺牲中国”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赫鲁晓夫于 9 月 30 日到达北京。他此行既是要表示对中国战友的尊重并消除他们的疑虑，也是要说服毛泽东接受苏共 21 大的路线，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在 9 月 30 日的国庆招待会上，尽管周恩来客气地祝贺赫鲁晓夫“作为和平使者”访美取得成功，赫鲁晓夫却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必须改弦易辙。他在发言中说，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应该永远被摈弃，而且不要企图用武力去“考验资本主义制度”。[②] 在随后两天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试图说服毛泽东接受苏联的缓和政策，在对美政策上同苏联保持一致。他在台湾、中印冲突等问题上，批评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③]

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反感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是从理念上，即使从中国当时面临的形势看，要求毛泽东接受赫鲁晓夫的政策都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仅仅美国从 1957 年开始在台湾部署可以运载核武器的“斗牛士”战术导弹一例，就使毛泽东有理由拒绝与苏联共同软化对美国的态度。更何况赫鲁晓夫 10 月 1 日还告诉毛泽东，苏联已经不打算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面对这种看上去就是“美苏妥协”的结果，毛泽东激烈地谴责赫鲁晓夫“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决心拒绝与赫鲁晓夫合作。用他的话说就是，苏联不反美“我们自己反，因为那时形势是美逼我反，我不得不反”。[④]

中苏首脑会晤以后，重新思考国际问题和中苏关系，一度成为毛泽东关心的重点，而且他开始在党内进行思想动员，为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做准备。在后来中共中央举行的一系列讨论国际形势、苏联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的会议上，

---

① 张少华：《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台湾金禾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02 页。

② Alan J. Day edit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The East Press, 1985, pp. 14–15.

③ 《前苏联国家新披露的有关 1959—1962 年中印关系文献》，第 19—20 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60—164 页。

④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01 页；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8 页。

毛泽东对有关问题发表了尖锐的评论。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还表明，他对1956年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担心也是他不赞成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的原因之一。[①]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了经过毛泽东本人和其他重要领导人讨论修改过的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他们对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问题的观点。这些文章以批判南斯拉夫为名，尖锐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显然从这时就已经开始将中苏在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归结为赫鲁晓夫背离马克思主义。

三、“大跃进”——危机与裂痕之三

1959年10月的中苏首脑会谈是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从中苏关系演变的脉络看，1959年10月以后中苏矛盾愈演愈烈毋宁说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的总爆发。如果仅仅对1959年发生的纠纷就事论事，中苏同盟的结束至少会被推迟，而且很可能不是以那种剧烈冲突的形式结束。可以肯定地说，1958年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在此判断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及其后果，对中苏同盟的演变影响巨大。

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宣布当今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②]那以后毛泽东相信，1958年的形势简直是少有的一派大好。他在批评国内所谓的“观潮派”时说：“他们是好人，就是不懂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问题已经成熟了。”这里所谓“问题”甚至包括中国和苏联谁应该先进入共产主义。[③]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④]有了这样的精神，原定15年超过英国的计划便被毛泽东提前为两年，而且“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

①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99–603，604页。

②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16、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1、632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2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37—639页。

④ 毛泽东：《对〈上海最近情况（3月24日电话消息）〉的批语》，1958年3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55页。

就不难了"。[①] 这大概可以说是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和他心中的主要目标之所在。

毛泽东这时对国际形势的描述同样是惊世骇俗的。他对来自各种渠道的那些分析美国阵营内部矛盾的报告尤为关注，甚至亲自为他感兴趣的报告或报道加上色彩鲜明的标题，例如《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等等，以便宣泄他那难以抑制的豪情壮志。毛泽东在这些报告上的批语表明，他之所以认为"东风压倒西风"，是因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形势就是"四分五裂"，"反动派大恐慌"。与帝国主义阵营相比，社会主义阵营则占优势，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其力量大大超过了帝国主义，所以"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②]

既然美国阵营处于弱势和被动，社会主义阵营采取更为主动和激烈的外交行动当然就是合理的。1958年夏季毛泽东在一系列他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上做出了结论。例如"谁怕谁多一点"？美帝国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紧张局势对哪一方更不利？对战争"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等等。毛泽东的回答既有逻辑又富于鼓动性。他断言"西方国家怕我们怕的多一些"，而且力量对比对美国阵营越来越不利，帝国主义国家只是以反苏反华为借口，进攻民族主义国家，争霸"中间地带"。这种战略态势决定了"紧张局势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因为它们既不敢贸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又无法安稳地统治民族主义国家。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对炮击金门的效果颇为欣赏，一方面是"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如此壮观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是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正是这种思考逻辑促使毛泽东兴冲冲地描述了他的"绞索政策"，即运用制造紧张局势，甚至"战争边缘"的手段，削弱美国及其集团，或者

①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冶金部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规划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78、279页。

② 毛泽东：《对〈宦乡西方世界的破裂〉的批语》，1958年11月25日；《对〈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批语》，1958年11月27日；《为印发宦乡报告重拟的标题和批语》，1958年11月；《为印发〈参考资料〉的一则电讯稿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1958年11月；《为印发南越政治、军事情况动态而拟写的标题和批语》，1958年12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81—583、589—590、599—560、606—607、616—617页。

迫使其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做出让步。[①]

毛泽东在1958年对形势的认识展示了他的危机意识中追求激烈变革与跃进的内容和特征，表明了他对“突变”的欣赏以及由那种欣赏而产生的关注与追求，他特别担心因为保守而错失“历史机遇”。用他当时的话说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他说后来新中国的粮食生产和钢、机器等的生产也是这样，突然一下就增长上去了。[②]

其实，毛泽东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到1958年不断用来论证形势“一片大好”的那些事件，如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中东局势紧张和美英干涉受挫、美国阵营内部的矛盾等等，在许多国内外的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同样信奉列宁主义的苏联领导人看来，也远不足以说明世界形势正出现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大转折，以至于必须加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但是毛泽东宁愿将目光更多地放在那些有利于中国甚至世界再次出现革命性发展的信息上并信以为真，他迫不及待地推动中国建设和外交的“大跃进”，并为由此而产生的动荡、紧张甚至冲突而兴奋不已。究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尤其担心会失去发生历史性突变的机会。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展示得相当全面。他尽管一再强调形势一片大好，即使出现紧张局势也不大会引发战争，但在内心同时保持着紧张和对冲突的敏感，并因此认为也要对所谓“最坏的结果”有所准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行将灭亡”的时候总要进行“垂死挣扎”，包括进行军事冒险，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③]他很可能考虑过美帝国主义集团是否不会坐视中国向共产主义突飞猛进以及执行革命的对外政策，并认为必须估计美国等采取冒险行动的可能性。[④]所以，他在推动内政外交“大跃进”的同时，也专门提出“要准备作战”，搞“全民皆兵”，要求“军事有一个大发展”。[⑤]同样的逻辑使毛泽东特别警惕美国领导人这一时期关于“和平演变”的言论，并断定那是“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

---

① 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8—400页。

②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第389页。

③ 毛泽东：《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人民日报》，1967年12月9日。

④ 毛泽东：《在〈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一文上的批语》，1959年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82页。

⑤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第390页；《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2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39—640页。

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①]

在整个1958年，苏联对外政策从发展趋势上看，与毛泽东对中国外交的调整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在当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布置着象征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嵌着“解冻”两个大字。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解冻”就意味着缓和同美国的关系，提倡和平共处。[②]苏共21大制定的对外政策表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以后，苏联对外政策向“缓和”的方向调整是确定不移的。不过这种发展趋势在1958年间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特别的不满，实际上他本人在审阅《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还专门要求加上“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必要和可能”。[③]毛泽东当时主要反对的是被认为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和平过渡”，而不是“和平共处”。莫斯科会议的结果也证明，当时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仍然是可以调和的。

即使在1958年7月发生的使毛泽东极表震怒的“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事件，对当时中苏关系的消极影响也在后来的意识形态论战中多少被夸大了一些。[④]这时，毛泽东几乎全神贯注于他正在进行的快速迈向共产主义的巨大实验，中苏军事合作中的纠纷属局部性问题，而且拟议中的炮击金门仍有可借助苏联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炮击金门后不久来自中国驻苏使馆的报告指出：苏联对大好形势的认识“有所进展”，尽管“深度还不足”。报告说赫鲁晓夫几次提到“我们对付战争的正确的态度，即决不害怕战争和不乞求和平”，“在理解和评价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估价”，并且“逐步吸收了中国的经验”。毛泽东对苏联这种变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自然是十分满意的。[⑤]他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的确在强调，对苏联要保持“谦虚的态度”。[⑥]

“大跃进”在1959年下半年已经露出的败象对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迄今为止，“大跃进”对中国外交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还没有被中国学

① 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第45页。

② 参阅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

③ 毛泽东：《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1956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85页。

④ 有关当时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可参阅《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0页。

⑤ 毛泽东：《对驻苏大使馆关于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各方面情况报告的批语》，1958年10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86—487页。

⑥ 毛泽东：《对驻苏使馆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语》，1959年1月15日；《对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959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6、41—42页。

术界认真地梳理过。从已经公布的毛泽东在1959年下半年的有关论述中，至少他本人就没有看到“大跃进”给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地位带来多少积极的影响，反之他不得不同时应付包括来自中共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怀疑和挑战。

可以想象，日益加剧的内忧外患多么严重地强化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彭德怀等人不过对“大跃进”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而已，但在毛泽东看来，他们的言论就足以证明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彭德怀的意见书不过有一万个字，在毛泽东的眼里却严重到“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从而证明了那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①] 特别是党内的不同意见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勾结在一起，就“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②]

使毛泽东危机感加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领导人公然对“大跃进”运动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火上浇油，而且与彭德怀等人在时间上几乎同步，说轻些也属于“内外呼应”一类。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发表谈话，批评苏联搞农业公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从《内部参考》上读到赫鲁晓夫的谈话后从此怒不可遏。即使随后一期的《内部参考》中的某文标题表明，美国主流媒体正在利用赫鲁晓夫的讲话挑拨中苏关系，毛泽东宁可中“离间计”，也不放弃“要向全世界作战”的决心。[③] 他随后开始部署，最快在当年秋季、最迟在1960年春季，要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并且要“向世界宣战”，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④]

在分析从庐山会议到赫鲁晓夫访华批评中国对外政策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反应时，有必要指出中苏关系的某些特征。在中共以往的历史中，唯一能够影响它内外政策的大国就是苏联。苏共经常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要求中共服从其对外政策的目标，而这些要求往往酿成中共党内斗争，毛泽东与王明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的斗争就是相当典型的一例。这场斗争以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的政

① 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959年8月15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47、451页。

② 毛泽东：《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1959年9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88页。

③ 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7月29日、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2页。

④ 毛泽东：《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1959年8月9日；《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1959年9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62—463、504页。

治路线结束，但如果它们采取相反的立场，后果对毛泽东是不堪设想的。后来的整风运动证明，毛泽东充分意识到苏联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他只要打算贯彻任何与苏联不同的政策，就必须使中共拉开与苏共的距离，否则就会在党内遇到更大的阻力。

50年代中期，当毛泽东探索与苏联模式可能有区别的中国发展道路时，他便开始在党内批评所谓的“教条主义”，指责一些人“盲目”和“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①]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以后，为了顺利贯彻“大跃进”政策和相应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在党内进一步批评了那些强调要学习苏联经验的人，尖锐指责他们“拿苏联吓人”，搞了“八年的教条主义，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②]显然，在毛泽东为贯彻“大跃进”政策而进行的思想动员中，“反对教条主义”、“破除（对苏联建设经验的——作者注）迷信”、“打倒贾桂”等等，是相当重要的内容。炮击金门的决策也是一例。苏联在炮击金门的过程中的确清楚地表达了站在中国一边，尽管开始时一度表示忧心忡忡和随后对中国的声援多少有些勉强。[③]担心受到苏联的牵制很可能是毛泽东没有将炮击决定事先通知苏联的原因之一。

上述历史背景、庐山会议期间的风波等国内因素与赫鲁晓夫对当时中国内外政策的批评混合在一起，导致了毛泽东将赫鲁晓夫的言行同中共党内的斗争联系起来，并逐步从中演绎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因为他在巩固政权和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方面，感到了强烈的危机。1959年夏季是毛泽东这个思考过程的开始。历史的演变证明，毛泽东的思考和理论逻辑决定了从这一时刻起，中苏同盟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了。

本文的研究表明，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在他1957年至1959年处理中苏关系的过程中，经常起着不同的作用，这部分地是由中苏关系本身的复杂性造成的。这一时期在毛泽东心目中，中苏关系经常涉及到三类问题，即：(1) 中国的国家利益；

---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5—287页；《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43、148页。

②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四海之内皆兄弟》，1958年5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08、121—122、196、203、231页。

③ 可参阅《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1—434页。

（2）毛泽东当时全力以赴地推动的“大跃进”；（3）毛泽东本人的权力地位。在这三类问题上，毛泽东对危机感受的程度不同，因此他的危机意识在不同问题上产生的影响也不同。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毛泽东更重视的是他全力以赴地推动中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事业，以及这项事业的成败。当“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夏季已经露出败象后，毛泽东对任何批评显得极度敏感，苏联领导人的讲话被他断定为是对“大跃进”的攻击或对人民公社的影射，特别是这些攻击和影射与中共党内的反对意见同时发生，使毛泽东更不能容忍。实际上毛泽东感到他的威望和与威望相联系的权力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庐山会议期间的风波因此被认为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它有着与赫鲁晓夫内外呼应的国际背景。总之，这种内容复杂且程度严重的危机感与中苏在对外政策、安全战略等方面的一些分歧结合在一起，终于使中苏同盟破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本文探讨的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这里所谓“外交战略调整”是指中国外交从“两个拳头打人”、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改变为“两枚抗苏”。当时最重要的事件是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中国改变对美政策，打开中美20年对抗的僵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发表的有关论著除了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献外，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们逐步提出了两条清晰的不同的思路，从而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尽管它们的作者显然无意就这种分歧展开争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1969年春中国军队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特殊背景下，对苏联不断制造边界事件的一种反应，此后中国寻求改善中美关系是“中苏紧张局势事实上的缓和”带来的“一个有国际意义的副产品”。[①] 另一种观点指出，毛泽东是在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利用中苏边境争端。这种观点在一些论著中存在，特别是体现在一些传记类论著的论述逻辑之中。比中国学术界开始讨论稍早一些，当时任苏联驻华公使的A．叶利扎维金的回忆及俄罗斯学者冈察洛夫和乌索夫所写的前言和评述已经发表，他们在其论著中强调，中国领导人在1969年的边界冲突中“在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是利用边界冲突“拉拢同莫斯科对抗的主要西方国家”。[②] 这显然更接近后一种观点。

如果认真比较上述不同的观点，便会发现分歧的出现是基于一系列带有根本性

---

① 这种观点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可见徐焰著：《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11页。

② A. 叶利扎维金：《柯西金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63年第2期，第65页。

的问题的不同解答，而这些研究中的解答仍然是不够系统和深入的，有些甚至是不明确的。这些疑问包括：从中苏关系破裂到1969年3月两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中国外交战略及其支配下的对苏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开始于何时，以及中苏边界冲突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是因为中国要调整外交战略而利用中苏边界冲突、还是边界冲突促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对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的后果是否有某种预见，包括是否预见到苏联会作出何种反应，以及美国将会如何利用这种形势？本文的目的是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新公布的历史文献，通过更系统深入的探讨来回答这些疑问，从而揭示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外政策调整之间的主要特征。当然，要解释上述疑问就必须参考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否则便很难解释中国决策者们调整外交战略的一些关键性的动机。

一、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中国外交战略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一边倒”向苏联阵营便是中国外交居首位的原则。在这项原则指导下建立的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是整个195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石。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曾有过调整或波动，但其格局基本上是固定的。至1950年代末期，中苏同盟开始出现裂痕，但不论其原因是什么，该由哪一方负责任，中国仍然对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抱有希望。直到1964年1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以前，中苏两党间的关系作为维系中苏同盟的重要纽带，虽然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毕竟还没有彻底断裂。[①] 即使是在两党关系彻底破裂以后，共同反对美国在亚洲进行军事干涉的战略需要，仍在维持两国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964年年8月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中国总的方针还是冻结边界争论，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并未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1965年2月，毛泽东会见了访问越南途经中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周恩来与柯西金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就改善两国关系提出了6点建议。[②]

---

① 可参阅余湛著：《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447页；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外交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编委会：《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288页；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

不过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外交战略实际上进入一个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是面临美国在中国的近邻越南的军事干涉；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外交基石的中苏同盟已经基本瓦解，中国在客观上陷于两个大国的夹击之中。用后来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来形容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虽有一些道理，却并不很准确。从实际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总地说来还是试图稳住中苏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正如 1966 年 1 月周恩来在外交部会议上所说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主要矛头是打击美帝，因为发动侵略战争，企图独霸世界，是美国为主，苏联则是美国的帮凶。[①]

1965 年 2 月毛泽东会见柯西金，以及周恩来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 6 点建议等，均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处理中苏关系的基本思路。他们在中苏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措词尖锐激烈，但仍然试图将这场争论届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党之间的问题，并指望论战不要损害或不要严重损害两个国家间的关系。至少他们主观上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和行得通的。[②]

决定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领导人认识世界形势的两个基本的观念。首先，不论是从世界革命还是从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看，美国都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早在 1946 年中国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便断定，美国的扩张既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也是对世界革命运动的遏制。[③]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最终决心参战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担心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干涉会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即如毛泽东所说的：“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了去，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不利。”[④] 这种观念也是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全力以赴地援越抗美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几乎在支持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出现的反对美国的斗争，不论其以何种方式进行。

进一步说，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的扩张还是对中国的直接威胁。自从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不断在中国周边地区组织军事同盟，建立军事基地，致使中美在

---

① 王永钦：《1966—1976 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113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 708 页。

③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191—1196 页。

④ 毛泽东：《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2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第 539 页。

中国的周边地区长期处于紧张的对峙，并不时出现紧张局势。从近代中国历史上看，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居心叵测的大国如此接近中国的边疆地区，中国都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因此，当时只要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向后撤，中国就一定会保持对抗的立场。

1964年4月，美国政府通过加拿大驻印度支那国际监督委员会新任首席代表布莱克·西博恩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转达，如北越不停止在南方的军事行动，美国将对越南实行海空打击，直至北越就范。[①] 美国扩大战争的威胁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②]7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时再次说明，中国要准备打仗，并提出了中国参战的可能性。[③]8月初，东京湾事件爆发，美军随后开始轰炸北越境内的目标，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东京湾决议》。显然是受到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的影响，毛泽东在当时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他甚至认为要不要搞三线建设，就如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到农村一样，是要革命还是不要革命的大问题。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三线建设要抢在战争前面，即使提前一个小时也是好的。[④]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当年制订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规定，要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来制订三五计划。

这期间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他们并不认为美国有向北越发动军事进攻的计划，因为美国没有做好军事准备，无长远打算。他们甚至希望越南保持某种程度的谨慎，在此重要时刻不给美国扩大战争的借口。显然，中国领导人将美国对北越的海空攻击视为是一种军事压力，而不是蓄意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入侵。但是，他们同样也认为，战争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美国在如此邻近中国的地方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⑤] 根据上述情况大致可以断定，美国在越南扩大军事行动，至少也是促使中国领导人试图利用赫鲁晓夫下台的机会，争取改善中苏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

①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② 鲁礼华、郭冰：《毛泽东加快三线建设战略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37页。

③ 《毛泽东与越南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7月12日。

④ 鲁礼华、郭冰：《毛泽东加快三线建设战略评析》，第38、43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1页；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55–456、474页。

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第二个重要观念即是“美苏勾结”。在1950年代引起中苏两党论战的重要分歧之一，便是苏联应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论中国近代的历史、还是中共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都使中国领导人对大国之间的妥协抱着高度的警惕。历史留给中国领导人的教训之一便是，大国间的妥协总是以牺牲弱国和小国的利益为代价的，在他们心目中，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当美国在谋求世界霸权时，苏联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必定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和断送各国革命的前途为代价。所以要彻底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

1950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他在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后，开始大谈“戴维营精神”，结果引起毛泽东的反感。10月2日，中苏领导人举行会谈后，毛泽东便决定在对美政策上拒绝与苏联协调行动。1963年7月25日，中苏在莫斯科举行高层领导人会谈期间，苏联便下决心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没有事先告知中国。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的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它被视为不仅是苏联企图与美英国家合谋，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而且表明苏联更重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正在进行的两党高层会谈并没有多少重要意义。中国领导人猛烈抨击苏联的行动，指责苏联领导人是想与美英一起“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①]

1964年夏季，北越领导人为了阻止美国扩大战争，曾表示有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中国领导人当时基于同样的考虑，赞成北越采取包括尝试和谈在内的谨慎措施。大约从1965年春起，中国开始对北越与美国谈判持反对态度。造成中国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同美国的政策有关。[②]不过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开始积极介入越南战争的警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利用外交场合，反复谈论在中国解放战争后期，苏联如何对美国妥协并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在他们看来，既然美国提出和谈建议是消灭越南革命力量的“阴谋”，那么苏联这时促使北越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就是要使越南人民的解放战争“半途而废”。[③]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批评言词激烈，但是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仍然认为苏联与美国还是有重要区别的，即美国对外扩张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胁，

---

①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95页。

② 可参阅 Qiang Zhai, “Beijing an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 1965–1968”,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18, June 1997。

③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11页。

而苏联则起着一种“帮凶”的作用；美国是要独霸世界，苏联则是企图靠与美国勾结来共同统治世界；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错误不是要称霸，而是要用牺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与美国妥协。这种基本看法使中国领导人即使是在边界问题上，总地说来是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并没有断定那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概而言之，直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以前，中国的外交战略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仍将全力以赴地反对美国的扩张政策作为外交的首要任务，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支持越南抵抗美国的战争中。另一方面，中苏同盟破裂后，中国对苏联主要还是口诛笔伐。在行动上，包括处理边界纠纷，则是谨慎和有节制的。用毛泽东的话说，中苏论战不过是“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①]

二、中苏边界军事冲突与中国的反应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些有关论著揭示，早在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即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警戒，做好以军事行动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中央军委还就处理边界事件的各种办法做了相当详细具体的规定。[②]这些文章还指出，由于苏联在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挑衅日益严重，中国军队于1969年1月25日制订了在珍宝岛作战的方案，2月19日，获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的批准。这些文章给人的印象是，该作战方案实际上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批准。[③]

进一步分析中国军事计划产生的背景是有意义的。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的军事行动首先是对苏军日益频繁地挑起边界争端的反应。根据中国当时的报道，从1964年10月到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挑起的边界纠纷多达4189起。这一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即使缩小一些夸大，也是相当可观的。[④]1966年以后，苏军加强了在乌苏里边界一带的行动，其采取的手段之恶劣，的确是令人发指的。叶利扎维金的回忆解释了苏军在边界地区采取行动的动机。他说在1966年间，苏联驻华使馆便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未来有可能发生军事冲

① 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第287页。

②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

③ 徐焰著：《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第6页；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319—320页。

④ 《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突；1967 年还进一步报告说，中国已经决定在一系列江心岛上将苏方挤走的方针，故应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①] 即便叶利扎维金对苏军行动意图的解释是真实的，中国领导人也不可能做出同样的理解。

1969 年 1 月下旬，解放军黑龙江军区开始制订在珍宝岛实施军事反击的计划，并于 2 月获军委批准。黑龙江军区的计划同 1 至 2 月苏军在珍宝岛的行动有直接的关系。从 1968 年冬季起，珍宝岛成为中苏边界争端的焦点，事态日趋恶化。例如，在 1 月 23 日的纠纷中，中国军人有 28 人被苏军用棍棒殴伤，部分武器被抢。2 月 7 日，在珍宝岛还发生了苏军鸣枪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决定进行反击。需要指出的是，在珍宝岛反击的计划的确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但有间接的资料证明，对于 1969 年 3 月 2 日发生的军事冲突，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事先是不知道的。

另一方面，不论是从中国军队作战的情况看，还是从中国军队反击的规模看，都很难断定，中国军队在珍宝岛的军事行动包括着战略意图，或是为了“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这次冲突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很有可能如徐焰所说，是“一次虽预有准备却不由自己掌握的遭遇战”。[②] 确切地说，中国军队在珍宝岛进行的是一次目标相当有限的边界战斗，是对苏军不断制造边界事件的一种反应。当然，不能否认这一行动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其国内的动力部分地来自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炽热的反苏气氛。

之所以要说明中国军队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有限的，是因为它与此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中国领导人试图在边界冲突中追求有限的目标，以至于他们对苏联的反应总地说来准备不足。这是导致他们后来高估苏联发动侵华战争的危险，并因此而大幅调整外交战略的重要原因。

从珍宝岛事件发生直到中共九大期间，中国决策层并不认为军事冲突会扩大。从目前可以得到的证据看，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冲突在苏联方面并不是有预谋的。3 月 14 日，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说，现在还不能说中苏军事冲突会扩大，“苏联要进攻中国有困难”。[③]3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明确表示，他认为珍宝岛事件是突发事件，苏联高层事先并不知情，政治局也没有讨论。他甚至不同意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过多地谈论中苏边界冲突。此后不久，毛泽东实际上已

① A. 叶利扎维金：《柯西金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第 64 页。
② 徐焰著：《1969 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第 7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285 页。

准备采取措施缓和中苏关系，并指示周恩来“准备外交谈判”。[①] 九大期间，毛泽东曾于 4 月 14 日就孙玉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发表谈话，其主要内容不是要备战，而是强调突出政治和呼吁中国人重视精神的作用。对于这期间苏军的调动，中国领导人基本上视其为“故意虚张声势”。[②]

九大结束后不久，中国决策层对中苏军事冲突前景的估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4 月 28 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并设想了两种战争形式。一种是在边界上“小打”，一种是苏军入侵中国的“大打”，对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所准备。[③] 此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一度对形势做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苏修”，中苏有两千多公里的国线，苏联随时可以挑起战争。所以，中国要准备应付苏联的入侵。不仅如此，中国还要准备应付世界大战，因此要在精神上、思想上和物质上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

在毛泽东的指示和推动下，备战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全国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战备热潮。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军委系统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军委办事组随后召开座谈会，制订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解放军开始大量增编新部队，各地方也加强民兵武装，国民经济实际上开始转入临战状态，许多企业转向生产军品，大批工厂迁往内地。8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④] 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解放军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至此中国战备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高层领导并未在战争的紧迫性和苏联威胁等战略问题上达成共识。其突出的表现是由周恩来推动并精心安排的陈毅等四人小组，在同一时期得出了与毛泽东并不一致的结论。由四人小组讨论国际形势最初是毛泽东本人的建议。该小组于 5 月开始讨论国际问题，则是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进行的。周恩来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四人小组的研究结果却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同有异。相同者是他们也认为，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

① 王永钦：《1966—1976 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 119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286 页。

②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322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290 页。

③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6 册，第 336 页。

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6 册，第 365—367 页。

大”；相异者是他们断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①] 根据熊向晖的回忆，四人小组的报告于7月20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高层的负责人。6月3日，瑞典驻华大使曾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一个国家对世界和平和中国的安全威胁更大，周的回答是有保留的，他认为“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②]

9月初，很可能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中共中央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如不允许地方报刊再宣传“要准备打仗”和“一切为了打仗”等口号。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谈。周恩来在会谈前曾指出，苏联挑起边界冲突是为了转移苏联人民的视线为其国内困难找出路。[③] 他在与柯西金会谈后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苏这种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中国应争取缓和边界局势，促进边界谈判。[④] 四人小组显然赞成周恩来的主张，也认为柯西金访问北京的主要原因是想同中国“缓和一下”，“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还有诸如朱德等也持同样或类似的看法。[⑤]

9月14日，周恩来着手准备中苏谈判。两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致柯西金的信，该信提出了缓和中苏边界紧张局势和举行边界谈判的具体措施。[⑥] 所有这些安排肯定是经毛泽东同意后进行的，问题在于他即使同意周恩来的安排，也未必相信形势在趋向缓和。9月17日，就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决定的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庆祝国庆20周年的口号。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条，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⑦] 此后中国的战备宣传再次升温。

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按照毛泽东的精神指出，

---

①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21页。

③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3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1页。

⑤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第195—196页；纪学：《朱德和康克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62—464页。

⑦ 《人民日报》，1969年9月17日。

准备打仗是新的战略部署，要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①] 国庆节期间，中国领导人相继发表措词强硬的讲话，历来反映中共中央重要决策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也突出强调了要战备。随着宣传的白热化，中国的战备达到了第二个高潮，其标志是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②] 作为战备措施的一部分，中共高级领导人也从北京向各地疏散。同时各大中城市也有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居民疏散到农村。

上述情况表明，从9月20日前后开始，中国决策层占支配地位的看法是要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掩护，发动突然袭击。这种担忧最初很可能来自毛泽东，而且领导人疏散也很可能是毛泽东想法，对此周恩来也未提出疑义。至于四人小组，据熊向晖回忆，他们在被疏散前曾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战备措施，以后他们也没有机会再讨论国际问题了。[③] 至此可以说中国高层决策者基本形成了共识，即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且目前存在着苏联军事入侵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中国决策层对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的看法存在一个变化过程，即从一开始认为是偶发事件，到后来断定苏联有可能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并因此而进行全面备战。这种变化产生于两个原因。首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将边界东段的冲突向西段扩散，不断制造流血事件，其中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有计划地进攻中国边防部队，造成严重的流血冲突。同时苏联领导人和舆论工具不断进行战争威胁，并对中国发出核战争恫吓。苏联的行动在中国领导人中引起极度的警惕和紧张在情理之中。[④]

其次，中国决策层对战争的判断与毛泽东1968年秋冬以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有直接的关系。自196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即认为世界形势进入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存在着发生世界战争和爆发世界革命的两种可能性。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是否会爆发世界战争和什么时候会爆发世界战争，成了毛泽东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有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2页；《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第124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③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第192、199页。

④ 叶利扎维金在他的文章中说，苏联所有的口头威胁都是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中国放弃在边界地区制造紧张的政策。苏联外交官舍甫琴科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苏联军方曾有意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但在了解到美国反对那样做后，才采取了折中的政策，即施加军事压力，包括进行核威胁。见阿·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生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能力发动世界大战，而且它们也都在准备扩大战争，因此“似乎要打仗了”，“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了”。[①] 此外他还认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间隔22年的历史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4年后，也该有大战争了。正是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一旦中苏边界发生军事冲突，毛泽东便自然将其与侵华战争和可能爆发世界大战联系起来。

不过，毛泽东最初对中苏边界形势的判断应该说是就事论事的，否则中共中央也不会批准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以致引火烧身。是苏联的军事威胁，特别是核战争的威胁，触动了毛泽东本已经绷得很紧的神经，致使他担心边界冲突会导致苏联大规模的入侵，甚至有可能成为一场世界大战的前奏。可以设想，如果毛泽东没有那种关于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的先入为主的看法，他未必不会像周恩来、陈毅等人那样，对形势做出较为现实的估计。而真正的不幸在于，绝大多数人认可了毛泽东的观点。

三、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变

要解释本文开始提出的疑问，必须参考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中苏边界冲突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是否在有意识地利用中苏边界冲突来为调整中美关系服务？

现有的资料表明，在尼克松竞选总统前及其当选前后，毛泽东已经注意到美国有可能调整对华政策。[②]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发表就职演说。毛泽东读后指示《人民日报》在照例予以批判的同时，应全文转载。有论著暗示，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在大范围内传播尼克松就改变对华政策发出的信息。[③] 毛泽东还批准中国驻波兰临时代表向美方建议，于1969年2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谈。后因美国向叛逃的中国驻荷兰外交人员提供政治庇护，中国于2月28日宣布取消会谈。至此中国在尼克松当选后的第一次试探便结束了。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毛泽东及中国政府做上述试探是否与某种战略考虑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这时毛泽东是否已经有了全面根本改变中国外交格局的战略考

① 《毛泽东会见巴卢库的谈话》，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的谈话》，1968年11月28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85页。

③ 《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第517页。宫力：《毛泽东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美政策的演变》，《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4期，第54页。

虑，还是像已往一样，这次行动只是中国领导人缓和中美关系的长期愿望的又一次表现？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看，后一种结论更为合理。

从60年代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认为，中美关系包含着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是在全球战略层次上，美国要称霸世界，以及与苏联联合对付中国，遏制革命运动。[①]第二是在地区层次上，当时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是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1968年间中国领导人已经肯定，美国早晚要从越南撤军，毛泽东甚至估计美国最多再坚持4年。不过估计归估计，在没有清楚地了解美国的政策之前，毛泽东等仍然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②]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不从越南撤军或明确承诺撤军，要改善中美关系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美国在那里的军事干涉一直被认为是遏制中国的一个极端的标志。第三是双边关系的层次，当时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只要美国不表示将改变自朝鲜战争以来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就很难根本改变对美国的政策。

在上述三个层次上，直到1969年春夏之交，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变化。如果考虑到中美长期对抗的历史，以及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敌意和怀疑，便可以想象，在毛泽东做了最初的试探后，美国不仅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反而在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时，继续做出对华强硬的姿态，这会在中国决策层造成多么严重的心理影响。这种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1969年夏美国发出一连串缓和中美关系的信息，而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却一直不动声色，尽管毛泽东这时认为，与苏联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根据熊向晖的回忆，四人小组曾于8、9月间讨论过如何利用美苏矛盾和打开中美关系，但由于受到外交部的劝告，未提出具体建议。在9月17日提交的《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中，四人小组的成员们甚至没有提及调整对美政策。只是陈毅表示，他将向周恩来口头汇报关于改变对美政策的具体建议和设想。至于他如何向周恩来口头建议，以及他的那些建议是否被转达给毛泽东，便不得而知了。[③]现有的资料表明，参与决策研究的有关方面，不论是外交部还是四人研究小组，都不能不

①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第324—32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3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80—583页。

③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第193、197页。

顾及建议改变对美政策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消极的政治后果。当然，如果毛泽东已经对调整外交战略成竹在胸，并多少透露一些，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1969年7月，尼克松政府开始采取行动缓和中美关系，包括减少在越南的美军和减少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9月7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向周恩来传达的信息是重要的，即尼克松政府将：(1) 无保留地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2) 美国不支持不参与苏联旨在孤立中国的任何行动；(3) 美国将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越南问题。周恩来对美方建议的回答只是希望继续进行中美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①

10月10日，基辛格告诉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美国准备停止美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1月5日，巴总统将此情况转告中国驻巴大使。两天后，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在台湾海峡巡逻。11月16日，周恩来在一份送毛泽东的电报上这样写道："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②很可能是在此时前后，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调整对美政策，为打开中美关系做出努力。

还有必要指出，自7月起，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并频繁发出信息，争取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四人小组应该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但如前所述，在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他们并没有提及改变对美政策问题。现有的资料还不足以说明，陈毅是否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关于如何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以及周恩来是否向毛泽东转达了陈毅的建议，或毛泽东是否看了四人小组的报告。此外，外交部当时基于什么原因、在谁的领导下以及如何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远不像四人小组的情况那样清楚。当然林彪掌管的军队系统的情况就更不清楚了。

本章的分析和上述疑问的存在，均说明既不能断定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开始阶段就已经决定，从根本上调整中国外交战略；也不能肯定他接受了其他参与决策或决策研究的人的建议。这样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意地实施一项明确的战略了。在此提出这样的假设或许有助于将这项研究推向前进，即毛泽东这时更多考虑的是全球性的战争与革命问题，对于中国是否、何时与如何调整对美政策，并无认真的思考和结论。很可能是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思维框架允许的范围内，领导和推动中国外交走上了实行战略转变的轨道。

---

① 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12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4页；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125页。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 1969 年 3 月珍宝岛事件到 10 月 20 日中苏重开边界谈判，中国决策层还没有形成全面调整外交战略的明确方针，不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利用中苏边界冲突来达到调整对外政策的目的，而是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的反应在中国领导人心中，主要是在毛泽东心中，引起强烈的战争危机感，以致当他们确认美国确实准备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后，便毅然走上了联美抗苏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外交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之所以称其为革命性的转变，不仅是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以往中国外交的格局，而且还因为此次外交战略转变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开始了将国家安全利益置于中国外交的中心位置的过程。

进一步说，对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分析，以及从目前披露的资料和国内已出版的有关论著的分析看，毛泽东在此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中所起的作用还不能说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如果不再拘泥于“伟大领袖，英明决策”这样的思路中，肯定能更客观更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外交战略转变中的思想与作用。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198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

近年来，1980年代中苏关系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中苏关系本身内容丰富庞杂（其程度大大超过中美关系），并产生过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从对抗到正常化的过程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10年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及其复杂性。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基本上是在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发展的：其一是双方不断寻求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基础，并通过谈判和交往逐步建立起共识；其二是同时在全球、地区和双边等三个层次展开战略博弈。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个过程展开的，1989年5月中苏峰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则是这两个过程演变的结果。为揭示上述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和一些基本特点，本文拟集中论述四个主要问题，即：1980年代中苏关系的研究框架；“正常化”问题的缘起及其意义；邓小平提出“三大障碍”及其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印度支那问题。

一、中苏关系的研究框架

由于中苏关系极为复杂，要清楚梳理和深入探讨1980年代的中苏关系，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它应该包括决定这个时期中苏关系演变的主要动力、特点等等基本因素和演变的基本线索。本人认为这个框架应该包括双边关系的历史结构、中苏的国内政治和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等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双边关系的历史结构。中苏关系从一开始在本质上就是在动乱和革命中新生的两个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宏观地看，中苏都是在经历内部的长期动乱并发生了激进的暴力革命，然后分别开始了各自新的国家建设。1911年10月，

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2000 多年的帝制被推翻，中国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1917 年 11 月，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并彻底结束沙皇的统治，开始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关系就是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发生的，中苏建立正常国家关系问题由此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是将这个过程带入了一个新时期。

中国的清王朝与沙皇俄国有长期交往的历史，并有漫长的边界线，加之 1840 年列强开始入侵中国后所带来的诸多冲突和纠纷，致使两国之间有数不清的历史遗留问题，中苏的新政府几乎继承了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它们概括起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俄国与中国的边疆地区如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等的关系，实质是如何处理沙皇俄国在中国边疆地区攫取的权益，如在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以及对中国边疆地区事务的干涉，如在中国蒙古和新疆地区的干涉；（2）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处于动荡和分裂的时期，俄国与中国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关系，包括同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军事集团及地方势力的关系；（3）沙俄在中国取得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权利，如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在华驻军权、租界等；（4）苏联与列强在中国的关系，如先后与英美和日本等处理在华关系；（5）两国长达 2 万多公里边界的划界和部分地段的领土争议。

两国在刚经历内部剧变后，当时都还没有经验、能力和时间来处理它们的前朝为双边关系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并且在很长时间里甚至没有积极地探寻解决办法。1920 年代初期，苏联新政府基于稳定外部战略环境的需要，开始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它虽然宣布过要废除沙俄时期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①] 但倾向继承沙俄从中国攫取的某些利益，并不论基于何种理由，实际上也在延续沙俄时期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尽管也有些调整。苏联政府作为双边关系中的获益者固然占据主动，将维护既得利益作为主要政策，甚至有时还以支持革命或维护民族自决权的名义，进一步介入中国内部的政争和支持非汉民族的分离活动。中国统治集团则穷于应付当时国内此起彼伏的政争和内战，基本上无暇处理中苏关系。当然，事实上的分裂状态也导致北京政府（以及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无法完全控制边疆地区局势，也无法有效地解决同苏联的各种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苏曾两次达成协议，即 1924 年 5 月 31 日签署的

---

①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 年 7 月 25 日；《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1920 年 9 月 27 日；载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1840—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 14—20 页。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包含一系列附属声明书，同时签订了《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它通过为解决两国前朝遗留问题确定原则和方向，为当时苏联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包括通过谈判解决沙俄在中国取得的各种权利和两国边界问题，以及苏联将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等。[①]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包含一系列照会和附属协议)。条约的目的是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和在战后建立稳定的中苏关系奠定基础，其内容包括解决中苏双边关系中一些遗留问题，如外蒙古地区的前途（外蒙古通过全民公投决定其前途)、苏联与新疆地区的关系（苏联不介入新疆地区事务，不支持新疆独立势力)、苏联在东北地区的权益问题（战后恢复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旅顺为苏联军港和苏联驻军权、大连行政权为苏联控制、中东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方式）以及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等等。[②]

上述两个协议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它们的内容大致勾勒了中苏关系的轮廓并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协议虽然基本涵盖了中苏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却没有为彻底解决那些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协议的一些重要条款并没有被执行。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动，更主要的可能还是中国持续的政局动荡、内战等等，致使不论是北京的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无能力也无暇应付苏联的压力和处理如此复杂和艰难之双边关系。

中国内部的革命性变化——中共夺取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确为中苏解决双边关系中复杂的历史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实际上中苏之间的一些重要而且麻烦的问题在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中自动消失了，如苏联同列强在中国的关系、苏联同新疆分裂运动的关系、苏联在中国处于分裂局面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介入，等等。1950年2月14日，中苏领导人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几个相关的协定和补充协定，中苏关系从此被置于新的基础之上。[③]以新条约为基础的中苏关系至少包含了这样的特点：双方基于面临共同的威胁而建立军事同盟；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就应该遵循共同的内外政策；尽可能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但条约中没有涉及的重大问题是两国的边界问题，它

①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相关的声明书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924年5月31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3—432页。

②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照会和协定，1945年8月14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27—1340。

③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391页。

实际上被搁置了。双方可能都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抱有后来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希望和信心，即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解决边界问题既不迫切也不困难。

事实上中苏同盟的形成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的多重性质，即它是相互毗邻的、有着漫长的边界并存在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国有着共同的政治体制，以及两国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居于核心或者说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中苏结盟也没有解决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将两国关系建立在普遍的国家关系准则上。中苏结盟开始就有三个准则在其中运行，包括普遍的国家间关系准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都认可的领导者（苏共）和被领导者（中共）关系。在如此复杂的关系准则中，两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中共和苏共两党的关系成为国家关系的核心，中苏结盟起始于两党关系的迅速密切和领导与被领导地位的确定，中苏关系恶化首先是两党出现理论分歧及至分裂。与此同时，两国领导人也没有认识到，在关系较好的情况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性。结果是双方关系恶化的极端表现是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再次突出并导致 1969 年春夏的军事冲突。

历史表明，直到 1970 年代末为止，在两国关系史中出现的三个条约都没有能为两国关系奠定稳定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双方曾经面临历史机遇，并建立了对当时世界局势产生巨大影响的军事同盟。不过中苏同盟的瓦解不仅证明了如此特殊的密切关系仍然不足以长期维系两国的正常关系，同时再次将正常化这一历史命题提上日程。

第二，中苏的国内政治。在研究中苏两个如此之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一般性地谈论两国的国内政治是没有意义的。这里强调的是要把握和理解中苏两国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由此造成了不同的国内政治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新的阶段。如同 20 世纪的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一样，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在 1949 年以后一直面临着一些基本的问题，包括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与国家认同的形成，以及如何保持执政集团的合法性。中国执政集团制定任何对外政策，以及处理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任何对外关系，都同解决这些根本

问题有关。[①] 这通常会比较系统地反映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变化中，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协调，这种协调是以国家发展道路的巨大转变为基础和主要动力的，它为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转变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并规定了方向。中国首先提出并明确坚持中苏关系应遵循普遍的国家关系准则，部分地取决于中国的特殊处境，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和安全战略的调整，尤为需要重视的是中国先于苏联实行的改革。

苏联的国内政局同样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有重大影响。1982 年 3 月勃列日涅夫发表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要讲话，同苏联因过度扩展而造成的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后来戈尔巴乔夫在 1986 年间决心大幅改变苏联对华政策，同他的改革“新思维”形成和苏共中央决心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有直接的关系。[②] 总之，中苏两国相继出现的内部巨大变革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背景，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

第三，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对三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每个国家对其他两国的政策的影响，是实实在在并显而易见的。这既包含对三国对外政策的总的影响，也有对不同阶段的具体政策的影响。如果从比较宽泛的角度观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起，就曾经出现过美中苏三方关系互动的现象。例如中共中央在建国前后选择“一边倒”就同冷战对抗激烈时期美苏两国对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反之，中共中央这个时期的选择也影响着美苏的对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关系。此后由于中苏结盟、朝鲜战争和中美处于隔绝，三方初步的互动才基本结束。

1970 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和中美关系缓和，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逐步形成，中苏关系受到这个“战略三角”和两国领导人对“战略三角”的认知的严重影响。在中苏处理双边关系的过程中，美国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阴影。中国领导人是将中美关系当作对外关系中的所谓“重中之重”，一直为了维护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而控制着中苏关系的节奏。苏联领导人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则始于加强同美国对抗的战略地位。这种情况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才开始逐步改

---

① 参阅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0—24 页。

② 参阅左凤荣：《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发展与实践》，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120—1134 页。

变。不全面地了解中苏两国是如何考虑各自同美国的关系，便无法完整地理解中苏关系演变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要分析和理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起因、动力、背景和主要特征，就必须全面地理解中苏关系的历史结构，以及当时两国的国内政局和国际冷战格局中的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影响。通往正常化的路程在如此复杂之结构中必定是漫长和复杂的。

二、“正常化”问题的缘起及涵义

所谓中苏关系正常化完全不同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即双方是否承认对方政府为国家的代表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主要是为两国关系维持常态寻找一个稳定的基础，在从同盟到对抗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处于中间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和如何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取决于双方对两国关系准则的探索和共识的形成，也取决于解决历史和现实战略问题的状况。另一方面，当时严重恶化的双边关系同历史遗留问题和双方内外政策等纠结在一起，即造成了解决有关问题的迫切性，也加剧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

多数论著均将 1979 年春中苏双方围绕终止 1950 年中苏同盟条约或 1982 年春夏围绕勃列日涅夫 3 月 24 日的一次有关对华政策的谈话所展开的决策与相应的外交活动等，作为“正常化”的历史进程的开端。[①]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两国提出“正常化”建议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两国领导人逐步开始意识到需要将国家关系同党际关系分开和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则要更早一些。

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础，是在 1956 年秋波匈事件期间。当年 11 月 1 日，中国政府在表示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的声明中称：“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②] 从当时特殊的背景和中国后来处理中苏关系的实践看，中国领导人这时提出

① 参阅苏起：《论中苏共关系正常化（1979—1989）》，台北：三民书局，1992 年版；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第五章《三、冰雪开始融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李华：《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第十四章，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孙艳玲：《中苏关系正常化与邓小平对苏外交决策》，《国际冷战史研究》，2009 年第 8 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 1956 年 10 月 30 日宣言的声明》，1956 年 11 月 1 日，《新华半月刊》，1956 年第 21—24 期，第 103 页。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观点具有长久的重要意义，不过这时他们还是将国家间关系放在社会主义阵营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框架中思考的。另一方面，这次表述毕竟不是特指中苏关系。

专门针对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概念最早出现在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中。由于还无法看到双方的会谈记录，不能确认是谁首先提出的。据苏联方面的翻译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回忆，柯西金在会谈中提出“采取一切措施使苏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必要的”。[①] 中方则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年谱》中披露，周恩来提出“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②] 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正常化”最终要看公布的会谈记录，不过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共识，或者说都同意保持国家间关系正常化，是显而易见的。会谈中双方都同意举行边界谈判、恢复贸易关系和恢复互派大使。

目前还无法知道苏联最高当局最终是如何评价这次会谈的，只有间接的资料表明，柯西金本人表达过希望从更积极一些的意义上评价中国方面的立场。[③] 中国披露的资料表明，周恩来在两天后报告毛泽东说：“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对该报告的肯定表明，他同意周恩来的判断。周恩来随后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决定，于9月18日致信柯西金，提出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建议，并准备根据苏方回应再决定发表政府声明。可以说这次两国总理会谈至少导致两国领导人开始共同思考“正常化”问题。当然，两国总理当时的共识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法成为实际行动的。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回函中仅提出“使边境局势正常化”。[④] 中国则进入针对设想中的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全面备战。尽管如此，两国总理会谈提出“国家关系正常化”和准备采取的措施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在边界军事冲突的压力下，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探寻如何区隔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以便在无法解决两党意识形态冲突时，尽可能维护住各自的国家利益。

从逻辑上推论，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情况下，如何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区隔，以免两党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严重破坏国家间关系，应该是从中苏发生意识形

---

① 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回忆中苏关系》，《当代世界》，1998年第7期，第45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321页。另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35页。

③ 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回忆中苏关系》，第45页。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2—323页。

态争论就开始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苏双方在争论发生的初期，都曾经为维持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做过努力。在这方面，与苏联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的思考开始的更早一些，更深入一些，做出的努力也更多一些。在1960年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就提出要“尽力来推迟中苏两党、两国的破裂时间”，这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并力图做到将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有所区隔。[①]当年7月16日，苏联对中国实行制裁，将意识形态争论扩展到国家关系。中方在交涉中表达了希望维护两国关系的愿望，陈毅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坦率说明，苏联撤回专家受损害最大的是中国。此后中方向苏联政府提出，就两国经济贸易领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举行政府间谈判。这是中方为避免意识形态争论冲击国家关系所作的第一次尝试。从结果看，1961年间中苏之间的经贸关系有所发展，双方就中国偿还贸易欠款的期限和部分欠款的利息问题等达成了协议。此外双方还签署了一些新的经济合作协定和为期5年的科技合作协定。[②]

中苏在两党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处理国家关系的另一轮尝试是1964年2月至8月举行的边界问题谈判。尽管两党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政府代表团仍然在谈判中就有关中苏边界东段4280公里边界线中的4200公里部分基本上按照中方的主张达成了协议，并草签或谈妥了部分工作小组协议。[③]后来由于两国国内政局出现剧烈动荡，谈判在8月结束后未能继续进行。

根据有关著作的描述，1965年是中苏国家关系伴随两党关系破裂也进入全面破裂时期。当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往返两次路过北京，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谈。这些会谈涉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合作以及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谈话中展示的思维里，包含着将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分开的逻辑。从目前能看到的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片段中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是希望为“改进国家关系”留有余地的。[④]此次会谈后不久，中苏两党关系全面破裂，国家关系随之严重恶化。不过如果没有双方都曾尝试过在党际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维持住国家关系，就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5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40—243页。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第254—255页。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06、708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913—921页；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册，第920—921、923—924、931—932页。

不会有后来1969年9月两国总理机场会谈提出关系“正常化”，以及根据这个概念提出稳定国家间关系的具体主张。苏联领导人曾经根据两国总理会谈后中苏关系发生的一些积极变化认为，中苏国家关系“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声称苏方将“争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①]

1969年春夏的边界冲突导致中苏进入尖锐敌对的状态，不过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对苏政策话语中，继续保持着对“正常化”的原则性论述。根据苏联领导人的谈话透露，早在1970年代初，中国代表就曾向苏联提出，两国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②]1973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政治报告在国际形势与对外政策部分突出地强调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危险性，即便如此，报告仍然将中苏关系正常化列入其中。该报告正式说明：“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③]这是第一次将两国关系正常化所应遵循的原则写进中共党的最高文件中，它可以被视为是中国对苏政策的重要指针之一。这段表述在当时看来可能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政治和道义的立场，但它被写进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是有重要意义的。这表明经过两党关系破裂、同盟解体和边界军事冲突后，中国领导人已经相信中苏关系不可能再回到结盟状态，而且他们就未来中苏关系的准则提出了明确而且是坚定的表述，这个表述的精神实质被载入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文件中。[④]

这个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也一再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同中国领导人一样，他们显然也意识到了，中苏关系只能建立在与1950年代结盟有所不同的基础上，不过他们还多少有些指望能使两国关系更密切一些。在197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会议上，苏联领导人明确宣布：苏联“不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

①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71年3月3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七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页。

②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2年3月2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八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

③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人民日报》，1973年9月1日。

④ 《中苏联合公报》，198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促进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恢复”。[①]在此前后，苏联方面多次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应采取措施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中方则拒绝了苏方的建议，要求苏联方面首先履行 1969 年 9 月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

这个阶段中苏关系出现了奇特的现象，即当两国最尖锐对抗时，却已经建构起了“正常化”所应遵循的原则即“和平共处”。尤为重要的是，“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在双方的外交话语系统中都是无可争议的“政治正确”，而且双方对此理念的理解的重合部分在增加，所以它们才能在对抗中都将这一理念作为谴责对方和谋取道义优势的思想武器。因此可以说“正常化”的确反映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方向。

三、“三大障碍”的提出及其影响

1979 年 4 月，中苏围绕 1950 年 2 月 14 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进行了接触。该条约于 1950 年 4 月 11 日生效，有效期 30 年。根据条约规定双方在有效期满前一年未提出废约，条约将自动延长五年。[②]双方此前都在考虑条约的存废，并试图利用这个机会缓和紧张关系。勃列日涅夫在 1979 年 1 月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经常从北京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就我们的意志而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③]苏联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一方面为缓和中苏关系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一旦关系进一步恶化，可将责任推给中方。

中国这时在积极推行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对中苏条约的立场不会与中国对外政策背道而驰。在 1978 年 7 月重新开始的中日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中，中国坚定主张应加入反霸条款。当时为促使日方接受这一立场，在 8 月 9 日的外长会谈中，黄华向园田直外相表示，中苏友好同盟到期将予以废除。[④]邓小平在 8 月 10

---

①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71 年 3 月 30 日，第 14 页；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2 年 3 月 20 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八集，第 34 页。

②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 391 页。

③ 转引自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62 页。

④ 汪培柱：《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郑言：《外交纪实》，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37 页。

日会见园田直时也告诉后者，中方到时“会正式宣布废除”该条约。[①]加之中国于1979年1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前不久的对越战争取得预期效果，外交上处于有利地位。这时选择中止中苏条约是合逻辑的选择。

当时中国外交部和驻苏联使馆内部讨论了中苏条约终止后怎么办，主要意见是与苏方举行会谈，争取签订新的国家关系文件。马叙生衔命回国汇报使馆的建议后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外交部的想法同使馆的建议是吻合的。[②]此后外交部提交了《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请示》，于3月24日获邓小平批准。4月初，邓小平做出明确指示，不再延长中苏条约，但应为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中苏关系举行谈判。[③]

4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向他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不延长中苏条约的照会。4月17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中国驻苏联大使王幼平递交苏联政府复照，宣布同意举行谈判，并希望中方告知谈判的题目和希望达成的目标。[④]此前早在1971年1月和1973年6月，苏联政府曾经先后提出双方签署《互不使用武力条约》和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等建议。1978年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致函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中苏双方就两国关系的准则发表原则性声明，并为此举行“足够高级别的代表会谈”。[⑤]中方在中止条约后提出举行会谈签订新协议，对苏联来说是很可以接受的。

5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约见谢尔巴科夫，递交中方有关谈判内容和宗旨的备忘录，包括确定两国关系准则、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发展贸易、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并根据谈判结果签订相应的文件，以及举行中苏边界谈判。[⑥]6月4日，苏方回复时提出7月和8月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谈判，制定两国关系原则的文件。[⑦]此时可以说双方的谈判原则有重要的重合之处。此后中国外交部门按照争取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达成协议的初衷展开准备工作，包括起草相关文件，包括：《关于两国关系的协议草案》、《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协定草案》、《关于两国事务来往的有关设想和意见以及谈判

①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②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3—34页。

③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209页。

④ 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册，第946页。

⑤ 转引自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册，第942—943页。

⑥ 马叙生：《结盟和对抗都不好——80年代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2000年第12期，第36页。

⑦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册，第946页。

方案》等。

8月29日，中方的谈判方针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此前外交部上报了《关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方案的请示》，目前不清楚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邓小平的批示是"以在政治局讨论为好"。[①] 他显然认为报告的内容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苏谈判问题，邓小平在主旨发言中提出，中方谈判的核心目标是解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即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具体原则是要求苏联从蒙古撤军和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苏双方都承诺：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谈判策略则是不急于求成。[②] 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中国决策层决定将谈判方针从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签署协议转向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这一转变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成为后来中国指导中苏谈判的战略方针，因此需要分析它产生的背景。

如前所述，中国决策层最初也是主张展开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以改善中苏关系的。但他们最终的决定是以消除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为首要条件，一般地说就是基于对全球战略形势的判断，执行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心，以及对消除苏联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一段非常能说明中国领导人此时此刻的战略思考。他说："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个战略"对于打破苏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③] 在这种战略认识指导下处理中苏关系，必定有其特点和限度。

从时间联系密切的程度看，这一时刻中美关系的发展很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8月27日上午，邓小平同到访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会谈，后者当天还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称中国是美国的友好国家，"任何国家如果想要在世界事务中削弱或孤立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6页。

②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第34页。

③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你们，它的立场就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①]28 日下午，邓小平同蒙代尔签订了未来两年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的协议，他对此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会有更积极的前景。[②] 双方还就美国防部长布朗访华达成一致意见，布朗访华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中美战略合作，包括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中美关系的进展很可能直接影响到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以及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毕竟是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才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反之，他们认为苏联不仅在威胁中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也还不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③] 在美中苏战略三角中避免因为中苏过快接近而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是合理的选择。在中苏副外长级谈判开始前，邓小平通过同尼克松的会谈，向美国公开了中国指导谈判的原则。他告诉后者，中苏谈判的前提是消除中苏关系的障碍，即“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不只是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④] 邓小平这样做显然是不希望中苏谈判给中美战略合作带来消极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对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中苏副外长级谈判从 10 月 17 日正式在莫斯科举行。苏方按照原定计划，首先提出苏中《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的草案。中方则提出《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要求苏方首先应消除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包括将苏联在中国毗邻地区军事力量减少到 1964 年以前的水平；撤走在蒙古的驻军和军事设施，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苏方提出苏联并没有威胁中国的意图，以及中苏谈判不应涉及苏联在蒙古驻军和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此后双方各执己见，经过 6 次正式会谈也未能取得任何共识。12 月 27 日，苏军入侵阿富汗。1980 年 1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断中苏谈判。[⑤]

1982 年 3 月 24 日，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在阐述苏联对

---

① *American Foreign Plolicy, Cur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gting Office, 1983, p. 999.

② 《邓小平在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举行的告别宴会上的讲话》，1979 年 8 月 28 日，《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新华通讯社，1980 年版，第 306 页。

③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第 37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卷，第 557 页。

⑤ 《人民日报》，1980 年 1 月 21 日。

亚洲政策时，表示希望为改善中苏关系做出积极努力。[①] 中方很快做出初步回应。外交部当天在内部讨论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黄华第二天当面向邓小平汇报了讨论的结论，邓小平当时即指示外交部立即发表谈话，要言简意赅，既坚持原则又要有灵活性。[②]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于3月26日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有关中苏关系的讲话，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③]

4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他请后者转告勃列日涅夫，中国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苏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例如从柬埔寨、阿富汗问题上做起，或者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做起。[④] 这是后来中方提出的消除"三大障碍"的最初表述。夏季，邓小平在自己家里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他提出要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条件的。他由此将同齐奥塞斯库所谈的三点归纳为苏联应主动解决的"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方案获得与会者的同意。邓小平还提出，由外交部派遣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直接向苏联方面转达中方的意图。[⑤]

在8月10日，于洪亮随身携带外交部起草并经邓小平审阅的说贴前往莫斯科。说贴主要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中方认为时机已到，已经可以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些实际的事情了；第二，建议苏方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做起；双方还应考虑为苏军撤出蒙古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同时中方也在阿富汗问题上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⑥] 于洪亮到达莫斯科后，即要求在中国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伊利切夫在第一远东司副司长贾丕才陪同下会见了于洪亮，后者几乎一字不差地将说贴的内容当面背诵一遍。这是中方第一次正式直接向苏方提出解决"三大障碍"问题。

伊利切夫等当时表示，要待请示后才能答复。于洪亮此后前往波兰，在回程经

---

①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授勋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3月24日，《参考资料》（下），1982年3月25日，第9—10页。

②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8页。

③ 《人民日报》，1982年3月27日。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815页。

⑤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页。

⑥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9页；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8页。

过莫斯科时，再次会见伊利切夫，后者表示已经向上峰汇报此前的谈话内容，苏方会做出正式答复。8 月 20 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递交一份备忘录作为正式答复，表示苏方愿意在任何时间、地点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谈判，以便“消除任何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邓小平在听取有关的报告后决定，重开中断了两年多的中苏谈判。中苏双方很快便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

9 月 18 日，邓小平于下午在专列上同金日成单独会谈时谈到中国的有关政策，包括：第一，此次中苏谈判的目标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第二，中方提出解除“三大障碍”是因为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苏联解除三大障碍可以是分步骤的；第三，中苏谈判将是长期的，实质性问题不会容易解决；第四，中方处于有利地位，苏联比中国更急于谈出成果，因为它“日子不好过”。[①] 这段谈话表明，中国领导人一方面确定了中苏谈判的目标就是实现正常化；另一方面这时对谈判仍然是不急于求成，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处于比苏联有利的战略地位，有条件从正常化进程中获得实质性的战略利益。

中苏副部长级政治磋商从 10 月 5 日开始在北京举行，外交部此前按照邓小平不要转弯太急和不急于求成的指示，确定了“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的方针，并已经有了具体方案，即要求苏联从“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②]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界碑，它标志着中方政策最终形成。这项政策可以概括为三点内容：第一，中苏关系正常化应该以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为目标，即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和解决在地缘安全领域面临的麻烦；第三，在上述战略利益中的优先目标是解决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面临的麻烦，即越南追求地区霸权造成的问题；第三，由于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国的战略地位优于苏联，中国并不急于求成。

苏联方面的决策过程目前还不得而知。前述邓小平在 4 月同齐奥塞斯库的谈话和在 9 月同金日成的谈话是否在中苏磋商开始前被转达给苏联领导人还无法确定。由于罗马尼亚和北朝鲜都是苏联阵营的国家，同苏联保持较好的关系，很难想象邓小平的那些讲话不被齐奥塞斯库和金日成转达给苏方，尤其是齐奥塞斯库一直在为中国向两个超级大国传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领导人同他谈话很少无的放矢。如果未来公布的档案能证明苏联领导人已经了解邓小平的谈话内容，那么可以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卷，第 851 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11 页。

大致断定他们对谈判也报定了不急于求成的态度。

提出消除“三大障碍”的重大影响是使中苏关系正常化成为一场安全战略的博弈。中方从此明确且坚决地将正常化谈判作为谋求战略利益的过程，务必要达成逐步地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的目标，两国关系正常化必须建立在双方拥有战略互信的基础上。苏方对正常化的定义就是谈出一个作为双边关系基础的准则，然后签署一个外交文件。它是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双边关系以缓解在亚洲方向面临的压力，而不想对已经获得的战略地位做根本性调整。中苏副外长级磋商到 1988 年 6 月止共进行了十二轮谈判，成为典型的“马拉松”式谈判。

四、解决印支问题与“正常化”

这个时期中苏的战略博弈是全面的，包括全球、地区和双边等三个层次。到 1985 年中期，双方谈判的焦点逐步集中到地区层次，即集中到印支地区问题。首先是 1985 年秋，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决定。4 月 18 日，邓小平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提出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苏联可以先做说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①] 这是他首次亲自表达在清除“三大障碍”方面，苏联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10 月 9 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后者给苏联新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带口信，进一步提出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具有可信性的谅解，他本人或胡耀邦总书记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他甚至表示可以破例到莫斯科去与戈尔巴乔夫会见。[②]

邓小平的这个口信显示了中国有关政策的两个重要变化，即将“正常化”进程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直接挂钩，以及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访苏作为对苏联协助解决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的回应，以增加促使苏联做出决定的压力。这些变化反映出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考的重大变化，即他们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已经将关注的焦点从解除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转向解决印支地区的问题，包括彻底打消越南地区扩张的意图。如果在改善中苏关系的同时，利用苏联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印支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将获得实质性的改善。显然，中国的主要目标已经是追求实实在在的地区战略利益。

中国政策的转变实际上也表明，中国领导人这时已经不再将苏联在中苏、中蒙

①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卷，第 1041 页。

②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卷，第 1085—1086 页。

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视为中国的安全威胁。中国政策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需要深究。首先，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心进一步调整对苏政策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在中国的内部，主要是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在1985年夏季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百万裁军方案和精简后的军队改革和编制。这次会议做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1) 国防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虑其轻重缓急；(2) 实行百万人规模的大幅裁军；(3) 在对外政策方面，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确定不再以"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为基础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会议期间，邓小平明确地概括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思考和结论，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这次会议的决定，对中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6月4日与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说，经过几年仔细观察和思考，中国决策层已经完成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这句话可以被合理地延伸为，苏联的威胁也并不像以往被认为得那么严重。第二是改变反霸统一战线政策，不在所谓"美中苏大三角"的思维框架中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①]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已经不再将反霸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并希望在建立多元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另一个需要重视的因素是在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大致形成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划，即争取经过七十年的努力，在21世纪中期使中国的发展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说中国"希望有七十年的和平"。[②] 这种对未来的思考很有可能是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根本改变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关键性动力。

除了上述中国内部的变化外，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印支形势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2年夏季中美签订"8·17"公报后，双方处理了一系列纠纷，中美关系逐步稳定下来。1984年初到5月，两国高层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中美关系随后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双方的军事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会使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正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可以更加主动和自信地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1985年中国对外政策转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反映在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印

---

①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6—129页。

②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3页。另参阅《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057、1059页。

支的政策。从目前公开的文献看，这一政策调整是以“安定南疆”为主要目的，争取尽快结束越南侵略柬埔寨和恢复印支地区的稳定与和平。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转达戈尔巴乔夫的口信凸显了中方要尽快彻底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迫切性，毕竟中国同越南的边境军事冲突仍在持续，这不仅在干扰中国的发展战略，而且柬埔寨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长期被拖在其中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

印支形势在1985年夏季也出现了明显变化。首先是越南领导人已经显露出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意向。1985年3月25日，越南提出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5点建议，虽没有实质性改变，但在越军撤出柬埔寨的关键问题上，文字表述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①] 6月下旬，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访问莫斯科，这期间出现苏越向改善对华关系的方向协调对华政策。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的欢迎宴会上致辞中说，苏联和越南都希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黎笋也在致辞中表示要恢复中越的“传统友好关系和正常的睦邻关系”。[②]6月28日，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苏越领导人在会谈中“涉及到了中苏关系问题”，他们都认为“苏中以及越中关系的正常化将符合加强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宗旨”。[③]《苏越联合宣言》中专门有一部分谈到，苏越都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④]

客观地看，中国当时在柬埔寨问题上也遇到相当复杂而且困难的局面。在如何安排越军撤出后柬埔寨的政治前途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来自越南和苏联，还包括东南亚国家。中国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与中苏正常化直接挂钩，反映了中国对自己战略利益的评估，其结果是在决定中苏正常化进程的诸多因素中，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可以接受的，部分地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相关问题的评估。例如如何评估中苏政治关系取得答复进展的紧迫程度；如何评估苏联在促使越南撤军问题上的能力；以及随着时空的变化，中方愿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可能做出的让步的程度；等等。后来中苏政治谈判之所以持续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苏一时难以在越南撤出柬埔寨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上达成谅解是主要原因。

---

① 《东盟对越南提出的所谓解决柬问题的五点建议反应冷淡》，《参考资料》（上），1985年3月26日，第53页。

② 《戈尔巴乔夫和黎笋在苏方宴会上的讲话》，《参考资料》（下），1985年6月29日，第18、20页。

③ 《洛梅科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苏越会谈情况》，《参考资料》（下），1985年6月29日，第13页。

④ 《苏越联合宣言》，1985年6月29日，《参考资料》（下），1985年6月30日，第22页。

齐奥塞斯库于10月22日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戈尔巴乔夫当时表示会认真考虑。[①] 但这一情况很可能没有立即反馈到中国。11月4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邓小平的谈话，其中包括分先后解决“三大障碍”的内容。[②] 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方面这种公开和直截了当的反应，两天后中方即接到苏方通知说，收到邓小平的口信了。[③] 随后不久苏方又提出，双方可以立即在远东某地举行中苏峰会。苏方对邓小平口信的这种外交辞令式的反应表明，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准备好为中苏正常化采取实质性的步骤。

1985年12月下旬，李鹏访问欧洲途经莫斯科回国。李鹏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与他会见。戈尔巴乔夫首先表示他收到了邓小平托齐奥塞斯库转达的口信并给予肯定的答复。然后他阐述了苏联对华政策，包括苏联继续争取实现正常化，以及希望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站在一条战线上”。李鹏在答复中表示，中国不可能与苏联再搞统一战线，当前最关键的是解决柬埔寨问题，“只要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之间一切都好谈”。[④] 双方这次仍然未能就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共识。

导致戈尔巴乔夫无法为改善中苏关系做出重大决定的原因同他在苏联国内面临的巨大困难有关，这种情况在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后才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巩固了他的权力地位，他试图推行的改革也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苏共二十七大刚结束，印支局势出现迅速变化，越南在3月间提出了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的时间表，即越南“将于1990年全部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还可以早些撤军”。[⑤] 韩桑林政权的外交部副部长贡昆本此后不久即表示，最多用两年时间找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⑥] 这一变化引起包括有关各方的重视和反应，柬埔寨抵抗力量的三方代表不久即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越军全部撤出后，将组成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并包括韩桑林政权代表在

---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086页。

② “An Interview with Deng Xiaoping,” *Time*, November 4, 1985, p. 40.

③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3页。

④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6页。

⑤ 《越第一副外长说越军将在一九九〇年前撤出柬埔寨》，《参考资料》，1986年3月5日，第42—43页；《越外交部发表“关于中国反越的敌对政策备忘录”》，《参考资料》，1986年3月15日，第11页。

⑥ 《柬伪副外长宣称达成寻求柬冲突政治解决办法只限两年》，《参考资料》，1986年3月15日，第12页。

内的“四方”联合政府。[①] 3月18日，胡耀邦在会见民柬三方领导人时表示支持他们的建议，并说“只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可以恢复中越传统友谊”。[②]

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在涉及对外政策部分中的不少内容都与中苏关系有关，这些内容被分别包括在阐述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部分里，它们的确回应了中国关切的所有基本问题。关于从蒙古撤军问题，苏联“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联军队撤出蒙古的问题”；关于中苏关系，苏联在各个领域发展同中国的合作，理解与尊重中国的国内政策，也愿意谈判解决黑龙江地区的边界遗留问题，“而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关于撤退中苏边境苏联军事力量问题，“苏联认为彻底削减亚洲的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并使之达到合理的限度具有重大意义”，“苏联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讨论旨在相应地降低陆军水平的具体步骤”。在印支问题上也明显透露出苏联不愿再支持越南打这场毫无前途的战争，不过它并不准备按照中方的要求向越南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将柬埔寨问题作为一种地区冲突做专门论述，也是在这个基调上说“这里的许多事情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③] 在当年4月的中苏第8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期间，苏方就提出可以将柬埔寨问题作为一种地区冲突，与中方讨论解决办法。[④]

中国领导人这时显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有诚意改善中苏关系，但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模糊了双方矛盾的焦点，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已经改变了的地缘战略关切。简单地说，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关切中，首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所谓的“苏联大兵压境”，而是消除印支地区紧张局势。8月13日，中国外长吴学谦奉命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告诉他中方并不满意戈尔巴乔夫忽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⑤]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表示，如果苏联在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就可以会见戈尔巴乔夫。[⑥]

1987年5月7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在会见到访的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时，请他向戈尔巴乔夫转达口信：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越南撤军，越军撤出后中

---

① 参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册，第203页。

② 《人民日报》，1986年3月19日。

③ 《戈尔巴乔夫在给葳市授勋大会上的讲话》，1986年7月28日，《参考资料》，1986年7月30日，第30—38页。

④ 田增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页。

⑤ 《人民日报》，1986年8月14日；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5页。

⑥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7—168页。

国不支持任何一派单独掌权，希望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①] 5 月 11 日，邓小平委托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越南方面转达中方的建议，包括越南必须首先从柬埔寨撤军，只有解决了柬埔寨问题，中越关系才能正常化。[②]

5 月 13 日，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中苏第十轮政治磋商结束后发表谈话。他在重复戈尔巴乔夫关于将柬埔寨问题当作地区问题（而非双边问题）同中国一起讨论的同时，表示苏联“准备尽可能地协助解决柬埔寨局势问题”。他也说明苏联的条件是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不能有红色高棉，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意愿。[③] 5 月 23 日，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回答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提问时，首次将柬埔寨问题放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范围内加以论述，认为双方都应关心解决该问题，而且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④]

11 月 16 日，邓小平会见土井多贺子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再次表示只要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采取行动，他愿前往苏联任何地方会见戈尔巴乔夫。27 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同中国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赞比亚领导人卡翁达时说，他注意到邓小平同土井多贺子的谈话，他本人期待在北京、莫斯科或任何地方同邓小平会见，但不应有“先决条件”。[⑤] 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回应中方举行中苏峰会的建议。

直到 1988 年 4 月苏、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达成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之后，苏联才开始采取实际行动。5 月 23 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越南外长阮基石时表示：“苏准备同有关各方一起为解决围绕柬埔寨形成的局势做出贡献。”[⑥] 两天后越南方面宣布，于 6 月开始从柬埔寨撤出 5 万军队，剩下的军队将由金边政权指挥，并于 1990 年底前全部撤出。罗高寿第二天即发表讲话，将越南部分撤军的决定同即将举行的中苏第十二轮政治磋商联系起来，说柬埔寨问题“将在议程上处于明显的地位”。[⑦]5 月 29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越南部分撤军

---

① 引自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 50 年》，上册，第 205 页。

② 《人民日报》，1987 年 5 月 12 日，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 50 年》，上册，第 206—207 页。

③ 《罗高寿说苏对中苏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参考资料》，1987 年 5 月 14 日，第 16—17 页。

④ 《戈尔巴乔夫对意〈团结报〉编辑部的书面答复》，《参考资料》，1987 年 5 月 24 日，第 79 页。

⑤ 《戈尔巴乔夫会见卡翁达时谈他同邓小平会晤问题》，1987 年 11 月 27 日，《参考资料》，1987 年 11 月 28 日。

⑥ 《谢瓦尔德纳泽会见越南外长阮基石》，《参考资料》，1988 年 5 月 24 日，第 51 页。

⑦ 《罗高寿说苏希望中越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谈判》，《参考资料》，1988 年 5 月 27 日，第 5 页。

是“重大的建设性的贡献”，苏联准备同所有相关国家一起寻求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设性办法。[1]

很可能是因为苏联做出如此明确的表态，中方认为根本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在 6 月上旬的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见了中国外长钱其琛，主动提出希望双方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柬埔寨问题。[2]6 月 13 日至 20 日，第十二轮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结束时双方宣布不再有新一轮政治磋商，而是用专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副部长级磋商代替它。中苏政治谈判从此集中到印支问题上。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中苏举行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第一轮副外长级会谈。从事后双方披露的情况看，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中方表达出来的满意度低于苏方。9 月 1 日，钱其琛会见罗高寿时说，双方“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有分歧”。[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做了同样的表示。中方的这种表态可能是在继续施加压力，谈判取得的进展可能比公开宣示的要大些。9 月 2 日，罗高寿发表谈话时说，苏方希望越南“明年撤出其全部军队，这样做肯定会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中苏副外长级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将柬埔寨问题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解决。[4] 这显然有利于进一步找到突破点。

9 月 16 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谈话。他在中苏关系部分表达了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苏联“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最高级会晤”，前不久的中苏副外长级商谈扩大了双方对柬埔寨问题的相互了解；其二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希望中越之间直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5] 这一谈话表明，苏联一方面希望加快实现中苏峰会的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推动中越直接谈判来打破僵局。这是苏联政策的一个重要发展，它表明苏联的确在为摆脱困境寻找切实可行的办法。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讲话发表后不久，中方即同意接受邀请，派遣外长钱其琛访问莫斯科。苏外交部于 9 月 28 日发布了两国外长将进行互访的消息。

---

① 《苏政府声明说越撤军为政治解决柬问题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参考资料》，1988 年 5 月 30 日，第 31 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47 页。

③ 《人民日报》，1988 年 9 月 2 日。

④ 《罗高寿说苏中有了更多的共同点但仍存在分歧》，《参考资料》，1988 年 9 月 3 日，第 6 页；《罗高寿说苏中副外长会晤有助于苏中政治关系正常化》，《参考资料》，1988 年 9 月 4 日，第 5 页。《参考资料》，1988 年 9 月 3 日，第 6 页，以及 1988 年 9 月 4 日，第 5 页。

⑤ 《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格斯诺亚尔发表的重要讲话》，《参考资料》，1988 年 9 月 17 日，第 21—22 页。

在10月19日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决定将越南撤军作为钱其琛访苏的目的，并决定如越南承诺1989年撤军即可同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①]换句话说，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角度看，有关越南撤军后柬埔寨内部的政治问题，将不是中苏外长会谈的重点，甚至不是中苏首脑会谈的障碍了。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访问莫斯科。他在回忆中说，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在这次外长会谈中，双方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一致。苏方再次建议中方直接同越南谈判，以促使越南方面接受中苏达成的关于越南最迟于1989年底撤军的方案，以及加快政治解决的进程。此次外长会谈的结果是双方以《共同记录》的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包括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是1989年6月到12月底之间。[②]

中苏外长会谈后不久，越南外交部于12月14日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要求建立直接联系，中越之间直接的秘密谈判从此提上日程。[③]根据以上的分析，苏联极有可能是越南此次向中国提出直接谈判的幕后推手，中越直接会谈无疑有助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同时也缓解了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面临的中方压力。1989年1月6日，越南外交部宣布，越南军队至迟到是年9月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1月中旬，丁儒廉秘密访问北京。期间越方明确承诺，根据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协议，越军将于1989年9月底全部撤出柬埔寨，中方表示接受这一时间表。[④]双方在政治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不过事实表明这对中苏首脑会晤已经没有实质性影响。

2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达泽访问北京。此次会谈是为两国首脑会晤做进一步准备，但实质性谈判仍然是柬埔寨问题，中方继续利用中苏峰会向苏方施加压力，争取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承诺。在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双方在2月6日同时发表了《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日至18日访华。至此，中苏终于清除了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后一个障碍。

在结束本文时需要说明，1980年代中苏关系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本文论述的这几个问题，双方关系一直在逐步改善，在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解决边界问

①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27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9—32页。
③ 李家忠:《亲历上世纪90年代 中越关系正常化始末》，《湘潮》，2010年第4期，第36—37页。
④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册，第205页。

题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中苏领导人在 1989 年 5 月峰会中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时，两国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稳固的基础。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能够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这一事实证明，中苏关系正常化是经过双方长时期的战略博弈最终将两国关系建立在现代国家关系基础之上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

（《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5 期）

抗美援朝决策

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

——抗美援朝决策研究之一

50 年前中国与美国在朝鲜的战争是两个大国在各自境外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这在二战结束以后至今都是绝无仅有的。双方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目标都经历过明显的变化，有一条类似的变化曲线。美国的目标是从决定进行军事干涉转变为越过三八线、用武力统一朝鲜，再被迫回到基本恢复战争爆发前的状态。中国的目标是从决定抗美援朝转变为越过三八线、将联合国军逐出朝鲜半岛，再到沿三八线地区停战。出现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中美进行的大国间的“局部战争”的必然结果，而“局部战争”（这里指使朝鲜战争成为局部战争）概念的形成，是同双方对各自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的认识、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以及它们同各自同盟国的关系等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的目的是从大国间“局部战争”的角度，比较中美在战争不同阶段的决策。由于上述中美双方的决策均发生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本文将研究集中于这一时期的有关问题。至于最后停战的决策，当然属重大决策，但从开始停战谈判到签署停战协议的两年间，双方和战过程中涉及的问题有其特殊性，需要专门探讨，故不将其包括在本文的论述中。

一、美国决定军事干涉与中国决定抗美援朝

1956 年 6 月 25 日朝鲜族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决定进行全面军事干涉。美国军事干涉持续将近四个月，朝鲜战局出现严重变化，战火蔓延到中朝边界地区后，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中美双方决策的军事背景和性质显然不同，中国出兵是对美国军事干涉的反应。本章是从两国都在本国境外的朝鲜半岛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

角度，对它们的决策进行比较。

1. 美国军事干涉的决策

如何认定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突然爆发的战争的性质，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决心进行全面军事干涉的决定性的和贯彻始终的因素。

早在1949年3月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便做出决定，认为美军应撤出朝鲜半岛，撤出时间不迟于6月30日。① 美国当时决定从南朝鲜撤军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朝鲜半岛在军事上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要不存在苏联在那里实行军事扩张的直接威胁，防守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远在天边的防线"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所以美国决策层决定在两个条件下撤军：其一是苏军撤出北朝鲜；其二是李承晚政权能够维持其统治，并有一定的能力抵抗北朝鲜可能发动的进攻。对于美国来说，第一个条件是绝对的，第二个条件的评估则带有移动的随意性，它取决于美国对来自北朝鲜的威胁的判断。1948年底苏军全部撤出北朝鲜。6月29日，美军按计划全部撤出南朝鲜。同时美国加强了对南朝鲜的援助，并于1950年1月与李承晚签订了防务协定。

无论是基于何种考虑，美军撤出朝鲜半岛都是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的重要标志。1950年1月艾奇逊向美国新闻界发表的讲话明确指出，南朝鲜被划在美国的太平洋"环行防线"以外，没有人能保证它不会受到攻击。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南朝鲜只能靠自己抵抗和联合国的"集体行动"。② 然而时隔不久，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的方针便受到严重的冲击。

自从欧洲发生"柏林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在估计国际形势方面，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全球性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苏联的敌意图谋和可怕的威力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本质"。③1949年8月苏联完成了第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对此反应强烈，杜鲁门于1950年1月31日指示国务院、国防部重新审议美国的防务政策和全球战略。国务院和国防部经过三个月的准备，提出了一份全面系统的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于同年4月下发各部门。这份编号为NSC68和其他一些有关文件声称：世界正处于以美苏为中心的"历史性的权利分

① Burton I. Kaufman, *The Korean War: Challenge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 New York: Newbery Award Records, Inc., 1986, p. 23.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8页。

③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edited by State Department, U.S., 1950, Vol. 1, p. 288.

配”进程中，苏联为了支配欧亚大陆“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或毁灭美国的完整的活力”，“冷战实际上是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绝续的真正的战争”，美国只能“凭着良知和毅力，作出生死攸关的新决定”。[①]

在强烈的冷战意识支配下，当时美国政府中弥漫着危机气氛。美国情报部门也在火上浇油，声称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能力，以致美国决策层相信：“凡是东西方接触的地方”都可以作出苏联在那里发动进攻的判断。[②]这种神经质的估计同样反映到对东亚形势的判断中，不过美国政府当时最担心的是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的局势。[③]4、5月国民党军队相继丢掉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美国政府估计台湾被解放军攻占为时不久。由于中苏条约的签订，杜鲁门政府将中国完成国家统一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归结为苏联扩张的一部分，内部要求采取军事措施阻止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强烈，调门也越来越高。[④]这种呼声同当时美国内麦卡锡主义遥相呼应，终于酿出了麦克阿瑟对台湾战略地位类似“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著名评论，即“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台湾就好比一艘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同时还可以把美国在冲绳或菲律宾的部队的反攻行动完全将死”，所以美国必须要“保台”，“台湾最终的命运无疑取决于美国”。[⑤]可以设想，在这种炽热的气氛中，不论在东亚或东南亚任何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美国都将以遏制苏联为由进行军事干涉。

在一片“狼来了”的喊声中，美国领导人获悉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乎立刻断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否则“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⑥]美军方的反应同样强烈。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军几乎没有打过局部战争，美军头脑中没有“有限战争”的概念。所以他们立即“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苏联“终于决定要决一雌雄了”。[⑦]显然，美国决策层当时根本无法、也不愿意去理解，朝

---

① *FRUS*, 1950, Vol. 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pp. 235–292; Vol. 6, Far East and Pacific, pp. 349–351.

② 哈里·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92—393页。

③ Burton I. Kaufman, *The Korean War*, p. 29.

④ 参阅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7页。

⑤ *FRUS*, 1950, Vol. 7, pp. 161–165.

⑥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394页；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65页。

⑦ 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4页。

鲜战争在最初阶段本质上是一场内战。他们在战争爆发后举行的第一次高层会议上便达成共识，即这是苏联“企图违反协议把朝鲜搞到手”，“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美国必须坚决予以反击。[①]

美国领导人断定朝鲜战争是苏联发动的，使他们迅速决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从6月25日到30日，美陆海空军全面卷入战争，海空军的作战范围扩大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可动用力量的底线划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即可。[②]从后来的发展看后果尤其严重的是，美国的军事干涉从一开始就没有限制在朝鲜半岛。在6月25日晚间的会议上，杜鲁门批准了封锁台湾海峡的建议。第二天，杜鲁门又批准向印度支那地区提供军事援助和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杜鲁门把这些行动统统称为预防性措施，是在“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③]问题在于美国领导人根本无法使人相信，它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军事干预也是“预防”苏联扩张的“措施”，因为那些地区的矛盾与冲突的根源像朝鲜半岛一样极其复杂，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美苏之间的问题。

在争取和动员盟国支持方面，美国是相当顺利的。美国首先是争取联合国相继通过了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然后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促使盟国参与组成了联合国军。美国之所以如此得心应手，主要原因是它是西方阵营的领袖，而且承担了战争的主要责任。联合国军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艾奇逊说得非常清楚，“美国对别国不能有太多希望，他们要么手头上事情太多，……要么拿不出什么东西”。[④]美国肩负着人力物力的主要责任，盟国不过是在壮声势，它们当然也就不会成为妨碍美国军事干涉的因素，甚至不是美国决定军事干涉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2. 中国抗美援朝决策

同美国军事干涉决策相比较，中国抗美援朝决策涉及的问题显然要复杂得多，决策过程长且反复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对美国军事干涉性质的认定外，主要是决策层面临国内困难和受到盟国关系的牵制。

---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397—400页。

② *FRUS*, 1950, Vol. 7, p. 263.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396、400、402页。关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的背景可参阅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④ 《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72页。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抓紧进军西藏和准备解放台湾。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向上，中国显然更重视后者，并在1950年春季开始向越盟军队提供训练和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团等。从解放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领导人的确将美国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这是他们决定与苏联结盟的原因之一。不过中国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他们甚至认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美国也不大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①

在朝鲜半岛，中国基本上置身事外，那里的局面是美苏外交折冲造成的，中国无插手余地和必要。在解放战争期间，北朝鲜曾经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重要的援助；中共也在内战接近结束的时刻，让大批在中共军队中作战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在金日成下决心发动进攻前，斯大林曾要求金日成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很可能知道他的意见并不能起重要作用，所以只不过是建议而已。②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亲自出面，要求中国“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③ 这表明当时中国对朝鲜局势的关注程度。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这一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当北朝鲜取得军事胜利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干涉的抨击主要集中于美军封锁台湾海峡。中国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以革命运动形式进行的统一战争，美国封锁台湾海峡与中国革命的最后努力迎头相撞，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难以容忍的入侵和对抗行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仅在朝鲜半岛使用武力，而且在台湾海峡和东南亚加强军事部署，从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中不难看出，美国的这些军事行动显然被视为对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地区的全面干涉，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发动侵略的借口。④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推迟进攻台湾计划的同时，开始逐步调整军事部署。

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后，中国领导人于6月30日即估计，可能需要推

---

① 参阅何迪：“‘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rate Taiwan, 1949–1950”, *Chinese Historians*, Spring 1992, Vol. 5, No.1。

② 参阅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18—222页。

③ 《斯大林关于中国尽快向朝鲜派出代表问题致罗申电》，1950年7月8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68页。

④ 《周恩来外长斥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声明》，1950年6月28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91—92页。

迟进攻台湾的时间。[1]7月7日，中央军委即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原指挥部署进攻台湾的粟裕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2]8月上旬，随着朝鲜人民军攻势受阻，中国加紧了军事部署。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北朝鲜。"[3]在8月26日的国防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推迟进攻台湾，准备援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4]中国随后开始在东北大规模集结军队，决定在已有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并着手加强东北的防空力量。[5]原准备进攻台湾的第九兵团和开始复员的第十九兵团调至津浦路和陇海路集结。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特别是美军不顾中国的警告，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北侵，使中国领导人认为与美国的战争已经难以避免。周恩来8月26日的讲话反映了中国领导人那时的基本看法，即："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6]这种担心出现"多米诺"效应的看法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多地包含了与美国作战难以避免的估计。如周恩来在1951年4月2日的报告中说："朝鲜事件不过是个借口；不在朝鲜爆发，也将在其他地区爆发，台湾、越南都是可爆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毋宁以朝战最有利"。[7]可以肯定地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全面干预所导致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上述判断，是促使他们决策出兵朝鲜的宏观背景。毛泽东在阐述中国出兵的理由时，始终都强调是国际形势，特别是"整个东方"形势的需要。[8]

---

①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rate Taiwan, 1949–1950", p. 14.

②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④ 周恩来：《充分准备，出手即胜》，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3—45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24—25页。

⑤ 毛泽东：《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⑥ 周恩来：《充分准备，出手即胜》，第43—44页。

⑦ 周恩来：《抗美援朝仍是一九五一年的首要任务》，1951年4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182页。

⑧ 毛泽东：《志愿军人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06—108页；《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3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

中国领导人在决策出兵过程中遇到的最复杂的问题，可能就是与盟国苏联的关系。与美国不同，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不是领导者，也不是一个军事和经济上强大到可以不顾盟国的态度而单枪匹马地与美国作战的国家。特别是它当时在朝鲜半岛既没有参与以往的外交折冲，战争爆发后也没有重大的影响力。目前公布的有关档案证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是斯大林将中国置于一个有限参与者的位置上。[①]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三天后，北朝鲜方面才向中国通报有关情况。[②]

中国出兵决策并不是根源于盟国苏联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7月上旬起中苏之间已经考虑过在朝鲜作战的军事合作问题。[③]从8月下旬，中国决策层开始认真考虑向北朝鲜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并且确实在积极加强必要时与美军作战的准备。实际上斯大林在发出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之前，已经获悉周恩来将发表的国庆讲话的内容。[④]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⑤]罗申后来给斯大林的报告也谈到，过去中国领导人表示过可以出兵。[⑥]所以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影响了斯大林的有关考虑。不过也无庸讳言，斯大林在关键时刻建议中国直接出兵，并要求金日成转向中国请求帮助，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⑦]此后中国决策层有关出兵与否的决定，始终贯穿着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

中国领导人与苏联协调政策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是否出兵和中国出兵后苏联承担何种义务。第一个问题同中国决策层中的不同意见交织在一起。斯大林显然是主张中国出兵的，并且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国领导人施加影响。根据当时中

---

① 有关6月至9月的有关情况，可参阅 Alexandre.Y.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The Cold War In Asia*, Washingtong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5/1996。

②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5页。

③ 《斯大林关于中国在中朝边境集结部队问题致罗申电》，1950年7月5日；《斯大林关于向中国提供空军掩护等问题致罗申电》，1950年7月13日；《罗申转毛泽东关于对中国提供空军掩护等问题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均见《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67、367—368、369—371页。

④ 参阅 Alexandre.Y.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⑤ 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⑥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80—381页。

⑦ 《什特科夫转呈金日成给斯大林的求援信致葛罗米柯》，1950年9月30日；《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电》，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关于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1950年10月8日。以上均见《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第376—379、386—388页。另参阅 Alexandre.Y.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相对地位，可以肯定苏联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毛泽东在几乎是同时接到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建议后，立刻作出了出兵的决定。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详尽地阐述了对战争前景的估计和中国面临的困难。① 由于毛泽东的决定未能得到多数同事的赞同，毛泽东并没有将电报发出。他于第二天向苏联驻华大使说明了决策层的反对意见，包括担心“美国与中国直接冲突”会破坏中国的和平建设计划，以及国内各方面可能的不满。②

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声称美国并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如果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专门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如不介入，“它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③ 大致与斯大林发出上述电报的同时，中共中央经过讨论，也做出了出兵的决定。④ 此时毛泽东等是否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尚不清楚，不过毛泽东显然感到仍然有同苏联协调政策的必要，所以他告诉斯大林中国“是过一些时候再派（兵）”，并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详细商谈”。⑤

中国决定出兵以后，苏联应承担何种义务便成为中苏协调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包括苏联是否根据中国的要求提供援助，以及如不能完全满足中国的要求，在苏联承担何种义务的条件下，中国仍然可以出兵。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认为中苏必须协调行动，苏联有必要向中国提供帮助。⑥10月8日，就在中央军委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和林彪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与斯大林的讨论集中在中国是否出兵和如中国出兵苏联如何提供援助等问题上。在10月11日的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如果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形成长期、严重的威胁并危及东北的经济发展。他甚至提出如果北朝鲜失陷，中国东北应成为金日成流亡政府的庇护所。关于苏联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作战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需要时间作准备，不可能立即出动。⑦

斯大林的决定无疑给中国出兵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不过中国领导人仍然决定立

① 毛泽东：《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1950年10月2日，第106—108页。

②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第380—381页。

③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第386—388页。

④ 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第11页；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第9页。

⑤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第387页。

⑥ 毛泽东：《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1950年10月2日，第107页。

⑦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第9页。

即出兵。毛泽东随后打电报给周恩来，指示他进一步争取苏联做出坚定明确的承诺，包括用租借的方式提供军事装备和苏联空军在两个月内参战。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志愿军最初将主要是进行战略防御和南朝鲜军作战，在苏联空军参战和获得新的军事装备后，再展开对美军的进攻。[①] 斯大林最终表示不能在空军掩护问题上满足中国的要求。[②]10 月 18 日，中国领导人根据周恩来介绍的苏联方面的情况，又一次讨论了出兵决策问题并做出最后的决定。第二天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没有空军掩护和新装备的条件下，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本章分析表明，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干涉与中国出兵朝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过从中美都是在本国境外诉诸战争的角度看，可以说双方决策层都没有将冲突视为仅仅是朝鲜的地区冲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认定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征服”亚洲的第一步，必须予以全面反击，所以它迅速决定进行全面军事干涉。中国则断定，美国的军事干涉从一开始就超出朝鲜半岛，表明美国蓄意在东亚进行针对中国的全面扩张和侵略，中美冲突在所难免，不坚决予以反击便不能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从双方的决策过程看，中国显然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麻烦。中美双方的国力相差悬殊，而且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是其所属国际阵营的领袖，这些因素导致中国的盟国对中国决策的影响远远超过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影响，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决策的难度，中国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与盟国协调政策，有时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不过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它使美国在朝鲜战场不得不面对两个密切合作的大国。

二、越过三八线决策

1950 年 9 月 27 日，美国政府授权麦克阿瑟指挥美军越过三八线，以武力占领全朝鲜，结果终于导致中国决心出兵参战。1950 年 12 月 31 日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此次战役目标是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歼灭敌军主力，为迫使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奠定基础。战役结束时，中朝军队打过三八线并进抵三七线。比较双方在决策过程中如何考虑有关因素和决策的含义，对于研究大国间的局部战争具有特殊意义，

① 《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13 日；《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朝鲜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14 日；以上均见《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

② 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确定的曲折过程》，第 12 页；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第 11 页。

因为从中可以看出，阶段性军事胜利多么容易使决策者改变已经作出的战略决定。

1. 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

美国决定全面干涉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军事干涉的目标。杜鲁门在决定干涉的第二天即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说明，美国的干涉目标是“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去”，“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即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这一意图也清楚地反映在安理会6月25日、27日通过的决议中。[①]

美国初期干涉目标的确定除了受战场形势的影响外，主要是担心军事干涉会进一步扩大为与苏联的全面冲突，同时还担心所谓苏联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欧洲发动突然袭击。所以美国加强监视苏联在其他地区的动向，力避任何刺激苏联的行动。美国领导人也在关注中国的动向，并采取一些诸如空军不飞越朝鲜北部边界进行侦察、不允许国民党军队参战一类的“克制”行动。他们自以为是地相信，在封锁台湾海峡以后，这样就足以避免中国卷入。到7月上旬美国政府作出的各项决定大致勾画出当时美国干涉政策的基本轮廓，即以“联合国行动”的名义进行全面军事干涉，以使朝鲜半岛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

7月下旬随着朝鲜战场形势相对稳定，美国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考虑修订干涉目标。国务院这时倾向于保持谨慎。7月28日，国务院开会讨论政策设计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必须考虑苏联和中国的反应，以及大多数盟国可能不支持武力统一朝鲜，所以应“尽快在可以接受的条件的基础上停止冲突”。[②]显然报告的起草者不主张美军越过三八线。会议经讨论一致同意暂不作出是否越过三八线的决定。国防部则认为，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战略好处甚大，美军随时可以越过三八线，干涉的目标是占领整个朝鲜或夺取40度线和39度线之间包括平壤在内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唯一限制美军越过三八线的条件是苏军直接介入。[③]

8月初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很难听到反对越过三八线的声音了。8月下旬到9月上旬，华盛顿开始为武力统一朝鲜大造舆论。美国政府相继作出了有条件越过三八线的决定，即美国的干涉目标应是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所谓条件则是中苏不直接参战，美军为此应该与朝苏和朝中边界保持距离，不在那些地区作战。[④]与此同时，

---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403、405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85—86、90—91页。

② *FRUS*, 1950, Vol. 7, pp. 449–454.

③ Ibid., pp. 502—510.

④ Ibid., pp. 646–652, 712–721.

美国开始与盟国协商，并争取使联合国通过决议，为美国的行动提供“合法的基础”。在这方面美国照样没有遇到什么阻力。[1]

9月15日麦克阿瑟发动仁川登陆作战，第二天在釜山的美第八集团军开始反攻。出乎预料的军事胜利促使华盛顿迅速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线以北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2]

逐步排除苏联和中国直接干涉的可能性，是美国决定北侵的关键所在。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国领导人认为苏联直接干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到决定越过三八线时，尽管有关的指令无一不规定了苏联介入后的处置办法，但是美国领导人已经基本确定，苏联不会直接进行军事干预。10月2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关于停战、撤出外国军队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3]这显然是在示弱，美国由此可以放心了。

中国的反应是美国政府一直关注的另一个问题。从8月下旬起，中国政府越来越频繁地谴责美国海空军侵犯中国领空领海。随着美军步步向三八线迫近，中国政府开始发出强烈的警告，声明对朝鲜局势不会置之不理。中国政府的声明和中国舆论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决策层的意向，然而美国政府对这种明显的变化不予重视。他们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干预的实力，出兵“纯粹是发疯”。[4]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印度向美国发出明确的警告。不论周恩来的措辞如何，这一行动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5]美国务院接到有关报告后，立即报告杜鲁门和军队领导人。国务院主管东亚和中国事务的部门负责人均认为，应当非常认真地对待周恩来的警告。[6]但美国领导人抱定成见，不相信中国领导人有决心和意志出兵朝鲜作战，他们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看作是“讹诈”和“恐吓”。[7]10月7日美军大批越过三八线，10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出指示，针对中国可能进行的干预，授权后者只要有把

---

① 《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310页。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册，第430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212—213页。

④ 约翰·斯帕尼尔著：《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钱宗起、邬国孚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⑤ 周恩来：《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66—68页。

⑥ *FRUS*, 1950, Vol. 7, pp. 848–849, pp. 864–866.

⑦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431—432页；《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307页。

握取胜就可以干下去，只是在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时必须事先请示。[①]24 日麦克阿瑟下令，取消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只准使用南朝鲜军队进入朝鲜北部边境地区的限制，指示美军可以打到鸭绿江边。[②] 这一决定被证明给美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实行武力统一朝鲜政策之所以招致失败，首先如上所述是因为决策层在中国出兵这个他们自己视为战略性的问题上，判断完全错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过分依赖麦克阿瑟这个战场指挥官的决定，这极大地加重了美国决策层宏观指导上的错误。

仁川登陆成功后，麦克阿瑟在美国决策层成为不容置疑的人物。10 月 15 日，杜鲁门总统不得不亲自前往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向麦克阿瑟请教中国出兵的可能性，并提醒后者不要使他的部队成为脱缰野马，在占领北朝鲜以后不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③] 杜鲁门的担心不无道理，后来麦克阿瑟确实一再突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使用美军问题上的限制，华盛顿却无法加以约束。[④] 志愿军发动第一次战役后，美军的失败已经引起美国决策层严重的不安。情报部门、军方和国务院均提出应该谨慎从事。[⑤] 在 11 月 9 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已经指出了在中国参战的情况下，美国要实现原定的目标是成问题的。[⑥] 但是似乎没有人敢冒犯麦克阿瑟的权威，于是大家一起找到一个借口，说是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很难作出比他更高明的判断。11 月 8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通知麦克阿瑟，华盛顿“拟重新考虑”武力统一朝鲜问题，同时也在考虑政治解决。麦克阿瑟的答复是谴责华盛顿有人企图搞“慕尼黑协定”那样的绥靖政策，并声称依靠现有兵力完全可以对付中国军队，他正在准备发起总攻。[⑦]

11 月 21 日，国务院与军方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对麦克阿瑟的作战方案“忧心忡忡”，既不赞成他分兵冒进，又不敢贸然加以反对。结果这次在关键时刻召开的会议除了表示支持麦克阿瑟的计划外，就是决定派人征求麦克阿瑟对进至鸭绿江以南 10 至 25 英里处建立防线的意见。[⑧] 麦克阿瑟断然否定了不打到鸭绿江边的计

---

① *FRUS*, 1950, Vol. 7, pp. 68–70.

② 约翰·斯帕尼尔著:《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 132 页。

③ *FRUS*, 1950, Vol. 7, pp. 948–960.

④ 约翰·斯帕尼尔著:《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 132—133 页。

⑤ *FRUS*, 1950, Vol. 7, pp. 1101–1106，pp. 1078–1085, pp. 1087–1093, pp. 1117–1121, pp. 1195–1198.

⑥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册，第 453—454 页。

⑦ *FRUS*, 1950, Vol. 7, pp. 1107–1110.《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 319 页。

⑧ *FRUS*, 1950, Vol. 7, pp. 1242–1249.《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 321 页。

划，并于24日发动了全面进攻。25日志愿军发动了第二次战役，将麦克阿瑟的军队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

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两次战役期间，侥幸、盲从和不敢承担责任等一切重要决策之大忌，美国决策层无不具有。既然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中国出兵就是势在必行的，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难以避免。但是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志愿军作战计划看，华盛顿与麦克阿瑟之间古怪的关系和听任麦克阿瑟为所欲为的决策方式，肯定扩大了美军的灾难。

2. 中国决策越过三八线

1950年12月30日，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全面突破三八线。1月8日战役结束时，中朝军队已经全线进抵三七线。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和决定突破三八线同样是同中国的战略目标紧密联系，而中国的战略目标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中国7月上旬即开始组建20万之众的东北边防军，主要是为了加强东北边防。①8月上旬，中国领导人已经注意到朝鲜战局的变化并开始考虑出兵参战，不过他们提出的参战目标比较含糊，即帮助北朝鲜“争取胜利”。②至于“胜利”的含义是什么，在当时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可以做多种解释，很可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也是需要随形势发展而定，上限是北朝鲜完成统一，下限是北朝鲜不被美国占领。随着朝鲜人民军陷入困境，中国领导人对参战决策的紧迫感日益增长，并提出出国与美军作战。按照周恩来8月下旬的估计，朝鲜战争将长期化，朝鲜人民军将主动后撤，而中国军队将承担“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的任务。③显然这时中国领导人考虑的重点还是帮助北朝鲜打赢战争。

但是，当出兵的决定直接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时，情况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甚至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毛泽东在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中国出兵与美军作战的目标就是争取“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他同时也承认，存在不能大量歼灭美军而形成僵持局面的可能性。④毛泽东的估计明显受到前一时期朝鲜局势的影响，对已经出现的

① 周恩来:《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东北边防》，1950年7月10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32页。《斯大林关于中国在中朝边境集结部队问题致罗申电》，1950年7月5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67页。

②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页。

③ 周恩来:《充分准备，出手即胜》，第44—45页。

④ 《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第106—108页。

情况很可能没有仔细斟酌。

由于多数同事的反对，毛泽东未将上述电报发出，而是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国决策层内部反对出兵的意见。[①]尽管这时中国决策层没有就是否出兵作出决定，但是周恩来的外交行动很可能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基本设想。在10月3日与潘尼迦的谈话中，周恩来说明美军不越过三八线是中国出兵与否的界线。中国首要的关注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其次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需要立刻停战和外国军队撤出。[②]这很可能是中国决策层当时的共识。如果考虑到它是在充分估计出兵与美军作战的困难后的共识，对后来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美军会在三八线停步。在随后两天的会议中，中国决策层不仅讨论了是否出兵，而且考虑了出兵后的作战方针。正是在这个阶段，林彪提出了"出而不战"的建议，屯兵于朝鲜北部观察形势。[③]有关的历史资料证明，林彪反对出兵的主张遭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但他关于"出而不战"的设想是否被讨论过，目前尚不清楚。很可能中国领导人当时还没有做最后决定，因为出兵后的作战方针很大程度上取决与苏联协调政策的结果。

周恩来12日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显然在中国决策层造成极大的震动。由于在朝鲜作战无法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是否坚持出兵？如果坚持出兵，应该和能够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是"攻防"兼备的。他们首先是坚持出兵；[④]其次是决定采取稳妥的防御作战方针，既照顾东北边境的安全需要，同时考虑志愿军入朝后的实力和安全。根据毛泽东的设想，志愿军入朝后应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线。如敌攻击则在阵地前歼灭，主要是与南朝鲜军队作战；如敌固守平壤、元山，志愿军则可以不打仗，进行换装备和训练，等待苏联空军参战，"六个月以内再谈攻击问题"。这其实是暂时的"出而不战"或暂时不直接与美军打大仗。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⑤]甚至在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当天，毛泽东仍然要求"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

---

①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第380—381页。

② 周恩来：《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第67—68页。

③ 《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7页。

④ 《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第6—7页。

⑤ 《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朝鲜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均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7—8页。

不说”，志愿军的作战目标是在朝鲜北部“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①]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对参战总目标的阐述也是很有弹性的，他们更多使用的是通过争取军事上的胜利，“使美国知难而退”，这一目标本身就包含着迫使美国在一定条件下谈判解决有关问题。[②]

第一、第二两次战役的胜利促使中国领导人开始调整作战方针，尤其是毛泽东更倾向通过运动战迅速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这种调整直接影响到第三次战役的作战目标。12 月 8 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暂时不过三八线，以便明年春季进攻中歼灭敌有生力量。[③] 毛泽东基于政治与外交方面的考虑，主张应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否则在政治上不利。他所说的政治上不利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美英等国正提出沿三八线停战，以便将志愿军阻止于三八线以北，此时停止作战将给国际社会以承认三八线的印象或误解，不利今后的作战；其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些人不以为然议论纷纷，给中国造成压力。实际上彭德怀也受到来自苏联军事顾问和北朝鲜方面的指责。[④] 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甚至不赞成志愿军休整时间过长，要求彭德怀尽早发起第三次战役。[⑤]

不过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尽早越过三八线，并不意味着他不赞成彭德怀对志愿军面临困难的分析。彭德怀在部署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同时也告诉毛泽东，志愿军减员严重，后勤供应极度紧张，而美国不会马上撤出朝鲜，美军转入防御后态势反而对其有利，因此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⑥] 为了在执行毛泽东越过三八线指示时，尽可能适应志愿军面临的实际情况，彭德怀提出“稳进方针”并告毛泽东，所谓“稳进”即“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⑦] 这是使政治需要与照顾军事上的困难得到较好协调的战役方针，它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毛泽东坚决支持“稳进”，同意“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战役结

① 《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出动目前只做不说的电报》，1950 年 10 也 19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11 页。

② 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1950 年 10 月 24 日；《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1950 年 11 月 13 日；《抗美援朝局势的发展前途》，1950 年 1 月 25 日；《抗美援朝运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1950 年 11 月 25 日；均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75、92、107、114 页。

③ 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54 页。

④ 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形式和作战部署》，1950 年 12 月 21 日；《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1950 年 12 月 29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245—246、252—253 页。

⑤ 毛泽东：《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第 252 页。

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246 页。

⑦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52 页。

束后“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①]

第三次战役的目标是突破三八线和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军。从战役结果看，达到了突破三八线的政治目标，占领了三七线以北地区并控制汉城，但是没有达到大量杀伤敌军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决策层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在第三次战役设计中已经反映出来的速胜情绪，在志愿军打过三八线的激励下迅速发酵。国内舆论高唱“把不肯撤出朝鲜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②]盟国也不断施加压力。金日成反对部队休整时间过长，斯大林也要求允许朝鲜人民军继续向南进攻。[③]

彭德怀坚决反对继续进攻，不同意北朝鲜方面关于美军会很快退出朝鲜的判断，认为志愿军当前的状况已经无法迅速发动新的攻势。他甚至在1月15日致电周恩来，表示不赞成立即拒绝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停战方案。他建议提出有限期停战，以便争取两个月的休整时间。[④]由此可见他对于志愿军的困难估计得相当严重。

毛泽东的反应是相当复杂的。他一方面在军事上坚决支持彭德怀停止进攻、休整军队。他于1月15日亲自打电报给斯大林，详细说明志愿军的计划和面临的困难。他甚至提醒斯大林如不充分准备，“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⑤]一天前毛泽东刚刚向斯大林要求军事贷款，由此也可看出他支持彭德怀的决心。另一方面他也在迁就盟友的要求。当北朝鲜强烈反对彭德怀的军事计划时，他指示彭德怀让朝鲜人民军向南进攻并自行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和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并进行休整。[⑥]以毛泽东性格之鲜明仍须如此妥协，可见他承受的压力之大。

不过毛泽东同时也决定拒绝“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建议。这部分地是因为在盟国的巨大压力下，连停止进攻都如此困难，更何况“停战”了。实际上1月11日，也就是周恩来声明发出的前六天，苏联已经在联大发言反对“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建议案，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⑦]

---

① 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作战部署》，1950年12月21日;《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1950年12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5—246、249—250页。

② 王焰:《第一次较量》，第67页。

③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65页。

④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67页。

⑤ 《毛泽东关于下一步作战行动问题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15日，军事科学院编印:《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第127—128页。

⑥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66页。

⑦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69—370页。

毛泽东拒绝三人小组停战建议也是因为他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不是在此之前），明确提出“解放全朝鲜”的作战目标。[①]需要指出的是，他不赞成持续攻击和追击既是接受彭德怀的建议，也反映了他对作战方针的考虑。毛泽东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非常信任，加之朝鲜人民军以往失败的惨痛教训，这些都使毛泽东力图将他的目标尽可能与战场的实际情况相协调。他的选择是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打运动歼灭战大量消灭美军，迫使其撤出朝鲜半岛，而不是采取长远距离的追击作战和攻坚战。所以他在第三次战役后希望志愿军有较多的时间进行充分的休整，以便发动更强大的攻势。[②]这种考虑使毛泽东没能充分理解彭德怀提出的困难，不愿因接受停火而束缚未来作战和降低对美军的威慑。这是他放弃一次取得外交主动和分化敌方联盟的机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章分析表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是美国根本改变干涉初期的目标、企图用武力统一朝鲜的结果。而在改变战略目标时对中国参战这样的战略问题判断失误，必然导致军事上惨败。志愿军越过三八线有一定的随机性，毛泽东调整战略目标是越过三八线的结果，而不是起因。不过双方的决策过程均表明，在一场有限战争中，阶段性、战术性胜利很容易导致战争目标的扩大，引起难以预期的后果。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境外战争中，最高决策与战地指挥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全局性的影响。美国这一阶段的决策表明，高层决策与战地指挥间古怪的关系给美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反之，中国高层决策与战地指挥保持较协调的关系是志愿军能够在有利时取得较大胜利、在困难时刻减少损失的重要保障。

三、“停战谈判”决策

本文所谓的“停战决策”是指 1951 年 6 月中美双方关于同意开始停战谈判的决策。它同“战争局部化”的概念有密切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所谓的“战争局部化”是不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中国本土，避免引发与中国和苏联的全面战争。在这个条件下，美国可以选择或不选择武力统一朝鲜。中国的“战争局部化”概念不仅是尽可能避免战争扩大到本土，而且包括不准美国在朝鲜北部、尤其

① 齐德学：《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52—153 页。

② 毛泽东：《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1950 年 12 月 26 日；《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1950 年 12 月 29 日；均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249—253 页。

是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美国同意停战谈判的是它最终决定使“战争局部化”因而不得不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的产物。中国则一直将确保“战争局部化”当作力争实现的宏观目标，政策调整是在此前提下进行的。

1. 美国的“停战谈判”决策

中国出兵后，美国实际上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使“战争局部化”，即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在中国参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其二是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这将冒险与苏联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麦克阿瑟是扩大战争派的主要代表。第二次战役后，麦克阿瑟急电参谋长联席会议称，中国军队的作战目标是全歼联合国军，而他的兵力已经难以应付“全新的战争”。他随后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如何对付中国军队已经超出他的职权，这应由联合国作出决定。[①]麦克阿瑟显然是在制造舆论，迫使美国政府允许他扩大战争。美国政府否定了麦克阿瑟的主张。在11月2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都认为，应该从美苏全球对抗的高度考虑在朝鲜的政策。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麦克阿瑟：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已经受到很严重的损害”，目前不得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战争扩大的行动。[②]

11月28日会议不主张扩大战争的倾向是明显的，但是杜鲁门本人坚决认为当前不能示弱。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美国将加强军事力量来对付中国军队，而且“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③]杜鲁门充满火药味儿的声音产生了复杂的反响。一方面是麦克阿瑟强烈要求增加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声称必须“重新制订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④]相反方向的压力来自美国的盟国，它们特别担心战争扩大会削弱美国对欧洲防务的支持，甚至引起苏联在欧洲实施报复。

面对尴尬的两难选择，美国决策层经过反复讨论和与盟国领导人会谈，才大致廓清了政策，即在不损害欧洲防务和不扩大战争的原则下，继续进行战争，直到形成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为止。12月11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确认了上述原

①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United States Senate, Washington: 1951, Vol. 5, p. 3495.

② *FRUS*, 1950, Vol. 7, pp. 1253–1254.

③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Vol. 5, pp. 3543–3544.

④ *FRUS*, 1950, Vol. 7, pp. 1320–1322.

则。[①]

战争时期的决策通常受制于战场的形势。1951年除夕之夜，中朝军队发动了第三次战役，并于4日攻占了汉城。联合国军全线崩溃，到1月8日战役结束时已经被迫撤到37度线附近。中朝军队的攻势使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参战的目标是将美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美国立即采取行动，促使联合国谴责中国为“侵略者”。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上一度陷入动摇不定。在中朝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前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指示麦克阿瑟，由于中国军队有能力将联合国军赶走，华盛顿在必要时将下令美军撤到日本。[②]中朝军队的攻势开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如果他认为撤退可以避免更严重的损失，就可以下令向日本撤退。麦克阿瑟反对给他的指示，声称要守住哪怕是一块地方，也必须扩大战争。[③]

1月12日，杜鲁门召集国务院和军方领导人，讨论如何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命令。这次重要会议的决定首先强调要在朝鲜坚持住，其次是如果依靠现有的力量无法坚持或苏联介入，美军就撤出朝鲜。决定的侧重点是在不扩大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在朝鲜坚持下去。第二天杜鲁门亲自打电报将会议的决定通知麦克阿瑟。美国政府的决定也得到主要盟国的支持。这时到朝鲜视察后回到华盛顿的柯林斯报告说，美军的实际处境比在华盛顿听到的要好得多，目前“重要的是绝对不要提撤出的问题”。[④]

1月25日联合国军开始向北反攻。2月11日，中朝军队发起局部反击。联合国军经历又一次被沉重打击和后撤后，于19日恢复攻势。经过50天的攻防战，联合国军于3月15日控制了汉城，并很快推进到三八线。军事地位的改观使美国政府又一次面临是否越过三八线北侵的问题。国务院显然不赞成越过三八线。艾奇逊在给国防部的备忘录中说，武力统一朝鲜将导致战争扩大到中国，并增加苏联直接介入的可能性，盟国也不会赞成，因此联合国军不应再越过三八线。[⑤]军方领导人认为，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在军事上不能接受。他们认为应将军事问题与政治考虑包括在一项总的政策中，在作出决定前允许麦克阿瑟根据部队安全的需要，在三八线南北两侧采取军事行动。[⑥]

① Ibid. , p. 1520.
② Ibid., pp. 1625–1626.
③ *FRUS*, 1951， Vol. 7, pp. 55–56.
④ *FRUS*, 1951, Vol. 7, pp. 102–105.
⑤ Ibid, pp. 189–194.
⑥ Ibid, pp. 203–206.

国务院与军方为了协调它们之间的矛盾多次召开会议，最终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首先，美国不必要也没有可能用武力统一朝鲜，战争的目标只能是“击退侵略和达到一种稳定的局面”；其次，美军要争取和守住的防线“应当是三八线以北，并且应当是在战术上可资防守的，又是实际上可以得到的”。[①]3 月 19 日国务院与军方的联席会议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有限度越过三八线、攻占并扼守三八线以北从临津江至元山一线的建议。[②]至此美国基本确定了作战目标，即有限度地越过三八线，取得有利的军事地位并迫使中朝方面停战。

华盛顿的决定再次遭到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3 月 20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总统即将发表政策性声明。麦克阿瑟的答复是他坚决反对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并要求允许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不仅如此，正当杜鲁门声明的草案在盟国间和东京总部传阅时，麦克阿瑟于 24 日发表声明称，军事失败是因为他受到联合国的约束，如果允许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地区，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③]他在 3 月 20 日给众议院领袖马丁的一封信中谴责美国领导人说：“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则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了”。[④]3 月 25 日这封信被公之于众。

麦克阿瑟的言论引起强烈的反响。3 月 28 日，中国方面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目的是使战争“持久化和扩大化”。[⑤]美国的盟国们更是高度紧张，它们纷纷要求说清楚，到底谁决定和代表美国的政策。显然，麦克阿瑟的言行已经严重冲击了美国政府的决策，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的言行已经“足以构成对现行政策的挑战”，并有可能颠覆美国的全球战略。[⑥]4 月 9 日杜鲁门签署了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的命令。

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并不等于美国内争论的结束，因为他代表国会中一批人的意见和立场。结果是杜鲁门政府撤掉麦克阿瑟以后，还必须应付国会中共和党人的攻击。不过杜鲁门政府的军政要员也不是平庸之辈，他们相继出席从 5 月 3 日到 6 月 27 日举行的参院外交和军事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成功地捍卫了政府的地位和

---

① 《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 389 页。
② *FRUS*, 1951, Vol. 7, pp. 246–247.
③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Vol. 5, pp. 3541–3542.
④ Ibid, pp. 3543–3544.
⑤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 412 页。
⑥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册，第 532—533 页。

政策，也为“战争局部化”方针争取到必要的共识。

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到国会听证会结束，杜鲁门政府渡过了一场政治危机。它在国内政争中的胜利为其政策转变奠定了政治基础。

谋求停战谈判是“战争局部化”的必然结果。至第五次战役结束时，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部分地区终于控制了一条防线，与中朝军队形成僵持。美国政府开始寻找与中朝方面谈判的途径，4 月间开始考虑通过与苏联接触实现停战。5 月 31 日和 6 月 5 日，凯南先后两次与马立克会谈，并取得进展。[①]

6 月 23 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行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称，苏联认为“朝鲜的武装冲突……也是能够解决的”，“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②] 在确认马立克的演讲代表苏联政府的立场后，国务院与军方于 6 月 28 日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认为，直接与中国政府接触会导致政府之间的谈判，那是不可取的，最好的办法是主动与中朝军队的战场指挥官建立直接接触。当天下午，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发出指令，要求他发表一项邀请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的公开声明。30 日李奇微在战区发表广播声明，美国终于迈出了停战的第一步。

2. 中国的“停战谈判”决策

如果说美国的“战争局部化”方针是逐步明确起来的，中国则完全不同，争取“战争局部化”是决策层自始至终考虑和争取的目标，它直接影响到中国是否出兵的决策，出兵后的作战方针以及确定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周恩来 10 月 3 日同潘尼迦会谈时，明确提出了“使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概念，即朝鲜立即停战，外国军队应该撤退，当时首要的条件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③] 从后来的发展看，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的宏观目标，它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周恩来后来不久所说的，中国出兵就是使战争“局部化”，即不仅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而且不能蔓延到三八线以北。[④]

由于美国一开始就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扩大到台湾海峡，致使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将维护本土的安全寄予美国没有扩大战争的意图之上。美国实行武力统一朝鲜的

---

① *FRUS*, 1951, Vol. 7, pp. 483–486, 501–511.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 511 页。

③ 周恩来：《美军如越三八线，我们要管》，第 67—68 页。

④ 《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第 92 页。

政策和美军越过三八线则使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选择在朝鲜打败或打退美国的干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本土的安全。①

当然，出兵朝鲜同样面临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的风险。毛泽东从决心出兵的时刻便在考虑这个问题，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② 做最坏的准备也是中国决策层决定出兵后的共识。③ 不过这毕竟是准备，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在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前景，或者尽可能地减少受损害程度。他们采取了预防性的外交活动，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也是避免使美国向中国宣战的措施。④ 争取苏联的帮助是最重要的行动。

在 10 月 3 日转达给斯大林的谈话中，毛泽东详细陈明中国决策层内对出兵的顾虑，他们担忧的主要问题就是“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⑤ 斯大林的答复慷慨激昂，他主动提到中苏同盟条约，表示如美国扩大战争（目前可能性并不大），苏联将与中国并肩作战。⑥ 斯大林的承诺对中国决定出兵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周恩来 10 月 12 日从莫斯科发回苏联暂时不能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的信息后，毛泽东用以说服他的战友可以出兵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苏联虽然不能立刻派空军进入朝鲜，但它已经承诺保护中国本土免受美国海空军的攻击。⑦ 在 10 月 13 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了苏联空军保护中国本土的重要性。⑧ 两天后毛泽东再次电告周恩来，表示了同样的关注。⑨ 在争取苏联帮助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全国性的防空准备。⑩

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也是与“战争局部化”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最初设想，中国出兵后将有两种可能的后果，即：(1) 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军；(2) 中美进入

① 《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第 6—7 页。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57 页；《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第 75 页。

② 《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第 106 页。

③ 《彭德怀自述》，第 258 页；《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第 76 页。

④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第 320—322 页。

⑤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第 380—381 页。

⑥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第 386—387 页。

⑦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01.

⑧ 《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第 6—7 页。

⑨ 《毛泽东关于同苏联商谈先调一个空军师来北京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15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10 页。

⑩ 周恩来：《全国防空的准备工作》，1950 年 10 月 31 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84—85 页。

战争状态。在中美进入战争状态也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志愿军在朝鲜歼灭美军主力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宣战；其二是志愿军与美军在朝鲜形成僵持情况下中美进入战争状态。他认为最后一种情况最不利。[①]战争的进程表明，毛泽东设想的情况均未出现，志愿军既未能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美国也未对中国宣战，而是双方在朝鲜僵持。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与苏联的作用有关，苏联保卫中国本土的承诺使美国不敢贸然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苏联不在朝鲜提供空中掩护也使志愿军无法在朝鲜大量歼灭美军。

在确定无法在朝鲜得到苏联的空中掩护后，中国领导人最初制定的作战方针是相当谨慎的，即争取在平壤以北建立二至三道防线，如遇攻击则先同南朝鲜军队作战，在得到苏联装备和苏联空军掩护后再发动进攻，歼灭一部敌军有生力量以迫使美国接受停战，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这种作战方针是建立在使美国“知难而退”的战略目标之上的。[②]很有可能的是，直到第一次战役发起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甚至都没有将美军退到三八线以南作为停战的绝对条件，当时主要的考虑仍然是击退美军的进攻。所以毛泽东在10月23日的电报中提出，在大量歼灭敌军后，即使美军控制包括平壤、元山在内的城市，也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③]在部署第二次战役时则提出，“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④]

取得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后，中国领导人显然考虑过停战问题，并明确提出沿三八线停战的设想。在12月3日与金日成会谈时，中国领导人提出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美国有可能要求停战。中国的停战条件是美军必须同意撤出朝鲜，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这次谈话的内容被告之彭德怀，可以认为它相当于一项重要的原则。从当时苏联方面要求志愿军“趁热打铁”，打过三八线后再考虑停战问题的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就停战问题征求过苏联方面的意见。

12月中旬中国领导人制定了关于朝鲜停战的五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外

① 《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第106—108页。

② 《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均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7—8页。《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第72—77页；《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第92—95页。

③ 毛泽东：《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40—141页。

④ 毛泽东：《同意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部署》，1950年11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98页。

国军队撤出朝鲜”。12月22日，周恩来针对联合国的停战决议发表声明说，谈判的基础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显然，中国领导人这时已经倾向于提高战争目标。如前所述，第三次战役以后，中国决策层对战争前景的估计越来越乐观。1月14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阐述了他对战局的估计，认为今后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美军“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其二是在大邱釜山抵抗到无法坚持下去“方才退出朝鲜”。总之是美军早晚要退出朝鲜。他因此提出春季作战目标就是“解放全朝鲜”，并转告斯大林。[①]

志愿军领导层这时也同样提出，将“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作为“奋斗目标”。[②]不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彭德怀并不认为经过未来一、二次战役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志愿军相当严重地缺乏兵员、弹药和粮食。[③]所以在美军发动进攻后不久，他再次建议提出限期停战并使志愿军向后撤退15至30公里。从彭德怀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时军事决策遭受到政治考虑的严重束缚。[④]毛泽东否决了彭德怀的建议。斯大林也在火上浇油，声称“从国际观点看”不应放弃汉城和仁川，继续沉重打击敌人是“完全合适的”。[⑤]彭德怀不得不执行命令，但是他坚决执行“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仍作长期打算的方针”，同时提醒毛泽东，如进攻不顺利仍有可能后撤。毛泽东又一次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方针。[⑥]

2月中旬志愿军全线转入防御，彭德怀认为已有必要回北京，就战略方针取得共识。21日彭德怀在北京与毛泽东的会谈对于志愿军作战方针的调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在听取了彭德怀的汇报后，开始改变“速胜”的观点，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⑦]3月1日，毛泽东将中国决策层的决定电告斯大林，指出“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的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根据当前战场形势，“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并将“再占汉城，再过三八线，当不免有一番波动，必须预作准备”。[⑧]斯大林显然同意中国领导人的决定，并表示将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3月

① 齐德学：《巨人的较量》，第141-142，152—153页。
②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86页。
③ 齐德学：《巨人的较量》，第153页。
④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69页。
⑤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69页；齐德学：《巨人的较量》，第166页。
⑥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71—473页。
⑦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80页。
⑧ 周恩来：《必须准备长期作战》，《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62—165页。

15日周恩来将中国的决定和斯大林的回复转告金日成。至此中国完成了与盟国的政策协调。3月14日中朝军队放弃汉城，4月初退至三八线地区进行防御。

4月22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此次战役是在判断美军有可能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情况下，未经充分准备而提前发动的。战役方针是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大量杀伤当面敌军，打破敌军登陆作战计划，夺取战场的主动权。至战役结束时，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战线，战争呈相持状态。此后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从以进攻为主的运动战转为积极防御。在这种军事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停战谈判。

从当时的军事态势看，志愿军打到三八线已经超出了出兵时预想的结果，基本上实现了出兵决策时使"战争局部化"的战略构想。与此同时志愿军在军事上的弱点，如无空军掩护，部队机动能力不足，战线拉长后后勤供应极其困难，等等，一时难以克服，还要时刻准备应付美海空军对中国本土的攻击。美军在前两次战役遭到沉重打击后，迅速改变战术，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像前两次战役那样，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总而言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打破军事僵持局面时，争取停战和政治解决不失为一种有利的选择。上述种种很可能是中国决策层内能够迅速就停战谈判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

6月初，苏联方面向中国通报了凯南与马立克会谈的情况。此时金日成到达北京与毛泽东会谈，他们决定准备与美国方面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停战。中国决策层经讨论也认为，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是可以接受的。[①]6月13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中国在停战问题上的立场，即以三八线为界停战，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和台湾问题可以不在停战谈判中解决。[②]斯大林回电表示"现在停战是好事"。[③]在决策层内达成共识和完成与盟国的协调以后，毛泽东终于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④]在李奇微发表建议停战谈判的声明后，彭德怀和金日成于7月1日联名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停战谈判"决策终于付诸实施。

以上分析表明，军事僵持局面的形成是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直接原因。不

---

①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41—742页。

② 《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问题致高岗、金日成电》，1951年6月13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463—464页。

③ 《斯大林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461—462页。

④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506页。

过双方的"停战谈判"决策从根本上说是"战争局部化"的战略指导的产物，而这种战略指导的形成是基于中美双方对各自战略利益的确认和对力量对比的估计。美国认识到，它的战略利益和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不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因此不能不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中国则将防止本土安全受到直接军事威胁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因此既要保护本土不受到攻击，也不能允许自己边境地区存在敌对的军事力量，更不能允许其在那里进行战争。基于同样的理由和对力量对比的估计，中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必定是有限的和局部的。中美战略指导中包含的冲突决定了双方不可避免地要在战争中进行实力较量，而双方"停战谈判"的决策同样也是它们战略指导的合乎逻辑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局部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包括参战者对其战略利益的认定、对力量对比的估计和战争目标的确定，对于认识或预见一场局部战争的规模、一般进程和结局等等，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

越过三八线

——抗美援朝决策研究之二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作战，于1951年元旦突破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防线，占领汉城并进抵三七线。多年来，由于历史档案的欠缺，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决策研究总的说来比较粗糙。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和相关问题的研究——如中国参战决策与参战目标的研究、中国关于停战的外交活动的研究、中国与盟国的关系的研究、中国军事战略的研究，等等——不断深入，一些论著开始从更加广泛的角度，研究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过程与动机，特别是将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决策与中国参战目标、盟国对中国决策的影响等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提出了一些相当重要的观点。[①] 本文试图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疑问，通过探讨中国参战目标的复杂性、志愿军作战方针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盟国关系对中国决策的影响等问题，说明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在军事上是权宜之计，政治考虑是导致该决定的主要因素。

一、中国参战目标："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几乎都不否认，联合国军在10月初越过三八线，是导致中国决心参战的关键性因素。如果这个论点是成立的，那么从逻辑上说，三八线不论

---

① 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2000年8月成都冷战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陈兼：《中国结束朝鲜战争的战略》，《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编印；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河南出版社，1999年版；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

在法理上、心理上还是军事安全的考虑上，对于中国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界限。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三八线具有这种意义，那么是否中国在决策出兵时，就已经将三八线作为可以达到和可以就此止步的作战目标？对此显然不是用是或不是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已经公布的档案表明，中国领导人从考虑参战起，他们提出的作战目标至少是经常变动的，有时看上去甚至不那么清楚确定。

美国宣布介入朝鲜战争和封锁台湾海峡导致中国领导人根本改变了对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抓紧进军西藏和准备解放台湾。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向上，中国显然更重视后者，并在1950年春季开始向越盟军队提供训练和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团等。中国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他们甚至认为，即使解放军进攻台湾美国也不大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①] 在朝鲜半岛，中国基本上置身事外。在金日成下决心发动进攻前，斯大林曾要求金日成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不过毛泽东很可能知道他的意见并不能起重要作用，所以只不过是提出建议而已。[②]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北朝鲜取得军事胜利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干涉的抨击主要集中于美军封锁台湾海峡。但是他们在内心深处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抱持深刻的警惕，认为美国不仅在朝鲜半岛使用武力，而且在台湾海峡和东南亚加强军事部署，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对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地区的全面干涉，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发动侵略的借口。[③] 他们这种认识的形成和加深，是他们决心参战并考虑一切战争决策的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原因。不论是参战还是越过三八线，都是同中国领导人消除美国威胁的决心和意志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领导人在美国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后不久，即开始考虑推迟进攻台湾的时间。[④]7月7日，中央军委即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其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军，原指挥部署进攻台湾的粟裕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

---

① 何迪："'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rate Taiwan, 1949–1950", *Chinese Historians*, Spring 1992, Vol. 5, No.1.

② 参阅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18—222。

③ 《周恩来外长斥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声明》，1950年6月28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91—9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页。

④ 何迪："'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rate Taiwan, 1949–1950", p. 14；《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63页。

委。[①] 8月上旬，随着朝鲜人民军攻势受阻，中国加紧了军事部署。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出兵的设想，即“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北朝鲜。[②]8月中旬东北边防军的任务更加明确，即准备入朝作战。[③] 在8月26日的国防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做出推迟进攻台湾，准备援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的决定。[④] 至于帮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要达到何种目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阐述。中国随后开始在东北大规模集结军队，并着手加强东北的防空力量。[⑤] 原准备进攻台湾的第九兵团和开始复员的第十九兵团调至津浦路和陇海路集结。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9月下旬和10月初，中国领导人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向美国发出不得越过三八线的警告。[⑥] 然而美军置若罔闻，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北侵。中国领导人因此断定，美国将不会停止在东亚的军事干涉。周恩来8月26日的讲话反映了中国领导人那时的基本看法，即：“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⑦] 中国领导人显然在担心出现“多米诺”效应，而且他们的担心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进一步强化。

可以肯定地说，是美军越过三八线导致中国领导人相信，与美国作战将无法避免。如周恩来在1951年4月2日的报告中说：“朝鲜事件不过是个借口；不在朝鲜爆发，也将在其他地区爆发，台湾、越南都是可爆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毋宁以朝战最有利”。[⑧] 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这一判断，是促使他们决策出兵朝鲜的宏观背景，而美军越过三八线则是使他们断定参战无法避免的关键因素。

---

①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63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③ 《萧劲光在沈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8月11日；《高岗在沈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8月13日；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④ 周恩来：《充分准备，出手即胜》，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3—45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24—25页。

⑤ 毛泽东：《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⑥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74页；《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3—45页。

⑦ 周恩来：《充分准备，出手即胜》，第43—44页。

⑧ 周恩来：《抗美援朝仍是一九五一年的首要任务》，1951年4月2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81—182页。

中国领导人决定出兵后，随之而来的是出兵的作战目标是什么？以往的论著比较充分地论述了中国参战的决策动机，大致将其分为国际主义（或扩大些说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等两个方面。[①] 以往的分析是相当丰富的，不过还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在“国际主义”与国家安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确定参战（包括战略的和临时的）目标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如何通过确定作战目标，将两者协调起来的。

从中国出兵决策的过程看，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的，即争取“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毛泽东在提出这个目标的同时也承认，存在不能大量歼灭美军而形成僵持局面的可能性。[②]

实际上，8月上旬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出兵参战时，就提出要帮助北朝鲜“争取胜利”。[③] 至于“胜利”的含义很可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也是随形势发展而定的。随着朝鲜人民军陷入困境，按照周恩来8月下旬的估计，朝鲜战争将长期化，朝鲜人民军将主动后撤，而中国军队将承担“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的任务。[④] 显然这时中国领导人考虑的重点还是帮助北朝鲜打赢战争。毛泽东10月2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的目标，明显受以往判断的影响，他很可能没有仔细斟酌后来出现的新情况。

第二个目标是10月3日周恩来提出的，即恢复战争爆发前的状况，包括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并最终撤出朝鲜半岛。周恩来在与潘尼迦的谈话中说明，中国首要的关注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其次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需要立刻停战和外国军队撤出。[⑤] 从谈话发生的时间看，这很可能是中国决策层当时的共识。显然，三八线在这时并没有被确定为作战的目标，不过可以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确定，它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条“安全线”。 由于周恩来的谈话是在中国决策层讨论过作战困难后的共识，它对后来的决策将产生重要影响。

---

① 以上只是大致分类，有论著也提到其他一些具体原因，在此不赘述。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96年第1期；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沈志华：《朝鲜战争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② 毛泽东：《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06—108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页。

④ 周恩来：《充分准备，出手即胜》，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4—45页。

⑤ 周恩来：《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67—68页。

第三个目标是10月中旬确定的，即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线，“六个月以内再谈攻击问题”。[①]在毛泽东看来，这可能是当时唯一有把握做到的，当然也是有利的。其实林彪曾经提出过“出而不战”的建议，即屯兵于朝鲜北部观察形势。[②]他的“出而不战”的设想是否被讨论过，目前尚不清楚。毛泽东获知苏联不能提供预期的援助后，于10月12日提出出兵到“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6个月后“可攻击美军”。[③]10月14日，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线和先与南朝鲜军队作战的方针。这其实就是暂时的“出而不战”，暂时不直接与美军作战。至于6个月以后的情况，至少也是很难预测的。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即使志愿军在某些条件的限制下只是长期守住这条防线，中国领导人也是可以接受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④]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目标是相继提出的，而且每个决定都有其具体的背景。但是很有可能的是，它们共存于中国决策者心中，相互并不矛盾，或者说有矛盾却至少暂时还可以兼容。这种状况的外在表现就是决策目标的弹性和模糊性。在志愿军参战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弹性和模糊性作出了典型的概括，即通过争取军事上的胜利，“使美国知难而退”。[⑤]其实这正是毛泽东决策特点的体现，即“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目标中的每一个，其实都反映了协调“国际主义”和国家安全等两个方面的需要。这两方面的需要反映在具体的决策中，就是要造成这种形势，即不允许美军（敌对的军事力量）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同时使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朝鲜半岛生存下去。所谓中国决策的弹性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的

---

① 《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朝鲜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均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7—8页。

② 《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7页。

③ 《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6—8页。

④ 《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朝鲜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均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7—8页。

⑤ 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1950年10月24日；《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1950年11月13日；《抗美援朝局势的发展前途》，1950年1月25日；《抗美援朝运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1950年11月25日；均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5、92、107、114页。

灵活选择。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提出将美军驱逐出朝鲜半岛，就是在片面地追求“国际主义”。中国领导人希望能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中国的安全。麦克阿瑟的行动使他们相信，只有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才能从根本上解除美国利用那里侵略中国的威胁，所以说追求这个目标也是追求上述双重目的的一种反映。

二、“取法乎上得其中”

如上所述，中国领导人在出兵作战的目标上保持着弹性和模糊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出兵决策的过程中，不论基于何种理由，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的作战目标呈现向下滑动的曲线，即在考虑可能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逐步降低作战目标。三八线差不多就在这条滑动曲线的中间。中国有句俗话:“取法乎上得其中”，它对研究中国参战后的军事决策应该是有启发的，因为它是中国传统的决策思维的组成部分。

从志愿军进入朝鲜初期的军事行动看，毛泽东明显趋向于提升作战目标，这种提升是逐步但也的确是相当迅速的，而且是在与志愿军领导人的协调中进行的。影响中国决策层迅速调整作战目标的首要和直接的原因，是朝鲜战场形势急剧恶化，致使志愿军无法按照原定方针进行防御作战。

志愿军参战的初期设想如上述，就是“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①] 根据这一设想，志愿军领导人选择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将入朝后的作战目标确定为“在朝鲜北部控制一大块地区”。[②] 具体部署则是争取控制龟城、泰川、德川、宁远到五老里一线，展开积极防御作战。毛泽东甚至提出，志愿军入朝参战“几个月内，只做不说”，由此可见其谨慎的程度。[③]

问题是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他们已经无法进入预定地区，实施防御计划。联合国军占领平壤后，迅速向北进攻。从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中可以大致推测其战略企图，就是迅速占领朝鲜北部边界的战略要点并封锁边界，彻底消除中苏阻止美

① 毛泽东:《志愿军参战目前只做不说》，1950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126 页。

②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3 页。

③ 毛泽东:《志愿军参战目前只做不说》，第 126 页。

国军事占领全朝鲜的机会。至10月20日，即志愿军进入朝鲜的第二天，西线的南朝鲜先头部队三个师已经进抵离志愿军预定防线90—130公里的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一线。东线南朝鲜先头部队一个师则已经进入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此时进入朝鲜的志愿军为四个师又一个团，他们离预定防御地区的距离比南朝鲜军队要远将近一倍。10月21日联合国军从平壤、元山全线向北进攻，志愿军不得不改变预定的作战计划。

中国领导人选择了进攻性的作战方针。毛泽东于10月21日即电告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人，迅速完成作战部署，向南朝鲜军队发动进攻，作战目标是歼灭西线南朝鲜三个师，以达到“转变朝鲜战局”的目的。[①]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具体解释“转变朝鲜战局”的含义。此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打电报给彭德怀等，指示志愿军放弃“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意即放弃出兵前夕确定的作战方针。[②]

志愿军领导人同样注意到朝鲜战局的变化，并相信已经无法实施预定的作战计划。不过在如何应对当前形势和采取何种军事方针方面，他们同毛泽东的想法是有距离的。彭德怀认为，志愿军有可能立即以运动战方式，歼灭部分南朝鲜军队，以此打击联合国军的士气并使其不敢冒进，从而达到争取时间部署防御的目的。[③]10月22日，他打电报告诉毛泽东，志愿军应在半年内坚持防御方针，争取时间准备反攻。所以目前拟议中的战役目标是在歼灭两三个南朝鲜师以后，仍按原计划在元山、平壤以北山区防御，支持朝鲜的游击战争。[④]

毛泽东显然认为彭德怀的计划过于保守，他在随后的回电中提出根本改变志愿军的作战方针。在他看来，由于朝鲜战局的变化，志愿军初期作战可能导致三对变数：其一是如果志愿军取得较大的胜利，联合国军将停止进攻甚至在一些地区后退；反之如果战果不大，联合国军增援迅速，战局将对志愿军不利。其二是如果美空军给志愿军造成重大损失，志愿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反之，如美空军无法造成严重破坏，志愿军则可以通过运动战大量歼灭联合国军，或迫使美国进行和谈，或志愿军逐一攻占所有的大城市。其三是美军大量增兵而志愿军运动战并不顺利，

① 毛泽东：《志愿军打好出国第一仗》，1950年10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28—129页。

② 毛泽东：《争取战机迅速完成战役部署》，1950年10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30页。

③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3页。

④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4页。

将造成志愿军被动和困难；反之，则对志愿军有利。毛泽东决心根本改变防御作战的方针，提出“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①]新的作战方针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远比此前的方针富于进取和进攻性；二是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可以认为其上限包括在具备某种条件的情况下（如美空军作用不大等等）下，通过运动战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下限则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长期作战，争取和谈。

志愿军发动的第一次战役基本体现了毛泽东新的作战方针，不过并没有取得大量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的战果。彭德怀的评价是中肯的，即第一次战役的意义在于稳定北朝鲜的人心和使志愿军可以立足，但是歼灭联合国军有生力量不多，故不能根本扭转战局。[②]实际上到战役结束时，志愿军第42军在东线仍在防御联合国军的进攻。这种情况意味着毛泽东设想的第一、第二两对变数中的有利情况并没有出现，战局将如何发展还无法确定。

第一次战役的胜利以及胜利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决策层对作战方针的思考。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志愿军领导人根据他们对战场情况和志愿军面临的困难的估计，提出了“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的方针，其具体措施是利用山区隐蔽休整部队，同时在内线战略要地构筑工事，待联合国军进攻深入后予以打击。

毛泽东对战局的思考同样受到第一次战役结果的影响。一方面战役的胜利使毛泽东宁愿继续采取运动战的方式，争取迅速大量地歼灭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有限性也明显地制约了他对第二次战役目标的确定。在他的思考中，既然第一次战役未能达到最理想的结果，志愿军的下一个作战目标就应该是争取根本转变朝鲜战场的态势，即经过一到二次作战，将志愿军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③]根据上述改变朝鲜战局的设想，毛泽东于11月初提出，将德川方向作为战略重点，在元山、顺川铁路以北区创造战场，消耗联合国军的兵力。[④]此后不久，他进一步明确，争取在第二次战役中歼灭联合国军七八个团，“将战线

---

① 毛泽东：《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靠的胜利》，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40—141页。

②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76页。

③ 毛泽东：《朝鲜战局是可以改变的》，1950年11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01页。

④ 毛泽东：《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创造战场》，1950年11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94页。

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他声称如此志愿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①]

毛泽东所谓“根本上胜利”并不是为一时鼓舞士气而发，它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志愿军取得战场主动权，具体地说就是要攻占元山到平壤一线。从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作战计划、部署和战役进程看，如果将战线向南推进到平壤、元山正面一线，建立德川、球场、宁边及其以北以西的战略后方，志愿军便造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态势，从而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这也是志愿军入朝前夕确定的战略方针，区别只不过在于，它现在是通过运动战沉重打击联合国军之后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战役虽然是进攻作战，但它要达到的目标却是同出兵前夕的计划相一致的。第二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志愿军占领平壤，基本达到预定的作战目标。

如上所述，越过三八线并不是志愿军入朝初期所争取实现的作战目标，实际上它大大超出了志愿军当时预期的目标。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参战的战略意图和初期作战目标的确定等各个方面考虑，甚至可以说越过三八线不是中国参战后非实现不可的作战目标，中国领导人很可能也是这样考虑的。唯其如此，才出现了发动第三次战役和是否越过三八线的决策问题。

还在12月初第二次战役取得初步胜利和志愿军准备攻占平壤时，毛泽东便提出越过三八线攻占汉城的设想。12月3日在与金日成会谈时，毛泽东分析了战争的发展前景，再次提到战争有可能拖长。不过真正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明确指出，目前已经存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志愿军应该改变既定的作战目标，一方面在占领平壤后争取再占领汉城，另一方面是争取进一步消灭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首先是全歼南朝鲜军队。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调停活动，毛泽东提出了明确的停战条件，即美国承认撤出朝鲜，首先撤退到三八线以南。[②]

从12月3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战局的看法出现两点变化：其一是突出了迅速结束战争的目标；其二是明确了将联合国军退到三八线以南作为停战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认为，美军有可能保证撤出朝鲜半岛，但未必会履行承诺，不过作为停战和谈的条件是它必须撤到三八线以南。这次谈话的内容于第二天转达给志愿军领导人，当然它必然要对他们的决策产生影响。事实上毛泽东的新设想成为中

---

① 毛泽东：《同意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部署》，1950年11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98页。

② 《中共中央致彭德怀并高岗电》，1950年12月4日，参阅《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62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国决策层考虑第三次战役的出发点。

第三次战役的决策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应该在何时发起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领导人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认真研究了他的设想。他们根据战场的情况判断，要彻底打败联合国军，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战争很难迅速结束。他们经过讨论后认为，新的战役最好推迟到1951年春季或2、3月，目前志愿军应该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否则部队很难应付艰苦的攻击作战。[①]

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事后回忆，毛泽东的答复为他们始料不及。后者要求将第三次战役提前到1951年的1月上半月，理由是停止进攻和长期休整，会在西方国家中引起揣测，也会在苏联阵营引起议论。[②]据当时的志愿军领导人回忆，北京的决定使志愿军领导人处境困难，他们不得不反复考虑，如何在战役部署中，协调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的矛盾。[③]

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否要越过三八线。正如提前发动第三次战役相当勉强一样，在志愿军领导人看来，仓促越过三八线作战也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包括部队过度疲劳、战线拉长造成军需供应的极度紧张以及联合国军有生力量损失并不严重，志愿军仍将进行极其艰苦的战斗，等等。12月8日，彭德怀即令志愿军各部向三八线附近的攻击位置挺进。他同时电告毛泽东，如果能歼灭美军第24师、骑一师和南朝鲜军队的两个师，志愿军将越过三八线并争取占领汉城；如果不能歼灭上述几个师，即使志愿军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做。他建议如果形成后一种局面，应在三八线做充分准备，同时派朝鲜人民军深入南方作战。[④]显然彭德怀主张第三次战役不越过三八线为宜。[⑤]

毛泽东再次表示不同意彭德怀的主张，他要求志愿军在新的战役中无论如何要坚决突破三八线。毛泽东主要提出了两个理由。其一是美国正要求志愿军停止在三八线以北，如果志愿军这时将攻势限制在三八线以北，等于在客观上造成接受美国要求的态势，政治上极为不利；[⑥]其二是从未来作战考虑，要打破“三八线在人们

①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1页。

②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2页。

③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2页；另可参阅洪学志：《抗美援朝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④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63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7页。

⑤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7页。

⑥ 毛泽东：《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1950年12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39页。

中存在的旧印象”，保持战略上有更大的选择范围，避免被三八线束缚。[①]

这时志愿军已经面临巨大困难，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踌躇再三。他在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以后，决心通过制订保守的战役计划来协调毛泽东的政治考虑与志愿军的实际困难。彭德怀在部署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同时告诉毛泽东，志愿军减员严重，后勤供应极度紧张，而美国不会马上撤出朝鲜，美军转入防御后战略态势反而对其有利，因此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②]至于部署中的第三次战役，彭德怀指出打败仗是不可能的，但有可能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为了在执行毛泽东越过三八线指示时，尽可能适应志愿军面临的实际情况，他提出“稳进方针”并告毛泽东。所谓“稳进”，即“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越过三八线以后能否控制该地区也要视情况而定，亦即仍有可能退回到三八线以北。[③]

彭德怀的计划是为了协调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的选择，它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毛泽东表示支持志愿军“稳进”，同意“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战役结束后“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④]毛泽东之所以接受彭德怀的战役计划，其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毛泽东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熟谙处理最高统帅与战场指挥间复杂关系之道，而且他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非常信任，加之朝鲜人民军以往失败的惨痛教训，这些都使毛泽东力图将他的政治考虑尽可能与战场的实际情况相协调。

其次，根据国内战争的经验和战争的一般规律，毛泽东更强调在运动战中歼灭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虽然这时他已经倾向于提高战争目标，但是他并不赞成志愿军采取长距离追击作战和攻坚战，而宁愿选择在三八线南北地区，通过运动战大量消灭美军有生力量，迫使其撤出朝鲜半岛。他甚至要求彭德怀放弃派遣朝鲜人民军深入南方作战的计划，使联合国军放心地继续将主要力量置于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从而有利于志愿军予以歼灭。[⑤]

第三，从毛泽东对战局估计始终保持“两种可能性”的结论来看，这时他虽然迫切争取迅速结束战争，但不大可能在内心真的断定迅速结束战争是笃定的。或许

---

① 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作战部署》，1950年12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5—246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6—247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52页。

③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52页。

④ 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作战部署》，1950年12月21日；《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1950年12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5—246、249—250页。

⑤ 毛泽东：《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1950年12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9页。

用“取法乎上得其中”更能解释毛泽东的决策思维逻辑。

正是上述几个方面的复杂考虑，促使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的作战计划，从而保证了第三次战役基本上达到了它所要追求的政治目标，同时避免了在军事上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次战役在军事上没有达成大量消灭联合国军的目的，不过中国却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并且基本保持了应付美军随后发动反攻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实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领导人在两次战役胜利后明显在拉高战争目标，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在志愿军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决定越过三八线作战，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

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在军事上带有权宜之计的特点，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并不意味着非长期占领并坚守相关地区不可。中国领导人在决定越过三八线的同时，便做好放弃三八线以南地区、退守三八线以北防线的准备。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决定越过三八线，对政治因素的考虑远远超过军事上的需要。问题是哪些政治考虑促使中国领导人在志愿军军事力量并不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做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的。

从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的主要考虑之一是中国的政治威望。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不久，由于联合国军再次遭到沉重打击，美国阵营内部开始出现议和的主张。同时一些国家开始尝试通过联合国调停来实现朝鲜停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亚洲 13 国呼吁中国不要越过三八线。[①] 随后它们起草了一份《朝鲜和平方案》，准备在联合国提出。[②] 一些国家驻联合国代表也在私下向中国方面试探停战的可能性。这使中国领导人立即面临是否接受调停。

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在内部多次谈到，经过军事斗争以后，美国有可能被迫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③] 当时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倾向于认为，和谈是可以接受的最现实的解决办法，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在 12 月初认真考虑过停

---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第 321 页。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2, 1950, Korean War, pp. 1488–1489.

③ 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1950 年 10 月 24 日；《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1950 年 11 月 13 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72—78、92—97 页。

战问题。不过在当时的局面下，他们没有接受那些国家的停战建议。

如前所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于12月3日同金日成在北京会谈，讨论了和谈问题。他们认为，谈判的起码条件是美军撤到三八线以南，时机以在占领汉城并歼灭大量南朝鲜军队后为宜。[①]这应该是中国领导人考虑了和谈问题后的结论。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当时战场上的有利形势是基本条件，另外还存在其他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志愿军正发动进攻并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如果在三八线止步不前，将不可避免给国际社会造成中国实际上接受了外国调停的印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美国并没有提出停战要求，反之杜鲁门政府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大量增加军费并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中国领导人作出参战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断定，美国的战争目标是武力占领朝鲜半岛。只要美国政府不宣布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必然会认为，此时的停战建议不论由谁提出，都是美国争取时间重整旗鼓的计谋。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分析的。[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贸然接受调停或停止进攻，将会严重地损害中国的政治威望，使中国在未来可能的政治解决过程中，至少也会处于不那么强有力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国家既不合时宜又欠周到的调停，反而成了促使志愿军非越过三八线不可的重要原因。

其二是中国领导人不能不考虑苏联阵营的反应。12月1日斯大林刚刚向毛泽东发出贺电，祝贺志愿军的军事胜利，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展开攻势。[③]这很难不被中国领导人看作是斯大林发出的信号。这时苏联驻华代表和北朝鲜方面也频频施加压力，要求志愿军继续进攻，打过三八线。斯大林虽然表示，应该尊重志愿军领导人的决定，并批评了苏联代表的态度，但他同时表示向志愿军增加2000辆汽车。[④]毛泽东不会不理解，斯大林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鼓励志愿军继续作战，因为彭德怀坚持谨慎作战的理由之一，就是战线拉长后志愿军运输过于困难。中国领导人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们肯定会认为，如果不越过三八线，中国在苏联阵营中威

---

① 《中共中央致彭德怀并高岗电》，1950年12月4日，参阅《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62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0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第355—358页。

③ 《菲利波夫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1950年10月1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19页。

④ 毛泽东：《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52页。

望同样将受到损害。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证明，上述两方面的政治考虑在他的决策中占据着主要位置。他一再鼓励志愿军领导人放手一搏。在他看来，如果志愿军不越过三八线，“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猜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反之则“影响甚好”。[①]从毛泽东的决定中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威望是何等的重视，这种“重视”也是他的决策动力之一。在重要的决策过程中，任何一个外部因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这个外部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决策者对有关的外部因素是否重视和重视的程度，而且重视的程度往往决定着外部因素影响的实际效果。例如，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这个阶段不那么重视苏联对他们言行的政治评价，苏联方面的某些议论所产生的影响力将是不一样的。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来自苏联的压力和影响的某些特点。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定越过三八线的重要原因。不过从现在已经公开的档案看，直到第二次战役发动之前，斯大林至少并没有公开干预中国的军事决策。根据斯大林最初对中国出兵数量和任务的设想，他认为中国出兵的目标应该是援助朝鲜人民军守住三八线。斯大林在10月1日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中提出，中国至少派遣5到6个师前往三八线，其目的是掩护正在溃退的朝鲜人民军，重新在三八线以北建立防线。[②]在随后不久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战争前景的基本估计，即如果中国出兵与美国“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美国“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③]由此可以推断，斯大林有可能设想中国参战后，将迫使美国放弃武力统一朝鲜，接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公开的档案表明，在中国决策出兵到第二次战役开始这段时间，斯大林并没有提出任何超出以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的设想或要求。换句话说，斯大林这时并不认为中国参战的结果是将美国彻底赶出朝鲜。

12月初13国提出停火草案后，苏联明显地表现出不希望中国接受停火。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利用辞行的机会，向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了解苏联对朝鲜停战的立场。关于是否应该与美国谈判停战的问题上，葛罗米柯表示，美国

---

① 毛泽东：《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1950年12月13日；《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作战部署》，1950年12月21日；《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1950年12月29日。

② 《菲利波夫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1950年10月1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96页。

③ 《冯西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00页。

并没有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当王稼祥询问志愿军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称应该“趁热打铁”。[①] 从葛罗米柯的解释看，很可能这时苏联领导人还没有对志愿军越过三八线问题作出明确决定，但他们显然不希望中国在第二次战役后就此止步。

根据目前公布的档案，苏联在王稼祥与葛罗米柯谈话三天后，开始明确表示志愿军应该越过三八线并占领汉城。12 月 7 日，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了避免在停战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准备向有关国家提出停战的五项条件。周恩来表示希望了解苏联的态度。[②] 葛罗米柯当天即指示罗申转告中国方面，应该在占领汉城后，再提出自己的停战条件。[③] 与此同时，苏共政治局批评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不应建议在朝鲜停战，他应该提出“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苏共政治局认为，当前美国建议停战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来挽救失败。[④]

苏联的上述行动表明，这时苏联同样认为，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应该是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占据有利地位后再提出停战条件。从时间的顺序看，苏联的决定是在毛泽东同金日成 12 月 3 日谈话以后。不能排除苏联领导人是在了解了毛泽东关于占领汉城的谈话以后，才作出上述决定的。但是苏联的决定既可以说是对中国的鼓励，同时也是对中国的压力。特别是在何时和如何提出停战条件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更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没有苏联在联合国的配合与支持，中国是无法解决和谈问题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了解苏联的态度后，立即通知在联合国开会的中国代表，对停战问题不要急于表明中国的条件，应采取拖延的方针。[⑤]

总而言之，中国与苏联在决策越过三八线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最初是志愿军的军事胜利使得中国领导人倾向于提高战争目标；然后是苏联领导人鼓励中国领导人决策越过三八线，并因此反对在越过三八线以前开始停战谈判；再然后是毛泽东虽然了解了志愿军的实际困难，却必须考虑苏联的决定和反应；最终的结果是彭德怀通过制定谨慎的作战方针，大致协调了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之间的矛盾。

---

① 《葛罗米柯关于与王稼祥会谈的日记摘要》，《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118—119 页。

② 《罗申关于中国政府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致莫斯科电》，1950 年 12 月 7 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121 页。

③ 《葛罗米柯关于同意中国政府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致罗申电》，1950 年 12 月 7 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122 页。

④ 《苏共中央政治局第 79 次会议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问题的记录》，1950 年 12 月 7 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122 页。

⑤ 周恩来：《对谈判应取他急我不急》，1950 年 12 月 8 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

最后应该肯定的是，第三次战役基本上是成功的，它使中国处于相当有利的政治地位。后来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善用这种有利条件，这已经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了。

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决策是朝鲜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同中国出兵决策时制订的战争目标的模糊性（或曰弹性）有直接的关系。第二，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是“政治决策”，即主要是考虑政治需要的军事决策，尽管过程极其复杂，从结果看无疑是对中国有利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战争中军事计划经常要根据政治上的需要进行调整。战争决策之所以被称为一门艺术，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政治需要与军事能力之间出现矛盾时，如何能加以有效与合理地协调。这包括协调的机制是否有效，制度的保障是否可靠，以及决策者是否具有协调的智慧和能力。

（《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论“战争局部化”与停战谈判决策

——抗美援朝决策研究之三

本文研究的“停战决策”是指1951年夏季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领导人决定接受美国方面的建议进行停战谈判的决策。目前只能间接地看到当时中国决策层的有关表述，即：“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①]本文的重点是探讨这项政策形成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故在此不对此段话进行诠释。

从1950年10月初决定出兵朝鲜到1951年6月决定与美国举行停战谈判，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决策过程，其中的停战决策具有重大意义。从后来的发展看，尽管停战谈判持续了两年之长，中美在朝鲜战场较量的基本态势却是在1951年6月固定下来的。后来双方反复进行过多种规模的战役，其结果均未能改变沿三八线附近对峙的基本格局。从军事角度看，这种情况反映了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力量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大致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中国领导人在1951年6月决定进行停战谈判，无疑是基于对军事力量对比的实际态势的认知和认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在决定出兵朝鲜和决定停战谈判之间的战争进程中，中国领导人是否考虑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会出现停战和通过谈判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可能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战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及在停战谈判的情况下争取达到什么目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对停战决策的解释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可以基本推断，中国的战争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简单的，即将美军驱逐出朝鲜半岛。中国领导人只不过是在某个阶段面对军事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斗争的结果，终于做出停战的决定。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论著论述了这个观点。[①]也有论著提出基本相反的看法，认为志愿军参战的目的就是打击侵略，“恢复朝鲜和平”，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②]似乎停战谈判本来也是中国出兵的目的，至少也是目的之一。

在本文论述的那个时期，目前可见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资料证明，中国决策层集体讨论抗美援朝的战略问题有过三次。第一次是1950年10月初讨论是否出兵；第二次是1951年2月彭德怀回北京，讨论志愿军未来的战略方针；第三次是第五次战役以后讨论是否停战。三次集体决策都存在不同意见，但相比较而言，中国领导人在第五次战役以后就停战谈判问题达成共识，明显要容易得多。这有可能也是有关这次会议的资料和探讨均不多的原因。

据聂荣臻回忆，第五次战役以后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参加会议的人数不详，但被称为是“中央开会”，应属比较正式的集体决策。与会者多数同意在三八线附近停战，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会议确定了停战谈判的方针。聂荣臻回忆他当时提出的停战理由是值得注意的，即：(1) 占领三八线以北已经达到出兵的政治目的，(2) 沿三八线停战各方也比较好接受。[③]这里指出了中国决策层的两个基本考虑：首先是中国已经达到了目的，换句话说是维护了被定义的基本利益；其次是“各方”可以理解为既包括敌人，也包括盟友。

聂荣臻的回忆大致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据此断定，仅以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五次战役以后战场形势中存在不利因素作为促使他们决定停战的理由，显得过于简单了，毕竟中国在1950年10月面临的军事态势并不能说比1951年5月就要好，他们却毅然决定直接参战。反之，以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作为促使他们决定停战的原因，同样是过于简单的。除了对战场形势的认识外，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促成了中国领导人决定停战谈判。所以，仍有必要对中国的停战决策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以丰富对中国抗美援朝决策的理解。

近年来已经出现的一些论著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④]不过同中国出兵决

① 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362页。Chen Jian, “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 seen i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p. 83–99。

②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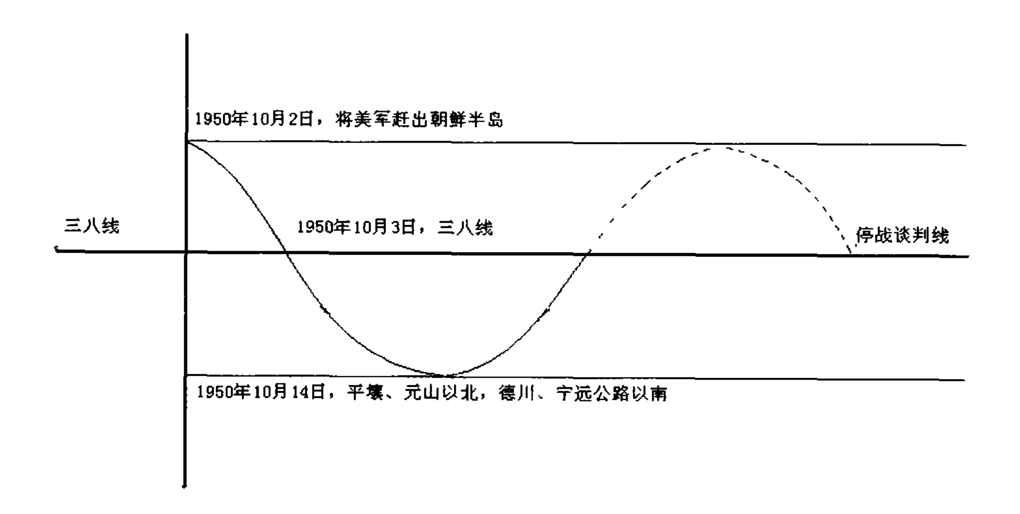
③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41—742页。

④ 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Chen Jian, “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河南出版社，1999年版；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

策的研究相比，仍然比较薄弱，特别是同抗美援朝军事战略研究的结合不够充分。本文拟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疑问，重点探讨中国的军事战略——包括“战争局部化”的战略、志愿军作战目标的制订及其变化等因素——对停战决策的影响。

一、“战争局部化”与出兵前的军事目标

沿着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中国的决策目标有一条明显的变化曲线。如果以三八线为横坐标，这条曲线大致是从上向下滑动，一直到低于三八线；然后是向上滑动超过三八线，以及再向下滑动直到三八线为止（见下图）。导致中国决策目标变化并最终锁定在三八线的原因，固然首先取决于战场上的军事较量。从深层次上看，则是中国在决策出兵过程中已经大致形成的“战争局部化”概念的合逻辑的结果。



以往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地论证了美国企图使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在当时对中国战略利益的威胁和损害，以及中国在决定出兵与美军作战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包括军事上的困难和与盟国苏联之间协调政策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决策层内部在出兵问题上的分歧，等等。[①] 正是基于对各种复杂因素的争论和分析，中国领导人在出兵决策过程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使朝鲜战争“局部化”的战略原则，它大致包括三个内容：其一是尽可能防止朝鲜半岛的战争扩大到中国本

① 参阅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等。

土；其二是阻止美国在朝鲜北部、特别是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其三是使北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生存下去。

“战争局部化”作为中国决策的一个重要概念，最初是周恩来10月3日同潘尼迦会谈中提出的，他当时使用的是“使朝鲜事件地方化”，即朝鲜半岛交战各方应立即停战，外国军队应该撤退。他当时提出的绝对条件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①] 可以说这个概念包含了当时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的战略意图，它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周恩来后来不久所说的，中国出兵就是使战争“局部化”。[②] 从后来的进程看，“战争局部化”的概念直接影响到中国是否出兵的决策、出兵后的作战方针以及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

以往的研究表明，美军企图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于10月初大规模越过三八线，是导致中国决心参战的关键性因素。这一事件导致的结果并非因为其简单就可以被忽略，即它使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打败或打退美国的干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本土的安全。[③] 同样的逻辑，中国领导人必然认为，只有在军事上打败美国的干涉，才有可能实现朝鲜战争“局部化”的战略目标。

毫无疑问，出兵朝鲜同样有可能导致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其风险至少同不出兵同样大。毛泽东从决心出兵的时刻便在考虑这个问题，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④] 做最坏的准备也是中国决策层决定出兵后的共识。[⑤] 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在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前景，或者尽可能地减少受损害程度。他们采取了预防性的外交活动，包括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以避免使美国向中国宣战，[⑥] 以及争取苏联承诺提供必要的援助。

中国领导人争取苏联援助的过程表明，他们当时将尽可能避免朝鲜战争蔓延到

① 周恩来：《美军如越三八线，我们要管》，1950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8页。

② 周恩来：《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1950年11月13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92页。

③ 《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7—8页。《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5页。

④ 毛泽东：《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1950年10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院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⑤ 《彭德怀自述》，第258页；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第76页。

⑥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322页。

中国作为首要的考虑，这也是苏联的援助起码要达到的标准。在10月3日转达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陈明了中国决策层对出兵的具体顾虑，其中主要的担忧就是“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①]斯大林在答复中主动提到中苏同盟条约，表示如美国扩大战争（目前可能性并不大），苏联将与中国并肩作战。[②]斯大林的承诺对中国决定出兵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随后的交涉中，斯大林虽然没有承诺立即在朝鲜半岛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但保证立即向中国本土提供空中保护。这是在得知苏联暂时不能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后，毛泽东用以说服他的战友可以出兵的重要理由之一。[③]在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了苏联空军保护中国本土的重要性。[④]两天后毛泽东再次电告周恩来，表示了同样的关注。[⑤]在争取苏联帮助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全国性的防空准备。[⑥]

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努力是成功的，它使抗美援朝战争最初阶段形成了这样的态势：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向美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时，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没有本土会遭到美国海空军攻击的后顾之忧。

中国领导人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制订的作战计划与“战争局部化”的战略原则是一致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援引的有关历史文献也证明，在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后不久，中国决策层即将美军越过三八线确定为中国出兵的底线。[⑦]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三八线具有这种意义，那么是否中国在决策出兵时，就已经将三八线作为可以达到和可以就此止步的作战目标？对此显然不是用“是”或“不是”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已经公布的档案表明，中国领导人从考虑参战起，他们提出的作战目标至少是经常变动的，有时甚至是模糊的。

---

①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沈志华编：《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381页。

②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1950年10月8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86—387页。

③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01.

④ 《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

⑤ 《毛泽东关于同苏联商谈先调一个空军师来北京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5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0页。

⑥ 周恩来：《全国防空的准备工作》，1950年10月3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84—85页。

⑦ 《刘晓同志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朝鲜与台湾问题的发言记录》，1950年7月9日；《39军党委会记录》，1950年7月，转引自刘统：《中共对朝鲜战争初期局势的预测与对策》，《文献与研究》，2001年第6期，第52—53页。

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的确明确提出，既然出兵朝鲜，就“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当然他也承认存在另外两种可能的不利情况。[①] 有两个因素可能决定着毛泽东的思考逻辑。其一是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有关问题时，前提一直是如何帮助北朝鲜“争取胜利”，而不是像后来做出参战决定时那样，必须考虑如何拯救那个政权。[②] 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美军正乘胜向鸭绿江挺进。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当时恐怕都很难想象，除了彻底打败美军以外，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迫使美国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

在随后的集体讨论中，决策层中几乎没有人赞成毛泽东要出兵朝鲜的想法。10月3日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为避免同美国的战争做最后一次外交努力。从谈话发生的时间看，他表达的内容应该就是中国决策层当时的共识。周恩来告诉潘尼迦：“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他的谈话显示，中国关注的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其次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即恢复战争爆发前的状况，包括美军最终撤出朝鲜半岛。[③] 在这里三八线并不是作为中国军队的作战目标提出来的，不过可以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确定，它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条“安全线”。如果能够基本确定周恩来的谈话是中国决策层讨论后的共识，那么前述聂荣臻回忆就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10月中旬，中国领导人再次调整了战争目标。在10月初的集体讨论中，林彪曾经提出过“出而不战”的建议，即屯兵于朝鲜北部观察形势。[④]10月中旬，毛泽东明确提出，志愿军入朝后，先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线，“六个月以内再谈攻击问题”。[⑤] 这几乎就是“出而不战”的计划，不同的是将防线南推到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和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地区。毛泽东认为这是当时唯一有把握做到的，当然也是有利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将国防线由鸭绿

① 《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周恩来：《充分准备，出手即胜》，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4—45页。

③ 周恩来：《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

④ 《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7页。

⑤ 《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朝鲜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7—8页；《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

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1]

导致中国领导人调整作战目标的因素主要是两个。其一是战场形势的迅速恶化和中国领导人对实际情况的进一步了解。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当中国真正决定出兵的时候，可能是由于对中国军队能否取胜缺乏信心，特别是担心空军大规模参战导致与美国的军事冲突，斯大林在是否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上大步后退。10月10日，斯大林向到访的周恩来和林彪表示，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至少两到三个月内不能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2]

毛泽东获知苏联不能提供预期的援助后，于10月12日提出，志愿军的任务是到“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6个月后“可攻击美军”。[3]10月14日，毛泽东经过与彭德怀等反复交换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志愿军入朝的作战目标，即“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4]在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当天，毛泽东要求“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他甚至进一步含糊了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即在朝鲜北部“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5]

当然，上述变化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本人完全放弃了将美军驱逐出朝鲜半岛的想法，他毕竟还保留着6个月以后同美军作战的选择。但不应过度解读那句话，因为首先它不过是诸多军事选择中的一种，而6个月后出现“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只是毛泽东的设想而已，实际情况是它从来没有出现过。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当时中国决策层的所有战略设想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上，即美军未经严重打击不会自动放弃武力统一朝鲜政策的。这一判断在当时是相当合理的，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据此而准备同美军作战并争取胜利，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而言之，在出兵决策的过程中，不论基于何种理由，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的

---

① 《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朝鲜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③ 《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

④ 《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朝鲜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

⑤ 《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出动目前只做不说的电报》，*1950年10月19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1页。

作战目标呈现向下滑动的曲线，即在考虑可能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逐步降低作战目标，三八线差不多就在这条滑动曲线的中间。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五次战役显然不是中国领导人在志愿军出国之前制订的作战计划中所预定的，甚至不是他们所预期的，由此才能理解后来为什么会一再考虑停战的问题。

二、停战谈判设想的提出

如上所述，在出兵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对参战目标的阐述是相当有弹性的，他们一再提出的"使美国知难而退"就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①]弹性的作战目标无疑应该包含这样的回旋余地，即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中国领导人也的确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周恩来在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不久曾谈到过，在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上，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②]

斯大林当时的看法也有其参考价值。从现有的档案看，斯大林在10月1日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中提出，如果中国向北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人员，哪怕是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北朝鲜军队能在中国军队掩护下，撤到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③]在随后不久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战争前景的基本估计，即如果中国出兵与美国"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美国"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④]由此可以推断，斯大林有可能设想中国参战后，将迫使美国放弃武力统一政策，接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已公开的档案表明，在中国决策出兵到第二次战役开始这段时间，斯大林并没有提出任何超过以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的设想或要求。换句话说，斯大林当时并不认为，中国参战的结果必然是将美国彻底赶出朝鲜。

不过，上述情况只能证明中国领导人考虑到有谈判的可能，这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领导人早就预见到，会出现后来沿三八线停战谈判的局面。况且这首先也不取决于中国方面，志愿军的作战对象美军在遭到第三次战役的打击以前，也从来

---

① 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1950年11月13日；《抗美援朝局势的发展前途》，1950年1月25日；《抗美援朝运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1950年11月25日；均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5、92、107、114页。

② 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

③ 《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1950年10月1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96页。

④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

没有考虑过停战谈判的问题。

从志愿军进入朝鲜初期的军事行动看，毛泽东明显趋向于提升作战目标，这种提升是逐步的，但的确相当迅速，而且是在与志愿军领导人的协调中进行的。影响中国决策层迅速调整作战目标的首要和直接的原因，是朝鲜战场形势急剧恶化，致使志愿军无法按照原定方针进行防御作战。

志愿军参战初期的作战方针如上述，即“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①] 据此，志愿军领导人将入朝后的作战目标确定为“在朝鲜北部控制一大块地区”。具体部署是争取控制龟城、泰川、德川、宁远到五老里一线，展开积极防御作战。[②] 毛泽东甚至提出，志愿军入朝参战“几个月内，只做不说”。[③]

问题是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他们已经无法进入预定地区实施防御。至10月20日，即志愿军进入朝鲜的第二天，西线的南朝鲜先头部队三个师已经进抵离志愿军预定防线90—130公里的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一线。东线南朝鲜先头部队一个师则已经进入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此时进入朝鲜的志愿军为四个师又一个团，他们离预定防御地区的距离比南朝鲜军队要远将近一倍。10月21日联合国军从平壤、元山全线向北进攻。

志愿军领导人注意到朝鲜战局的变化，他们认为志愿军有可能立即以运动战方式，歼灭部分南朝鲜军队，使联合国军不敢冒进。不过当前的战役不应改变原定的方针。[④]10月22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在半年内，我军基本方针是保持长津、熙川、龟城以北地区和长甸河口、辑安、临江渡河交通，争取时间，准备反攻条件。目前我无制空权，东西沿海诸城市甚至新义州，在敌海陆空和坦克配合轰击下是守不住的，应勇敢加以放弃，以分散敌人兵力，减少自己无谓消耗。目前战役计划以一个军钳制敌人，集中三个军寻机消灭伪军两三个师后，以达到争取扩大和巩固元山、平壤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⑤]

毛泽东则认为必须改变志愿军原定的作战方针。在他看来，志愿军初期作战可能导致如下三对变数：

其一，如果志愿军取得较大的胜利，联合国军将停止进攻甚至在一些地区后

① 《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出动目前只做不说的电报》，1950年10月19日。
②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3页。
③ 《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出动目前只做不说的电报》，1950年10月19日。
④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3页。
⑤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4页。

退；反之如果战果不大，联合国军增援迅速，战局将对志愿军不利。

其二，如果美空军给志愿军造成重大损失，志愿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反之如美空军无法造成严重破坏，志愿军则可以通过运动战大量歼灭联合国军。

其三，如果美军大量增兵而志愿军运动战并不顺利，将造成志愿军被动和困难；反之则对志愿军有利。

毛泽东提出“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①]他认为当前“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志愿军应迅速完成作战部署并发动进攻，争取歼灭西线南朝鲜三个师，以“转变朝鲜战局”。[②]正是在调整作战计划的背景下，毛泽东在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第一次首次明确指出，如能大量歼灭美韩军队，就有“迫使美国与我外交谈判之可能”。[③]

志愿军发动的第一次战役固然取得了胜利，不过并没有取得大量歼灭美、韩军队的战果。[④]这意味着毛泽东设想的第一、第二两对变数中的有利情况并没有出现，战局将如何发展还无法确定。

第一次战役的结果明显地制约着毛泽东对第二次战役目标的思考。他坚持志愿军应该经过一到二次作战，将“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个目标将通过运动战迅速大量歼灭敌方有生力量予以实现。[⑤]毛泽东于11月初提出，将德川方向作为战略重点。他强调指出：“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⑥]此后不久，他进一步明确，“争取在本月内至十二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

① 毛泽东：《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靠的胜利》，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40—141页。

② 毛泽东：《志愿军打好出国第一仗》，1950年10月21日；《争取战机迅速完成战役部署》，1950年10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28—129、130页。

③ 毛泽东：《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靠的胜利》，1950年10月23日。

④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76页。

⑤ 毛泽东：《朝鲜战局是可以改变的》，1950年11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01页。

⑥ 毛泽东：《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创造战场》，1950年11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94页。

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他声称如此志愿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①]

所谓“根本上胜利”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志愿军取得战场主动权，具体地说就是要将战线向南推进到平壤、元山正面一线，建立德川、球场、宁边及其以北以西的战略后方，造成进可攻退可守（甚至可和）的战略态势。这也是志愿军入朝前夕确定的战略方针，区别只不过在于，它现在是通过运动战沉重打击美、韩军队之后才能实现。毛泽东称这一设想的实现为“根本上胜利”，是因为控制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如彭德怀在第五次战役后指出，“元山、平壤线必须控制于我手”，否则美军占领该地区将“控制朝鲜蜂腰构成防御纵深对我是不利的”。[②] 毛泽东在部署第五次战役时，也表示这一地区是必须控制的底线。[③] 由此观之，第二次战役虽然是进攻作战，但它要达到的目标是同出兵前夕的计划基本一致的。

本文之所以强调第二次战役作战目标与决定出兵时的确定的作战目标之间的联系或一致性，是因为惟其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中国决策层会就未来的作战目标展开讨论，而这些讨论已经直接触及到“停战谈判决策”这个本文探讨的关键问题。目前还只能从一些间接的资料中，看到讨论的（很可能是）部分内容。

12 月 3 日，即第二次战役取得初步胜利和志愿军准备攻占平壤时，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金日成。目前还不清楚金日成为什么这时访问北京，合理的推断应该是与战局发展有关。毛泽东在会谈中向金日成分析了战争的前景，并像以往一样，指出战争既可能拖长也可能速胜。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调停活动，毛泽东认为美国很可能提出停战。他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停战谈判条件，即美国承认撤出朝鲜，首先撤退到三八线以南。他告诉金日成：“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得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为有力量。美国如果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同意在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不过他根据自己政治经验提醒金日成，美国的

① 毛泽东：《同意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部署》，1950 年 11 月 9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198 页。

② 彭德怀：《关于持久作战方针和今后作战的指导原则》，1951 年 6 月 25 日，《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403—405 页。

③ 毛泽东：《对美英军在几个月内只打小歼灭战》，1951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282—283 页。

“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①]

从12月3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战局的看法出现两点变化：其一是与出兵前后相比，毛泽东明显地乐观多了，他认为已经存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其二是明确提出将联合国军退到三八线以南作为停战的必要条件，时机以在占领汉城并歼灭大量南朝鲜军队后为“最好”。[②]这无疑是毛泽东坚决主张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重要原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始终认为，一切可以接受的前景能否实现，都取决于军事上的胜利，否则即使与美国达成协议也是不可靠的。毛泽东的思考中的这种观点是相当重要的，在当时也是合理的。对美国的极度不信任应该被认为是影响中国停战决策的重大因素。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以往一些研究未予足够的认识。

当时国际环境中的一些因素在这个阶段可能对他的决心产生了更重要影响。当时苏联驻华代表和北朝鲜方面频频要求志愿军继续进攻，打过三八线。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会见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谈到停战问题。后者表示美国自己并没有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而志愿军应“趁热打铁”越过三八线。[③]12月7日，周恩来告诉罗申，为避免在停战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准备向有关国家提出停战的五项条件。[④]葛罗米柯当天即指示罗申转告中国方面，应该在占领汉城后，再提出自己的停战条件。[⑤]与此同时，苏共政治局批评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不应建议在朝鲜停战，他应该提出“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苏共政治局认为，当前美国建议停战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来挽救失败。[⑥]盟国的态度显然在推动毛泽东下决心坚决突破三八线。

12月3日谈话的内容于第二天转达给志愿军领导人，后者的答复表明，他们对战局的估计显然不像毛泽东那么乐观。志愿军领导人认为，要彻底打败美军，必

① 参阅《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62页。

②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62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③ 《葛罗米柯关于与王稼祥会谈的日记摘要》，《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18—119页。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王稼祥询问停战问题的起因。合理的推测是他得到国内的指示征求苏联的意见。当然也不排除他自作主张提出询问的可能性，毕竟他是对国际问题比较敏感的资深外交官。

④ 《罗申关于中国政府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致莫斯科电》，1950年12月7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21页。

⑤ 《葛罗米柯关于同意中国政府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致罗申电》，1950年12月7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22页。

⑥ 《苏共中央政治局第79次会议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问题的记录》，1950年12月7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22页。

须经过艰苦的努力。联合国军的一线部队达20万，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加在一起为30万，不占绝对优势。经过连续两次作战，部队相当疲劳，而且后勤供应不足，西线主力20万人仅有300辆汽车供运输之用，其困难程度难以想象。故战争很难迅速结束，目前志愿军应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否则很难应付艰苦的攻击作战。[①]

毛泽东与志愿军领导人对战局的不同判断当时比较突出地反映在第三次战役是否要突破三八线上。12月8日，彭德怀在命令志愿军各部向三八线附近的攻击位置挺进的同时电告毛泽东，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应该根据战局的发展再做决定。他说："能歼灭伪一、六两师、美廿四师、骑一师，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时，我即将进越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如上述敌人不能消灭，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时，即能越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做。因过远南进，驱退敌至大邱、大田一带，增加以后作战困难，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作战，让敌占三八线。待我充分准备，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人主力。"[②]

邓华在此后不久给彭德怀的信中，表明了他对第三次战役的结局存在几种不同的估计，并倾向于不大可能大量歼灭美军，因此建议应准备长期作战。邓华认为："第三个战役可能打出三个可能：一为敌被迫谈判求和，二为被迫撤出朝鲜，三为安上桥头堡一个（大丘、釜山）或两个（汉城、仁川）。如我能歼灭比上一战役更多的美军，则可能出现第一、二个可能，否则为第三个可能。根据今天情况看来，第三个可能大。因敌有两次经验，且兵力更加集中了。虽如此，我们仍应争取前两个可能，缩短战争时间，于全局有利。……假如打成第三种局面，我意作较长期打算。保留小部分（两三个军）配合人民军并撑他们的腰，广泛开展游击战，来纠缠疲惫和消耗敌人。"[③]

毛泽东没有接受志愿军领导人的主张，坚持志愿军无论如何要坚决突破三八线。毛泽东主要提出了两个理由。其一是美国正要求志愿军停止在三八线以北，如果志愿军这时将攻势限制在三八线以北，等于在客观上造成接受美国要求的态势，政治上极为不利；[④]其二是从未来作战考虑，要打破"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

---

①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1页。

②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63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7页。

③ 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65页。

④ 毛泽东：《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1950年12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39页。

象”，保持战略上有更大的选择范围，避免被三八线束缚。[①]

彭德怀在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以后，决心制订一项相对保守的战役计划，使志愿军既能突破三八线，又不至于陷入困境。彭德怀在部署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同时告诉毛泽东：“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然较前低落，现在还有二十六万左右兵力。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来说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山），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②]所谓“稳进”，即“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越过三八线以后能否控制该地区也要视情况而定。[③]不论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表示赞成支持彭德怀提出的“稳进”方针，同意“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战役结束后“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④]

第二次战役胜利后中国决策层内部对朝鲜战局的讨论表明，中国决策层的确在进一步考虑停战谈判。不过战局的顺利发展使毛泽东本人越来越乐观。他在第二次战役取得初步胜利时，提出起码要迫使美军撤到三八线以南，才有可能进行停战谈判，甚至对迅速迫使美军撤出朝鲜半岛抱有希望。但就中国决策的完整过程看，志愿军领导人的看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为第三次战役制订了稳妥的作战方针，从而保证志愿军在突破三八线的同时，避免了在军事上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中国因此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志愿军也基本保持了应付美军随后发动反攻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实力。

三、停战谈判决策的形成

肯定“战争局部化”战略原则的存在和影响（包括宏观指导意义），并不等同于认为只要确定一项基本合理战略原则，它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就会自动地导致正确

---

① 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作战部署》，1950年12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5—246页。

② 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作战部署》，1950年12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6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52页。

③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52页。

④ 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作战部署》，1950年12月21日；《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1950年12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5—246、249—250页。

的决策。在现实中任何一项合理的战略都不会自动导致在关键时刻作出合理的选择。决策者是否能审时度势，经常是至关重要的。第三次战役结束就是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是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并占领了汉城；另一方面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提出了立即停火的五点建议，其内容接近周恩来12月下旬提出的停战条件，而且不论基于什么理由，美国已表示可以接受。[①] 这种局面导致中国决策层再次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展开讨论。最初讨论的是是否接受“朝鲜停火三人小组”关于立即停战的建议。

第三次战役的目标是突破三八线和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军。从战役结果看，志愿军虽然占领了三七线以北地区并控制汉城，却没有大量杀伤敌军。这本在志愿军领导人的预料之中，问题是在规划第三次战役过程中已经反映出来的速胜情绪，在志愿军突破三八线的激励下迅速发酵。国内舆论高唱“把不肯撤出朝鲜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②]

盟国也不断施加压力。很可能是延续第三次战役之前的政策，1月11日，也就是周恩来声明发出的前六天，苏联代表已经在联大发言，反对“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建议案。[③] 苏联的决定极大地限制了中国领导人的选择余地，因为在何时和如何提出停战条件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几乎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苏联在联合国的配合与支持，中国是无法解决和谈问题的，况且志愿军要依赖苏联的军事援助。这或许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前引聂荣臻回忆中称，停战条件要考虑是否“各方”都可以接受。

彭德怀坚决反对继续进攻，不同意北朝鲜方面关于美军会很快退出朝鲜的判断，认为志愿军已经无法迅速发动新的攻势。他甚至在1月15日致电周恩来，表示不赞成立即拒绝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停战方案。他建议提出有限期停战，以便争取两个月的休整时间。[④] 由此可见他对于志愿军的困难估计得相当严重。

这时的关键是毛泽东本人的看法。1月14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阐述了他对战局的估计，认为今后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美军“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其二是在大邱、釜山抵抗到无法坚持下去“方才退出朝鲜”。总之是美军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67—368页。

② 参阅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69—370页。

④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67页。

早晚要退出朝鲜。他因此提出春季作战目标就是“解放全朝鲜”，并转告斯大林。[①]正是这种看法使毛泽东不愿因接受停火而束缚未来作战和降低对美军的威慑。重要的是这种看法已经开始贯彻到志愿军的军事部署和准备中。这是导致中国领导层拒绝当时“朝鲜停火三人小组”建议的最主要原因，其结果是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取得外交主动和分化敌方阵营的有利时机。

不过，在军事行动方面，毛泽东坚决支持彭德怀停止进攻、休整军队的计划。他的经验使他相信，通过在三八线南北地区以运动战大量消灭美军，而不是采取长远距离的追击作战和攻坚战，就可以达到驱逐美军的目的。[②]所以毛泽东一方面坚持其脱离实际的目标，另一方面却支持彭德怀的军事计划。他于 1 月 15 日亲自打电报给斯大林，详细说明志愿军的计划和面临的困难。他甚至提醒斯大林如不充分准备，“就会重犯朝鲜军队 1950 年 6 月到 9 月所犯过的错误”。[③]当北朝鲜强烈要求立刻发动新的进攻时，他指示彭德怀，让朝鲜人民军向南进攻并自行指挥，志愿军只担任仁川、汉城和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并进行休整。[④]

由于美军迅速发起反攻，导致中国决策层内部再次开始讨论停战问题。应该指出的是，志愿军领导层中这时也存在“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的看法。[⑤]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经过未来一、二次战役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志愿军相当严重地缺乏兵员、弹药和粮食。[⑥]在美军发动进攻后不久，彭德怀再次建议提出限期停战，志愿军向后撤退 15 至 30 公里。[⑦]

毛泽东否决了彭德怀的建议，并再次提高了停战的条件。他要求志愿军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歼灭敌军二三万人，占领三七线以南的大田、安东一线，从而确保稳固地控制汉城、仁川等地，那时谈判将对中朝有利，现在停战则不利，故“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⑧]斯大林也在火上浇油，声称“从国际观点看”不应放弃汉城

---

① 齐德学：《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52—153 页。

② 毛泽东：《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1950 年 12 月 26 日；《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1950 年 12 月 29 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 249—253 页。

③ 《毛泽东关于下一步作战行动问题致菲利波夫电》，1951 年 1 月 15 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第 127—128 页。

④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 466 页。

⑤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 186 页。

⑥ 齐德学：《巨人的较量》，第 153 页。

⑦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 469 页；《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224 页。

⑧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 224—225 页。

和仁川，继续沉重打击敌人是“完全合适的”。[①]彭德怀不得不执行命令，但是他坚决主张“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仍作长期打算”的方针，同时提醒毛泽东，如进攻不顺利仍有可能后撤。毛泽东又一次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方针。[②]

2月中旬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志愿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战。在2月17日发给志愿军各军党委并报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志愿军领导人明确指出：“目前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敌人还暂时占某些优势。”[③]正是这种判断使彭德怀认为，已有必要回北京，就战略方针与毛泽东等取得共识。这时中央军委已经注意到战局变化中的不利因素和志愿军面临的困难，并在考虑志愿军向三八线以北地区撤退。[④]中央军委2月8日起草的给彭德怀的电报表明，毛泽东也开始意识到，在将美国退出朝鲜半岛作为作战目标的情况下，朝鲜战争不可能短期内结束。[⑤]

21日彭德怀到达北京的当天，即与毛泽东讨论了朝鲜战争的有关问题，这次会谈对于调整志愿军的战略方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听取了彭德怀的介绍后，开始改变“速胜”的观点，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⑥]随后几天，彭德怀密集会见其他军事领导人或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介绍、讨论和安排与志愿军作战相关的重大问题。这些活动对志愿军战略方针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中国决策层开始放弃“速胜”思想，并提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

3月1日，毛泽东将中国决策层的决定电告斯大林。这份电报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决策层经过讨论后，对战局和志愿军作战方针的决定。电报说明：志愿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的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根据当前战场形势，“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并将“再占汉城，再过三八线，当不免有一番波动，必须预作准备”。[⑦]斯大林同意中国领导人的决定，并表示将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3月15日周恩来将中国的决定和斯大林的回复转告金日成。至此中国完成了与盟国的政策协调。

---

①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69页；齐德学：《巨人的较量》，第166页。

②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71—473页。

③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255页。

④ 周恩来：《对敌反击的部署与十九兵团的开进》，1951年2月1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54—155页。另参阅《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245页。

⑤ 参阅《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246—247页。

⑥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80页。

⑦ 周恩来：《必须准备长期作战》，1951年3月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62—165页。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提出这个方针明显带有过渡性，它还不能说明毛泽东的看法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因为类似“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说法，毛泽东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前后就讲过。[①]从政策调整的过程看，首先中国决策层仍然将作战目标确定为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所谓“准备长期作战”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其次是没有讨论谈判问题。其原因很可能是在美军在战场仍占据军事优势并正在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时候，中国决策层不认为美国会有意停战谈判，而且他们必然会认为，在这种军事被动的情况下提出停战，将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直到这时都一直坚定地相信，志愿军如果不能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和军事优势，美国不会停战并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这也是他们总是提出要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的重要原因。

4月22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此次战役是在判断美军有可能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情况下提前发动的。战役方针是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大量杀伤当面敌军，打破敌军登陆作战计划，“夺回主动权”。[②]至战役结束时，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战线，战争呈相持状态。第四、第五次战役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志愿军在军事上的弱点，如无空军掩护，部队机动能力不足，战线拉长后后勤供应极其困难，等等，一时难以克服，还要时刻准备应付美海空军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加之美军在前两次战役遭到沉重打击后迅速改变战术，致使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像第一、第二次战役那样，在运动战中歼灭敌有生力量。

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打破军事僵局并建立军事优势，是此后不久中国决策层能够迅速就停战谈判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当时彭德怀显然再次感到，有必要进一步与中央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即派遣邓华及一些重要的一线军级首长等返回北京。

志愿军固然有重新调整军事战略的需要，不过直接导致6月初中国决策层讨论是否停战谈判以及相应地调整军事战略的关键因素，是恰在此时苏联向中国通报了6月1日美国代表凯南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会谈的情况。在这次会谈中，美国方面明确表示希望尽快停战。美国通过苏联转达有意停战的信息，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有价值的。因为中国决策层一直对美国有关停战的种种议论持严重的怀疑，由苏联转达的信息则使中国决策层可以基本确定，美国对沿三八线停战有可能是认

① 毛泽东：《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应后撤休整》，1950年12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9—250页。

②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306。

真的。这一判断对中国决策层当时下决心停战谈判是至关重要的。

6月3日金日成到达北京，与毛泽东讨论朝鲜的军事形势和战争方针。双方决定与美国举行停战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停战。前述聂荣臻回忆的集体讨论，应该发生在6月初这段时间，与会者多数认为，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是可以接受的。[①]6月13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中国在停战问题上的立场，即以三八线为界停战，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和台湾问题可以不在停战谈判中解决。[②]斯大林回电表示“现在停战是好事”。[③]

在决策层内达成共识和完成与盟国的协调以后，中国决策层终于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④]配合“停战谈判”决策的实施，志愿军于6月25—27日召开“高干”会议，决定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至此，停战谈判决策终于形成。在李奇微发表建议停战谈判的声明后，彭德怀和金日成于7月1日联名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结 论

本文的论述已经证明，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后，除了以积极防御为主要特点的第四次战役外，其他几次战役都伴随着对停战谈判的考虑，有关停战的设想和条件也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每次都涉及到战役目标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原因是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的连续进攻作战并不是入朝前所预期的和策划好的作战方式，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了解和判断导致了军事和政治决策呈现出很强的随机性。不过有关的各种意见和决策从根本上说，始终联系着对“战争局部化”和由此界定的战略利益、制定的军事战略的本质的理解、背离或贯彻。因此探讨停战谈判决策与探讨军事决策一样，都必须比较准确地理解中国决策层有关“战争局部化”的概念。“停战谈判”决策形成的过程也表明，中国决策层在不同阶段对战场形势和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认识和判断，在特定的时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741—742页。

② 《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问题致高岗、金日成电》，1951年6月13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463—464页。

③ 《斯大林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461—462页。

④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506页。

而这些认识和判断往往是由复杂的因素造成的，是在持续的争论中形成的。由此观之，一项合理的战略并不必然导致在战略实施的每个阶段，决策者都必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反之，也不应该因特殊阶段的决策失误甚至是严重的失误，便忽视一场局部战争中的战略原则对于指导、认识或预见战争进程的重要意义。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地区问题

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

（1949—1955）

本文的主旨是探讨导致中国亚洲政策的提出、形成和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飞跃性发展的主要内容、动力和过程。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领导人都是在全球战略的层面思考亚洲地区问题的，本文的研究并不否定这个基本判断。不过大量新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外交档案证明，毛泽东等对亚洲地区问题的思考和他们针对此时期与亚洲地区有关的问题制定的政策等等，有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含义。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些政策的形成与实践为中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和空间，中国因此建构起新的国家身份和认同。尤其是对中国外交影响重大的是这种变化加强了中国领导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他们渴望更加迅速地克服与外部世界交往中的战略性缺失和获得更强大的世界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对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苏结盟、中美对抗和主要的事件，对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对亚洲地区政策缺少深入的探讨。冷战、中苏关系与中美对抗、亚洲地区国际体系的变动和中国的内部事务等等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等，固然是中国亚洲政策发生发展的基本背景，也是探讨中国亚洲政策的基本结构。本文试图在这个结构中勾画出中国亚洲政策的轮廓和线索，国内外新外交档案的发现则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条件和动力。

论文的标题是受王正毅教授的启发，他在一次会议中提出"建构'中间地带'"的概念。不过选择"中间地带"作为关键词主要还是基于对历史的重新考察。"中间地带"思想是毛泽东在1946年8月提出的，他习惯性地用形象的语言描述当时地缘政治和世界政治中正在展开的关键变化，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非欧洲大国的兴起以及欧洲的衰落之后，美苏之间的地缘空间中的那些政治力量大致都可以用"中

间的”来概括，并将对世界政治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1954年夏季，中国的亚洲外交进入一个十分活跃的新时期，当时毛泽东重新使用这个概念概括他对世界政治的观察和解释对外政策的调整，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到一个连贯的论述逻辑，故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历史文献重新界定“中间地带”思想的内涵和长期影响。本文论述涉及的东亚和南亚地区并不是毛泽东用“中间地带”概括的全部地区，将这两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那里是中国当时在苏联阵营之外展开外交活动的主要空间。

一、“中间地带”：一种新认同的缘起

20世纪初中国兴起的政治思潮和革命运动都证明，关注中华民族之命运的所有精英基本达成了共识，即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是否能自觉和坚决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其代表者为孙中山之名言：“当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共领导人同样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同世界的联系甚至还要更紧密、更具体。这主要表现为他们笃信，中国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二战以来的世界政治演变尽管极为复杂，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是苏联与各国共产党的命运紧密相关，“反苏”必然“反共”，而“和苏”就会“和共”。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共领导人对国共关系变化的每次判断，都将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状态以及美英法等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作为重要的依据。

抗战结束后，中共领导人仍然认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的政策是反苏反共，国民政府则是“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这种将国共之争视为美苏之争的看法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共与苏联是连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二是中共中央因此需要同苏联协调政策，中共的政策要适应苏联的对华政策。不过到1946年3月东北内战爆发之际，中共领导人的看法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他们当时不再认为中国的形势发展同美苏关系有那么紧密的联系，中共有必要根据新的现实来决定战略和对外政策。从1946年初起，毛泽东就在寻找机会在东北同国民党军队打一场大战以确立中共在东北的地位。3月间，毛泽东下决心不惜通过战争来控制北满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不过党内也有人担心东北大打有可能引起全面内战，甚至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这时丘吉尔刚刚发表富尔顿演讲，有关美英苏再度爆发冲突的国际舆论沸沸扬扬。中共中央因此确实需要解释

世界形势的变化到底对中共的战略将有何种影响，以及中共的政策与美苏关系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

针对上述疑问，毛泽东在 4 月写了一个简短的文件表达他对世界形势的一些新看法。看来他并不十分有把握，所以文件当时仅限部分领导人中传阅。他说苏联同美英法之间的关系是妥协为主，尽管目前妥协还不会很多。更重要的则是大国之间的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同美英法“做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特别是苏联同美英法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换言之，中共中央不必为了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而不断对国民政府做出让步。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等对冷战与中国革命运动之关系的认识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信号。

全面内战在 6 月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开始用“中间地带”这种话语进一步阐述他的上述看法。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首次使用“中间地带”来概括他对世界政治的新观察，此后不久又据此对世界政治做了与众不同的系统阐述。他当时描绘了一幅这样的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图景：在“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即“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在毛泽东看来，“中间地带”有两重属性。从地缘角度看，那片地方处于美苏之间而且“极其辽阔”；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里的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两类，它们中的每一类都力量不足，但加在一起则数量极为庞大。毛泽东认为，3 月以来美国进行反苏宣传是在施放烟幕，它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所以，只有“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扩张，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战争。根据这个逻辑，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就是美国到处侵略扩张和“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对美国的斗争，“美苏之争”自然也就不是中心、也不是最重要的了。

11 月 21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三人在延安枣园开会。当时由负责宣传工作的陆定一做记录，这表明他们是打算宣传这次会议中提出的观点的。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概要地阐述了“中间地带”思想。他说现在世界分成了三块地方，即美国、苏联和美苏之间，其中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中共革命因此而“与世界有紧密的联系”。他还估计，未来的发展很可能是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就像二

战爆发以前那样，反正就不可能是美苏矛盾占据世界政治的中心。经过在这个小范围达成共识后，毛泽东指示陆定一专门写一篇文章阐述上述新见解。

陆定一很快完成了初稿。该稿经毛泽东两次批阅以及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等阅后表示同意，于翌年1月4日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该文集中阐述了“中间地带”思想的核心，即“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人民与美国反动派的矛盾，是英美矛盾和中美矛盾”，那种关于世界政治中“美苏矛盾是主要的”等等观点，则是“中外反动派的武断宣传”。在这样的论述逻辑中，中国革命在世界政治中地位大大上升，属于决定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一部分。中共中央因此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中共推行更为激进的政策符合世界政治的大潮流。

毫无疑问，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思想首先是为了中共战略转变的需要，既然中共中央选择了战争解决问题，就必须回答同战后一个时期以来的情况相比，世界政治的新特点是什么，以及中共的战略选择同世界政治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描述其实是很实用的，他对世界政治的本质的论述远不能说是准确和完整的，但都满足了中共战略转变的实际需要，而且这些论述还是把握住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中共可以走自己的路，因为不论美国和苏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和对抗达到何种程度，它们实际上都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介入国共内战。

不过从更长远的影响看，需要指出“中间地带”思想中包含着一种新的认同的萌芽，其核心是包括中国革命运动在内的民族和革命运动有着比大国政治更为重大的影响和意义。根据陆定一文章的论述，正在形成一个“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它包括“美国的人民，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等“十几万万人的极其巨大的队伍”，这“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新的一页”。文章没说苏联是这个“世界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尽管肯定了它会给予“同情和支援”；中国则与苏联不一样，“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运动，是这一段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一部分”，中共应该“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革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大幅上升，他说“打破了德国，来了英法左倾，打破了日本，来了中国革命”。这就像一次大战后出现了苏联一样。后来的发展证明，这种新认同既然萌发，便不可避免地开始影响中共领导人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判断，以及影响后来中国对亚洲的政策。那个地区是“中间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主要的地缘政治舞台。

之所以说“中间地带”思想中包含的只是一种新认同的萌芽，是因为“中间地带”思想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就延续了一年时间。到1947年9月，欧洲九

国情报局会议召开以后，“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在毛泽东的话语系统中一度消失了。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及它立即公开宣布世界已经划分为两大阵营，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借此公开宣布它将担当起世界反美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指出，当前各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错误倾向是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计美国集团的力量。各国共产党只要不怕美国的战争恫吓和讹诈，就可以挫败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任何计划。这一论述显然非常有利于中共中央的战略决定和克服中共党内的“恐美”思想或倾向。所以，自从共产党情报局的《宣言》发表以后，中共中央很快接受苏联的观点，宣布世界已经划分为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以及苏联是和平民主阵营的领导者，等等。毛泽东还充分发挥《宣言》对世界形势的论述，宣称全世界反美力量超过了美国及其阵营的力量，以及中共“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不过，毛泽东此时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分析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在“中间地带”思想中，中国革命是处于世界政治中心的，虽然还不是唯一的中心。情报局《宣言》则断言，世界政治的中心仍然是在美苏之间，美苏之争的中心还是在欧洲。《宣言》几乎没有涉及中国革命和中共，而中共也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在苏联看来，中共算不算共产党都还是个疑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立即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的论述是有选择性的和很实用的，尽管他们知道“中间地带”在地缘和国际政治两方面的确切含义是无法同“两大阵营”协调起来的。

革命民族主义的激扬是这个时期中共战略思考的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同样也是毛泽东“中间地带”思想的一股源头活水。二战胜利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再次蓬勃兴起，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诉求，就不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实际情况是在中共的政治动员中，民族主义的确被证明是最行之有效的法宝之一，特别能在革命队伍中激起昂扬的斗志、献身的热情与无所畏惧的勇气。这个时期中共革命民族主义在追求民族解放这一点上与以往并无不同，同其他政治集团相比本质上也无不同，它的突出特点在于针对列强在东亚以《雅尔塔秘密协定》为基础构建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冲撞直至根本性的革命与颠覆。这一特点在抗战刚结束时就表现出来，“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则是第一次用中国话语进行理论化的尝试。

伴随着中共的战略转折，中共的革命民族主义进入新的高潮。194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军队转入战略进攻后的部署。这次会议决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布接受情报局《宣言》的观点。不过毛泽东的很

多论述内容与其说是在迎合苏联对世界政治图景的新描述，不如说是在继续为中共的战略做论证。会议期间的讨论反映出党的领导层存在不同的意见，与会干部中有人认为仍然存在爆发大的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等等。毛泽东则有针对性地重申了他在1946年4月那个短文件中提出的观点，特别是批评一些中共干部“谈帝国主义就好像谈虎色变”。他说那是一种精神作用，“中国多年与帝国主义斗争，遭受失败，故精神有些害怕”。特别是他指出“恐美”在苏联也有，“喜欢美国罐头，喜欢美国纸烟，对伟大的现实看不起，这就是由于战争受了创伤，精神上未获解放，怕纸老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热衷走议会道路而导致革命力量遭受挫折。毛泽东还流露出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的赞赏。他以南共领导人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期间强硬批判美国为例，暗示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的发言有些软弱。对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运动是首要的，他无非是要使中共指战员获得一次精神解放，但他对南共的赞扬和对苏共的暗指显然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苏南关系破裂后他一度被怀疑是中国的“铁托”。更重要的是中共革命所包含的革命民族主义诉求使毛泽东在涉及中国世界地位的问题上不可能同苏联始终保持一致。

二、“一边倒”中的亚洲政策定位

论述“中间地带”思想的缘起以及它与“两大阵营”理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要否认后者对中国外交的历史性影响。本文要做的是将焦点从中苏结盟与中美对抗等等转向“一边倒”对中国亚洲政策的影响。这个影响的核心就是在建国伊始，毛泽东等即将承担亚洲革命中心的重任确定为亚洲政策的重要目标。

有关中苏同盟的研究聚焦于1949年2月初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对中苏结盟的意义时，几乎都忽略了后者向中共中央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即斯大林有意让中共担当起东亚革命运动的领头羊。此后一直到毛泽东建国后访问莫斯科的历次双方高层交往中，这一直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话题，其结果对中国亚洲政策的影响巨大。苏联对外政策转上冷战轨道之后，斯大林试图更积极地推动亚洲的革命运动，苏联有关部门开始在亚洲寻找合适的代表。他们最初并不是很关注中共的地位，这同斯大林对中国局势的估计有关。这种情况持续到1948年春天，中国内战局势的急剧变化、苏联与中共在东北关系的发展以及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电报联系，等等，导致斯大林决定让中共承担亚洲革命中心的重任。

米高扬向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地转达了斯大林的上述意图。他在强调中国革命的亚洲意义时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必谦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具有历史意义，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代表苏共中央建议中共“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并询问“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是否有可能。毛泽东当时表示同意并说要争取“尽早成立”。他说“我们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联系紧密些,同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然后双方还谈到具体的步骤，毛泽东表示希望在中共军队占领华南并等局势稳定后再讨论。此后毛泽东的确同斯大林探讨过组建共产党东亚国家局。这是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导致的一个重大的事态，其关键是使中共领导人相信他们从此要承担起东亚革命运动中心的历史责任。

在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领导人之间至少谈论过中共在东亚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这时是相当谨慎的，这同他的主要思考是一致的，因为他刚刚告诫说“务必使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很明确地说，中国革命是20世纪可比肩于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不过他不赞成王明说他的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提出了这样几个理由：第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域宽阔，这样定义好像“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第二，如果有的国家不听中国的，“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第三，“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毛泽东这时还是谦虚的，不过他列举的理由中并没有完全否认中国革命在亚洲地区将拥有首要地位的内在逻辑。

在刘少奇7月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本人亲自说明希望中共成为东亚革命运动的中心。他明显地突出了东亚和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向刘少奇描述了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断从西方向东移动的历史过程，即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世界革命从欧洲“移到东方”，即俄罗斯，“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他说中共有“很高的地位”，因此“责任更大了”。会谈中，随同刘少奇访苏的高岗提出中共参加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国家不同，一是“中国是一个长期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同东欧的不同。他建议组织一个“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因为“在东亚各国有许多情形是和中国相同的”，即

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东亚是有普遍意义的，苏联也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可以推断，斯大林这些评价会极大地强化中共领导人对东亚地区革命的认同和责任感，他们看来是乐于接受这种使命的，尽管他们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还不准备采取重大的行动。当时，至少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已经开始从东亚革命的角度考虑问题了。刘少奇当时专门就东亚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给斯大林写过一个报告，他直言不讳地说，报告中的建议是“根据中国的经验”。

建国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公开宣布愿意承担亚洲革命领导者的义务。建国仅45天，亚洲和澳洲工会会议就在北京召开了。刘少奇担任这个会议主席团的主席并致开幕词，他豪迈地宣布中国革命的经验和道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有普遍性的，即“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的道路”。他在会议期间还发表讲话说，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就意味着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也就大大地加重了”，“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而且“这是一种光荣的责任”。刘少奇的两篇讲话逻辑清晰，显示了中共领导人的地区认同、角色理解和对支援地区革命的相当明确的义务感。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同斯大林讨论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的局势，中苏决定结盟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从莫斯科回到北京。10天后，刘少奇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有关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这种时间上的连接至少表明毛泽东和斯大林就社会及亚洲的问题达成了某种共识。刘少奇在这个指示中写道：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共应给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等“兄弟般的帮助”，“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表现出“冷淡和骄傲”。这是“一边倒”严重影响中国处理亚洲事务的认知与态度的标志性事件，它表明中国领导人愿意承担东亚革命中心的重任。

以往的研究都忽略了“一边倒”对中国领导人理解何为外交的直接影响。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建国后的外交任务“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友谊”；另一方面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国家机器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它的对外功能就是“联合各兄弟国家，联合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反对敌视新中国

的国家。比较毛泽东访苏期间中国领导人分别处理同越南和印度建交问题是有意义的，这两个案例对于解读“一边倒”的影响相当典型。

新中国成立不久，越共中央即派遣李班、阮德瑞秘密使华，争取军事援助和恢复中越两党高层直接联系。中共中央当时希望越共能协助阻止国民党军队败逃到越南境内，并考虑向它们提供军事援助。不过双方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12 月 24 日，刘少奇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电告云南局势时说，越共代表明确提出希望中国提供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并要求互相给予外交承认。他告诉毛泽东，政治局开会认为在法国没有承认中国之前，与“胡志明建立外交关系是可以的，利多害少”。至于“害”是什么电文中没说，只是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当天即回电要求刘少奇转告越共，“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公开来华，中方“予以公开欢迎”。刘少奇接电后即通知越方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来北京”，不过他明确提出“应秘密地来到中国，不应公开”。此后双方很快就建交问题达成一致。1 月 15 日，越共中央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承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周恩来 3 天后回电，宣布与胡志明的共和国建交。19 日，《人民日报》以《东方民族解放斗争的新胜利——祝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为题发表社论高调予以肯定。胡志明则已经踏上亲赴北京求援的旅途。

1 月 25 日，胡志明到达武汉。直到这时，刘少奇才从中南局的来电中知道，到访的越南“负责任的”代表竟然是胡志明本人。他感到兹事体大，因为这毕竟是要接待第一位国家元首。他立即指示中南局只在党内表示秘密欢迎，善加款待后“周密护送来京”。第二天即电询毛泽东，对胡志明本人来访，北京是否要公开欢迎，毛泽东复电表达了极大的热情。他要求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等都应前往车站迎接，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并希望胡志明能等他和周恩来回京后举行“峰会”。28 日，刘少奇转达胡志明的一封电报，后者提出打算秘密访问莫斯科。这样做的好处对胡志明是显而易见的，他可以一举实现中越“峰会”和苏越“峰会”。

1 月 30 日，胡志明到达北京。北京的领导人并没有公开到火车站热烈迎接，刘少奇只派杨尚昆到车站接人，以便继续保密。当天晚上，刘少奇设宴招待胡志明并随后举行了会谈。胡志明对他想要获得的援助是富有想象力的，他甚至提出要得到飞机，等等。刘少奇表示愿意满足越方大部分要求，具体方案要同毛泽东商量后确定。会谈后，刘少奇打电报告诉毛泽东，胡志明是光脚走了 17 天才进入中国，知道如去莫斯科往返要个把月，便打算取消这个行程，而且为见到毛泽东而在北京

等一个月亦"认为不可能"，那样会耽误革命工作。毛泽东立即回电力邀胡志明访苏，他说斯大林经劝说已同意立刻接待胡。为了能使胡志明顺利成行，毛泽东说服了斯大林派飞机到北京接驾。

胡志明于2月6日抵达莫斯科，访问期间他有机会被斯大林接见，从披露的会谈内容看，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因为斯大林已经将援越抗法的重任交给中国，毛泽东也已经毅然承担起这个重任。2月16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胡志明借参加宴会的机会，向斯大林提出越共也与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斯大林除了高度赞扬胡志明很有智慧，其他未置可否。不过不管怎样，越南已经被带到苏联阵营之中。

在同一时间，毛泽东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处理与印度建交问题。建国前后，中国领导人将刚独立不久的印度视为国际反动势力的一部分。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印度政府被定义为"反动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合作者"。对印度的这种负面评价因当时印度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而愈加强化。1949年12月16日，缅甸政府致电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莫斯科打电报告诉周恩来，要求对方"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相关问题，他说"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而谈判则是为了保证"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毛泽东的复电既有对缅甸政府的阶级定性，也包括了要求对方派代表谈判的真正目的。21日，周恩来在回电中表示很同意毛泽东的主张，通过先谈判再建交来"取得主动"，"并可在谈判中适（原文如此）宕时间"。他当天即复函缅甸政府要求举行建交谈判。此后不久，印度政府亦表达建交意愿，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照此办理。

1950年1月17日，刘少奇电告毛泽东，尼赫鲁本日发来一电表示，唯有同意两国已经建交并采取实际步骤"才能进行有效谈判"，即先建交再后谈判。此后刘少奇就此事再电毛泽东，提出对印度来电的答复方式，并认为处理方式会涉及同英国的关系。20日凌晨1时，毛泽东电告刘少奇他同意给印度的答复，但对英国的答复"应当拖一下"。显然是因为对刘少奇转达的外交部一些人的看法不满意，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他们"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因为"主动权完全握在我们手中"。他当天晚些时候又发给刘少奇一封电报，专门解释要求与印度等国家谈判建交就是为了拖延时间，谈判无非是"出些难题拖延时日，表示我并非急于要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附属国建立外交关系，相反地倒证明这些国家是在急于要钻进来"。他还认为拖住它们的好处是"同时也可使美帝国主义集团推迟其钻进来的时日"。毛泽东将这些国家主动提出与中国建交等看作是想要"钻进来"，既然将印度定义为

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也就适用于中印建交。在中国政府举行的一些活动中，也特意不邀请印度代表参加，以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区隔。中国于4月1日同印度正式建交，导致中国很快做出决定的主要原因是解放军已着手准备向西藏进军。

此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先后做出了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的决定，它们无疑是中国亚洲政策形成过程中有长久影响的事件，对此已有不少专门的研究成果，故不赘述。当毛泽东在中南海同时指挥志愿军对联合国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和越南人民军对法军发起边界战役时，可以想象他心中多少会有“亚洲革命中心”的感觉。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经验在亚洲具有普适性的信念在很长时间里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亚洲政策。

三、重返“中间地带”

从建国直到1955年4月亚非会议召开，与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是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这种近乎停滞的发展状况固然同美国的遏制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影响中国同亚洲新兴国家关系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包括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边界领土争端、华人华侨，等等，而中国领导人当时完全没有同这些国家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他们既没有到过那些国家，也没有直接接触过那里的领导人。不过也有必要指出，“不承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政策被继续贯彻和中国领导人对外交本质的理解等，是至关重要的“内因”。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调整对外政策、美国军事遏制造成的安全形势严重恶化以及国内实施“一五计划”等重大事态的发展，推动中国亚洲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朝鲜停战则是重要的契机。

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和中国领导人将关注转向国内事务后，他们已经在思考对亚洲新兴国家的政策。当时中国除了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同美国对抗之外，对外关系需要有新的发展领域，首先就是发展与周边亚洲国家的关系。诚如他们最初交往所获之心得，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外交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修改了此前对“国际统一战线”的一贯阐述。他说区别不同国家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而不是国家的阶级属性，他还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问题：“外交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他的回答是“就外交工

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在今天看来是简单明了的结论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在苏联阵营国家之间，执政党间的党际关系是决定性的，通行的国家关系准则被称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并不能被运用于与其他类型的国家关系中，当然历史也已经证明，即使是在苏联阵营国家之间它也是不可持续的。中国领导人有必要为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相处找出行得通并被广泛接受的原则。

首先是中印关系的发展为中国调整亚洲政策注入了重要的动力。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西藏局势逐步稳定，中印之间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随之凸显，双方不断就印度在西藏一些地方驻军、印度外交人员的特权等等进行具体交涉。1953 年 9 月 2 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提出双方就中印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三天后，印度外交秘书面交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一份备忘录，提出“尽快商讨所有待决问题”，认为过去的经验证明，“零星考虑个别问题不能引导向圆满解决”。10 月 3 日，赖嘉文再次向袁仲贤面交一份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乘最早的机会”解决两国在西藏地方面临的问题。15 日，周恩来复函尼赫鲁，正式表示希望两国于 12 月在北京举行谈判。他在信中提出中印关系的基础是“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印度在西藏地方的特权必须终止，但印度在那里的具体利益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23 日，尼赫鲁复函表示同意举行谈判并同意周恩来在复函中提出的三点“新的基础”。

12 月末，中印谈判如期在北京举行。31 日，周恩来会见印度谈判代表团。他提出双方应该按照“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从中印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和后来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看，周恩来当时系统地提出这么多的原则是有相当强的针对性的，这也印证了处理中印关系对于中国外交的典型意义。1954 年 4 月 29 日，中印签订了一项协定，在“序文”中包括了周恩来的上述建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完整地载入外交文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不能说是偶然，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说，中国领导人必须将革命意识形态同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进行某种程度的切割，才能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至于成为不能取信于人的华丽空谈。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他们有比较自觉的国家领导人的角色意识，而这种角色意识需要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逐步构建。

此后不久发生的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日内瓦会议，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以国家代

表的身份参加非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中除了苏联、朝鲜和越南的代表，其他人都将周恩来当作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常委。同样，当周恩来等人作为国家外交代表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他们也必须要用国家和国家利益这类话语思考和解释中国的政策和行为，否则就难以同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进行基本的外交交往。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对印度的访问在中国亚洲政策转变过程中有特殊的意义，尽管这次访问的起因是尼赫鲁的反复邀请。5 月 23 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赖嘉文会见正在日内瓦开会的周恩来，他在会谈一开始便说尼赫鲁邀请周恩来在回国途中访问新德里。周恩来当时未置可否，第二天他在向北京汇报此次会谈内容时提到尼赫鲁发出邀请，不过这个内容被列在这个很长的报告的第四项，只用了两句话知会北京而已，未作任何评论和建议。他的注意力都放在解决印支停战问题上了。6 月 13 日，梅农再次当面向周恩来发出邀请，他说周恩来哪怕是“路过印度小住，一天也可以”。周恩来告诉他“现在很难答复”。这段对话被列在报告给北京的会谈记录中，不长也不突出，周恩来也没有先向北京表达任何意见。不过就在此时，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接受尼赫鲁的访印邀请。

北京的领导人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中思考中印关系和周恩来是否访问印度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后不久，外交部曾经就如何评价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金等亚洲五国总理会议提交专门的研究报告，认为五国总理都赞成印度支那停战，而且他们提出的停战方案同中国的主张很接近，特别是印度、印尼、缅甸等在中国关切的地区安全问题上，与中国有重要的共同点，即都反对美国在亚洲建立军事同盟体系。6 月 12 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有关周恩来是否访问印度的建议，它被包括在一份有关争取与东南亚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综合性报告之中。该报告提出，周恩来访印取决于中央是否下决心积极发展同印度这类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因为印度、缅甸等有可能在访问中提出“复杂的边界问题”，而这短期内“还不可能解决”。但是，错过这次时机对中国设想中的签订“亚洲和平公约”计划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所以关键是能否确定“积极争取这些国家的方针”。

毛泽东、刘少奇等看过报告后很快做出肯定的答复，刘少奇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示他接受尼赫鲁的邀请。17 日，周恩来告中共中央他决定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前往新德里。后来因为缅甸总理吴努也发出邀请，他的行程中又增加了对仰光

的一天访问。从周恩来给北京的报告内容看，他设想这次访问的目的主要是在解决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同尼赫鲁交换看法并争取达成共识，具体地说就是为缔结“亚洲和平公约”做准备，打击美国组织东南亚条约的计划，以及实现印支停战。

6月25日到29日，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这是建国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非苏联阵营的亚洲国家，此前他们只去过莫斯科。周恩来分别同尼赫鲁和吴努签订了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印、缅领导人在声明中确认他们也同中国领导人一样，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亚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公报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们使中国领导人相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中国在亚洲高举的一面旗帜，而拥有这面旗帜不仅对中国在这个地区追求的战略目标是有益的，而且对中国亚洲政策的转变十分重要。周恩来同尼赫鲁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后者说明，中国领导人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在推动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同亚洲新兴国家发展合作关系。

这次访问使周恩来更加乐观和自信。在日内瓦会议上和休会期间的外交活动使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对印、缅的访问则是锦上添花，他相信中国在亚洲的外交天高地广，大有可为。7月5日，周恩来在柳州结束了与越共中央的会谈，说服他们接受了积极争取印支停战的方针。这相当于克服了中国亚洲政策转变的最后障碍，他此前已经基本确定印支停战的关键就是越南方面是否下决心做出妥协，事实也是如此。第二天，周恩来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并于当晚到毛泽东处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汇报他的外交活动并讨论今后的对外政策。周恩来的汇报对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调整对外政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次与会者还包括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他们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印支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做出重大决定。

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的对外政策。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日内瓦会议的情况、他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成果以及他同越共中央会谈的情况，等等。他最后说“原想再关一年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有欲关不能之势！”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很高，而且苏联也希望中国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周恩来的介绍令与会者感到鼓舞。毛泽东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表示了肯定，而且对周恩来的建议深表赞成。他说“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因为“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就这样，“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时期结束了。用周恩来的话说：“前几年，我们说先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现在经过初步整理，房子已经基本打扫干净了，因此可

以请一些客人来。”

非常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次会上重新用“中间地带”概括了他对世界政治的观察与结论。他说世界形势变化很大，“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一方面苏联阵营团结得很好，另一方面则是世界的其他部分四分五裂”。美国“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是利用反共的旗帜把它盟友的地盘“占领起来”，特别是在东方占领了诸如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等很多国家。在他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同他在1946年夏季所阐述的一样，是借口反共来控制“中间地带”。他认为在他描述的世界政治图景中，中国“情况是很好的”，中国“走出去”发展的空间就是那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而指导方针就是“和平共处”，“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第二天，毛泽东在政协常委会上就外交政策发表讲话。他说今后外交要全面发展了，而指导方针就是“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到此为止，中国领导人终于为他们调整对外政策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论述，其特点是通过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整合到传统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之中，从而大致协调了支持亚洲革命和发展亚洲外交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也是他们下决心改变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8月24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他再次阐述了“中间地带”思想。他以欧亚大陆为中心，把世界政治结构描述成按照地理状况分成的三个部分，美国所处的北美在欧亚大陆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剩下的都归于“中间地带”。“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它的真实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此后不久，毛泽东也这样提醒到访的尼赫鲁，他说美国反共“是以此为题目，另有其他的目的”。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于解释冷战国际体系的出现和基本特征是有其合理性的。对二战后国际体系的解释建立在一个基本事实之上，即美国和苏联两个非欧洲大国的兴起以及欧洲的衰落，冷战和诸多地缘和世界政治版图的勾画都缘起于这个变化。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那些国家大致都可以用“中间的”来概括，毛泽东的一系列分析就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的概括之上。不过比较1946年8月提出的“中间地带”，毛泽东此次重提这个概念还是有巨大区别的。1946年夏季提出的那个“中间地带”中除了英国为代表的一些中等“资本主义国家”，其余的成分是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和他们发动的革命运动。1954年夏季描述的“中间地带”中的主要行为

体则包括各种各样的新兴民族国家和即将兴起的国家。至少中国领导人的目光聚焦在那些国家上，他们必须为处理同它们的关系找到指导原则，“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和“和平共处”等概念就这样合逻辑地出现了。

中国领导人在7月6日到8日的几次会议中所阐述的思想是中国外交的一次历史性转变的开端，在中国外交的演变过程中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随着日内瓦会议结束，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8月开始，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陆续接待了很多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一批批代表团。它们包括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和一大批苏联阵营国家的代表团，还有诸多来自亚洲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和各类型的政府、政党的代表团。在所有这些外交活动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事必躬亲。从他们同来自亚洲、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政治人物的交往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开始取代“两大阵营”；“和平”、“和平共处”等概念则高频率地出现，成为中国领导人阐述国际政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外交话语。与之相联系的则是重新命名亚洲新兴民族国家。

中国领导人在如何定义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很长时间里都存在困惑。到1954年夏季，在中国外交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中国领导人开始用它们来称呼亚洲（后来加上了非洲）新兴国家。这些概念大致分成三类，它们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认知的视角和逻辑。第一类是以地理文化为标准的，诸如“东方国家”、“亚洲国家”、“亚非国家”，等等。第二类是以国家主权独立程度为标准的，如“独立自主”、“接近独立自主”，等等。第三类是以同冷战“两大阵营”的关系为标准的，如“中间国家”、“中立国家”、“第三世界集团”国家，等等。显然，当中国领导人决定改变对外政策时，他们已经在有意识地重新定义这些国家，以便为新政策找到合理的依据，以及建立起能够进行有利和有效交往的外交话语。重新定义亚洲新兴国家的性质和地位对中国外交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以这些定义为基石构建起来的话语系统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外交的一种新认同，即中国不仅拥有不同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身份，而且也不同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与尼赫鲁会谈做准备时决定，将“东方国家”的认同作为他的论述中心。在那次会谈中，毛泽东阐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亚洲新兴国家拥有三个“共同点”，即都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都是农业国、工业落后被人看不起，以及地理上都在东方、在亚洲。他分析了这些共同点的优势和劣势，并阐述了中国将做出何种努力，甚至告诉尼赫鲁中国打算开始研究原子弹。从此以后，“共同点”就成为中国领导人同后来所有到访的亚非国家领

导人会谈的主题。1955 年 4 月 19 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全体会议上所作补充之发言是一个经典之作，他将毛泽东的“认同”主题推向了一个高潮。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确信中国是一个具有上述本质和形象的国家，而且这种本质和形象是有价值的和积极的，是中国外交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

中国领导人在建构新的国家认同方面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这并不仅仅体现在为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开辟了一条宽广的大道，更重要的是这次认同建构的高潮同中国领导人的革命史观结合在一起，使中国人对自己具有这样特殊的身份坚信不疑，并充满自豪和自信。这在当时固然加强了中国同美国对抗的信心，后来则成为导致中苏分歧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领导人因为这种认同而在内心深处生发了一种在道义上比苏联更优越的感觉，他们相信中国在亚非（后来增加了“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先天地具有高于苏联的合法性。

新中国这次外交转变的高潮是中国参加 1955 年 4 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从 1954 年春季开始一直到 1955 年夏季，外交部的工作者们针对亚洲发生的如科伦坡会议、日内瓦会议、马尼拉会议、茂物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涉及的主要亚洲国家，等等，做了大量和相当深入的调查和分析，认为亚非新兴国家的人民和各个阶层的人都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和反对西方；那里的“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其统治也不得不举起和平和中立的旗帜，反对美国扩张和在亚洲建立反华的军事同盟体系。这些报告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更积极主动地参与亚洲区域多边外交，更多地选择与亚洲国家合作，他们并相信能够通过亚非会议走到亚洲舞台的中心。在决定参加万隆会议的决策过程中，毛泽东一如既往地扮演了领导核心与政策主要推动者的角色。他这个时期将注意力集中于外交领域，这十分有利于中国亚洲政策的迅速形成。这以后，中国开始积极争取参加亚非会议并认真着手准备，直到周恩来登上万隆的讲台。中国通过参与并推动这次会议取得成功，极大地改善了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周恩来本人则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和影响力。

结 论

以上论述表明，中国亚洲政策的转变蕴含着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战略思维，并对此后的中国对外政策产生了长远的重大影响。在他们看来，“中间地带”尤其是其中的亚洲地区有着重大的战略价值，这里是中国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主要战略空间，是比中苏同盟更为持久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这里有地缘安全方面的特殊重要性，是中国东南方向的安全缓冲地区之一，中国需要在这里狙击美国的扩张；这里也是中国在美苏两个阵营之外展开一场新的战略性竞争的舞台的一个主要部分，中国有可能在这里拥有足够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是领导地位。中国领导人将从这里开始在国际冷战格局中开辟新的外交战场，这在当时已见端倪。中国的亚洲政策转变是中国构建“中间地带”的努力的开端，它的确打开了一个重塑冷战并推动冷战全球化的独特而又影响巨大的进程，中国从那时起直到后来很长时间（很有可能直到今天）都试图将这里作为自己的主要外交舞台。

（《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2 期）

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

1950年4月开始的“援越抗法”是建国后首次大规模军事援外行动。它酝酿于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形成于中苏谈判结盟时期，是新中国迈出军事介入周边事务的第一步，也是理解冷战时期中国援外政策的第一个历史故事。以往的研究都简单描述援越抗法的决策过程或中方在策划重要战役中的作用，却忽略了很多有长远影响的重要内容（包括革命意识形态、中苏同盟与地缘安全观等之间的互动对中国东亚政策的具体影响；中国对外援助中道义原则的提出与主要特点；中国印支政策的形成与中越矛盾的历史缘由，等等）。这种忽略导致严重低估了援越抗法对冷战时期中国东亚政策和援外政策的持续影响，这意味着迄今对冷战时期中国东亚政策和援外政策的理解存在严重缺陷。本文的目的就是呈现一个更完整的援越抗法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政策产生的主要动力、主要内容和主要经验，等等。由于涉及诸多领域，本文在论述中提出的问题会多于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其中一些尚处萌发状态，后来才逐步发展成尖锐的矛盾，本文涉及的历史时期有限，无法概括解释，专此说明。

一、“援越抗法”政策的缘起

抗战后中共与越南共产党（当时称越盟）在1947年间建立起无线电联系，毛泽东也是在当年底即表明，他已经萌生了未来支持越南抗法斗争的想法。导致他在内战转折时期想到要支援越南的基本原因是两国革命运动的历史联系，中共与越共交往在源头上同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胡志明在巴黎结识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些

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大革命期间，胡志明在广州担任过苏联顾问的翻译。后来胡志明同中共领导人保持时断时续的联系。当时双方的核心认同就是中共与越共是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下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同志关系。这种关系后来被称为“同志加兄弟”是十分贴切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胡志明曾领导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1946年12月，法军进攻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立刻号召奋起抵抗，抗法战争从此开始。此时正值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广西地区的一些中共部队为躲避国民党军队追剿，曾经分散进入到越南境内，他们得到越共部队的接待和保护，中共边境地区党组织还在越南境内开办过干部培训班。双方还有过层级比较低的军事合作，越共游击队帮助过边境地区中共部队攻占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越南历史学家描述说，1949年初，越军有两个排的“主力部队”在广西地区参加了解放军作战。

中共领导人真正开始关注印支地区是解放军打过长江以后，这同军事形势有直接关系。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如果广西的白崇禧部队退到印支地区，中共军队将坚决追击到那里予以消灭，并同时消灭其他敢于抗拒的“反动派”。后者很可能包括了法国军队。斯大林则劝告中共军队不要进入印支地区，以免引起美英法的干涉。他打电报告诉毛泽东，应警惕美英军队在华北港口登陆，不要急于派军队到华南边境地区去。中共中央后来为了防止美国的干涉，明确规定中共军队不得超越国境线，这样越共的帮助就显得比较重要了。这是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直接原因。斯大林的建议也导致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列强是否会利用越南作为军事干涉中国革命的基地。他们当时认为美英法等有可能加强在印支的军事存在，但从那里发动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并不高。分析内战后期中共领导人的这类思考有重要价值，因为他们在建国后继续将印支地区作为存在安全威胁的战略方向，而且地缘安全考虑在中国印支政策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从对外政策的角度看，中共中央在建国前夕将越南归类为存在革命斗争的东亚国家，而“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已经是或将要是武装的游击战争”。《人民日报》对越南抗法斗争的报道虽有增加但仍很少，其中包括转载苏联《真理报》的文章和越盟歼灭法军的消息。总的来看，中共中央与越共的交往这时既不密切也不深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军向西南进军。越共中央代表李班、阮德瑞于10月秘密到达北京，要求得到军事援助和恢复两党高层的直接联系。中共中央这时很希望越共能协助阻止一些国民党军队败逃到越南境内。不过双方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当时中国领导人做出两个重要的决定：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

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越南）建交。

毛泽东启程赴莫斯科后不久，广西战役即告结束。云南卢汉宣布起义后，由于中共军队尚不能及时开进，国民党李弥部队开始向云南边境地区转移，这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警惕，他们担心李弥部队进入越南就会从后方威胁越共军队，故多次指示有关部队迅速截击向越南境内败逃的国民党军队。这时法军也在加强在中越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以防止中国内战蔓延到越南境内。法军行动引起中共中央的警惕，担心他们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庇护。1949 年 11 月 30 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谴责国民政府正企图使越南成为其“卷土重来的基地”，警告法国殖民当局不得“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和法国殖民政府加强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是造成中国领导人认为越南涉及中国的安全利益并感到有必要进行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

12 月 24 日，刘少奇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报告了云南政治和军事局势，他同时转达说越共代表明确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希望中国提供一笔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包括三个师的军事装备和物资，100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以及派遣军事干部到越南协助指挥作战。二是要求中国与越南互相给予外交承认。对于军事援助，刘少奇告诉毛泽东，在北京的领导人认为可以援助但需要有所节制。武器装备和医药器材可以提供“但不能给予太多”；部分物资可通过贸易解决，“但不能有一千万美元”；军事干部可以派，不过要先派遣罗贵波带电台前往了解情况，“然后再派军事干部”。总之是不能立刻和完全接受越方的要求。对于外交承认，刘少奇报告说政治局开会时权衡了利弊，他们认为在法国没有承认中国之前，与“胡志明建立外交关系是可以的，利多害少”。用“是可以的”这样的行文显然并不是表达十分积极的态度，而且他们是看到了还是有“害”的，只是比“利”少而已。至于“害”是什么刘少奇没说，他请示毛泽东做决定。实际上，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而言这并不是那么容易权衡利害的。1954 年日内瓦谈判期间，法国代表告诉周恩来，他们原来是准备承认新中国的，后来由于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而未能实现”。

毛泽东此刻正在莫斯科，他接到刘少奇来电的当天即回电，对援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同他正与斯大林会谈有关，在莫斯科经常需要从世界革命运动的角度讨论问题，不过他这时还是坚持了“先谈判，后建交”的既定方针。他指示刘少奇转告越共，需“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公开来访，北京要“予以公开欢迎”；援越物资则要采取逐步增加，以便越方“善于掌握这些物资”；罗贵波带电台去越南很有必要，要“谆嘱”他“务须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多鼓励、不要批评”。毛泽

东还首次提出派到越南的军事干部只能做“顾问”。这是中国后来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团”的由来。

毛泽东的积极表态有力地推动了双方的讨论。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即电告越方立即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人的代表团来北京”。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他明确提出越代表团“应秘密地来到中国，不应公开”。第二天，刘少奇又电告对方，表示中国“很愿意”给越共“一些援助”，并将派遣一个代表并随同五六个人带电台前往越共控制地区。与此同时，林彪也派遣四野151师向老街靖边方向进军，以便截击可能退入越南的国民党军队。中方还明显地加强了管理中越边境贸易和人员的往来。

显然，在北京的领导人比毛泽东要谨慎，他们在没有了解清楚越方实际状况之前，并不打算贸然承诺提供更多的援助。另一个原因同中共中央曾经不赞成胡志明在1946年事变之前对法国的妥协有关，他们认为那种“中立”政策是错误的。当时胡志明基于策略考虑一度同法国殖民当局合作。特别是他还给杜鲁门政府写过几封信，要求美国支持越南独立。当时正值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很反对“各国人民”随着大国间的妥协也妥协。显然，双方这个阶段的交往还不足以消除在中国领导人内部对越共过去“中立”政策的消极看法。当然，他们也还需要确定公开与越共交往是否会引起法国的干预。

在1950年元旦发出的一份电报中，刘少奇告诉林彪等人，越军因作战需要可以经过中国境内或暂时躲避，但应是“非正式地”允许，并告诉越方“不是必要的时候”就不要进入中国境内，如必要过界“亦须在夜间秘密行动”；如越方需要弹药、粮食等，可以在越方保证能够保密时，方可“暂时送给他们不大的一批”。毛泽东很快从莫斯科表示他并不赞成这种谨慎的措施，刘少奇在5天后的一个电报中告诉林彪，毛泽东认为“必须尽可能给越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便利和帮助”，越方所需弹药、粮食等“应尽力帮助”，毛泽东要求应将越方“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

1月2日，刘少奇电告林彪等人，对越代表访问北京一事，“在中央未公布前并暂时保守秘密”。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刘少奇再电林彪，指示后者要给予越共代表团“热情招待并用最迅速的办法送他们来北京”。不过，他这时仍然认为双方联络不畅，在北京的越方代表并不能解释清楚到底需要何种援助，故中国不能盲目地提供援助，更不能有求必应。刘少奇这时还不知道，他将在北京接待的越代表是胡志明。

胡志明这时决定亲赴北京求援同越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有直接关系。这次会

议认为越军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包括缺乏武器装备和军事干部等，寻求中国援助是解决困难的唯一办法。就在胡志明启程的时候，1月15日，越南宣布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周恩来于3天后回电，宣布中国与越南建交。这是中国迈出援越抗法的重要一步，也是越南得到的第一个实质性的政治支持。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撰文称1月18日是“外交胜利纪念日”，是“举国欢腾的日子”。

1月25日，胡志明到达武汉。刘少奇这时才从中南局发来的电报中得知，“负责任的”越代表是胡志明本人，建国后到访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他立即指示中南局不要公开此事，只在党内表示秘密欢迎，并善加款待后“周密护送来京”。第二天，他电询毛泽东对胡志明来北京是否要公开欢迎？ 这时中苏谈判正取得转折性的进展，毛泽东复电表达了极大的热情。他要求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等都应前往车站迎接，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并希望胡志明能等他和周恩来回京见上一面，举行今日所称的“峰会”。他随后又发一电报说，越方在战后搞的“中立”政策不是原则错误，意即中方不必再受过去的看法约束。28日，刘少奇将胡志明的一封电报转给毛泽东，后者向毛泽东、斯大林和周恩来提出打算秘密访问莫斯科，以便一举实现中越“峰会”和苏越“峰会”。

1月30日，胡志明到达北京。刘少奇当时只派杨尚昆到车站迎接而且继续保密。当晚，刘少奇设宴招待胡志明并举行会谈。胡志明对所要求之援助是富有想象力的，他甚至提出要得到飞机等。刘少奇表示可以满足越方的大部分要求，具体办法和内容要等同毛泽东商量之后确定。刘少奇还表明，中国并不急于同法国建交，相信援越可能不会对法国承认新中国有实质性的影响。胡志明在会谈中解释了越共过去一度搞过的“中立”政策。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口径说那不是原则性的错误。

刘少奇对胡志明的气质印象深刻。会谈后，他电告毛泽东说胡志明“年已六十”，看着很瘦“但尚健康”，特别是光脚走了17天才进入中国。他本人因担心离开“战斗岗位”时间过长而打算取消访苏，为见到毛泽东而在北京等一个月亦“认为不可能”。毛泽东立即回电力邀胡志明访苏，他告诉刘少奇，斯大林是在他的劝说下才同意立刻接待胡志明的，斯大林本来希望在苏联承认越南后胡再访问莫斯科。现在胡志明如嫌路远不愿意来，他会再与斯大林电话协商。

刘少奇接到电报后再与胡志明协商，后者遂毅然决定2月3日启程前往莫斯科。他们当即与苏联驻华代办商量是乘火车还是飞机。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从莫斯科发来一封贺电，问候胡志明并告之“苏联已承（认）越南”，中国已代为转达了越南要求各苏联阵营国家承认并建交的文件，估计这些国家“亦可能承认”。就这

样，中国顺便把越南也带到苏联阵营，胡志明则必须要到莫斯科共襄盛举了。为了能使胡志明顺利成行，毛泽东还促使苏方派飞机接胡志明，以致后者终于在2月6日便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期间，斯大林会见了胡志明，不过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在胡志明到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告诉毛泽东，援助越共之重任可由中国担任，苏联可提供一些物资从旁协助。胡志明当然希望能有更密切苏越关系。2月16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胡志明借参加宴会的机会，向斯大林提出越南希望也与苏联签订同盟条约。斯大林除了高度赞扬胡志明很有智慧，其他未置可否。至此，中苏基本协调了在印支地区的政策，即由中国担负起支援胡志明革命的主要责任，苏联则给予支持。

中国的援越抗法政策最终确定下来是在毛泽东等访苏回国后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不久，即接到罗贵波从越南前线发回的电报，他建议在中越边境的高平、老街等地区发动一场战役，打开中越边界的交通。罗贵波还提出需要向越共提供15000人的武器装备，以及派遣一批从营到军级的干部前往越军担任军事顾问。中国领导人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援越问题。这次会议确定了援越抗法政策，即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派遣军事顾问团的方式，帮助越共打败法国殖民统治。援越抗法政策终于确定下来。

二、“积极援助，但不包办”

从4月开始到9月，中国为了实施边界战役，立即向越共提供了各种枪支15700支，各种火炮及火箭筒500余具，以及大量弹药、粮食、药品和通讯器材等，并有大批越南军人进入中国边境地区接受军事训练和接收武器装备。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韦国清为军事顾问团团长。4月17日，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下达抽调干部组建顾问团的命令。组建工作于5月中旬完成，共调集从兵团级干部到工作人员共281人。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军事顾问团的团以上干部。结合此前的决策过程综合分析他们在此次会见中对援越抗法政策的阐述，可以大致将这项政策概括为“积极援助，决不包办”。

援越抗法政策包含着比较复杂的动力，既有支援东亚革命运动的强大的内在冲动，也有对国家安全的基本考虑，还有中苏同盟的影响，故有必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如前所述，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援越抗法的巨大热情，他尤其强调这

是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苏结盟无疑强化了这种义务感，使中国领导人愈加认为有必要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3 月 14 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有关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共应给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等“兄弟般的帮助”，“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表现出“冷淡和骄傲”。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援越抗法势在必行，要确定的只是方式和计划而已。

援越抗法是建国后第一次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实践，中国领导人的确表露出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毛泽东在 6 月 27 日对顾问团的讲话特别清楚地展示了他所理解的国际义务，即取得国家政权的共产党“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他号召顾问团成员发扬很高尚的精神，因为越南是很艰苦的，“要打摆子，有牺牲的危险”，至于何时能回来则“不要急”。刘少奇、朱德也同样强调了援越“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是“重大的国际任务”。

在中国领导人的认知中，所谓国际主义在理论上是基于阶级认同的一种原则和义务，必须是无私的和不可附加其他政治条件的；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含混着儒家道德风范和历史经验的理念、道义原则。这导致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特别关注中国国际援助行为在道德层面的完美度，中国对外援助在行为上应该表现出更近似于中国历史传统中行王道的伦理再现。他们十分注意塑造一种他们认为是新型的党际关系，中国应树立高尚的道德形象，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中国顾问们做到高大全，越方自然会心悦诚服。毛泽东在讲话中用了不少篇幅告诉军事顾问们应该如何做人。他尤为强调“搞好团结”，“不要看不起人家”，“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不能表现出我们胜利者的骄傲自满”，顾问团甚至要做到儒家提倡的每日“省吾身”的境界，最长不超过一周便要认真反省一次。他甚至提到汉代那时起“中国曾经欺负过越南”，例如“马援征交趾”什么的，顾问团应该就这类历史问题向越共道歉，等等。刘少奇在会见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谈话。毛泽东后来还亲自在王稼祥起草的军事顾问团《工作守则》中增加了“热爱越南人民的一草一木，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在向越军提供武器装备的那些电报上，毛泽东时常会加上“应该是好的和合用的”等。为了确保上述道义原则被坚决执行，中国领导人同时要求军事顾问团的领导人遇到重要问题必须要“请示报告”。

中国领导人在提倡搞国际主义义务的同时，也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中国地缘安

全的关切。他们相信帮助越共“也对我们自己的安全有利”，是“一举两得的事”。从当时中越边境地区的局势看，中国领导人有理由对法国在印支的军事存在感到担忧，尽管这种担忧达到何种程度才是合理的这一点是需要认真鉴别的。法国人当时在中越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部署和军事侦察是为了防止国共战争蔓延到越南，所以要求进入越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必须放下武器。不过法国政府内部认为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很可能会支持越共。正是在冷战开始向东亚蔓延的背景下，法国越来越多地向美国寻求援助，而这个蔓延的过程中存在着两大阵营之间明显的互动。

1950 年 2 月 1 日，就在苏联等国家外交承认越南一天后和毛泽东说服斯大林邀请胡志明访苏的当天，美国国务院一个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有关印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苏正在共同努力“颠覆”反共的东南亚国家政府，那里“正处于落到共产党统治的危险之中”,法国军队“正在抵抗红色中国共产主义的向南扩张”,法国需要援助，美国的选择无非是“要么支持印度支那的法国人，要么眼看着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2 月 7 日，杜鲁门政府宣布承认法国扶植的保大政府。5 月 1 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向保大政府提供 1000 万美元的援助计划。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宣布在朝鲜半岛进行全面干涉的同时，批准向印支地区提供军事援助和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杜鲁门随后宣布向法国提供 15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两天后美军用运输机开始在越南为法军空投物资，美国对法国殖民当局的援助当年即达到 1.5 亿美元。8 月 12 日，中国军事顾问团到达越南高平的广渊地区。9 月间，美国也应法国的请求，向越南派遣了一个军事援助顾问团，帮助法军训练越南军队和从事战略咨询。

中国抗美援朝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印支政策，此前美国认为印支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遏制苏联的影响扩大；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美国则断定中国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威胁，美国东南亚战略的重点是致力于遏制中国的扩张。这种变化酿成了后来美国长达十年的军事干涉，当下则是决心给予法国越来越多的援助。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全面干涉加剧了中国领导人的担心。6 月 27 日，就在杜鲁门政府宣布加强对法属印支援助的同一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将越南局势同美国在朝鲜的干涉联系在一起，他们说美国在“朝鲜、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形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我们”,“唇亡必齿寒”。11 月，罗贵波从越南返回北京汇报工作，毛泽东指出中越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即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法国。他说越南驱逐了法军，“中国的南部边疆也就解除了法国殖民者的威胁”。这时志愿军已经在朝鲜同美军直接作战，中国领导人对地缘安全的重视程度必然大幅上

升。

对地缘安全的关切既是导致中国援越抗法的原因，也是导致中国领导人对越南抗法“不包办”的原因。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决定采取有限度援助越南的方针，所谓“不包办”首先就是坚持中国军队决不直接在印支参战，他们始终坚持了这个原则。1952 年 7 月 11 日，罗贵波曾经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为了顺利完成西北战役计划，越共希望中国云南部队能参加作战。中央军委 10 天后复电明确予以拒绝，指出不能出兵深入越境配合作战“是早已确定的一条重要原则”。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坚持不直接参战，首先是为了避免引起美英法等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干涉，这个原则是毛泽东在 1949 年渡江战役后答复斯大林时确定的。当时斯大林因为担心引起美英法干涉，建议中共军队占领西南中心城市后，不要急于向边境地区进军。毛泽东则坚持要控制全部国土，同时又通过不到境外作战来避免外国军事干涉。同时，中国领导人也不允许越共军队进入中国领土作战。1950 年 1 月 23 日，越共中央曾提出派部队进入中国领土协助中国军队截击国民党残部。26 日，刘少奇复电婉拒越方建议，他说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消灭了，“越南部队不必到中国地界来”。

毛泽东是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提出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的设想的，这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之一。在国共内战期间，苏联在向中共提供援助包括向东北地区派遣技术顾问等，从未忽略尽一切努力避免给美国指责苏联介入中国内战之口实。访苏期间，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就提出，解放军攻打台湾时希望苏联秘密出兵参战。斯大林则表示，“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预提供借口”，所以他建议派遣苏联的“参谋人员和教官”。这是后来苏联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的由来，很可能也是毛泽东遇到胡志明的求援时会想到派遣军事顾问的直接原因。因为同苏联一样，中国在印支也面临着不能给“美国的干预提供借口”的相似情况。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后来派遣军事顾问团也是相当谨慎的，他们坚持并非常注意军事顾问团必须采取秘密的方式。毛泽东告诫即将赴越的干部们，“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要张扬，连亲友也要保密”，顾问团在越南要有代号，要多穿便衣或越军军服。总之就是不要给美英法等国家“找借口的机会”。事实表明，中共领导人的谨慎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些措施对防止美国介入和后来的日内瓦谈判成功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战略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在华北地区，他肯定不希望因为过度援助越共而使中国军队被牵制在西南方向。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大军入朝作战，中国领导人当然更不会派兵进入印度支那。

不过，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宁可在朝鲜半岛用兵，却不愿直接卷入印支战争，还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援越抗法决策与中苏结盟几乎同步，斯大林在印支问题上不积极的态度不可能不影响中国的政策。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法国是苏联在欧洲的“统战对象”，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友直接与法国在印支直接作战，苏联的欧洲政策必定要受到严重冲击，这是苏联不希望看到的局面。进一步说，在中国领导人的观念中，法国是反动程度大大低于美国从而需要区别对待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它也没对新政权表现出特别的敌意。所以，中国领导人在避免引起美国介入的同时，也需要与苏联协调行动以及争取在对法关系上留有余地，这是合逻辑的选择。当然，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而中国领导人坚持不在印支用兵，这在越方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尤其是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中国领导人拒绝派兵进入越南实施小规模的支援作战，毛泽东甚至都不同意越军将法军战俘送到广西境内。这样肯定是有潜在的负面影响的。

中国领导人坚持这一原则对维护中国的安全环境无疑是必要的。美国政府当时无意直接卷入印支战争，不过也是有条件的，一旦中国军队直接在越南作战，美国将至少会派遣海空军参战，甚至有可能动用海空军攻击中国本土。越领导人也许会寄望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断然出兵印支。毛泽东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实际上他不仅要向越方解释朝鲜局势，而且还需要首先向派驻越南的中国顾问们解释清楚，中国在朝鲜和越南的援助“意义同样重大”，出兵朝鲜和不出兵越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

三、推广“中国革命经验”

中国领导人从决定援越抗法开始就很重视在印支中推广中国革命经验，他们相信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也必然会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其经验特别是对东亚革命运动具有普遍意义，越方需要认真学习并运用这些经验。不过如前所述，他们相信模范的行为更有感召力。而且基于中共经受过的惨痛教训，他们有意识地避免苏联式的“强加于人”。罗贵波回忆说，毛泽东曾经“有些激动”地谈到“中央苏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毛泽东心目中，李德不仅给中共的事业造成莫大损失，而且“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奇十足”。这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也是面目可憎的，毛泽东决不允许他麾下的战将们变成李德再世。他谆谆告诫他们千万小心谨慎，不要有

"胜利者的骄傲情绪"，不要"强加于人"，"不能摆大国的架子"，否则将事与愿违。无论哪个中国领导人都在提醒前往越南的干部，一定要谦虚谨慎，要相信越南人自己会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中国领导人希望得到的不仅是越方按照中国革命经验走下去，而且要他们心悦诚服，这才是国际主义的最高境界和最佳效果。苏联人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才导致中共领导人对他们很不满意。

罗贵波等到越南后相当严格地践行了毛泽东强调的道义原则。1951 年 6 月 2 日，罗贵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他会经常受邀参加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被要求提供意见。他的原则是能不参加的会议就不参加；参会只提自己了解情况的、成熟的和对方可能接受的意见；重要问题先向中共中央报告和请示；凡涉及越共内部的人事、历史等问题均不参与、不发表意见。这些原则得到中国领导人的首肯，不过他们希望他还是可以更积极一点。11 月间，胡志明当面向毛泽东提出，邀请罗贵波参加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当时即表示接受，但在胡志明走后他告诉罗贵波，参会必须要谨言慎行。罗贵波则继续坚守未经中央批准不向越方提出任何建议的原则。

尽管中国顾问团言行谨慎，但越方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态度显然是很关注的。初到越南的罗贵波很快就报告中共中央，越共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似乎并不重视。5 月 8 日，刘少奇在复电中提醒罗贵波，"根本不要用过多的心思去注意越南同志这些毛病。更不要去批评他们这些毛病"。他所说的"毛病"包括越南人"害怕说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不重视，更多地依赖外援，随便开口要帮助等"。刘少奇要求罗贵波"诚恳老实和热情地"在各个方面提出建议并介绍"中国的经验"，假以时日就会有效果。20 来天后，罗贵波就在一个电报中告知刘少奇，他经过多方了解证明过去是判断"有偏差，应予纠正"，越方"基本上都是欢迎和接受中国革命的经验的，他们一致认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尤其是中共已经总结与纠正的缺点和错误中的经验，基本上适合和适用于越南"。不仅如此，越方还认识到"过去越南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了解决的图景，过去找不到的方向，现在有了指针"。还无从知晓越南领导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转变，或者说罗贵波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现了越共中央与过去看到的竟是如此之不同。刘少奇很快回电表扬罗贵波说："你对越南同志重视与学习中国革命经验一点，改正以前错误的看法，是很好的。"他鼓励罗贵波和其他人在"介绍中国革命经验方面可以多做一些工作"，但"绝不可性急，不可自以为是"。

战争中打胜仗就是决定一切。越方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态度是在边界战役后根本

改变的，他们因战争胜利而信任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边界战役发起之前，越军原拟先攻占高平。陈赓到达越南后提出先攻占东溪，取得中共中央同意后便开始说服越军指挥员。他的主要论据就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即“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役结束后，胡志明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说：他认为边界战役的胜利“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毛泽东路线的胜利”。10月下旬，越军召开边界战役总结会议，越主要领导人均出席。陈赓在发言中“深刻阐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和人民军思想”，还介绍了“中国革命战争经验”。胡志明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中国的援助，他说边界战役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越共中央领导人长征的发言肯定是最令人鼓舞的。他说边界战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同胡主席思想相配合的胜利”，特别是越军指战员从战役实践中认识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完全适用于越南抗法战争”。越方此后一直宣传越南革命需要学习苏联和中国的经验，但是“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的经验”，因为中国的经验“最适合我国的环境和水平”。

此后不久，罗贵波再次回国述职。毛泽东在认真听取前者的汇报后，对中国以谦虚的姿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将效果更好这一观点更加坚信不疑，而且他本人的感觉也随之迅速升华。罗贵波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即提出中国的援助应该是“无私的、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这是后来中国阐述对外援助的道义原则的最初版本。罗贵波当时很感动地认为，毛泽东“这种国际主义也是世界上罕见的”。总之就是同苏联很不一样的。

越方内部的变化进一步增强了毛泽东的信心。1951年2月，越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一项议程就是确认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越南劳动党以马、恩、列、斯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与越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一切行动的指南。”此次大会前后，越共《人民报》不断发表文章，阐述学习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意义。

向越南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的经典范例是在越军中展开类似中共军队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展开的“新式整军运动”。1952年冬，胡志明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请教越南革命运动的一些所谓重大问题，其中之一是在越南发动土地改革。1953年1月，越共中央四中全会通过决议，准备实行土地改革。3月初，胡志明告诉与他同车返回越南的韦国清，越方将根据斯大林“他老人家”的建议开始推动土地改革。据描述，韦国清当时立即想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担心土改展开后越军中有可能出现波动。他提出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在越军中“也要进行教育和整顿”。在中国军事

顾问团的指导下，越方模仿解放军在内战时期的“新式整军运动”，在军内展开政治教育，包括动员战士进行“忆苦”来激起能够鼓舞斗志的“阶级仇恨”。有的越军部队还观看了电影《白毛女》，据描述“当场有十余人哭倒”，“有一个战士跑到银幕前枪打‘黄世仁’”。这里描述的越军反应同当年解放军几乎是一样的。

推广中国经验的另一范例是帮助越方建立财政制度。1951 年初开始，罗贵波等做出巨大努力帮助越方解决财政问题。中国领导人指示罗贵波转告胡志明，越方“可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在基本上解决”战时财政问题。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越方要认识到自力更生是“坚持长期斗争，战胜法国殖民者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战略”。“一切问题能在越南用自力更生办法可以解决者，应力求在越南就地解决”。总之，越方有必要像当年中共那样树立自力更生的信念，中国顾问将根据中共在革命时期的经验帮助越方建立合理的财政制度和加强贸易来支持其战时经济。事实上越方后来建立的财政制度基本上是中共根据地财政制度的复制。

罗贵波等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帮助越共中央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财政制度。4 月 14 日，罗贵波报告中共中央，经过整顿税收、控制货币发行、严格财政管理，等等，越南争取当年财政接近平衡“是有客观条件的”。5 月 31 日，胡志明曾经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报告越共的财政状况，说他们无法解决“收少支多的困难”。三周后，刘少奇在复电中很清楚地告诉他，“你们预算中的收入是可以超过的，你们的开支也可以节省一些”，总之，越方的财政困难是可以“进一步克服”。中国领导人非常希望越共中央能从中国革命经验中学会自力更生，当然他们也不愿继续有求必应。

四、分歧的由来

从援越抗法政策形成期的指导思想和实践看，所谓“不包办”也包含了不能漫无节制地满足越方对援助的要求。越方从一开始对援助就有过度索要的倾向。最早到北京的李班等便开出包括 1000 万美元的巨额援助清单；胡志明第一次到北京也提出过援助飞机的要求；他回国后不久又提出要求中国提供人员、各种物资和装备，以及 3000 吨粮食等。毛泽东在莫斯科时固然更为慷慨一些，但回到北京后也有所改变。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在援越抗法期间一直在试图控制住越共索要援助的胃口。

从 4 月开始向越南运送援助起，在云南地区的部队便报告中共中央，越共“要

求数目太大，实无力供给”。他们甚至拒绝向越方提供粮食。刘少奇指示陈赓等应根据越共确实需要和中方有支付的能力等两个标准提供援助，并要向越方解释清楚，至于粮食等则不可完全拒绝。中共中央在给罗贵波的电报中也告诫他不必有求必应，“当尽可能满足越方要求，不能办到者则无法供给”；其他物资可暂时作为军事援助，都要记录在册，将来越方有能力时“可要求他们偿付一部分物资”，现在先以帮助越军作战为主。

中国领导人的上述行为同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经历有一部分关系，特别是同他们处理苏联援助的经验有直接关系，在这方面他们感到无愧于心。在6月27日会见顾问团成员时，中国领导人就专门提出了越方也必须要学会“自力更生”。毛泽东很清楚地说明，“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朱德说，靠中国的帮助“不是唯一办法”，中共军队是靠夺取敌人的武器和自己生产武器打赢了内战，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越军建立根据地。罗贵波曾经当面向毛泽东直陈越方提出的“援助计划太大，要求过高”。毛泽东则表示要用柔性劝说的方式劝告他们，原则是提供“凡是越南实际需要的，我们又有的”。后来发生的问题表明坚持这个原则是很有必要的。

1951年3月18日，胡志明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援助1500吨大米、150辆汽车、夏衣10万套等。中共中共很快就决定先援助大米500吨。5月15日，胡志明又一次电告中共中央，越南“正处于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他提出再迅速提供1500吨至2000吨大米。刘少奇第二天即批示“如有办法，给他们运去此批粮食为好”。5月23日，中共中央通知胡志明，同意分两批运给越方1500吨大米。但是实际情况是越方没有接运这批粮食的能力，而且管理十分混乱。6月21日，中共中央电告越方，3月间运到邻近越南老街的河口镇的500吨大米“你们迄今仍未运走”。在这种情况下“再送去恐受损失”。

在武器装备援助方面也有类似问题。中国领导人在1951年初即感到，越方会“随便开出要求援助的货单，有时数目很大”，有些要求甚至“完全不近情理”。他们要求中国军事顾问团对越共的援助请求“均应做负责的审查”，不合理或不可能的要求“均应删除或减少”，而且要向越方说明必须爱护武器弹药。5月2日，刘少奇在给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电报中专门谈到援越武器装备的管理。他说根据来自南宁的报告，援助越方250辆汽车他们只领走65辆，而且交送越方的物资“保管甚差”，公路两旁“遗置很多弹药”，都已经生锈不能使用，仅运回的报废弹药就有300余吨。他要求将此情况转告胡志明，军事顾问团今后必须审核越方提出的军援

项目是否为必要。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和中国财政状况的变化，中国政府逐步加强对援越物资的管理和控制。1951 年 4 月 7 日，华南分局电告中共中央，越方派驻海南岛的联络人员向海南区党委大量借款，故希望中央迅速指示中南军政委员会华南分会拨付。刘少奇复电说，以后越方借钱必须事先做出预算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才能拨付，海南区党委“不得任意借给他们”，以前未经批准即借给“也是错误的”。8 月 10 日和 13 日，罗贵波向中共中央报告，中越之间贸易很不平衡，中方已经向越方提供价值 210 亿元人民币的物资，越方表示到一年后才能偿付 150 亿元的物资，同时又提出中方再提供价值 350 亿元的物资，问题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实际需要。罗贵波认为“中越贸易目前不可能成为正常的贸易关系”。中共中央复电不同意他对中越贸易的看法，中越贸易“只能按照一般贸易规则进行等价交换，不能与财政援助混同”，越方要尽可能发展出口物资的生产以偿付中方出口物资，这点必须告诉越方。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国是向越共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军事援助规模巨大，包括各种枪支 15.5 万多支、枪弹 5785 万多发、火炮 3692 门、炮弹 108 万多发、手榴弹 84 万多枚、汽车 1231 辆、军服 140 万多套、粮食和副食品 1.4 万多吨、油料 2.6 万余吨，以及大量其他各类物资。尽管如此，双方的军事合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中国援助的项目和数量上不能符合越方的预期、中国军事顾问在日常工作中对越军的态度、越军干部对中国军事顾问的不信任，等等。尤其是双方在越军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歧，对双方关系的负面影响比较深。

中国军事顾问团对越军的军事战略一直有比较大的影响，不论是战略谋划和具体战役设计过程中，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意见往往是决定性的，而中国军事顾问团则是接受中共中央的直接指挥，它的主要战略设想均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按照毛泽东最初的战略设想，中国军事顾问团应该帮助越军在背靠中国的地区打开局面，建立起稳定的根据地。这一战略规划被逐步贯彻到中国军事顾问团的作战计划中。1950 年 12 月上旬，中国领导人已经形成了先完全控制北部地区然后再进攻中部和南部的战略思路。做这种战略选择首先是中国革命的经验使然。中共在战后因控制了东北而获得了背靠苏联的战略基地，可以方便地从苏联得到大量的援助。另一方面也同中国军事顾问团对越南战略形势的分析有关。他们认为，越南部地区远离指挥中心而且被法军封锁，交通联络很困难，“军事工作的办法很少”，所以南方应发展游击战“配合北部战场”，战略重点则应放在北部地区。

中国领导人选择这种战略的确对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也是有利的。正如王砚全后来总结1950年9月到10月发动的边界战役的意义时所提出:“边界战役的胜利迫使法国侵略军设在中越边界的大小据点绝大部分撤退了，使得逃亡越南的国民党残余匪特失去了支持，有利于中国广西、云南当时正在进行的肃清匪特的斗争，有利于中国巩固南部边疆的国防。”边界战役的结果是越军攻占了5个重要的城镇，控制了长达750公里的毗邻中国的边境地区，越北根据地同中国连成了一片。后来相继实施的西北战役、老挝上寮战役、奠边府战役等，差不多都同完全控制越北同中国接壤的地区有关，其结果当然包括“有利于中国巩固南部边疆的国防”。中国领导人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认为中越是相互支持的。

中国当时的战略环境的确正处于持续恶化阶段，主要是美国开始在东南亚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1950年10月，美国首先同泰国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12月23日，美国同法国和保大政府签订了正式的军事援助协议。1951年夏季，美国加快了行动。8月，美国同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了《美澳新安全条约》。美国加强军事遏制不可能不影响中国领导人对印支战争的战略思考。1951年夏季，朝鲜战场上中美军队沿三八线对峙的战线基本稳定后，中国领导人在印支的战略也越来越明确，就是集中力量夺取越南北部和老挝上寮的战略要点，建立大片背靠中国的战略根据地。

1952年2月16日，从北京返回不久的罗贵波即提出，当年下半年发起西北战役，然后再挥师进入老挝作战。这个作战计划获中共中央同意，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3月18日，越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西北作战计划。会上多数越军干部不赞成中方关于9月组织西北战役的计划。他们的理由多种多样，其中有一些反映了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深刻猜疑，而且后来被证明是很难改变的。根据韦国清向毛泽东的汇报，当时越军的高级干部中有人认为，中方建议发动西北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国的边境地区，“是因为对中国有利”。

1952年9月下旬，胡志明秘密访问北京，通过同中国领导人的直接沟通和协调，西北战役计划才最终确定下来。10月18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韦国清、罗贵波等参加。会议决定执行胡志明与中共中央商定的原则，按计划发动西北战役。西北战役胜利后，中国军事顾问团参与到随后展开的老挝作战之中。中共中央提出发动上寮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北战役的成果，将越共的西北根据地与老挝北部连成一片。对中国来说，同时也就是在中越、中老边境形成了一道屏障。

越方的猜疑并没有因为西北战役和上寮战役的胜利而消除，尽管那里形成的局

面对他们也是非常有利的，没有这些战役打下的牢固基础，就没有后来奠边府战役的胜利。1953年夏季，中国军事顾问团开始策划冬季作战。这时越军干部中再次出现波动，用韦国清的话说就是“旧病复发”，他们再次猜疑中方作战计划的动机。

中国领导人这时已经掌握了法军的纳瓦尔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经过持续作战最终在越北地区消灭越军主力。法军7月开始从北部到中部、南部展开扫荡作战。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纳瓦尔计划如果成功不仅对越共不利，而且很不利于改善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环境，故必须反击，绝不允许法军在越西北地区获得立足之地。1953年11月20日，法军空降部队攻占西北重镇奠边府。24日，韦国清在越军委高级干部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发动冬季攻势的意义，他说继续将越北作为战略方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做这样的战略选择也是同中国革命的道路一样的。越军再次接受了中方的作战计划。由于法军调整军事部署，越军的冬季攻势后来很快发展成奠边府战役。该战役的发生主要是基于军事形势的变化，但它很快成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的外交筹码，并成为印支停战前的最后一战。当周恩来领导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坚决贯彻在越南以南北分界停战的方案时，中国军事顾问团相继提出并贯彻的一系列军事计划造成的战略格局变得十分清晰，它成为越南南北分治的基础。

随着1954年7月各方在日内瓦达成停战协议，援越抗法即告结束。作为建国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援外行动，援越抗法中形成的主要原则和获得的主要经验，包括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的冲动和尝试，等等，均对中国援外政策造成深远影响。当然，它遗留的一些矛盾也在后来出现的特殊条件下发酵并造成重大的后果。

（《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

“回归亚洲”：中苏关系与中国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

（1979—1989）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19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与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转变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中国在1980年代逐步形成对东亚和南亚的新战略方针，其主要特点是基于对世界战略形势的重新认识、对中国世界地位的重新界定以及新的国家发展战略，跳脱以往将这些地区问题从属于冷战中美苏全球性对抗的窠臼，更多地从地区的角度认识和更多地依靠地区力量来解决有关的矛盾和冲突，在与中国毗邻的东亚与南亚地区造成有利于贯彻新国家战略的地区安全与经济形势。中国印支政策的转变及其后果是此新战略形成的重要方面，而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这是深入研究此问题的价值所在。

一、提出问题

此研究首先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在冷战时期是否有针对东亚和南亚的地区战略？换句话说，中国在亚洲不同地区的政策是否有共同遵循的战略原则？ 国内外不少论著持否定的答案，认为中国是一个亚洲地区强国，但没有地区政策。[①]

---

① Steven I. Levine, “China in Asia: The PRC as a Regional Power”, seen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7. Robert Ross 同意这一观点，见 *The Indochina Tangle: China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9. 一些中国学者虽没有专门的探讨，但也倾向这种判断。唐世平、张蕴岭在2004年发表的《中国的地区战略》一文中提出“十多年前，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仍在寻找一个有凝聚力的自我形象，因此对自己在本地区内的合理位置并不十分清楚”；庞中英在2001年发表的《中国的亚洲战略：灵活的多边主义》指出：到那时为止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并没有出现过“‘中国的亚洲政策’这样的术语”。牛军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133页。

这种看法是有部分根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通过三次重要的军事行动——1950 年 10 月—1953 年 7 月的“抗美援朝战争”，1962 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和 1979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基本奠定了中国在亚洲的地区强国地位。这三次战争决策的过程表明，中国领导人最初几乎都没有将它们看做仅仅是地区冲突。他们当时将中国同这个地区各国家的双边问题等，都同冷战、同中国在冷战中的全球性思考、战略设想及战略选择联系在一起，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中国领导人通常是根据自己对冷战下的世界政治之本质的理解和对特定时期的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选择美苏作为敌人或盟友，然后根据他们的选择来衡量和判断他国，尤其是将他国对自己的敌人的态度当做标尺来区分“敌我友”，简言之就是“以美划线”或“以苏划线”。例如，冷战时期中国在分处东亚两端的朝鲜半岛和印支大规模使用武力，两个决策各有其复杂的原因，但在战略层面思考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同中国领导人对冷战的战略态势及其对中国威胁的程度等的认知有关。前者被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反击美国的侵略；[①] 后者被他们认为是反击苏联的扩张。[②] 而且它们分别反映了中国在不同阶段的战略选择，前者是中苏同盟的产物，后者则同联美抗苏直接相关。在中印边境战争中，中国决策者也认为印度的军事挑衅同美国和苏联的鼓励和支持有关。[③]

不过全面观察冷战结束时中国的地缘安全状态就可以发现，在朝鲜半岛，在中国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破美国武力统一的政策后，形成了北南双方持续的对峙；在南亚半岛通过军事打击挫败了印度的地区野心，并帮助造成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相互制衡的局面；在印度支那半岛则是通过军事打击，同时开始持续地支持柬埔寨抵抗力量。通过直接军事打击和长期援柬抗越，最终永久性地结束了越南控制该地区的梦想，并顺便也将苏联势力排挤出去。在中国东南方向不同的毗邻地区出现类似的局面，很难说是偶然的。当然，这些并不都是因为中国的有关政策，但中国的政策肯定起了重要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的确有以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为主旨的战略原则，指导或规范着中国针对亚洲不同地区的政策，只不过它缺乏来自官方文献的系统且明确的阐释，或者说它被大量充满道义辞

①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1950 年 9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3 页。

② 《邓小平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的讲话》，1979 年 1 月 7 日，新华通讯社：《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新华通讯社，1979 年，第 22—23 页。

③ 参阅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院，1994 年版，第 111—114 页。

藻的官方文献所掩饰。

中国在这些地区的重要决策至少展示了两个共同点。其一是绝不允许敌对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即需要保持一个“缓冲区”；其二是在不同毗邻地区均“抑强扶弱”，通过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种方式造成地区内部的力量制衡，保持影响地区形势的有效杠杆。这种现象的存在决定了有必要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在冷战时期处理毗邻地区问题的动机以及有关政策的本质特征。在这方面，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是最具分析价值的。例如，在冷战时期中国对北朝鲜的支持几乎是没有变化的，一些特征甚至延续到冷战后。在印支则不同，从建国初的援越抗法，到 1954 年和 1962 年两次为实现该地区和平作出外交努力，再到 1960 年代中期大规模援越抗美，最终演变到 1979 年对越作战，此后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国在整个冷战时期对印支政策可以说变化惊人，内容复杂丰富。

二战后的印支问题最初的确是地区性的，它被卷入冷战并一度变得如此突出和具有象征性，是中美两国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胡志明声称他早在法国就信奉了列宁主义，但苏联对他的事业基本上是冷漠的。[①] 胡志明本人在战后曾经向杜鲁门政府发出呼吁，希望后者支持越南的独立和解放，美国人对此也没有什么反应。[②] 胡志明在 1946 年 12 月事变后逃入密林，他那个草房子里的政府当时被称为“丛林政权”，未获任何国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胡志明终于得到一个大国的真诚支持，他领导的反法运动实际上是在 1950 年初被中国领导人携带到苏联阵营里的。毛泽东在莫斯科时，胡志明的政权不仅被中国承认为越南的合法政府，而且还被中国当做一个国家带到苏联阵营面前。通过同斯大林协商，毛泽东帮助胡志明的政权得到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承认。[③] 胡志明在莫斯科曾向斯大林试探签订一个条约，未被后者接受。[④]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一度希望印支问题地区化，并经过努力造成了这种局面。美国从 1963 年代开始的军事介入

---

① 参阅 Marvin E. Gettlemom, Jane Franklin, Marilyn Young and H. Bruce Franklin edited, *Vietnam and American*,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85, pp. 20–21; 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 17；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7。

② 参阅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 Cambridge Press, 2006, p. 157; William Duiker, *Ho Chi Minh*, New York: Hyperion, 2000, pp. 390–391; Michael Hunt, *The American Ascendan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nd Wielded Global Dominanc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M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p 216。

③ 参阅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7 页。

④ 伍修权：《我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 1950.1—1958.10》，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3 页。

终于使这个地区成为冷战的又一个热点和前沿，随后不久中苏之间的竞争也向这个地区蔓延，局势变得更为复杂。这些发展同二战后兴起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汇合在一起，使印支成为一个罕见的被赋予全球多种政治象征的地区。1973 年美国退出那里后，苏联继续把这个地区同美苏全球对抗捆绑在一起。这些是 1980 年代中国印支政策演变的基本历史背景。

建国之初有两个因素使印支问题对新中国对外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建国伊始便提出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承诺。[①] 最初包括了在斯大林引导下给予东南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以特殊关注。斯大林在刘少奇 1949 年夏访问莫斯科时告诉后者，中共取得政权后应该多关心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②] 另一个因素是逐步形成的国防战略，它的部分内容决定了中国需要保持印支地区稳定和阻止敌对大国的介入和控制。[③] 深入探讨这两个先后出现的因素是有意义的，它们是梳理中国印支政策的主要线索，它们之间的相互交织、相互牵扯以及在各个时期发展的特点，是造成中国印支政策变动的基本原因。如果说 1960 年代中期中国的印支政策越来越多地服务于毛泽东日益宏大的全球抱负，[④] 那么 1980 年代中国印支政策的演变方向就是向以追求地缘安全为主要目标的回归。

1979 年中国对越战争决策表明，中国是否在印度支那直接用兵在当时主要是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冷战的战略态势（苏联扩张的严重性）和中国的战略处境（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和承担着维持全球均势的重要责任）的判断。[⑤] 从后来印支局势的演变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特殊影响是苏联决定放弃在印支地区角逐的同时，也逐步为中国提供了一种选择，即建立一个解决印支问题的地区框架。当然，这同美国已经在十几年前退出印支地区有关，当时美国并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办法。苏联则在美国退出后迅速进入这个地区，导致中国再次选择了同大国对抗的方式。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在退出印支地区时选择了另一个办法，即提出将越南侵柬作为东南

---

① 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30—135、163 页。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12 页；"Stalin Remark to Liu Shaoqi, re. Creating a Union of Asian Communist Parties", July, 1949, Sergei N.Goncharov, 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32–233。

③ 徐焰：《中国国防导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50—154 页。

④ 参阅《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67 年 11 月 6 日，该文称中国是"世界的革命中心"。

⑤ 邓小平：《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39—241 页。

亚地区的问题，推动中国同越南以及其他一些东南亚地区的有关国家合作，寻求最终解决地区冲突的途径。[①]尽管苏联的动机相当复杂，包括不情愿向越南施加压力等等，它的做法毕竟为中国在地区层次上思考和解决问题造成了客观的条件。

二、"项庄舞剑"与"一石二鸟"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于1979年1月7日攻占金边，被打败的红色高棉军队撤退到山区。在越南发动侵柬战争之前，中国至少在形式上还在试图缓解越南与民柬之间的矛盾，但是中国同越南的矛盾在加深以及与民柬保持密切关系并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各种支持，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越军入侵柬埔寨以后，中国立即开始谴责越南。越军攻占金边后，中国政府谴责越南的用词明显更加尖锐。李先念在当天的一次国外记者招待会上向越南发出警告说：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不能把中国的话当成耳旁风"。[②]中国越来越激烈的反应逐步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可能采取的措施的关注或期待。

从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声明和中国领导人的有关言论中可以看出，激烈反对越南侵柬首先是因为他们断定，越南侵柬同苏联的全球扩张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同苏联威胁中国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领导人几乎利用所有的国际场合指责越南侵柬是苏联霸权主义在亚洲的延伸，"是苏联争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部署的一个重大步骤"，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代理人"。[③]恰逢此时访美的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告诉美国人，中国"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越南如"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④]

客观上看，苏越之间建立的战略关系明显包含针对中国的意图，苏联在鼓励越南谋求地区权势，特别是在越南发动侵柬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越南完成国家统一后，中国印支政策的重点是阻止苏联介入这一地区，包括阻止越南与苏联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1978年11月3日，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

---

① 戈尔巴乔夫：《在授予弗拉迪沃斯托克列宁勋章大会上的讲话》，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432页。

② 《李先念在达累斯萨拉姆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1979年）》，第20页。

③ 《陈楚代表在安理会上的两次发言》，1979年1月11日，《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1979年）》，第36—38页。

④ 《邓小平同美国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时的讲话》，1979年1月31日，《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1979年）》，第76—77页。

《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是越南倒向苏联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最终决定发起对越作战的关键原因。中越双边关系中以及两国在印支地区层次上的矛盾，特别是越南入侵柬埔寨，都因为有苏联在背后支持越南对抗中国这一因素而迅速激化。

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等地区，向越南发起军事打击。中国发动对越作战的目的主要是阻止苏联在东南亚扩张，并鼓励其他国家勇于挺身反对苏联的扩张政策。中国政府公开声明，“苏越大小霸权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侵略扩张，这是当前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遭到破坏、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受到威胁的根源所在。”[①] 中共中央的有关通知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认知，它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他们相信越南入侵柬埔寨的目的是“破坏我领土安全和国家威信，配合苏霸在我北方的威胁和在印支地区以及整个东南亚的扩张”，越南已“甘当亚洲的古巴”；其二是中国惩罚越南“势必引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应”，中国有必要“做好充分准备”。中国领导人当时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同美国的情报合作，基本判定苏联的反应很可能是有限的，即在他们估计的三种可能的反应——恶骂、恐吓和局部入侵——中，第二种的可能性最高，因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以致在亚洲打仗力不从心。这并不表明越南侵柬同苏联的战略之间的联系是有限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决定对越作战时，没有提出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中国领导人当时决定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武力时，并没有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有采取措施以取得合法性的必要。在 1960 年代末调整对苏联政策时，中国领导人还认为有必要论证苏联已经变成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了。[②] 现在邓小平等显然认为，只要将越南的扩张定义为“地区霸权主义”就足够了。[③] 在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中，所谓“霸权主义”是指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侵占、统治或控制其他国家或地区，而越南作为“地区霸权主义”还是因为它是为苏联扩张服务的。这类话语反映的战略思维是需要深入分析的，它们是中国地缘安全思想的一种情不自禁的表露，而且有着潜在的强大的说服力，为对越作战提供了一种合法性。即使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只要断定它是地区安全的威胁就可以动用武力，这很能说明这个时期地缘安全的战略优先地位。

中国发动对越作战也是为了支持民柬坚持抵抗越南入侵。根据中共中央《通

① 《人民日报》评论员：《越南当局的霸权主义逻辑》，《人民日报》，1979 年 5 月 7 日。

②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人民日报》，1968 年 8 月 23 日。

③ 《大小霸权主义受到严正审判》，《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17 日。

知》的论述，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把昨日并肩作战的盟友柬埔寨当作鲸吞的对象"，"大举出兵，侵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和大片领土"。中国对柬政策更能反映中国印支政策的复杂性。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开始，中国通过事实上承认西哈努克的王国政府合法，已经为防止越南控制印支地区创造了条件，尽管当时中国领导人很可能还没有这种意图。此后中国同柬埔寨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同柬埔寨签订了互助条约并向后者提供了有力的援助和支持，多次在西哈努克面临危机时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就在越军攻占金边前不久，中国政府已经派专机接西哈努克亲王及家属到北京避难，这是这位亲王在又一次面临亡国危机时受到中国的庇护。上一次发生在1970年春美军入侵柬埔寨并扶持一个傀儡政权的时候，那时西哈努克几乎没有落脚之地，中国领导人帮助他组织了一个流亡政府。

无论不同时期中国对柬政策的目标为何，客观上的确造成了对越南统一后公然宣示的地区野心的有力制约。有研究揭示，中国在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同时，从1960年代中期起也开始关注波尔布特上台后柬埔寨共产党推行的政策，从而在柬埔寨内部鼓励起一支更为亲中国的政治力量。中国同柬共的关系或许同当时兴起的中苏论战有关，柬共全面赞成中共中央的立场，特别是赞成毛泽东视为珍宝的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另外柬共领导人对越南的地区野心有着发自心底的担心与反感。[①] 中共与柬共的这种关系使中国多了一种选择，包括利用激进的柬共来影响越南的政策。

1975年4月17日，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攻占金边，这使柬埔寨在中国政策中那种维持印支地区均势的作用明显地呈现出来。红色高棉控制金边后，中国很快予以承认，并与之签署了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6月下旬，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人访华。毛泽东等会见了到访的波尔布特等人，对柬共政策表示支持，并向他们介绍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验。[②] 这期间中国领导人多次同波尔布特等会谈，会谈必然会涉及印支地区的战略形势。邓小平在6月30日欢迎泰国领导人的晚宴上就警告说，苏联企图将东南亚纳入其势力范围，他呼吁第三世界国家应团结起来。[③]

---

① 这方面的情况可参阅 Nayan Chanda, *Brother Enemy, The War after the War*,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6, pp. 61–62.

② 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下）1972—1976》，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9—1230页；Nayan Chanda, *Brother Enemy, The War after the War*, p. 17.

③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毛泽东本人这个时期显然比较关注柬埔寨局势。1974年春，在红色高棉控制柬埔寨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曾会见在北京的乔森潘、英·萨利和西哈努克。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出柬共应继续维持与西哈努克的统一战线，双方不要分裂，要“小吵架，大团结”。[①]此后，毛泽东在会见西哈努克和乔森潘等人时，再次表示希望红色高棉同西哈努克之间应继续维持统一战线的形式，而不是分道扬镳。[②]正是毛泽东的这种关注使西哈努克还能生存下来，并在柬埔寨政治舞台上最终发挥了被历史证明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为中国后来的选择留下了更多的余地。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世时，中国对柬政策并不都是为了安全战略利益，其中包含十分浓重的革命意识形态因素。

民柬建国后不久，越南和柬埔寨就发生了边境纠纷，甚至发生过军事冲突。当时中国为了避免将越南推到苏联的怀抱，在向民柬提供援助的同时，还是希望缓解越柬冲突。但是，一旦越南最终选择公开同苏联建立军事安全关系，中国立即公开站在民柬一边。从越南统一后印支局势的发展看，民柬在印支地区有特殊的战略地位。1977年7月18日，越南与老挝签订《友好与合作条约》。1979年2月18日，越南与它扶持的韩桑林政权签订了《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此后不久，韩桑林政权与老挝于3月22日签署了《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越南操纵的这一系列准结盟活动同越苏《友好合作条约》结合在一起，已经使印支隐然形成了一个亲苏的地区军事集团，并同时对中国怀有敌意。这种局面使柬埔寨抵抗力量成为中国打破越南控制的地区军事集团的唯一杠杆。

另一方面，红色高棉的军队虽然仍然是抗越主力，但在柬内外均陷政治孤立，因此中国全力促成柬埔寨各派抗越力量结成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反越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柬埔寨抵抗力量终于联合在一起，并在1982年6月22日建立了一个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这个政府的许多重要政治活动是在北京展开的，它的国际地位也有赖于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显然，越南侵柬后中国印支政策的本质内容并没有改变。中国领导人继续将这个地区的冲突视为主要是全球冷战的反映，中越矛盾激化和越南侵柬均是苏联在印

---

① 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下）1972—1976》，第1062页。

② 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下）1972—1976》，第1256页。

支扩张的结果，越南是在配合苏联威胁中国。这种战略思维决定了中国领导人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认识和解决印支问题，中国的反应必须有利于维护中国边疆的安全，有利于遏制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扩张，以及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国际反苏统一战线。选择军事手段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能同时达成上述三个目标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柬埔寨在中国印支政策中起着地区杠杆的作用，只要有柬抵抗力量存在，印支就不可能有稳固的亲苏联地区联盟，所以支持柬抵抗力量和迫使越南从柬撤军便成为中国印支政策的主要内容，柬埔寨问题也成为中苏战略博弈的一个焦点。

三、成为中苏正常化的"障碍"

1979年3月，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军后不久，中苏关系出现重要变化。当时围绕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存废，中苏两国政府终于展开了正式谈判，尽管级别并不很高。此前双方都在考虑条约的存废，并试图利用这个机会缓和紧张关系。[①] 中苏缓和关系的结果之一是印支问题变成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障碍"。

当时中国国内对如何处理中苏条约有过比较多的讨论，尤其是中国驻苏联使馆内部经过讨论认为，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使中苏军事同盟关系已经过时，最稳妥的处理办法是同苏联谈判争取签订一个新的国家关系文件。马叙生衔命回国汇报使馆的建议后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外交部的想法同使馆的建议是吻合的。[②] 此后外交部提交了《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请示》，于3月24日获邓小平批准。4月初，邓小平做出明确指示，不再延长名存实亡的中苏条约，但应为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中苏关系举行谈判，签订相应文件。[③]4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宣布中方决定中止条约，并建议举行谈判以签订相应的文件。

苏方照例谴责了中方的决定，但仅三天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王幼平，宣布苏联同意举行谈判，并希望中方告知谈判的题目和希望达成

① 汪培柱：《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郑言：《外交纪实》，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②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3—34页；另参阅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③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209页。

的目标。[①]5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约见谢尔巴科夫，递交了中方有关谈判内容和宗旨的备忘录，包括确定两国关系准则；消除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发展贸易、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并根据谈判结果签订相应的文件，以及举行中苏边界谈判。[②] 6月4日，苏方回复表示同意举行谈判，并建议7月和8月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谈判。[③]

中方接受了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建议。一些间接的资料透露了中方的准备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8月间谈判方针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次变化导致印支问题同中苏正常化谈判直接挂钩。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苏谈判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中提出，中方谈判的核心目标是解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即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具体原则是要求苏联从蒙古撤军和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苏双方都承诺：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④] 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中国决策层决定将谈判方针从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签署协议转向消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这一转变意义重大，印支问题从此被明确纳入到对苏联政策的框架中。

中苏副外长级谈判从10月17日开始正式在莫斯科举行。苏方按照原定计划，首先提出苏中《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的草案。中方则提出《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要求苏方首先应消除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包括将苏联在中国毗邻地区的军事力量减少到1964年以前的水平；撤走在蒙古的驻军和军事设施；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此外还应先解决边界问题，以及扩大经贸交流等。苏方坚持苏联并没有威胁中国的意图，以及中苏谈判不应超出双边关系的范围，不能涉及第三方（包括苏联在蒙古驻军和越南入侵柬埔寨）。12月3日，在经过第六次正式会谈无结果后，双方同意1980年春在北京举行新的会谈。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中国政府宣布中断副外长级谈判。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阐述苏联对亚洲政策时，主要谈到对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政策。该讲话涉及对华政策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提出，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的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和当然是在不

① 参阅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46页。
② 马叙生：《结盟和对抗都不好——80年代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2000年第12期，第36页。
③ 参阅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中册，第946页。
④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4页。

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①] 这里实际上坚持了苏方不涉及第三方的原有立场。

两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②] 4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他请后者转告勃列日涅夫，中国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苏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例如从柬埔寨、阿富汗问题上做起，或者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做起。[③] 这是后来中方提出的所谓消除"三大障碍"问题的最初表述。此后邓小平在自己家里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提出要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条件的。他由此将同齐奥塞斯库所谈的三点归纳为苏联应主动解决的"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他的建议获与会者同意。[④]

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转达中方的说帖。该说贴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中方认为时机已到，已经可以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些实际的事情了；第二，建议苏方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做起；双方还应考虑为苏军撤出蒙古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同时中方也希望在阿富汗问题上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⑤] 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苏联提出"三大障碍"问题。

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递交一份备忘录作为正式答复，表示苏方愿意在任何时间、地点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谈判，以便"消除任何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邓小平在听取有关报告后决定重开中断了两年多的中苏谈判。9月18日下午，邓小平在专列上同金日成单独会谈中表示对中苏谈判仍然是不急于求成，因为中国处于比苏联有利的战略地位，有条件从正常化进程中获得包括解决印支问题在内的战略利益。[⑥]

中苏双方很快便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

---

①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授勋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3月24日，《参考资料》（下），1982年3月25日，第9—10页。

② 《人民日报》，1982年3月27日。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15页。

④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⑤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8页。

⑥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851页。

磋商。10月5日，谈判在北京举行。根据钱其琛的回忆，中方在谈判前已经有了明确的方案，即邓小平所谓“先从一件事做起”，就是指的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第一轮磋商开始后，钱其琛即强调消除“三大障碍”，他还进一步说明苏联可以从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做起。伊利切夫则重申了苏联的立场。①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政府宣布勃列日涅夫逝世。中方很快决定利用此机会改善中苏关系，决定派外交部长黄华率团专程前往莫斯科参加吊唁。13日晚，黄华在离京之前专门打电话给邓小平，请求进一步指示。邓小平在电话中对原定方针做了新的补充和修改，其内容凸显了对消除“三大障碍”的重视和对以往方针的坚持。②中国代表团启程后，邓小平又指示新华社要发一个简短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既不能简单地批评，也不能只说好话。③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以黄华名义发表的谈话稿，并于当天播发，其中明确提出要消除“三大障碍”。④

黄华在莫斯科期间取得的最重要进展是在11月16日下午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正式会谈。黄华在会谈中重申了苏联需要消除“三大障碍”，他期待葛罗米柯在苏方从中苏边界撤军方面有所表示。但是，葛罗米柯一方面明确排除讨论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的可能性，他说苏联可以做所有取决于苏联的事情来推动正常化。⑤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的苏联政局进入一个不稳定时期，主要是最高领导人不断因健康原因更换，对华政策也陷于停滞。1983年春，美苏就在欧洲地区削减中程导弹部署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8月26日，安德罗波夫接受《真理报》采访。在涉及到中国安全关切的问题上，他作出了有利改善中苏关系的回应。⑥《人民日报》于两天后摘要转载了安德罗波夫的谈话，这一非常举动表明了中方对安德罗波夫谈话的重视，不过转载时仍然批评他“对中苏关系中存在的障碍只字未提，却仍然坚持所谓的在确定中苏关系时应‘不损害第三国’的立场”。⑦不过，邓小平在9月24日同金日成的谈话表明，中国领导人认为安德罗波夫的谈话表明苏联印支政策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1—16页。
②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1—362页。
③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0页。
④ 《人民日报》，1982年11月15日。
⑤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8—369页。
⑥ 《安德罗波夫答〈真理报〉记者问》，1983年8月26日，《参考资料》（下），1983年8月27日，第3页。
⑦ 《人民日报》，1983年8月28日。

有些变化。[①] 安德罗波夫很快又去世，他的续任契尔年科病魔缠身，不久人世，中苏关系遂陷入停滞。

四、成为唯一的"障碍"

大致是在 1985 秋，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决定，即明确将解决印支问题置于"三大障碍"中的最优先地位。这一变化是逐步完成的，尽管时间并不很长，它所反映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则意义重大。在中国领导人战略思维中，印支问题也从大国全球战略对抗的层次向东亚地区问题的层次回归。伴随着这种回归，印支问题成为中苏关系的优先问题，本质上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要服务于中国印支政策的需要。

1985 年 4 月 18 日，邓小平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首次明确表达中国的战略优先，即在消除"三大障碍"的问题上，苏联可以先做说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条。[②] 这是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关注在发生变化的重要信号。中国领导人终于迈出决定性一步是在当年秋天。10 月 9 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后者给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带口信，进一步提出在"三大障碍"中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具有可信性的谅解，他本人或胡耀邦总书记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他说他甚至可以破例到莫斯科去与戈尔巴乔夫会见。[③] 在这里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即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邓小平本人甚至以访问莫斯科作为条件，敦促戈尔巴乔夫做出政治决断。这一变化是巨大的和很有分析价值的。它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已经将关注的重点从解除所谓的"苏联威胁"转向解决印支问题，即通过改善中苏关系来追求中国在印支地区的安全利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主要战略追求已经窄化到实实在在的地区战略利益。

1985 年夏，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印支政策。这一调整是以"安定南疆"为主要目的，争取尽快结束越南侵柬战争和恢复印支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这同中国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是协调一致的，中国不可能在全力以赴地追求现代化目标时，继续无限期地接受印支处于战争状态并使自己卷入其中。中国同越南的边境军事冲突仍在

①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卷，第 936 页。
②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卷，第 936 页。
③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卷，第 1085—1086 页。

持续，这不仅在干扰中国的发展战略，而且柬埔寨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长期被拖在其中会损害自己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政策调整并不是一相情愿的，印支形势在1985年夏季的确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越南领导人已经显露出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意向。1985年3月25日，越南提出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5点建议。这一方案虽无实质性突破，但在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这个关键问题上，文字表述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声明发表在契尔年科逝世两周以后，越南这样做很可能包括向克里姆林宫新主人做姿态的目的。6月下旬，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在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说，苏联和越南都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认为这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黎笋不论是否情愿，也在致辞中表示要恢复中越的"传统友好关系和正常的睦邻关系"。[②]6月28日，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苏越领导人在会谈中"涉及到了中苏关系问题"，他们相信"苏中以及越中关系的正常化将符合加强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宗旨"。[③] 在双方发表的《苏越联合宣言》中包括"双方认为，苏联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将符合加强亚洲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目的"。[④] 由于缺少历史文献，目前还无法分析和判断苏联在越南领导人就中越关系做这种表态方面起了何种作用，不过可以推断，戈尔巴乔夫要求越南领导人在对华政策上与苏联保持步调一致的可能性是很高的。特别是苏联政策的逻辑中已经出现了将越南侵柬问题地区化的含义，即由地区有关国家自己扮演主要角色来解决该问题。

中国之所以利用中苏关系正常化来推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也是因为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遇到相当复杂而且困难的局面。在如何安排越军撤出后柬埔寨的政治前途方面，中国面临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越南和苏联，还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特别关注不能允许红色高棉再次执政。中国领导人采取直接挂钩的做法反映了对中国战略利益的评估，然而柬埔寨问题的确不是苏联能够完全控制的。对于中国来说，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可以接受的，仍然保留着可以操作的

---

① 《东盟对越南提出的所谓解决柬问题的五点建议反应冷淡》，《参考资料》（上），1985年3月26日，第53页。

② 《戈尔巴乔夫和黎笋在苏方宴会上的讲话》，《参考资料》（下），1985年6月29日，第18、20页。

③ 《洛梅科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苏越会谈情况》，《参考资料》（下），1985年6月29日，第13页。

④ 《苏越联合宣言》，1985年6月29日，《参考资料》（下），1985年6月30日，第22页。

空间，也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相关问题的评估，包括如何评估苏联在促使越南撤军问题上的能力；以及随着时空的变化，中方愿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做出的让步的程度；等等。后来中苏政治谈判之所以持续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苏一时难以在越南撤出柬埔寨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上达成谅解是主要原因之一。

1985年12月下旬，李鹏访问欧洲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与前者会见。李鹏在会见中告诉戈尔巴乔夫，当前中苏关系中最关键的是解决柬埔寨问题，"只要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之间一切都好谈"。[①]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谈到改善中苏关系时，除了继续表达将追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外，并没有在中方关切的实质性问题上做出改变。苏共二十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曾经召开会议讨论该次大会的情况。在涉及中苏关系方面，与会者认为苏联"只走了一小步"，还没有下决心按照中国的条件解决印支问题。[②]

不过这时印支局势在迅速变化，最突出的标志是越南提出了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的时间表。1986年3月4日，波兰《晚快报》刊载了越南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阮颐年对记者的谈话。他说"越南军队将在1990年前撤出柬埔寨，即使那时波尔布特集团的残余分子还在"，"这甚至还可以发生得更早一些"。[③]这是自从越军入侵柬埔寨以来，越南方面首次非正式地公开表示要在1990年前撤出柬埔寨，并且不以彻底清除红色高棉作为撤军的绝对条件。3月10日，越南外交部发表《关于中国反越的敌对政策备忘录》，在指责中国时也提出"将于1990年全部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有一个政治解决办法的话还可以早些撤军"这个明确的撤军时间表。[④]柬埔寨的韩桑林政权的外交部副部长贡昆本此后不久即表示，最多用两年时间找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⑤]

越南政策的变化引起各方的重视。民柬联合政府的三方代表不久后即在北京召开内阁会议，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提出越军可以分两阶段撤军，越军全部撤出后将组成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

①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6页。

②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册，第16页。

③ 《越第一副外长说越军将在一九九〇年前撤出柬埔寨》，《参考资料》，1986年3月5日，第42—43页。

④ 《越外交部发表"关于中国反越的敌对政策备忘录"》，《参考资料》，1986年3月15日，第11页。

⑤ 《柬伪副外长宣称达成寻求柬冲突政治解决办法只限两年》，《参考资料》，1986年3月15日，第12页。

合政府，在有关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不排除将越南扶持的金边政权包括在内。[①]民柬联合政府三方在北京开会做出这样重大突破的决定，没有中国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3月18日，胡耀邦在民柬联合政府提出“八点建议”的当天就会见了民柬三方领导人，表示支持民柬的建议。胡耀邦在此次会谈中还表示，“只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可以恢复中越传统友谊”。[②]4月22日，中国政府利用中国同老挝建交25周年的机会，开始主动寻求改善同老挝政府的关系。此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和改善，到1988年6月，中老关系完全正常化。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在涉及对外政策部分中的不少内容都与中苏关系有关。他将这些内容分别放在阐述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的框架里，特别是将柬埔寨问题定义为东南亚地区问题，声称解决柬埔寨问题“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③]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明显透露出苏联不愿意再支持越南打这场毫无前途的战争，不过也不准备按照中方的要求向越南施加压力。此外，戈尔巴乔夫将柬埔寨问题作为一种地区冲突做专门论述，也是在这个基调上说应由中越之间加以解决，这是苏联在权衡各种利弊后的选择。一方面苏联还不想而且实际上也很难做到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未必能完全支配越南的政策；另一方面因为了解中方对柬埔寨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希望因无所表示而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在当年4月的中苏第8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期间，苏方就提出可以将柬埔寨问题作为一种地区冲突，与中方讨论解决办法。[④]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循着相同的逻辑，将解决柬埔寨问题作为地区冲突，推给印支地区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和越南去解决。但是，不论苏联基于何种理由，这种推脱责任的政策至少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苏联不再有意愿介入印支地区的问题，而且无意继续被越南拖在这个泥潭中；其二是将越南侵柬定义为地区问题，苏联将支持在地区内寻找政治解决办法。戈尔巴乔夫的论述方式展示了苏联外交思维的变化，从而提供了一个从地区角度认识印支问题的框架，而且苏联随后的确为此采取了实际行动。这会对中国的政策产生何种影响，的确值得观察和分析，事实上，中国能不接受这种印支问题“地区化”的逻辑吗？

中国领导人这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模糊了双方矛盾的焦点，没有完全满

①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册，第203页。
② 《人民日报》，1986年3月19日。
③ 《戈尔巴乔夫在给葳市授勋大会上的讲话》，1986年7月28日，《参考资料》，1986年7月30日，第30—38页。
④ 参阅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页。

足中国已经改变了的地缘战略关切。简单地说，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关切中，首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所谓“苏联大兵压境”，而是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8 月 13 日，中国外长吴学谦奉命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告诉他中方并不满意戈尔巴乔夫忽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这正是邓小平通过齐奥塞斯库转话的核心。[①]9 月 2 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Mike Wallace）采访时表示，如果苏联在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就可以会见戈尔巴乔夫。[②]

五、回归“地区”

到 1986 年夏季，中苏在除了印支问题之外的重要问题上都取得了进展，双方的交锋集中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上。1987 年 5 月上旬，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访华。中国总理赵紫阳在 7 日会见他时，请他向戈尔巴乔夫转达口信：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越南撤军，越军撤出后柬埔寨的内政由柬埔寨人自己解决，中国不支持任何一派单独掌权，希望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③]中国领导人在这里明确表态不支持红色高棉在越军撤出后控制柬埔寨。5 月 11 日，邓小平委托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越南方面转达中方的建议，包括：(1) 柬埔寨的内政和某个人犯的错误都不能成为侵柬的理由，越南必须首先从柬埔寨撤军，结束那里的战争；(2) 越军撤出后，柬埔寨问题由柬四方协商解决；(3) 中国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不希望红色高棉掌权；(4) 只有解决了柬埔寨问题，中越关系才能正常化。[④]至此，中方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政策已经明确。

苏联方面很快做出了反应。5 月 12 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刚从北京访问归来的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第二天，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发表谈话说，苏联认为柬埔寨问题是地区问题（而非双边问题），但苏联“准备尽可能地协助解决柬埔寨局势问题”。他也说明苏联的条件是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不能有红色高棉，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意愿。[⑤]5 月 23 日，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回答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

① 《人民日报》，1986 年 8 月 14 日；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25 页。

②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67—168 页。

③ 转引自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第 205 页。

④ 《人民日报》，1987 年 5 月 12 日，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 50 年》，上册，第 206—207 页。

⑤ 《罗高寿说苏对中苏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参考资料》，1987 年 5 月 14 日，第 16—17 页。

提问时，首次将柬埔寨问题放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范围内加以论述，认为双方都应关心并愿意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该问题。① 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必然加剧苏越关系中已有的矛盾，苏联媒体开始公开表达对越南的某些不满。

不过，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已经表明了苏联亚太政策的优先次序，即解决苏军撤出阿富汗要先于解决柬埔寨问题。所以，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虽然不断表明态度，但真正采取实际行动则要迟缓得多。越南方面当时继续坚持将越南撤军同不允许红色高棉参加越南撤军后的柬埔寨政府挂钩。苏联在此问题上显然还无法或者还不愿意劝说越南做出让步。11 月 16 日，邓小平会见土井多贺子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再次表示只要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采取行动，他愿前往苏联任何地方会见戈尔巴乔夫。②27 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赞比亚领导人卡翁达时说，他注意到邓小平同土井多贺子的谈话，他本人期待在北京、莫斯科或任何地方同邓小平会见，但不应有“先决条件”。③

1988 年 4 月，苏、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达成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苏联此后才开始采取实际行动。5 月 23 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越南外长阮基石时表示:“苏准备同有关各方一起为解决围绕柬埔寨形成的局势做出贡献。” ④ 两天后越南方面宣布，于 6 月开始从柬埔寨撤出 5 万军队，剩下的军队将由金边政权指挥，并于 1990 年底前全部撤出。罗高寿第二天即发表讲话，将越南部分撤军的决定同即将举行的中苏第十二轮政治磋商联系起来，说柬埔寨问题“将在议程上处于明显的地位”。⑤5 月 29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苏联准备同所有相关国家一起寻求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设性办法。⑥

由于苏联做出如此明确的表态，中方认为根本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在 6 月上旬的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钱其琛时，主动提出双方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柬埔寨问题。⑦6 月 20 日，第十二轮政治磋商结束

① 《戈尔巴乔夫对意〈团结报〉编辑部的书面答复》,《参考资料》，1987 年 5 月 24 日，第 79 页。

② 《邓小平年谱 1975—1979》，下卷，第 1218—1219 页。

③ 《戈尔巴乔夫会见卡翁达时谈他同邓小平会晤问题》，1987 年 11 月 27 日，《参考资料》，1987 年 11 月 28 日，第 6 页。

④ 《谢瓦尔德纳泽会见越南外长阮基石》,《参考资料》，1988 年 5 月 24 日，第 51 页。

⑤ 《罗高寿说苏希望中越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谈判》,《参考资料》，1988 年 5 月 27 日，第 5 页。

⑥ 《苏政府声明说越撤军为政治解决柬问题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参考资料》，1988 年 5 月 30 日，第 31 页。

⑦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47 页。

时双方宣布，将举行专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副部长级磋商。

在这次联大会议期间，中方很可能也感受到有关各方不仅坚持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也坚决反对红色高棉在越军撤出后控制柬埔寨政权。7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柬埔寨局势发表四点声明，表示"越南尽早从柬埔寨全部撤军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中方"赞成在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下建立柬埔寨4方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和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自由选举"，中国"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对柬埔寨的独立、中立和不结盟地位作出国际保证"。①7月2日，李鹏在担任总理后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专门谈到中苏关系与柬埔寨问题，他重申了外交部有关柬埔寨问题声明的立场。②

8月27日至31日，中苏举行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第一轮副外长级会谈。9月1日，钱其琛会见罗高寿时说，双方"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有分歧"。③9月2日，罗高寿发表谈话时说，苏方希望越南"明年撤出其全部军队，这样做肯定会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④从罗高寿的谈话中可以大致推断，在越南撤军问题上，中苏的分歧包括越南全部撤军的时间表，即中方希望越南撤军早于1990年。苏方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意愿采取更积极的行动，罗高寿第二天向越方通报了中苏会谈的情况。

中苏副外长级会谈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将柬埔寨问题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解决。越南方面一直坚持将撤军同阻止红色高棉参加联合政府挂钩，而苏联坚持越军撤出后只建立一个西哈努克领导的临时机构而非政府。目的是为了使韩桑林政权还能作为政府存在，同时保持排除红色高棉进入未来政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将越南撤军与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分开解决，是有利于进一步寻找突破点的。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谈话。他在中苏关系部分表达了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苏联"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最高级会晤"，因为中苏副外长级商谈扩大了双方对柬埔寨问题的相互了解；其二是正式提出希望中越之

---

① 《人民日报》，1988年7月2日。

② 《人民日报》，1988年7月4日。

③ 《人民日报》，1988年9月2日。

④ 《罗高寿说苏中有了更多的共同点但仍存在分歧》，《参考资料》，1988年9月3日，第6页；《罗高寿说苏中副外长会晤有助于苏中政治关系正常化》，《参考资料》，1988年9月4日，第5页。

间直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①] 苏联推动中越直接谈判来打破僵局无疑是一种策略，不过历史的转变通常就是在这种权宜之计的行动中实现的，苏联的策略背后代表的是它无意愿继续陷在印支地区，而苏联退出和中越直接谈判则是印支问题地区化的关键，这可能是中方对戈尔巴乔夫谈话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原因之一。

10 月 9 日，中国领导人召开高层会议，中方决定将越南撤军作为钱其琛访苏争取达成的目标，并决定如越南承诺 1989 年撤军，即可同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11 月 8 日，中方确定了中苏首脑会晤的具体形式。[②]12 月 1 日至 3 日，钱其琛访问莫斯科。在外长会谈中，双方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一致。苏方按照戈尔巴乔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讲话的方针，再次建议中方直接同越南谈判以促使越南方面接受最迟于 1989 年底撤军的方案，以及加快政治解决的进程。[③] 此次外长会谈的结果是双方以《共同记录》的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包括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是 1989 年 6 月到 12 月底之间。

中苏外长会谈结束后不久，越南外交部于 12 月 14 日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说，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请中国驻越大使李世淳于 15 日上午 10 时前往越南外交部商谈两国关系问题。李世淳按照国内指示于 15 日访问越南外交部，丁儒廉面交了越南外长阮基石给钱其琛的一封信，其中提出 1989 年 3 月前在北京举行两国外长会晤。中方经研究于 12 月 23 日答复越方，建议越方在近期内派一位副外长到北京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中越之间从此展开秘密谈判。[④] 以上的分析表明，苏联极有可能是越南此次向中国提出直接谈判的幕后推手。中越直接会谈具有重要意义，它是苏联退出和印支问题最终地区化的重要标志。1 月中旬，丁儒廉秘密访问北京。期间越方明确承诺，根据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协议，越军将于 1989 年 9 月底全部撤出柬埔寨，中方则表示接受这一时间表。[⑤]

2 月 2 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北京。在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双方终于在 2 月 6 日同时发表了《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从声明的内容看，苏联显然并没有完全满足中方的要求，或者说它就是双方都做了一

① 《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格斯诺亚尔发表的重要讲话》，《参考资料》，1988 年 9 月 17 日，第 21—22 页。

②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册，第 27 页。

③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29、31—32 页。

④ 李家忠：《亲历上世纪 90 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始末》，《湘潮》，2010 年第 4 期，第 36—37 页。

⑤ 参阅王泰平：《新中国外交 50 年》，上册，第 205 页。

些妥协的产物。[①]它更重要的价值是表明，当时尽管寿命已不长但毕竟还是超级大国的苏联不再干预印支地区，印支问题终于地区化，在中国对外政策框架中也终于成为一个地区问题。

结 论

在比较系统地追溯中苏关系与中国印支政策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印支问题地区化引起的中国对外政策思维的变化和对中国新地区战略的影响，这无疑需要放在中国对亚洲其他地区政策的变化这个更大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在中国新亚洲战略研究中，中国印支政策的演变只是多个视角之一，要完整呈现该战略方针的全貌，包括中美关系、中国对东盟国家政策的发展、对朝鲜半岛政策、对南亚政策等等的变化，需要更为丰富和深入的专题探讨。

（《国际政治研究》2011 年第 2 期）

① 《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人民日报》，1989 年 2 月 7 日。

中美关系

未确定的开端：内战末期中共对美政策再探讨

本文的主旨是利用近一时期出现的新历史文献再考察1948年至建国这个时期中共对美政策演变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往对此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①]那些成果主要是强调了冷战、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毛泽东的革命理念等等如何影响了中共对美政策的确立及其后果，因篇幅限制这里不再做具体的文献分析。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新的历史文献，使得有条件也有必要重新考察这一历史事件。本文不再重复此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包括对美政策）的宏观背景（很多相关的论著已经对这方面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而是聚焦于政策发展各阶段的具体事件和中共领导人处理这些事件的具体过程，包括中共内部的政策形成机制的复杂性。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说宏观背景不重要，只是要通过更具体地分析连续出现的个案和中共领导人具体的处理方式，使中共走上与美国对抗之路的过程呈现得更加完整，也提供更丰富一些的视角。实际上新出现的历史文献也足以说明，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和内容比以往研究所证明的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分析中共中央对个案的具体处理方式与宏观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逐步从中揭示和总结中共中央政策制定的机制和程序等，仍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

①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ter two, "The Myth of American Lost Chance in Chin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1，pp.39–48；杨奎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中的第二章《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77页，作者标明这一章的内容原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一、从"承认"到"挤走"

1948年春夏，中共军队开始相继攻占华北一些大中城市，中共领导人终于直接面对处理同外国官方机构的关系，对美政策从此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必须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继续用反帝口号进行政治动员，而且要满足取得内战最后胜利和建国两方面的需要。在对美政策上具体地说就是防止美国军事干涉和美国是否承认中共政权。这两个问题因中共的革命和建国在时间上重叠而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内在矛盾则是分析中共对美政策延伸和变动的重要线索。

在防止美国军事介入中国内战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的政策一如既往地在宣传上言辞激烈而政策极为谨慎细腻，特别是在涉及与美军冲突或纠纷的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明确重申必须严格执行事前请示之原则。1948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在给华东局有关谈判处理扣押5名美军人员的指示中，详尽阐述了何为"有利有理有节"，并特别指出"任何外交谈判，从中央到地方，外交代表绝不能不经请示，便可宣布谈判破裂"，"以后一切外交文稿，均应先由中央批准，然后发表"。[①] 相比较而言，有关"承认"问题要复杂得多。

从当时中共中央给有关地区领导人的指示的内容看，中共领导人最初有意愿在地方政权的层次上同美国等国家建立官方关系。7月下旬，华北局报告称，有法国领事表示希望与中共当局建立"外交关系"。中共领导人指示华北局可"非正式的同意"，他们认为法方很可能是受美国之托"试探"，故华北局要"表示出华北解放区愿意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可以推断这种态度应适用于在地方一级处理对美关系。[②] 中共领导人这种反应很难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在这方面既不了解多少情况，也很缺乏经验，所以在行动上比较谨慎，对不同情况的回应是观望和试探性的。例如规定上述原则应限于华北地区，并且"不忙订立具体的协定"，以便留下调整政策的空间。[③]

中共中央在华北地区的上述原则很快延伸到东北地区并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东北野战军攻占沈阳后，东北局直接面对处理沈阳的美国领事馆问题，中共中央由

---

① 《中央关于对美国外交斗争策略的指示》，1948年3月24日。

② 《中央关于对法国领事要求与我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给华北局的指示》，1948年7月28日。

③ 《中央关于对法国领事要求与我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给华北局的指示》，1948年7月28日；《中央关于与英商谈贸易问题给方方同志的指示》，194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9页。

此而首次明确提出了迫使美英法等承认中共地方政权合法性的方针。东北野战军于11月2日攻占沈阳。此前三天，中共中央专门就美英法等国的领事馆和侨民问题电令东北局，要求其必须要建立起专门的外事机构，必须遵守中央的指示，以及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必须请示，而“不要草率决定”。从电报的内容看，中共中央这时的意图不是要断绝同美国的关系，而是通过各种具体措施“逼使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机关，不得不承认我解放区地方政府的政府地位和权力”。[①] 这是这个阶段中共中央有关在地方层级与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明确表述，此节标题中的“承认”即指通过特定的交往方式迫使美方承认中共地方政权的合法地位。

11月1日，东北局转发给中央一份有关占领沈阳后如何处理外事问题的请示，其中包括了是否关闭外国银行和派兵警卫美英等领事馆。因为在沈阳是首次遇到苏联和美英法等国商业机构同时存在的情况，此外东北局也担心国民党特工攻击外国领馆给沈阳军管会制造外交纠纷。[②] 周恩来当天草拟了一封很长的电报。他在电报中专门叮嘱东北局，一定要特别重视沈阳地区的特殊情况，在那里中共首次遇到苏联和美英法等国领事馆、外交机构、商业机构等同时存在。为了慎重起见，东北局应暂时不停止外国银行的营业，对外国领事馆均应提供武装保护，并不得对其人员和室内实行检查。电报说“许多外交事宜和国际惯例，我们甚不熟悉”，东北局应多向苏方人员请教。但他也说明，苏方的意见也“只做参考”而已，“凡与政策有关者均应先报告中央请示”。周恩来在电报中明确要求东北局派人通知各领事馆“不得设立无线电台”，如有电台应向中共沈阳政府报告并交政府保存，归国时再交还给他们。周恩来估计美英等领事馆会有秘密电台，但东北局采取行动前必须秘密侦查证实，并报中央批准后“才得进入其内检查”。[③]

11月5日，中共沈阳市长朱其文事先未经请示就接待了美英法等国驻沈阳的领事，并于3天后回访了这些国家的领事馆。朱其文的这些行动并不能说是完全违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因为他不这样做就很难执行中共中央10月29日指示中的一些要求，向英美法人员转达东北局的有关规定，并达到迫使对方承认中共沈阳政权合法性的目的。当时东北局即对朱其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报中央。中共中央重视的是朱其文事前不请示便以市长身份与美英法官方代表接触。显然，中共内部还没

① 《中央关于对英、美、法等国领事馆及侨民的态度和方针应按丑虞电处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10月29日。

② 《东北局关于处理外国银行、领事馆的请示》，1948年11月1日。

③ 《中央关于处理外国银行及领事馆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11月1日，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94页。

有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做到上下步调一致，地方负责人对外交纪律的敏感和重视程度远没有达到中共领导人心目中的要求。中共内部的这种情况是导致后来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

11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局的报告，曾提出利用军事管制来限制美英法人员活动，相信经长期相持他们会被迫撤走。从间接披露出来的电文内容看，东北局报告说，美英法领事馆没有承认中共沈阳政权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针锋相对，也不承认它们是外交机构，同时告诫东北局一定要行事谨慎并做到事前请示。[①]这时中共领导人可能已经有了迫使美英法领馆撤出沈阳的想法，但对采取何种具体措施和到底需要用多长时间均无确切的看法，而且十分谨慎小心。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想法，很可能同东北局与美英法等领事馆打交道的情况有关。

15日，中共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向美英法领事馆发出通告，限其36小时内交出所存之电台。导致东北局采取此措施的原因一方面是落实中共中央早前的指示，另一方面就是军事形势急剧变化和苏联的反应。在辽沈战役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已经与林彪等开始讨论第四野战军秘密入关参加平津战役。11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提前结束休整，尽快秘密进入华北。从中共中央同四野司令部的来往电报中可以看出，保密是这项战略决策的关键之一。毛泽东本人极为关注沈阳外国领事馆的电台，他甚至为此指示在沈阳附近的部队，“宜推迟出发时间，因沈阳有敌电台，我一行动，敌必警觉”。[②]在取得战争胜利压倒一切的历史时刻，外交只能是配合军事行动；在无法配合时则必须让步。这是决定中共政策转变和美领事馆后来命运的至关重要的战略背景，军事压倒一切的战略优先顺序决定了中共中央在面对复杂局面时宁可选择相对简单但对保密来说最有效的办法。

就在沈阳军管会发出通告的第二天，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向高岗提出，应该没收沈阳美英法领事馆的电台，他说“这是关系苏联很大的事情”，而且暗示是苏联高层的想法。高岗当即告诉前者，已经向三国领事馆发出了收缴电台的通告，东北局对美国领事馆的方针是将其“挤走”，而收缴电台就是为了“挤走”它们。他随后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求考虑他在谈话中提出的“挤走”美国领事馆的建议。[③]

①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 39；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第5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1949》，第796页。

② 毛泽东：《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194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页。

③ 《友方要求没收美英法在沈电台》，1948年11月16日。

中共领导人很快就回电，表示同意高岗“所取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而且要高岗转告马里宁，中共的外交政策“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挤走”美国领事馆的方针似乎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从过程看，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的过程至少也是相当仓促的。所以，这个电文最后告诉高岗还是要保持一些谨慎，“关于整个外交方针及策略，另电告”。① 这表明中共领导人认为，还有必要从更大范围来考虑其含义以及如何限制其影响。

对中共中央来说，虽然能认可“挤走”方针，但不能容忍沈阳军管会事前不请示的做法。11 月 17 日，沈阳军管会在通告发出超过 36 小时之后向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报告说美方回函称侨民中无电台，领事馆中是否有电台则未谈，也没有交出电台。他们请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是否批准沈阳军管会进入美领事馆强取。② 中共中央在回电中严厉批评沈阳军管会在 15 日发出通告之前没有请示，在美领馆超过 36 小时不交电台后又不执行通告的内容，反而请示中央如何处理，这些“实为大错”。电报要求沈阳军管会应向美领事馆发出警告，在若干小时后如继续不交出电台，沈阳军管会将进入领事馆查收，并告美领馆人员因其蔑视沈阳军管会命令而禁止“与外界自由来往”。中共中央认为“如此办理”才能达到“挤走”美领事馆的目的，“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③

接获中央电报后，沈阳军管会副主任伍修权接见美领事华德，要求美方交出电台。后者予以拒绝，称那是美国政府财产，需要得到美国务院批准才行。东北局立即请示中共中央，是否可以进入美领事馆强行取出。18 日，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上写了自己的意见，从中可以看出他心情已略平静。他写道：“电台所有权可仍属美方，我接受暂时代管，将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退还。似较妥当。”④ 这表明中共领导人并不是很了解该如何应对这类涉及领事馆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特别是这时他们不打算升高对抗。

第二天，周恩来起草了回电，措辞缓和且内容十分周到。电报要求沈阳军管会进入美领事馆收缴电台时，应明确声明决不承认对方为外交机构，只视之为侨民并保护他们安全和“非正式外交往来”，如对方有违反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限制其人身自由，直到“驱逐出境”。特别重要的是，这份电报要求沈阳军管会应声明，

---

① 《同意挤走沈阳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1948 年 11 月 17 日。
② 《请即示对外领电台处理方法》，1948 年 11 月 17 日。
③ 《关于沈阳旧领事馆交出电台问题》，1948 年 11 月 18 日。
④ 《林罗陈关于到美领事馆强取电台向中央的请示》，1948 年 11 月 18 日。

收缴的电台是由中共方面保管而非没收，“待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这是目前能看到的中共中央首次提到未来存在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并可向美方表达。电报还要求沈阳军管会行动必须特别严谨，不给美方任何借口。[①] 很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留下多少时间可以供事态向前延伸，否则不论最终结果是什么，后人毕竟可以看到更丰富一些的中美关系。

东北局到第二天下午 6 时才收到上述中共中央电报。在 5 个小时以前，沈阳军管会已经按照此前的指示进入美领馆，他们不仅查收了电台及相关设备等，而且开始对美领馆实行封锁，限制美领馆人员的行动自由，并断电、断电话等。查收电台之外的种种措施是按照苏联人的建议实施的，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苏联人告诉他们，过去国民政府就是这么对付苏联驻沈阳机构的。东北局还报告说，在查收电台过程中，“美领态度一般尚乖”，不过“似乎已有逐其出境之理由存在”。[②] 看来东北局是十分支持甚至更希望尽快将美国领事馆“挤走”，他们的措施几乎是“赶走”了，这恐怕更符合他们的真实愿望。从他们因此事所受中共中央反复之批评看，外交对于中共地方领导人来说实在是巨大的麻烦，以致他们宁愿选择比较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最好是辖区内没有美国人。有必要强调，忽视地方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面临的困难和他们做出的反应有可能造成的影响，会导致对中共对外政策的解读被简单化。

沈阳军管会采取的措施超出了中共中央授权的范围，尽管比较 18 日和 19 日的电报内容，可以看出中共中央的态度的确是有过变化的，即曾经同意过东北局采取更强硬的态度直至“挤走”。在获知沈阳军管会封锁美领馆后，毛泽东首先提出对英法领事馆的态度应该比对美领事馆更缓和一些。同时又一次严厉批评东北局无视中央权威，“沈阳外交行动至今仍是事先不请示（如割断电灯电话），实在太危险了”。[③]

23 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领导人系统阐述了对美政策。电报再次强调任何外交行动都必须要事前请示，批评东北局割断美领事馆电话、电灯等行动“实属违背中央关于一切外交行动必须事先请示的规定”，东北地区要“照顾全局，急躁鲁莽不得”，任何事情“均必须事先请示中央，否则相当危险”。中共中央一再批评东北局违背外事纪律这一点也可说明，沈阳军管会的行动的确偏离了中共中央的政策

① 《中央关于沈阳旧美领事馆拒交电台处理办法给林彪等同志的指示》，1948 年 11 月 19 日。

② 《东北局常委关于接收旧美国领事馆电台情况的报告》，1948 年 11 月 20 日。

③ 《对英法态度应较对美稍微和缓些》，1948 年 11 月 21 日。

轨道，而且不仅仅是在执行外事纪律方面。中共中央在这封电报中详细阐述了对未来与美国可能发展官方关系的方针，要求目前在东北的行动必须考虑外交的全局。中共中央的原则包括：第一是对美国与英法要有所区别；第二是东北地区有特殊之处，在东北对美领馆实行的“挤走”方针不一定在其他地区也实行；第三是不承认国民政府与美国等国家的外交关系，“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①]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 11 月 17 日的电报中曾经告诉东北局领导人，将另电告之“关于整个外交方针及策略”。经过 5 天的考虑和这期间处理各种意外事件后，中共领导人终于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对未来与美国关系的设想。从电报的内容看，他们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且他们的思考远不像公开发表的反美言辞那么简单，他们至少也是考虑过为未来的政策选择保留一些空间。

此后不久，东北局报告于 21 日抓获间谍和破获间谍小组，并称他们承认与沈阳美领馆有联系，东北局还估计美领事馆中可能还有秘密电台。东北局表示非常迫切地希望能尽快查清间谍小组与美国人的联系，并明显倾向尽快将美领馆挤走。中共领导人很快复电对东北局的果敢行动表示“欣慰”，他们早已获知沈阳地区有间谍组织的电台，很担心间谍组织会危及到四野进入华北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们在电报中也指出，在未能证明该间谍组织确实与美领馆有直接关系以及不能证明美领馆有秘密电台时，不赞成东北局完全隔绝美领人员之间的往来，也不允许检查华德的私人住宅。东北局则坚持为破获间谍案线索，仍需禁止领馆人员之间的往来。12 月下旬，中共中央还指示东北局在间谍案没有新发现的情况下，应从圣诞节当日起适当放松对美领馆人员的限制。[②] 其后的事态表明，如何处理沈阳美领馆一事在当时实际上被暂时搁置起来。

处理沈阳美领馆问题的过程表明，中共此时的政策既不清楚也不稳定，波动明显。在缺乏外交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固然相当谨慎，有时甚至是紧张的。另一方面，在中央与东北局、沈阳军管会之间，政策远不能说是协调和顺畅无碍的，中共领导人有时很难直接控制住东北地方当局的作为。他们一直在避免激化与美方的关系，同时也希望在沈阳的做法不要自动地蔓延到其他地区。

---

① 《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问题给东北局电》，1948 年 11 月 23 日，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1949》，第 799—800 页。

② 《中央关于对沈阳之美英法旧领事馆人员的对策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 年 12 月 25 日。

二、“不承认”与“不断绝”

在处理沈阳美领馆问题后期，相继发生了一些与此事无关的事情也在影响中共中央的决策。12月初，中共中央接到一份来自香港的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了一位叫雷文和的美国记者告诉中共在香港的代表说，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美国政府有意承认未来的中国新政府，条件是这个政府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有上海和青岛的驻军权。毛泽东对此反应强烈。他断定美国人已经从单纯扶蒋改为一面帮国民政府军事顽抗，一面在中共革命队伍内部组织反对派，所以中共必须百倍警惕并粉碎美国的“政治计划”。他要求他的战友们传阅这份报告。[①]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未来的新国家走什么道路，他认为在这个战略性的问题上同美国的矛盾越来越深刻，而且美国一直在施展各种阴谋诡计。12月30日，毛泽东在他撰写的新年献词中将美国的行动视为中共面对的一种主要危险，美国正“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以使中共“务必要不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使反动派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所以中共必须要“将革命进行到底”。[②]

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主要还是在如何取得战争最终胜利的框架下思考和讨论与美国之间的相互“承认”问题。他们认为美国此刻提出建交问题是另有图谋，它有可能“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取得合法地位”，目的则是实施“内部破坏”，所以要警惕“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并坚决将其击破”[③]。另一方面，在沈阳遇到的复杂局面使中共领导人体会到对美外交虽不紧迫却十分麻烦，暂时搁置是成本最低的选择。所以他们在这次会议中确定了“不必忙于要”美国承认，既是因为“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也是因为还缺乏外交经验，故“不忙于解决”。毛泽东甚至提出“不承认为好”。日益高昂的革命民族主义在会议发言中反映明显，这也对“不承认”原则的提出有重要的影响，在此不详述。会议结束后不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中共

① 毛泽东：《对〈雷文和谈话摘要〉的批语》，1948年12月4日。

②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1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5页。

③ 《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

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这无疑在强化中共领导人的上述倾向，从而导致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不承认”的原则。

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发表了带有结论性的讲话，他说不急于解决美国的“外交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应急于去解决”。[①] 从中共领导人的言论看，他们这时相信搁置“承认”问题比“迫使”美国承认中共政权更有利。在会后发布的外交政策文件中，中共中央重申对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一概不予承认”，并提出对美国官方代表实行更为严格的管制，包括“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②] 中共中央提出“不承认”原则被证明是重要的，因为这时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要将“承认”作为与中共政权“讨价还价”的筹码。[③]

但是，中共军队占领南京前后的一些事态发展表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不承认”方针并不是那么坚定不移的。4月17日，周恩来就向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通报说，虽然在外交上原则问题“决不让”，特别是对美国“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但在具体执行中“又要很谨慎，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处理问题”。他透露“美国也不是不要和中国交往，司徒雷登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就是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④] 中共中央这时也已决定选派燕京大学毕业的黄华去南京，在中共南京市委中负责外事工作，包括同司徒雷登接触。中共领导人这种言行至少不能说是敌对的。可以说“不承认”此时已经延伸出了“不断绝”。

这时美国驻华使馆仍然留在南京，没有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本人也提出并在寻找同中共建立联系的渠道，他的行动也获得美国务院同意。[⑤] 美方的行动足够引人注目，不过仅此一点还不足以解释中共对美政策何以如此快地出现重大变化。还存在一些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互信的增加，导致苏联方面不打算妨碍（甚至希望）中共中央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5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

②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5页。

③ 《石博思谈话备忘录》，1949年1月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一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7页。

④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322页。

⑤ 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由来(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

4月13日，苏联代表科瓦廖夫打电报给斯大林，汇报了他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谈话的内容。毛泽东在介绍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不承认”政策时说，为了经济需要中共将不得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一些事实上的关系，但不建立合法的“关系”，他说这是“半放手的外交”。他告诉科瓦廖夫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另外，4天前他得到从香港那边来的电报说，由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介绍的美国贸易公司要同中共商谈贸易，以及还有消息说美国要通过花旗银行向中共贷款。总之，毛泽东谈了不少经济方面的问题、困难和中共中央的应对措施。显然，经济方面的困难正促使中共领导人考虑采取更灵活的“半放手外交”，他们需要了解苏联方面的态度，所以毛泽东告诉科瓦廖夫，中共中央“还没有回复呢”。[①]

4月19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回电，明确表示中共中央“不应该拒绝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官方关系”。他列举的重要理由包括：第一，这样做有利于完成国家统一，可防止那些国家支持其他政权；第二，不应拒绝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和贸易，只要不影响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工业就好；第三，苏联暂时还无法向中共提供贷款，苏联政府需要同中方政府签协议才行。换句话说就是中共中央还不能指望很快就能从苏联得到贷款。[②]斯大林的这种表态不论基于何种考虑，都使中共中央在对美政策方面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渡江战役发起前后对美国军事干涉的担心和防范也在推动中共中央考虑同美方接触。4月20、21日，中共军队在长江三江营地区同数艘英国军舰发生激烈炮战，东亚国际形势顿时紧张起来，美英苏等大国驻东亚的军队都进入紧急战备的状态，局势有一触即发的感觉。中共中央在21日接获了关于外国军舰在长江游弋情况，曾指示渡江战役前线指挥部，凡进入战区妨碍作战的兵舰，不论是哪个国籍，均可予以炮击。[③]斯大林立刻提醒毛泽东，当前最危险的是美国的军事干涉，具体地说就是美军有可能在华北地区的港口登陆，从背后攻击中共军队。[④]如何防止在紧张局势下发生美国的军事干涉等，就因长江炮战这一突发事件成了中共中央面对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

① “Bable，Kovalev to Filippov (Stalin)”, 13 April,194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after here *CWIHP*), Issue 16, pp. 159–160.

② “Bable, Kovalev to Filippov (Stalin)”, 17 April, 1949, *CWIHP*, Issue 16, pp. 160–161.

③ 《凡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1949年4月21日，参阅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5页。

④ 尼·特·费德林、伊·弗·科瓦廖夫、安·梅·列多斯基著：《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彭卓吾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169页。

中共军队攻占南京后发生的涉外事件加剧了中共领导人的担忧。4 月 25 日，攻占南京的中共 35 军一部官兵进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官邸，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来自国际舆论的压力加剧了气氛紧张。中共中央闻讯后于 27 日去电严词批评总前委，未及时对下属部队官兵进行外交政策方面的教育。电报最后说："此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①]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又从外电获悉，中共南京驻军通令不允许外国记者向外发电报稿。中共中央立即电令总前委，必须取消不许外国记者发电报的规定，并告诫说："南京为各国大使公使集中地区中外观瞻所系如此妄为极为危险。"[②] 此后，中共中央就 35 军涉外事件处理问题再次指出，对外交事务如此擅自处理，"影响所及，至为危险"。[③]

从"可能出大乱子"、"极为危险"、"至为危险"等等这些用词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对外交事务极为重视、极为谨慎，对南京发生的情况极为不满。中共军队进入南京后的一些行动证明，中共中央在指战员中进行反美教育是卓有成效的，他们的确没有了惧怕外国人的心理而且士气高昂，否则 35 军官兵未必有胆量闯入司徒雷登的官邸并感到理直气壮，以及对外国记者心存敌视。问题是在中共中央看来，如不及时控制住这种情绪，而任其自由宣泄，就有可能酿成招致外国军事干涉的事件，而这恰恰是中共中央要全力避免的。不仅如此，即使没有导致外国军事干涉，也会限缩中共领导人在外交上可以选择的空间，这时他们未必已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念头。实际上，在南京地区的基层官兵对中共中央的批评并不是完全服气的，他们能理解推翻帝国主义并坚定地为之战斗，但对中共中央指示中所说的"灵活性"却颇感费解，用他们的话说反正"就是灵活不起来"。总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官兵这种反应"是真实的合理的"，应该做出非常具体的规定以便能够执行。军队内部的这种状况也会增加中共中央的压力，推动他们在努力控制部队官兵的行动，随后发布的有关规定之具体令人吃惊，甚至包括除指定人员外，"其他任何人不得与外侨来往，不得与外侨谈话"；警卫部队在任何时候"对外侨无权使用武器，严谨开枪"，等等。[④] 总前委的回电也再次证明，在解读中共中央政策

① 《速查告三十五军派兵进入司徒雷登住宅经过》，1949 年 4 月 27 日，参阅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下卷，第 489 页。。

② 《外交事件不论大小均须经中央同意方能办理》，1949 年 4 月 29 日，参阅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下卷，第 489、492—493 页。

③ 《对三十五军擅自处理外交事件等重大问题的处理意见》，1949 年 5 月 3 日，参阅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下卷，第 495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 822—823 页。

形成过程时，的确需要重视地方领导人在具体事件中的反应，他们如何处理面对的问题往往会导致十分复杂的局面。

中共中央严格控制部队官兵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们同时力图缓和军队中官兵脱轨行动造成的与美国之间的紧张，也是为了配合随后将要展开的与美方的秘密交往。4月28日，毛泽东打电报告诉总前委的邓小平等人，美国已经“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如果美国能断绝同国民政府的关系，中共将考虑同美国建交。[①]4月30日，毛泽东以“李涛”之笔名，就英舰在长江被击伤一事发表声明，即史称“李涛声明”。毛泽东在该声明中宣布，新政权愿意考虑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条件是外国政府必须与国民政府断交和从中国撤军。[②]周恩来则告诉前往南京的黄华可以同司徒雷登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③]至此，中共与司徒雷登在南京的接触拉开序幕，而目的是为了探寻发展双方关系的途径。

三、南京秘密交往与中断

黄华被专程派往南京领导该市的外事工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黄华此后与司徒雷登的秘密会谈对中共政策的确造成了很有分析价值的影响，这段交往在史家看来还是相当精彩的。

5月7日，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走访黄华的办公室，转达司徒雷登盼与中共方面直接接触的愿望。他当时说司徒雷登之所以没有随着国民政府去广州，就是希望能与中共建立联系，而且司徒雷登的这个行动获得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首肯。可见此正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时期”，司徒雷登则是促成此次转变的最佳人选。[④]此信息转达北京后中共中央作何思考尚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大大超出中共领导人头脑中对美国人的负面想象。

对于一直在思考如何防范美军登陆华北攻击中共军队后方和防止美国人钻到

① 毛泽东：《如果美英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可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90页。

②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与30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1页。

③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④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0页。

“铁扇公主肚子里”进行内部破坏的毛泽东来说，傅泾波的谈话的确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他于三天后亲笔写了包括七点指示的回电，明确放宽了与司徒雷登接触的范围。他指示黄华可以接受邀请，前往会见司徒雷登，目的是“侦查美国政府的意向”。对于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做大使与中共办交涉和修改中美商约等，则“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毛泽东似有欲身临现场的感觉，他的指示事无巨细，包括了黄华遇到不同的情境时应该如何变换态度等等。他说如果司徒雷登态度友善的话，黄华也“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即一种“庄重而和气的态度”。[①]

5月13日晚8点，黄华以私人身份到司徒雷登官邸访问，与后者会谈两个小时。从南京市委在这次会谈后发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内容看，双方讨论的中心问题是驻华美军将何去何从和“承认”等两个问题。司徒雷登说明，美使馆留在南京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而他本人希望促成“中美双方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并“盼联合政府广泛团结民主分子参加”。在黄华问他对“李涛声明”的看法时，司徒雷登表示，美国目前无法宣布断绝同国民政府的关系，因为中共的新政府还没有成立，只有新政府成立后提出要求，美国“才能承认”。傅泾波这时询问了新政协何时召开和新政府何时成立，并说新政府成立后司徒雷登回国一趟，再由国内派来则“承认”问题“自然解决”。关于驻华美军，司徒雷登直言撤军“已不是问题”。对中共中央非常关注的美军登陆华北之可能，司徒雷登说青岛美军在中共军队到达后即撤走。当时中共中央正急于了解驻上海美军的动向。[②] 司徒雷登对此表示，那里有陆战队几百人，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侨民，中共军队“一到他们就撤走”；崇明岛以南的美军舰完成撤侨即离开。司徒雷登还说，他本人并不介意35军官兵进入官邸的行为。南京市委的报告最后将司徒雷登的谈话综合为：青岛和上海的美军会在中共军队到达前“先撤出一步”，外交上要求非正式往来并承认领事地位，司徒雷登不会在南京久留，他本人不会介意侵犯其住宅事，以及“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等等。至于司徒雷登的态度则是“惯用的友善”。[③] 傅泾波在会谈中的一些表示应该说代表了司徒雷登的设想，那些是后者碍于身份不便表达的。

黄华会见司徒雷登的结果导致中共领导人增加了对司徒雷登的信任，尽管他们在言辞上仍然是犀利无比和充满敌意的。这种信任主要反映在中共中央的军事决策

---

① 毛泽东：《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949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7—88页。

② 毛泽东：《要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1949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560页。

③ 《黄华访司徒接谈要点》，1949年5月17日。

中。在会见发生之前，中共中共曾经电令总前委，在攻占吴淞和嘉兴等重要城镇时，应“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①]在会见后，中共中央因确信美军无意军事介入，大大放宽了同外国军舰作战的限制，即不允许任何外国军舰进入黄浦江。

5月20日，毛泽东电令总前委，“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②]第二天，总前委即向吴淞口驻军传达命令，对黄浦江“实施炮火封锁，如炮击我者，更应还击”。值得注意的是，总前委的命令中解释说，实施封锁是因为外舰多为国民党海军假冒，司徒雷登已“作个人负责的表示，吴淞口内已无美军”。[③]23日，中共中央指示第三野战军“迅速准备提前入闽”，而且只要占领上海、宁波、福州和青岛等地，“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④]当然，不能说这时毛泽东因为司徒雷登的说明便完全放心了。28日，中共中央再次向各野战军发出“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的某些象征”的警告。[⑤]不过，华东局和总前委在第二天的报告中即表达了某种程度的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今后最大的困难，恐将是帝国主义从经济方面所施的压力”，当然，中央做“有备无患的谨慎部署”也是“完全必要的”。[⑥]

5月23日，毛泽东向苏联方面通报了黄华与司徒雷登会谈的情况。他告诉科瓦廖夫，黄华同司徒雷登数度会谈，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美国不支持国民政府、美军撤出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等。他介绍了司徒雷登的主要观点，后者表示美国已经停止支持国民政府，美国使馆留在南京就是一例；美军将从中共军队到达的城市撤出，如青岛、上海等，美军现在驻扎是因为那里有很多美国的财产需要保护。他还表示希望联合政府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等等。然后，毛泽东说司徒雷登在“撒谎”，而且与麦克阿瑟的行动不一致，如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撤出中

① 毛泽东：《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1949年5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575页，1949年5月6日。

② 毛泽东：《对外国军舰轮船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194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589页

③ 《总前委关于对敌舰应施行炮火封锁致粟张、军委电》，1949年5月21日。

④ 毛泽东：《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591页。

⑤ 毛泽东：《预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对策和部署》，194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600页。

⑥ 《华东局总前委关于入川闽及攻青岛等部署向中央军委报告》，1949年5月29日。

国，“我们会很高兴”。[1] 毛泽东的这番介绍更多的是政治表态。6月初，青岛美军如司徒雷登所说自动撤出后，他才基本打消了对美军事干涉的顾虑，这也是事实。这期间，苏联方面没有对中共代表与司徒雷登的接触表示任何负面评价。

6月3日，中共中央就司徒雷登回国一事给南京军管会发出指示。从这项指示的内容看，美军撤出青岛后，黄华同司徒雷登的接触已经集中到双方未来能否建立官方关系。毛泽东就司徒雷登要求访问上海一事电告南京市委，黄华可见司徒雷登，并告同意他前往上海视察，同时要声明美方不得向国民政府提出对日和约问题。他特别指示黄华可以私人身份向司徒雷登透露，新政协可能在中共军队占领广州后召开。[2] 这最后一点暗示性是很强的，因为4天前毛泽东刚刚亲自在新华社的社论《祝上海解放》中加了一段话：“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3] 此时，被搁置一段时间的美沈阳领事馆事件也出现有缓解的迹象，该领馆被允许与南京和北京的美国官方机构进行明码通讯，华德等人员不久后被沈阳军管会允许离开沈阳。[4]

6月6日，黄华按照指示与司徒雷登举行第二次会谈，内容涉及广泛。关于司徒雷登提出去上海和傅泾波去美国，黄华表示中共均可安排。关于黄华提出对日和约问题，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开罗会议的决定，在对日和约签订后就将台湾“交还中国”。关于黄华要求美国政府断绝同国民政府的关系，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就已经表明了态度，而且今后不论国民政府迁都何处，他“可肯定申明美国代表不拟随往”；由于中国政局未明朗，美“现采被动”观望。至于美援则是去年的决定，已经所剩无几。黄华则照例对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痛加指责，司徒雷登也说明了美国在建交问题上的障碍，即美国人“害怕共产主义”和“希望今后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政府。黄华再次予以批驳，然后谈话“乃告结束”。[5]

从上述报告的记录看，双方在谈到“承认”问题时矛盾不仅突出，而且相当尖

---

① “Bable, Kovalev to Filippov Stalin, Report on May 22 CCP CC Poliburo Discussion”, 23 May, 1949, *CWIHP*, Issue 16, p. 165.

② 《可允许司徒及傅泾波赴美》，1949年6月3日，参阅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下卷，第514页

③ 参阅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下卷，第511页。

④ 参阅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由来（1949—1950）》，第90—91页。

⑤ 《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年6月7日。

锐。美国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基本态度都是不急于解决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尽管司徒雷登本人作为一位曾经的传教士，可能比华盛顿的意愿要强烈一些。中共中央如前述，在 1 月就有了“不急于建交”的考虑。在美国方面，5 月 13 日，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提出有关美国驻华使、领馆地位的六点建议，其中包括只要国民政府“没有明白无误地灭亡”，美国与中共的接触就只能限于“美国人的福利、财产方面的咨询与抗议”。[①] 与此同时，艾奇逊提出了美国承认新政府的三项条件：(1) 事实上控制该国的领土和行政机构；(2) 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3) 得到该国人民的普遍接受。[②] 结果就有了后来在会谈中双方各说各话。黄华说应由“美国首先采取行动与人民民主政府建立关系”，司徒雷登则声称美国“只好处于被动地位”。[③] 这种关于谁“先走第一步”的争议后来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双方的分歧虽已十分明显，中共中央并没有做出断绝接触的决定，而且还在进一步推动双方的接触。6 月 8 日，傅泾波会见黄华，提出司徒雷登在回国前希望能访问北京（记录中用当时名称“北平”）。他还详细地陈述了对美国政府内部有关情况的看法，并说“司徒需要知道中央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黄华当时告傅泾波，他认为由于美国还没有表示要断绝同国民政府的关系，司徒雷登去北京“并非易事”。[④] 第二天，南京市委将会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接到南京市委的电报后，认为通过非官方渠道与司徒雷登接触更方便一些，故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邀请他访问燕京大学。[⑤]12 日，陆志伟起草了一封给司徒雷登的信，其内容和措辞都很值得关注。陆志伟在信中说，他 11 日上午见到周恩来，而且毛泽东也已经知道司徒雷登要来燕京。他说“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⑥] 但是，在陆志伟的信未发出之前，6 月 14 日，周恩来指示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如果再提出要求访问北京，可以表示同意他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能否与周恩来会见，等他到北京后“再定”。[⑦]15 日，毛泽东在新政协

---

① Kenneth W.Rea and John C. Brewer edit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NY: Westview Press, Inc, 1981, p.323.

②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Officers”, Washington, May 6, 1949, 5 p. 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Washington, May 13, 1949, *FRUS*, 1949, Vol.8, pp. 17, 22–23.

③ Kenneth W.Rea and John C. Brewer edit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p.322, 325, 328.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1 页；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 83 页。

⑤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 83 页。

⑥ 参阅朱梦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62—263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 21 页。

筹备会上发表讲话。他在一如既往地谴责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和阴谋之后说，中共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和“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接受“李涛声明”的立场，就可以“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①]陆志伟的信是16日寄出的，这种时间上的巧合的确比较容易扩展人们的想象空间。

6月18日，傅泾波再次访问黄华，他在这次会见中对美国在“承认”问题上的态度的陈述引起南京市委的重视。傅泾波说，司徒雷登“最近得到国务院的指令，赞成其与中共联络”，并希望他返美两个月后暂以私人身份回北京，将来两国建交后即可“重新任命其为驻华大使”。南京市委当天即报告中共中央，并询问由于傅泾波没有再提返美前访问北京之事，是否要“予以暗示”，让他主动提出访问北京的要求。[②]

21日，中共中央复电南京市委说：司徒雷登可能还会提出返美前访问北京，陆志伟也去信暗示他如果愿意来访“可能得到许可”。如果他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下面一句至关重要，为毛泽东亲自加上：“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北京，作者加），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会晤。”[③]这封电报是中共中央政策出现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不过这个变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同一天，南京市委再次写报告请示中共中央，应如何处理司徒雷登访问北京的要求。南京市委分析认为，司徒雷登要求访问北京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美方担心将来承认中共政权后，中共“不接受彼任驻华大使”。这一分析显示，至少南京市委对美国政策的估计较为积极，而且分析的相当细致深入。由于还没有收到中共中央当天发出的指示，他们对毛泽东是否同意司徒雷登访燕京大学一事并不知情，所以在报告中进一步询问中共中央，是否需要“试探司徒赴北具体任务”。从电报的行文看，他们是明显地倾向于同意司徒雷登访问北京的。[④]

陆志伟12日起草的信16日发出，信在途中几经辗转，26日才到司徒雷登手中。司徒雷登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从与周裕康谈话中听说，他去北京的话，毛泽东会视他为“老朋友”，而这天收到的陆志伟的信“也提到关于我要往北平旅行

---

①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21—22页。

③ 周恩来：《中央关于司徒雷登欲来北平事给南京市委的电报和批语》，194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19页。

④ 《司徒对黄华邀请处理请示》，1949年6月21日。

的事”。[1] 这些中间人传递的信息看来还不足以使司徒雷登得出明确的结论，他本人的确也感到困惑。这期间，司徒雷登也请陈铭枢给中共领导人带话，转达希望会见之意。他为了再试探中共中央对他访京要求的态度，还曾邀请黄华参加他的生日宴会。中共中央当时指示黄华拒绝了这一邀请，因为他们决定再等待一段时间。

这时中共与美国正处于尖锐对抗的气氛中。由于美军撤出青岛，中共中央已无军事方面的顾忌，遂于6月中旬公布了沈阳美国领事馆卷入间谍案。针对美国驻华使、领馆和美国舆论强烈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中共公开宣布将审判美领事馆涉案人员。22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不允许沈阳美领事馆任何人员离开沈阳。[2] 第二天，中共中央电告上海、南京等市委，说“帝国主义者正在采取利诱和胁迫的两种手法争取合法地位（以便从内部进行破坏)”，等等。[3] 中共中央处理沈阳间谍案实际上就是基于这种认识，向美国发出一个即使它不打算进行军事干涉了，也不要企图“从内部进行破坏”的强烈警告。也可以推测这也包含了向司徒雷登施加压力以增加其紧迫感的意图。

27日，傅泾波携陆志伟给司徒雷登信会见黄华，表示司徒雷登接信后感到突然，故希望了解中共的意图。黄华解释说，曾经向北京报告司徒雷登的愿望，但还未接获指示。如果司徒雷登仍然有此要求，他可以代为禀报。傅泾波这时做了堪称最差的外交姿态，尽管他也许只是基于习惯。他说司徒雷登原来有前往北京的愿望，但现在行期紧张，中共如同意“须尽早决定”。28日，黄华经请示周恩来后会见司徒雷登。他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明确指示，按照复电中原文逐字告诉后者北京的决定：“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当时极为高兴，立即表示虽然有很多困难，他仍决定上报艾奇逊做出决定。[4] 然而，随后的发展却是全面逆转。

中共领导人的态度在随后两天出现了剧烈变化。6月28日，黄华将27、28两天的会谈情况汇总报告中共中央。周恩来阅后即起草回复，认为傅泾波27日所持之陆志伟信内容不实。他说陆志伟给司徒雷登的信“曾由我同志交来一份”，内容与傅泾波所说不一样，而且周6月14、15两天没有见过陆，“更从未与陆谈司徒问

① 司徒雷登著：《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香港文史出版社，陈礼颂译，1982年版，第75页。

② 《不要让美领馆任何人离沈》，1949年6月22日。

③ 《对紫石英号的处理方针》，1949年6月23日，参阅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20—521页。

④ 《司徒谈话经过》，1949年6月28日。

题”，故需要详查该信的内容，他并怀疑或是陆“以假信示我”，或是傅泾波“故加数语，以抬高司徒身价”。他告诉黄华必须谨守前电既定原则，说明中共系“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而不是邀请和欢迎他；司徒雷登希望“与当局晤面亦有可能”（即不是确定的），但这些都是他提出，“决非我方邀请”，这一点“不能丝毫含糊”。电报最后说：“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①

从目前公开的历史档案中还无法找到中共政策在两天时间里急剧变化的最直接的原因。就陆志伟信的内容这件事而言，有一种可能是傅泾波在传递信息过程中，把陆志伟的信和周裕康对司徒雷登讲的话混淆在一起，从而造成了某种混乱。实际上在黄华与司徒雷登交往的全过程中，不能排除傅泾波有夸大司徒雷登与中共交往和推动双方相互承认的意愿的可能。周恩来还曾为此要求秘书杨超调阅陆志伟给司徒雷登信的中英文稿，以便查明谁是“阴谋挑拨者”。②不过重要的是中共领导人的行为方式表明，他们已经基本结束了与美国发展外交关系的想法，不打算继续南京的秘密会谈了。6月30日，就在周恩来发出上述电报当天，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并发出了一项党内通报说，通过审理沈阳间谍案证明“美使馆过去确曾从事间谍工作”。③这时刘少奇已经启程赴莫斯科，毛泽东在两周后告诉邓小平，在南京与司徒雷登接触是为了迫使美国“就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所以要尽快把“一边倒”落实到行动上，以打破美国的封锁。④

从美国方面看，当时傅泾波曾提出先斩后奏的建议，即司徒雷登先去北京，然后再向国务院报告。司徒雷登未敢如此行事，他还是于6月30日向艾奇逊发出了一份内容很乐观积极的请示电报，希望能被批准北上。结果是他的北京之行被否决，艾奇逊第二天即复电要求司徒雷登务于7月25日赶到华盛顿，中途不得停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⑤当时艾奇逊并不了解毛泽东已经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其内容。

如果说美国务院不允许司徒雷登访京和中共中央6月30日电报及毛泽东当日

① 周恩来：《中央关于司徒雷登欲来北平事给南京市委的电报和批语》，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20页。

② 周恩来：《中央关于司徒雷登欲来北平事给南京市委的电报和批语》，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21页。

③ 《美使馆曾从事间谍工作》，1949年6月30日。

④ 邓小平：《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1949年7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⑤ States Department edited, *Foreign Relation of United States*, 1949, Vol.8, pp. 377, 766–769.

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象征中共与美国接触的终结，那么美国政府于8月5日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和毛泽东随后发起并亲自参与的对《白皮书》的批判运动，则标志着后来长达20年的中美全面对抗的开始。

结　论

本文试图利用新发现的档案更详尽地揭示此时期中共对美政策发生和演变的过程，尽管复原是不可能做到的，但作为个案分析还是凸显了一些有意义的内容。首先是这项政策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其过程并不是连贯、清晰和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重点，并与不同地区的特殊条件有密切关系，这些特殊条件包括地区领导人的个人特性以及他们同中共中央的关系等。其次是对美政策在中共中央的战略表列中排序不高，这个排序大致是军事优于其他，内政优于外交，对苏优于对美，所以对美政策变化并不总是取决于双方在具体时间进行的具体交往本身，经常会受到其他一些事件的影响、牵制，很难有连贯的政策表述和行为。此文中的个案研究也证明，处理对美官方关系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是一个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领域，而且他们并不总能集中精力思考和处理相关问题，这一方面导致他们通常行事谨慎，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他们宁可选择暂不交往的原因，“不承认”其实也是一种比较简单易行的办法。

（《国际冷战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

本文的目的是从军事角度探讨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过程。此研究基于一个基本事实，即“炮击金门”不论被赋予何种政治意义，它首先是一场现代化军事行动，战略谋划、军事计划和准备等必定是很复杂的过程，而且军事战略设想和军事能力从根本上决定着政治目标的限度和结局。这决定了研究“炮击金门”决策中相关的军事问题的重要性，这也正是以往研究成果中不足之处。1958年“炮击金门”是需要进一步界定的概念。以往的研究成果都没有对这个研究对象做出明确的定义。本文使用“炮击金门”主要是为文字简洁，它是指1958年夏季解放军在福建沿海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包括空军夺取福建沿海上空的制空权、炮兵打击金门国民党守军以及陆海空三军对金门的联合封锁。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958年“炮击金门”是解放军1954年制定的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之军事计划的一个部分，是1954年春季即逐步展开的军事行动在特殊国内外环境下的继续。解放军对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进攻在酝酿阶段到后来的发展，都带有明显的防御性质，1958年炮击金门也是如此，尽管在某个阶段上被毛泽东赋予了独特的政治意义。战略谋划和作战计划包含的防御性质是导致决策动机和过程呈现复杂性的一个关键原因。多数论著是从“解放台湾”和国家统一的视角和大背景之下研究“炮击金门”，这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夺取沿海蒋占岛屿从一开始的确是夺取台湾的军事计划的组成部分，追求国家统一无疑一直是有关决策的重要动力。但是由此导致的问题是没有重视并深入分析军事计划包含的防御性这个基本但十分重大的问题。

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1958年炮击金门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这些成果的共

同特点是着重分析炮击金门的决策动机，力图通过越来越细致地勾画相关的决策过程，详细地分析和揭示有关决策动机的复杂性和发展过程。其中一些近年来发表的研究成果特别分析了中国国内因素对有关决策动机的影响，这反映了这项研究的新的进展。[①]不过，档案未公开所造成的限制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一些研究成果在着重描述决策过程时，并没有对 1954—1955 年东南沿海军事行动对 1958 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影响、军事计划与政治考虑之间的相互影响等做深入分析。弥补以往之不足并着重论证解放军军事计划包含的防御性及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一、东南沿海作战计划的形成

1958 年“炮击金门”同 1954—1955 年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有直接的联系，它是大致形成于 1954—1955 年东南沿海作战过程中的军事计划的继续实施，这项军事计划的主要和基本内容缘于 1952 年春季。以往的研究已经很详细地描述了 1954—1955 年作战的过程，但对解放军发动作战的背景和动机未做完整的分析，对军事行动过程出现的各种因素及其对后来产生的影响等，则缺乏比较详尽的阐述。

这里首先说明，1954—1955 年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是指解放军于 1954 年春开始在东南沿海展开的一系列作战，包括海空军在浙江沿海的“力量向前伸”与春汛护渔作战、空军在浙江沿海夺取制空权作战、海空军保护海上航运作战、福建沿海炮击大、小金门和浙江沿海夺取大陈列岛的三军联合作战。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大致持续到 1955 年 4 月上旬。4 月 23 日，周恩来在万隆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②]以此为标志，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

有不少资料证明，在 1954 年春季东南沿海军事行动展开后，解放军总参谋部

①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 年的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版，第 846—884 页；赵学功：《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侯晓佳：《炮击金门决策与曲折进程》，《中共党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50 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版；宫力：《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章百家：《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均载姜长斌、Robert. Ross 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版。

② 《周恩来关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的声明》，1955 年 4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国代表团出席 1955 年亚非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版，第 75 页。

开始拟订有关的作战计划，最终于8月9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①] 这项军事计划的具体内容目前还没有公开，不过可以对该军事计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做合理的推论：这项军事计划是基于对台军事斗争将长期化的判断，将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分为“两步走”，即先夺取东南沿海的蒋占岛屿和取得制空权，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完成统一台湾。这一推论是基于对有关的回忆和传记的研究，以及分析朝鲜战争后中美关系、台湾海峡的军事形势和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解放军的现代化计划等几个方面的因素。

1949年春取得渡江战役胜利以后，中共中央于6月即向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当时中共中央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关系到上海及沿海各港口城市的安全。[②] 此后随着大陆地区陆续解放，攻占台湾逐步成为解放军的作战重点之一。特别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解放台湾被确定为需要较早完成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这一时期设想是争取在1950—1951年发动攻台战役，毕其功于一役，完成国家统一。[③]

中国领导人从开始为解放台湾进行动员起，就非常关注美国的政策。当时他们认为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种判断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而根本改变。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在两天后宣布派遣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及向台湾派驻美空军。美军封锁台湾海峡和朝鲜战局的发展最终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定推迟原定作战计划。[④]

从此一直到1953年7月停战前，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主要作战行动是防御性的，包括清剿国民党军队支持的海匪，沿海城市的防空作战，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海上封锁，夺取一些沿海岛屿，等等，军事行动的规模都不是很大。根据《张爱萍传》记载，解放军华东军区于1952年春夏间开始考虑和筹划夺取东南沿海岛屿，

① 张震：《张震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9页；《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849页。

③ 周恩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1949年12月22日、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毛泽东：《关于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等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页；参阅何迪："'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1950", *Chinese Historians*, Vol. 5, Number 1, Spring, 1992.

④ 参阅《粟裕传》，第853页。

当时曾制定攻占大陈列岛的作战计划，并于 6 月中旬向军区发布作战指示。[①] 彭德怀认为当时中美正交战中，美军肯定会介入，故经毛泽东批准延后到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再实施。[②] 显然，东南沿海作战的最初设想同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并无直接关系。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此后解放军的战略重心逐步向东南方向转移，明显加强了在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并首先展开争夺浙江沿海制空权。

这个时期开始加强东南沿海军事行动的指导思想与建国初期夺取蒋占岛屿和准备攻台的军事行动已有不同。建国初期解放军的战争目标就是要彻底摧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并完成国家统一，到 1953 年前后，在解放军的相关战略思考中，已经增加了维护国家安全的观念。[③] 这首先起因于解放军制定国防政策和军事现代化计划。根据参加制定中国第一个《军事建设五年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张震回忆，1952 年春，周恩来开始领导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即要求总参提出军事建设五年计划供军委讨论。总参在制定计划过程中，明确界定了美国在朝鲜半岛、东南沿海和印度支那等三个战略方向上“构成对新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基于此判断提出了国防政策和建军方案。[④]《纲要》于 7 月获毛泽东批准后开始实施，包括在北方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南方的海南岛重点设防，修筑永久坚固的工事，等等。这种国防布局必然导致解决东南沿海岛屿和台湾问题中的国防因素突出出来，并深刻影响解放军的战略思维。

外部因素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于 1953 年 2 月起推行“放蒋出笼”政策，怂恿和支持国民党军队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军事攻击。[⑤]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事介入台湾问题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导致解放军停止攻台计划。国民党军队在 1950 年代初期仍然处在溃败中，甚至已经准备弃守大陈列岛和金门等岛屿。[⑥] 但到 1953 年夏季朝鲜停战前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支持下，在东南沿海所占岛屿逐步

---

① 东方鹤：《张爱萍传》，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656 页。

② 毛泽东：《朝鲜战争结束前不要进行对大陈岛作战》，1952 年 7 月 2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解放军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第 45 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30 页。

③ 毛泽东在考虑抗美援朝时即提出“国防线”的概念，《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14 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5 期，第 8 页。

④ 张震：《张震回忆录》，上册，第 474—475 页。

⑤ “放蒋出笼”政策的主要内容见艾森豪威尔 1953 年 2 月 2 日国情咨文中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参阅 U.S. State Departmen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 1950–195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pp. 61–65.

⑥ 胡琏：《金门忆旧》，台北黎明出版社，1976 年版，第 112 页，转引自黄文娟：《20 世纪 50 年代台海危机期间美国与两岸互动模式之研究》（博士论文），2006 年 5 月，第 62 页。

形成一条以大陈列岛为中心的战线，并以这些岛屿作为基地，加强对大陆沿海地区的海空军事攻击和侵扰。其中最大规模作战是国民党军队于7月16—17日集结12000部队，进攻福建东山岛等。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显然是进攻性的，本质上就是美国在朝鲜半岛以外开辟的另一条战线，它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包括威胁大陆渔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生产安全、海上交通安全和一些沿海城市的安全，等等。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将台湾当局的军事行动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定义为美国敌视和威胁中国的侵略性政策。①

另一个重大事态是美国同台湾当局开始磋商签署军事同盟条约，尽管双方在是否防御东南沿海岛屿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台湾当局相信签署该条约只是个时间问题。美国内部虽有分歧，但支持与台湾签约的势力显然十分有影响力。美台之间讨论签约开始于1953年春夏，此正为美国开始积极在亚洲建立和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和联盟之时。中国政府对美国这一行动高度警惕，中国主流媒体不断增加和强化宣传，谴责美国在亚洲建立军事同盟是企图侵略中国，加剧了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而美台之间酝酿的军事条约则是美国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和利用台湾威胁中国安全的阴谋。②总之，朝鲜战争结束后，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已经从建国初期的完成国家统一演变成包含完成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等两方面内容的战略问题，这是所有相关政策问题的基本背景。

1954—1955年解放军东南沿海作战持续时间一年左右，其中规模最大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是夺取大陈列岛战役，攻占大陈列岛战役的关键则是三军联合作战攻占一江山岛。此次战役与1954年7月下旬中国政府提出“解放台湾”口号等结合在一起，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往的研究多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即解放军夺取沿海岛屿和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恰恰是形成于军事行动逐步发展到高潮的1954年夏季，而不是先有计划才开始行动，故有必要深入分析制定军事计划与政治和外交考虑等之间的相互影响。

如前所述，华东军区开始考虑和筹划夺取东南沿海岛屿开始于1952年春夏，但未获批准。1953年春季，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紧张局势上升，华东军区再次开始制定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计划。从此开始到1954年7月上旬，经反复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05页。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95页。

② 《美国加紧进行敌视中国的侵略部署妄图继续奴役亚洲人民和加深国际紧张》，《人民日报》，1954年3月26日；《美国统治集团敌视亚洲人民》，《人民日报》，1954年5月14日。

论，最终形成了夺取东南沿海岛屿的战略方针，即“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①] 这个方针首先解决的是解放军应逐步夺取浙江沿海和福建沿海的蒋占岛屿，而不是同时进攻大陈列岛和金门、马祖等岛屿。其次，在浙江沿海岛屿和福建沿海岛屿之间，首先夺取浙江沿海的大陈列岛，然后再夺取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即“由北向南”，而不是先攻金门，后取大陈。[②] 第三，不论是攻占大陈列岛还是金门等岛屿，均采取从夺小岛到占大岛、逐岛进攻的作战方式，即“从小到大”，“逐岛进攻”，而不是同时攻击大陈、二陈，或同时攻击大、小金门和马祖等。至此，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作战行动也实际上分成了“两步走”。

在考虑和确定战略方针期间，局部的军事行动已经展开。1954年春季，解放军空军在浙江沿海实施“力量向前伸”，与国民党空军争夺制空权；海军则主动前出浙江海域，展开春汛护渔作战，海空军均取得显著战果。7月11日，军委基本同意浙江沿海岛屿作战方案，毛泽东本人也于当日予以批准。[③]

两天后即13日，中国政治军事领导人召开高层开会，专门讨论为到中国港口的外国商船护航。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了朱德、邓小平等，以前讨论东南沿海作战问题的会议上有党政高层领导人参加是不多见的。会议召开同外交部和国外的轮船公司要求护航有直接关系。此前国民党海空军攻击和劫持外国商船的行动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起是6月23日，国民党海军将苏联商船“图阿普斯号”劫往台湾，这严重损害了中国海上航运的安全，极大地增加了解放军护航的压力。由于苏联顾问提出了护航的建议，这在当时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在此背景下，会议责成总参作战部拟订护航和保卫领海领空的作战计划。至此时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和计划基本上是防御性的，维护东南沿海安全是作战的主要目的。

综合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和回忆录的信息，7月下旬起，中共中央的政策开始出现变化。实际上媒体公开出现明显变化应始于7月13日会议以后，这次会议对后来宣传调门的升高很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7月16日，《人民日报》就解放军护航问题发表文章，措词强烈地谴责国民党海军劫持和攻击十几个国家的商船是海盗行为，文章称解放军将为“最后收复台湾和粉碎美国的海盗行为而奋斗到底”。[④] 此后中国媒体明显加强了对美国的谴责，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谴责美国

---

①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林晓光：《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历史演进》，《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3期，第3页。

② 东方鹤：《张爱萍传》，下册，第658—659页；张震：《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1页。

③ 张震：《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4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71页。

④ 《人民日报》，1954年7月16日。

国会通过决议，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二是谴责美国企图与台湾当局签订军事条约。[①]媒体的变化至少也是部分反映了中国领导层的关注在变化，国民党海军劫持苏联商船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

根据张震回忆，彭德怀在7月22日召开的军委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指示，并指示要拟订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②]这表明，中国决策者们讨论过台湾问题，时间应在17日至21日之间，具体内容则不得而知。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批评说，朝鲜战争后没及时提出解放台湾是一个错误，他此时提出这样的批评也同英国首相丘吉尔7月14日声称要联合国托管台湾有关。[③]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重要社论，谴责美国与台湾当局密谋军事同盟，同时也批评了丘吉尔的谈话。[④]《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应当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7月24日，毛泽东在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海军上报的作战方案上批示，应召集华东、浙江和福建等军区的领导人到北京，讨论针对大陈岛的军事行动。[⑤]这个批语的内容表明，毛泽东在如何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上仍然是相当谨慎的。由于档案没有公开，目前还无法了解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是否和如何讨论相关的军事和政治等问题。但可以从7月27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了解出现的变化。《毛泽东传》介绍了这份电报的内容，即“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⑥]《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表明，电报的内容还包括了对日内瓦会议后亚洲形势的估计，即美国仍会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以及美台之间可能形成军事同盟，因此中国还面临着同国民党当局的战争，还有解放台湾的任务。[⑦]

根据《彭德怀年谱》介绍，军委于7月30和31日两天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东

① 《人民日报》，1954年7月18日。
② 张震：《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8页。
③ 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④ 《人民日报》，1954年7月23日。
⑤ 毛泽东：《对攻击大陈港敌舰方案的批语》，1954年7月2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22页。
⑥ 《1954年7月27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585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405页。

南沿海军事行动。彭德怀在会上首先说明，有必要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不过从目前的材料中还看不出他随后说明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军事计划同 7 月 11 日批准的计划相比有重要的变化。[①] 总参作战部根据 7 月 22 日会议的决定，很快制定并提交了《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的草案。这个计划的标题没有用“解放台湾”，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8 月 8 日毛泽东批准该计划，第二天政治局讨论通过，军委于 8 月 31 日正式颁布命令。[②] 此前在 23 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③]8 月 11 日，毛泽东在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说，现在提出解放台湾“是为了强调它”，“解放台湾的时间也不会很短”。[④]

以上情况表明，大致是从 7 月 16 日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赋予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更为复杂的政治内容，即基于对日内瓦会议以后亚洲形势的估计和东南沿海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利用已经确定要实施的军事行动，突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目标。这期间突出的事件是美国方面的行动，包括美国反对联合国讨论恢复中国的代表席位的言行上升；美台加强军事关系和公开宣传准备缔结军事条约；[⑤] 美海空军加强在东南沿海的军事活动；美第七舰队航母进入海南岛东部海域，最严重的是事件是 7 月 26 日两架执行护航任务的解放军作战飞机被美军击落。[⑥] 很可能是这些因素同国民党海空军的行动结合在一起，导致中国领导人认为台海紧张局势在加剧。

从实际情况看，美台商谈签约的确升高了解放军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加大了夺取沿海岛屿的困难程度。可以推断，很可能是这种局势导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赋予原定的军事行动更为明确、也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将计划中的军事行动同解放台湾紧密联系起来，在外交上同防止美台缔约结合起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解放军的军事计划本身并无重大调整。《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

① 参阅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574 页；张震：《张震回忆录》，上册，第 494 页。

② 军事科学院编：《粟裕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595 页；《粟裕传》，第 914 页。

③ 《人民日报》，1954 年 8 月 23 日。

④ 毛泽东：《海空军强大起来就能够收复台湾》，1954 年 8 月 11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227—228 页。

⑤ 《人民日报》，1954 年 7 月 24 日；美驻台大使兰金当时回华盛顿，顾维钧与包括美总统在的政要会谈后也于 7 月 20 日返台，他们都公开发表了美台缔约的言论。台湾学者张淑雅经研究认为，当时台湾舆论普遍相信美台签约只是时间问题。参阅张淑雅：《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1950 年代中美结盟过程之探讨》，《欧美研究》，1994 年 6 月，第 12 卷第 2 期，第 73 页。

⑥ 《人民日报》，1954 年 7 月 28 日。

计划与实施步骤》的内容包括东南作战的指导原则和从此时起到1957年逐步夺取浙江福建的沿海岛屿，也就是说要继续贯彻两个“两步走”。[①]

以往有不少论著认为，中国当时采取的宣传和军事行动是为了阻止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以此推论，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甚至加速了美台条约的签订过程。[②]不能说这个观点全无根据和道理。7月初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回国汇报会议情况期间，毛泽东在7日的政治局会上曾经专门提到，要争取“破坏”美国同台湾签订军事条约的可能，要采取宣传和外交两种办法，包括抨击美国的政策和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等，“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③]在7月27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中共中央提出了有关美台签约的内容。[④]但认为中共中央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消除美台签约可能性，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就很难使人相信，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真的认为，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和在沿海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就足以阻止美台签约。从逻辑上说，争取阻止美台签约和相信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就能阻止美台签约，是不一样的。包括攻占大陈列岛的军事计划，如前所述，是长期酝酿并在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之前就确定了，即使在中共中央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后，这个计划基本没有变化。从毛泽东本人7月23日亲自修改并批准下发的为外国商船护航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他在军事行动方面仍然保持非常的谨慎，如规定对外国海空军如“不发生自卫问题，一律不得采取攻击行动”。[⑤]在7月31日的军事会议上，彭德怀指示空军轰炸作战的范围仍然是在浙江和福建蒋占岛屿，并不包括台湾。《周恩来年谱》引用的27日的电文则是“击破”美台条约，其含义是可以做比较宽泛解释的。

问题的关键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理解美台条约适用范围的，即在他们看来，美台条约有可能包括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岛屿，甚至有可能将封锁中国大陆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东京湾地区”。[⑥]其结果不但会造成台湾的长期分离，而且会对中国大陆构成更加严重的安全威胁，解放军甚至无法完成预定的夺取沿海岛屿

① 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第198页。

② 代表这种观点的较近论述是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75页。

③ 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34页。

④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405页。

⑤ 毛泽东：《对军委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指示稿的修改》，1954年7月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20—221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405页。

的计划。中国领导人的担心是有根据的。6月初美海军舰队驶近大陈岛显示武力。8月19日，美海军四艘军舰抵达大陈岛，美指挥官还登岛视察。中国领导人因此必定要考虑，在美台签约的情况下应尽量阻止条约涵盖范围。

11月11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在给华东军区的命令中，指示有关部队须积极作战，以迫使美台条约不能适用于大陆蒋占岛屿。[①]11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表明，解放军当时决定尽早攻占浙江沿海岛屿，主要是为了防止美台条约包括大陆的沿海岛屿。[②] 12月初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后，华东军区仍按计划上报《关于进攻一江山作战计划方案》。有资料显示，在讨论批准攻占一江山岛过程中，中国决策层并没有因为美台签约而改变战略指导方针，实际上美台签约反而强化了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的决心。[③] 从军事角度看，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是阻止美台条约将它们涵盖其中的最可靠的保证。

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按计划向一江山岛发起攻击，并迅速达成战役目标，东南沿海作战由此达到一个高潮。第二天，美第七舰队部分舰只抵达大陈列岛外海。但此后不久，美国通过苏联方面转达国民党军队将撤出大陈列岛，希望解放军届时不要发起攻击。[④]2月8日至12日，国民党军队陆续全部撤出大陈列岛，浙江沿海其他一些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也相继撤出。2月下旬解放军占领浙江沿海全部岛屿，此地区作战基本结束。

以上分析表明，1954—1955年东南沿海作战中，夺取沿海岛屿既是解放台湾的战略步骤，也是针对被认为是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而且作战的动力首先是来自解除东南沿海面临的安全威胁。在制定和实施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计划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利用已经实施中的军事行动，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凸显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这项军事计划的防御性，毛泽东也没有因为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而提出比原定计划更激进的军事目标，他在军事问题上甚至比一些军事领导人更为谨慎。可以做合理的推论，很有可能即使没有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军事行动也会发生。这对理解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① 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② 江英:《50年代毛泽东外交思想述论》，载《从对峙走向缓和》，第587页。

③ 张震:《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5页。

④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

二、1958年炮击金门的背景与起因

近年来发表的一些学术论著对1958年夏季炮击金门的决策目标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它们比较注重揭示包括毛泽东这时对国际形势的极度乐观估计、国内“大跃进”运动的考虑、外交思想和政策的激进化等等因素的影响。[①]这些成果存在的共同问题是不重视甚至无视1958年炮击金门与1954—1955年夺取浙江沿海岛屿作战之间的联系。1958年炮击金门作战的筹划、准备到实施中的诸多特点均表明，这次军事行动同1954—1955年夺取浙江沿海岛屿作战有直接的联系，这里所谓的联系主要是指：（1）军事计划本身的连续性，（2）1954—1955年作战经验对1958年作战的指导思想和战略谋划等的影响。

首先，从军事计划的角度看，炮击金门本身就是1954年夏季制定的东南沿海作战计划在福建沿海的实施。1955年初夺取浙江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结束后，解放军并没有立即发起夺取福建沿海蒋占岛屿的战役。一些军队将领传记和年谱等披露，2月25日完成夺取浙江沿海岛屿的任务后，总参几乎立即部署将作战重点南移，着手准备夺取福建沿海制空权，以及准备攻占金门和马祖。3月上旬，总参制定了福建沿海作战方案并获军委批准。该计划准备先攻马祖，并于年内夺取金门。[②]

以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发表声明为标志，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暂告结束。但是大量资料显示，解放军的军事准备几乎从未停止。当年3月上旬，空军组织进入福建的演习，并初步拟订进入福建的作战计划。[③]5月间，总参和空军司令部即提出空军当年夏季即进入福建新建机场的计划，并获毛泽东同意。7月8日，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夺取金门的作战方案，7月14日毛泽东批准了会议的决定。在9月10日的厦门会议上，彭德怀提出了夺取金门战役的计划，获军委批准。[④]10月上旬军委多次开会讨论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并决定加紧战役准备，于11月开始实

① 宫力：《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第56—57页；章百家：《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第433—434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266—274页。

② 《粟裕传》，第915—916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590页。

③ 空军政治部编：《空军高级将领传》，蓝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④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44—45页。

施，后因未获毛泽东批准而推迟。[①] 为适应作战需要，1956 年春，南京军区进行大调整，为直接指挥进攻金门、马祖而专门增设了福建军区。9 月，中共八大召开期间，粟裕受军委委托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空军进入福建作战的各种问题，并在会后即提出空军进入福建的方针："以小进求大进，逐步往前推进"。[②] 这就是 1958 年空军进入福建的行动方针，由此可以推断，这次会议很可能讨论了相当具体的作战问题。

1958 年 3 月 5 日，彭德怀向邓小平提交空军进驻福建的计划和时机，3 天后毛泽东批示按照此计划进行准备。[③] 根据彭德怀的秘书郑文翰统计，从 1955 年到此次终获毛泽东同意为止，彭德怀已经先后六次提出实施空军进入福建的计划。4 月间，韩先楚根据军委作战设想和指示，制定了火炮打击金门的计划。上述来自各种历史人物年谱和传记的间接资料显示，1958 年 8 月炮击金门有其连续性和必然性，尽管最后一刻的决定的确有重要的政治考虑。

其次，1954—1955 年东南沿海作战所遇各种情况和获得的经验，必然会影响到 1958 年炮击金门的指导思想、战略筹划和具体的军事计划与行动。深入考察 1954—1955 年的经验，很有助于理解 1958 年炮击金门过程中诸多决策的来龙去脉。

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在 1954—1955 年的决策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原则，后来这个原则也贯穿于 1958 年炮击金门之始终。1954—1955 年作战时期，美军多次在相关海域和空域部署海空军力量，进行军事演习，对解放军进行军事威慑。中国政府在宣传中强烈抨击美国的军事干预，但在军事行动中则保持巨大的耐心和谨慎。几乎在每一个重大军事行动中，毛泽东和军委都为避免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作出具体和严格的规定。例如在筹划攻占大陈列岛时，解放军领导人多次强调应避免同美海空军作战，华东军区于 6 月 1 日即提出不得主动攻击美国海空军的规定；彭德怀在 7 月 30—31 日的军事会议上指出，作战计划应在无美海空军的情况下实施，此后听取汇报时重申避免同美海空军作战。[④] 在护航作战中，毛泽东亲自修改注意事项，强调海空军行动"仅限于"国民党军队，对美军如"不发生自卫问题，一律

① 参阅《彭德怀年谱》，第 606—607 页；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 32—33 页。

② 南京军区《杰出将领聂凤智》编委会编：《杰出将领聂凤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19 页。

③ 毛泽东：《关于空军进入福建问题的批语》，1958 年 3 月 8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79 页；另参阅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672、675 页；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 239 页。

④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574、576 页。

不得采取攻击行动”。12月中旬，毛泽东曾一度因为美军在大陈海域附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要求彭德怀等重新考虑攻占一江山的时机。[①] 在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陈列岛过程中，解放军空军做出明确和严格的规定，以避免发生误击美战机。可以做合理的推论，解放军作战的计划是建立在美军不直接介入的前提下的，如果因为政策失误而与美军发生冲突，甚至导致美军直接介入，东南沿海作战肯定无法达到预定的目的。

避免同美海空军发生军事冲突也有更深层的原因。在12月美台条约签订前，避免与美海空军作战除了战役考虑外，还有了解美国协防沿海岛屿的程度之意图。军委在7月11日的一项指示中表示，选择攻占一江山岛的目的包括“打击美蒋协防阴谋，查明美军可能采取的行动”。[②]《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该条约涵盖的范围以及该条约是否包含进攻大陆的意图，成为解放军东南沿海作战必须面对和查明的战略性问题。1954—1955年军事行动遗留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没有能最终确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否包括福建沿海的蒋占岛屿。1956年8月解放军空军击落一架美军飞机，美军立刻调动三个航母编队向江苏沿海事发地区集结示威。这也就是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中毛泽东提出“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是考验美国人的决心”的历史背景。[③]

还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1954—1955年作战是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和万隆会议召开之间展开的，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的确在考虑缓和同美国关系的可能性。从相关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军事行动中越来越多地增加了照顾外交政策的特点，“外交”这个词也开始出现在一些作战指示中。换句话说，这场军事行动揭示了东南沿海作战必定涉及重大的对外政策考虑，甚至可能成为执行某种对外政策的手段。1955年6月，空军司令刘亚楼未知会毛泽东本人即着手部署空军准备进入福建，结果受到毛泽东批评。粟裕就此事所作的书面检讨中提到，对东南沿海问题涉及“政治上复杂的外交斗争理解不深刻”。[④] 显然，负责作战的解放军领导人已经逐步形成了这种认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大有利于统一作战思想和行动。在1958年金门

① 毛泽东：《关于攻击一江山岛时机的批语》，1954年12月1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627页。

②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71页；张震：《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4页。

③ 《1958年8月18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857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7页。

④ 《粟裕传》，第916页。

作战中，空军司令刘亚楼曾向参战部队强调军委的政策："台湾海峡的斗争属于中国的内政，由于美国的介入，已成为复杂的国际性问题，因此，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① 避免同美海空军作战这个战役决定从形成到发展的复杂背景也是后来 1958 年炮击金门被称为"军事政治仗"或"军事外交仗"的原因，至少也是原因之一。

浙江沿海作战中遇到另一个重要情况是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国民党军队很快从大陈列岛撤出，其他浙江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也陆续撤出。解放军原准备在攻占一江山岛以后，观察美军是否直接介入后再决定下一步作战行动。美国通过苏联转达国民党军队将撤出并希望解放军不要攻击撤出的国民党军队，肯定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之外。自此以后，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福建沿海岛屿成为解放军作战的重要选择。1955 年 3 月 9 日军委批准攻占马祖的作战计划，毛泽东专门提示，如果"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② 在 1958 年初解放军提出的作战方案中，也包含着用炮击和封锁等军事行动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的设想。③ 这也是对金门实施三军封锁作战的由来。

从作战角度看，用军事压力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马祖固然是上上策。不过多数研究成果都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中国领导人对东南沿海作战中财政问题的考虑。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都对战费相当敏感。总参 1953 年 10 月拟定了攻占金门的作战计划，毛泽东于 12 月下旬否定了该计划，除华东军区有不同意见外，他认为所需经费过高是最主要的因素。④ 一五计划期间，中国领导人一直在控制军费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军队制定作战计划时自然会顾虑财政方面的压力，实际上东南沿海作战在规划之初便受到战费问题的很大影响。⑤ 可以对 1958 年炮击金门的决策过程做一个合理的推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超英赶美"，炮战开始不久他甚至提出经一年努力即超过英国。⑥ 这期间他不可能希望糜兵费饷地打大仗，否则他的宏大设想更不可能实现。因此在封锁作战达

① 杨万青、齐元春：《刘亚楼将军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27 页。

② 毛泽东：《关于马祖等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军不要攻击的批语》，1955 年 3 月 14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第 51 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 478—479 页。

③ 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第 209 页。

④ 《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报告的批语（手稿）》，1953 年 12 月 23 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 583 页。

⑤ 编委会编：《当代中国海军》，第 71 页；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第 193 页。

⑥ 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9 月 5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381 页。

不到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马时，结束大规模作战而不是登陆作战即“打而不登”，在战略上对毛泽东也是合乎逻辑的选择。[①] 有间接的资料表明，在7月26日的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即认为“要尽量节约可以不用的钱，投入工业建设”。[②] 在9月2日黄克诚提交的《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中，第一段即有解放军装备“不必为近期准备打台湾搞那么多那么大”。这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这个时期的想法，毛泽东第二天即批准该指示，说明毛泽东本人有同样的考虑。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东南沿海作战计划带有明显的防御性，这也是理解1958炮击金门决策本质的重要线索。以往研究成果都忽略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后，国民党空军连续两天相继对广东和福建沿海城市进行大规模报复性轰炸，造成严重损失。特别是1月20日对福州等地的轰炸，炸毁民房4000余间，引起大火烧毁民房8000余间，另炸沉炮艇一艘，炸伤三艘。[③] 可能是因为看到战报时深感痛心，彭德怀对空军进入福建一直有一种紧迫感。福建沿海制空权不仅是防空问题，还关系到金门、马祖作战的成败。解放军选择由北向南、先浙后闽，同没有取得福建沿海制空权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空军从台湾基地起飞到大陈列岛上空，因航程较远几乎无法作战，故在浙江沿海的空战中多采取少数飞机作战和骚扰战。金门离台湾机场则近的多，国民党战机可持续作战40分钟。而解放军空军从当时最近的连成机场起飞，到金门上空也仅能作战10分钟。1954年7月中旬，军委批准一江山岛作战计划并非偶然，当时空军从5月开始经过3个月作战，刚刚取得浙江沿海的制空权。所以，取得制空权不论对于防空还是夺取蒋占岛屿，都是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问题。而要取得制空权，空军能及时进入福建则成为关键。换句话说，空军进入福建又因此成为福建沿海作战的关键步骤和首要步骤。

空军进入福建涉及两方面问题。其一是修建机场和保障运输，包括修建铁路和公路。其二是解放军对空军进入福建机场对台海局势可能产生何种影响的判断和应对计划。第一个问题相对简单，相关工程在攻占一江山前后相继动工，从1955年6月到1956年5月，解放军在闽浙地区修建的一批一线、二线机场相继完工，1957年12月，鹰厦铁路也建成通车。第二个问题则比较复杂，而且对解放军的作战计划有重大的影响。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册，第173页。

② 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第216页；郑文翰：《秘书日记中的彭老总》，第320页。

③ 姚峻主编：《中国航空史》，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页。

根据在朝鲜战场与美国空战的经验，解放军空军 1955 年春在规划进入福建机场时，就设想到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首先是机场特别是一线机场一旦建成，立即招致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如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修建机场反复遭美军轰炸破坏而无法使用一样。这是 1955 年 5 月华东军区即决定空军立即进入福建已建成部分机场并获军委同意的重要原因，福州前线总指挥所于 5 月 30 日成立当与军事行动迫近有关。后军委多次讨论空军进入福建计划，终因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方面的考虑，到 11 月初停止执行。[①] 其次则是空军大规模进入福建的军事调动可能引起国民党空军的攻击和轰炸。军委和空军在规划空军入闽过程中，高度重视如何应付这种局面，这对后来炮击金门作战的影响至为重大。

如前所述，到 1958 年 3 月为止，军委多次开会提出空军入闽的时间表，均未获毛泽东批准。在这个过程中，解放军空军逐步建立了东南沿海防空体系，取得了大部分沿海地区的制空权，歼击机作战半径从浙南方向可达福建的烽火列岛，从粤东方向可达汕头，沿海仅有 500 公里地段尚无法提供空中掩护。[②] 国民党空军则利用这一空隙，经常进出大陆进行侦察和袭扰。1957 年随着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国民党空军的侦查和袭扰明显上升。11 月下旬起，国民党空军飞机一再经福建沿海进入大陆腹地，飞经地区遍及除西藏和西北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区，有时长达 9 小时，最严重的曾达石家庄地区，未被击落然后经连云港地区退出。[③] 这一情况引起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周恩来一再强调“影响太坏”。12 月 18 日，毛泽东在总参的有关报告上批示：请彭德怀“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并“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问题”。[④] 至此炮击金门已经不可避免。重复前面的有关内容是有意义的，即 1954 年 8 月颁布的《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的计划中提出，从 1954 年到 1957 年逐步夺取浙江福建沿海的蒋占岛屿。毛泽东提出 1958 年空军进入福建是有根据、有军事计划支撑的决定。

三、炮击金门决策过程探析

关于毛泽东 1958 年决定炮击金门的动机和目的可以用众说纷纭来形容，从以

---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606—607 页；《粟裕传》，第 916 页。

② 编委会编：《当代中国空军》，第 354 页。

③ 参阅杨万青、齐元春：《刘亚楼将军传》，第 332 页。

④ 毛泽东：《空军要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70 页。

往的回忆和研究成果中大致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种：支援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对美国进行战略侦察，了解美国军事干涉的底线；打击台湾当局在福建沿海和空域的侵扰；迫使美国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为“大跃进”鼓劲；对美国实行“绞索”政策，等等。[①] 这些说法都是有根据的，这至少也反映了影响毛泽东思维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经常发生变动。但是，如果仅仅罗列毛泽东在不同阶段说过的话，不进一步深入分析决策过程的内在逻辑以及这些被表述出来的目标中可能存在的内在矛盾，就很难把握炮击金门决策的本质特征。本文认为东南沿海作战计划及其在福建沿海实施的特点，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观察角度，一条可以贯穿始终的分析线索。

在毛泽东指示空军 1958 年进入福建后，福建沿海作战的解放军将领于 1958 年 1 月 15 至 19 日在福建军区曾经召开一次重要的作战会议，讨论空军进入福建作战计划，这次会议提交的报告包括了炮击金门决策过程中的几乎全部军事问题。目前仅能从《8·23 炮击金门》中间接看到报告的一些内容。也有回忆证明的确召开了这次会议，会议的报告提交毛泽东等。会议的参加者中不少参加过 1956 年中共八大期间的军事会议，他们比较了解福建沿海作战计划的主要目的和问题。有些还参加了八大后不久召开的讨论福建沿海地区作战的军事会议。[②]

1 月会议的报告在肯定空军应进入福建地区的同时，对后果做了详细的分析，其中包括：(1) 空军进入福建不会引起大战，但美军会制造台海地区紧张局势，较大的可能是国民党空军轰炸福建机场、城市和交通枢纽，解放军的“行动计划必须建立在敌人会轰炸的基础上，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2) 为反击国民党空军轰炸，直接轰炸台湾并不适宜，但可以“抓住金门、马祖这两条小辫子”，小打或大打。小打是用地面炮兵和海军舰艇打击马祖；大打则是陆炮和海空三军打击和封锁金门、马祖，报告认为“即使不用步兵登陆，也有可能将金门、马祖敌人迫走”。(3) 空军进入福建时间“最早也要到七、八月间才行”，而且那时的气象条件有利于空军进入福建的战术安排，对国民党空军作战不利。[③]

这份报告包含了作战的时间表、对作战形势和进程（包括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

① 宫力：《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第 56 页。这篇论文在有关部分罗列了几乎所有决策的目标，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② 编委会编：《杰出将领聂凤智》，第 519 页；空军政治部编：《空军高级将领传》，第 243 页；沈卫平：《8·23 炮击金门》，上册，华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 93 页。本人曾向作者求证，被告知书中所用资料均有根据，并非杜撰。

③ 沈卫平：《8·23 炮击金门》，上册，第 93—100 页。

情况等）的基本判断、应对措施和可能的结果，对理解炮击金门决策有重要价值。3月5日，彭德怀根据军委会议的精神，向邓小平提交空军进驻福建的报告，内容包括：拟定7、8月间空军进入福建，估计经长时间围困，国民党军队有可能放弃金门、马祖，但也有可能困守，海空军准备应付国民党空军对江苏、浙江和山东沿海的报复性轰炸。3天后毛泽东批示按照此计划进行准备，最后执行则视当时情况再定。[①] 以上发展证明，空军进入福建实际上是炮击金门最直接的起因，彭德怀上报的作战方案是以1月会议的报告为蓝本，即以空军进入福建作战作为夺取金门、马祖的核心环节。

毛泽东决定实施炮击金门是7月18日向正在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直接宣布的。有间接证据显示，此前一天彭德怀已经向三总部领导人传达毛泽东的决定，要求空军尽快进入福建，以及炮兵准备封锁金门，包括封锁海上航运。[②] 这部分具体内容还有必要做深入了解。据当年在总参作战部的王尚荣将军的传记记载，7月14日彭德怀等召开作战会议，制定了在福建沿海作战的具体方案和军事部署。[③] 这一日期需要进一步考证。根据粟裕的秘书鞠开记录，当天下午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第二次检讨发言，刚获通过。[④] 根据彭德怀秘书的记载，当天下午他去参加军委扩大会，彭德怀应该也在会上，陈毅在粟裕检讨后作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报告，到晚八点才结束。[⑤] 两位秘书都没有提到当天上午或晚8点以后，彭德怀与粟裕等在一起开军事会议。军委扩大会的内容也表明，当天他们讨论金门作战问题的可能性很低。根据《毛泽东传》记载，15日到18日毛泽东召集解放军领导人开会，讨论国际形势和对策，然后做出炮击金门的决定。[⑥] 如有那次讨论作战的会议，发生在17日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促使毛泽东决定立即行动的直接原因是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以及由此带动的台海局势紧张。台湾当局于17日召开紧急会议，军队随即进入紧急戒备。[⑦] 同时太平洋美军也宣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8日会议决定最迟到7月25日要大规模炮轰

① 参阅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72、675页；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39页；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第209页。

②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10页。

③ 罗元生：《百战将星王尚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王尚荣将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页。

④ 鞠开：《在跟随粟裕的日子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⑤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09页。

⑥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853页。

⑦ 《中央日报》，1958年7月18日。

金门，毛泽东说炮击的目的是以实际行动支援中东人民，作战对象是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队，空军两个师在炮击同时或稍后进入连成和汕头机场。[①] 这清楚表明，此时他决定炮击金门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干涉，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意在击美”。彭德怀随后部署作战计划，包括空军 27 日转入福建机场，炮兵准备于 25 日打击金门守军舰艇、封锁港口等。[②] 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断后，毛泽东于 1958 年 6 月中旬即向中国外交部说明，有必要调整 1954 年以来的对美政策，应该“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③] 这一看法肯定对决定炮击金门有重要的影响。

由于尚无法看到毛泽东和彭德怀 18 日会议讲话的记录，根据目前出版的间接材料分析，他们二人对作战的安排是有区别的。毛泽东强调的是大规模炮击金门，彭德怀则将空军进入福建放在首要位置。这种区别表明，毛泽东考虑的是最终的政治效果，但彭德怀的思维逻辑受到长期制定军事计划的影响，将取得制空权视为福建沿海一切作战的前提，空军进入福建是“关键的第一仗”。[④] 彭德怀从着手指挥作战那一刻起，军事行动实际上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空军进入福建；二是炮击金门。[⑤] 由于重视政治效果，毛泽东不仅强调炮击金门，而且很重视炮击的规模，提出要达到一次发射 10 万到 20 万发炮弹。从现在披露的谈话内容看，彭德怀则有意无意地显露出用炮击封锁金门的强烈意图。[⑥] 这恰恰是解放军原定作战目的之一。

从战役发展的进程看，解放军空军严格按照预定计划和作战方针，于 27 日开始陆续进入福建和粤东的各机场，29 日开始与国民党空军作战，展开夺取福建沿海制空权的战斗。可以说空战拉开了炮击金门的战幕，毛泽东却在同时决定无限期推迟炮战。他在 27 日给彭德怀、黄克诚等的信中提出暂停炮击，“看一看形势”，“总有打之一日”。他认为比较好的时机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漳州、福州、杭州、汕头等，他写到“那就最妙了”。[⑦] 信中表露出他认为此前决定有些操之过急。这封信更重要的是透露出毛泽东对空军进入福建后军事形势的判断，即他认为引发台海军事冲突特别是国民党空军进行报复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才有“等彼来攻”后再反

---

① 韩怀智、谭旌樵：《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87 页。

②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 311 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097—1098。

④ 编委会编：《杰出将领聂凤智》，第 520 页。

⑤ 编发会编：《当代中国空军》，第 334 页。

⑥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 311 页；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第 210 页。

⑦ 毛泽东：《关于把握打金门时机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1958 年 7 月 27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326 页。

击等语。

毛泽东的判断实际上再一次反映了作战计划的巨大影响。福建沿海军事行动开始于中东出现紧张局势之后，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关注和讨论该事件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影响，包括是否引发世界大战，虽然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高。在这种气氛影响之下，战争问题和准备打仗迅速成为军委扩大会的重要内容。这次军委扩大会持续了两个多月，一直以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中心内容，7月15日以后开始发生变化，18日以后差不多都是讨论战争和国防问题，结束时彭德怀则要求各位领导人迅速回到各自的岗位，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另一方面，不仅1月19日形成的空军进入福建计划认为国民党空军会报复性轰炸沿海城市，7月18日布置作战和随后的讨论中，彭德怀亦提出要准备“打大仗、打恶仗”。可以说准备反击国民党空军很有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一直是解放军作战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以上判断，如何在空军转入福建机场过程中尽量避免国民党空军的报复性轰炸和与美军发生冲突，成为解放军领导人高度关注的问题。军委和空军对作战行动做出极为严格的规定，包括：(1) 空军不进入公海作战；(2) 国民党空军不到大陆轰炸，解放军空军不轰炸金门、马祖，如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解放军空军即轰炸金门、马祖，但不轰炸台湾；(3) 不主动攻击美军，除非美军侵入中国领空。[①] 毛泽东本人同样对空军的行动极为慎重，尽管他的语言总是豪情万丈的。聂凤智曾经回忆毛泽东非常关注空军进入福建可能遭受攻击，在空军于8月初进入漳州机场时，他甚至直接向聂凤智了解飞机着陆的朝向，并告诫战机不得进入金门上空。从纯军事的角度看，1958年7月中旬选择美国在中东进行军事干涉时发动金门作战，其实就是选择了美国进行军事干涉可能性最低的时机，也就是最符合解放军作战设想的时机。当年负责指挥空军进入福建作战的聂凤智就曾认为，选择美国干涉中东时决定空军进入福建，“迫使美国难以顾及东西两头”，其意即美国很难在台海直接军事干涉。[②]

以上的分析至少也证明了原定军事计划的确对决策有强大的影响力，用炮击金门支援中东人民很可能是毛泽东一时兴起，绝非神来之笔。27日的信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在空军开始实施进入福建作战时，毛泽东便放弃了用炮击金门支援中东人民的想法，或者说这个想法已经很不重要了，保证空军顺利进入福建并取得制空权等成为首要的目标。在这里不妨提出这种可能性，即不论是否为了“支援中东人

① 编委会编：《当代中国空军》，第341页。

② 编委会编：《杰出将领聂凤智》，第502、503页。

民”，解放军空军这时都会进入福建。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即使没有中东局势紧张，夺取福建沿海制空权的军事行动也照样会发生，而一旦发生后形势将如何发展，导致炮战至少也是可能性之一。这里顺便提出一个问题，从毛泽东27日信的行文看，选择7月25日即发动炮战这个具体的决定未必是他本人做出的。这需要进一步分析，也有待档案解密。

8月17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18日凌晨1点在一份报告上批语，再次提出准备炮击金门，并说明作战目的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①] 该报告是广州军区拟在深圳方向举行军事演习的请示，起草时间是在8月13日，何时报到毛泽东处尚不清楚，批语何时转回彭德怀处也不清楚。8月20日上午彭德怀等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下午毛泽东召集开会，研究作战方案。21日叶飞到北戴河汇报前线情况，在下午的会上做出23日开始炮击的决定，当晚军委向前线下达作战命令。[②]

毛泽东再次决定炮击金门的动机是理解此后决策发展演变的关键因素，如何解读“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则是核心。吴冷西的回忆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因为他本人参加了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当天）和8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都谈了（不可能不谈）炮击金门的目的。分析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所谓“直接对蒋”包括炮击和封锁金门，迫使国民党军队自己撤出金门，在封锁无法达成目的的情况下是否发起登陆作战，则要“相机行事”，关键是美国是否军事介入。所谓“间接对美”就是通过作战了解美国协防金门的决心，即“侦查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毛泽东在23日的会上也有不少豪言壮语，如“思想上获得解放”、“支援阿拉伯人民”、“整美国人一下”，等等。[③] 这些话固然均事出有因，但此时更像是毛泽东正当化自己决定的论述，毕竟大规模炮击是有风险的，解放军的作战计划中也明确指出，存在国民党军队不撤出金门的可能性很高。正当化自己的行为是人的天性，毛泽东也不能例外。更重要的是后来决策目标的实质性调整一直围绕着是否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展开的，与那些激情的语言并无直接联系。例如，毛泽东后来从没有考虑是否能起到“支援阿拉伯人民”的作用，便决定将金门留在蒋介石手中。

---

① 毛泽东：《关于停止在深圳方面的演习准备打金门的批语》，1958年8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48页。

② 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第214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856页；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54页。

③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4、76—77页。

毛泽东8月18日决定炮击金门曾使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不少人感到突然，因为13日彭德怀指示王尚荣，如无情况福建前线部队可以解除战备。总参19日已经通知前线部队解除战备。不过客观地看，解放军炮兵和海军已经完成大规模集结和实战准备，要参战部队长期盘马弯弓，引而不发，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必定要做出选择，或者在不出现国民党空军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放弃炮击金门，或者选择作战方案中强度更高的作战方式。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选择炮击金门。以上曾分析毛泽东决心炮击的动机，尽管还无法更确切地分析和证实他此时下决心的思维过程，但是已经形成某些有利再战的客观条件则是有迹可寻的，这些条件肯定有助于推动毛泽东升高作战强度。

首先是空军已经陆续进入福建，并在夺取制空权的战斗中取得初步胜利。在夺取粤东和福建制空权战役的第一阶段，即7月27日至8月22日，进入福建的空军部队出动战机255批共1077架次，空战四次，击落国民党空军战机4架，击伤5架，解放军空军仅被击落1架。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将领认为极有可能发生的中等规模的空战和国民党空军轰炸沿海城市的情况等并未发生，国民党空军每天约100架次飞机起飞，主要在台湾海峡上空巡航，仅有少数进入大陆上空侦察飞行。事实表明解放军的作战计划高估了国民党空军的反击能力，加上解放军空军逐步取得空中优势，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使尝试升高作战强度以加快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的进程，成为合理的选择。

其次是赫鲁晓夫于7月31日到8月3日访华，结束时中苏发表了联合公报。这次中苏峰会和联合公报的发表，为炮击金门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在中国是否向苏联通报福建沿海作战行动这个问题上，以往存在一些不同看法。这里的事前通报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是否通过双方的军事或外交部门进行了协调；二是在7月底到8月初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是否告诉他中国的军事计划。中国一些新出版的官方论著和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炮击金门之前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向苏方通报相关军事计划。当然，在有关档案可以被直接查阅之前，仍然要保留一些谨慎。《毛泽东传)》披露了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纪要，前者在谈到炮击金门问题时说，那时美国“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他解释说首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其次是“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①] 这

①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855页。

种解释是比较可信的。吴冷西曾回忆，毛泽东在当年 11 月的郑州会议上说过："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 7 月底 8 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这里毛泽东说得再明白不过，即有关炮击金门同赫鲁晓夫"一句话也没有谈到"。①

以上证据表明，毛泽东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并没有同后者谈过炮击金门问题。但是，赫鲁晓夫访华本来是秘密进行的，却大张旗鼓地离开，很容易造成中苏在协商重大决策的印象。赫鲁晓夫同毛泽东发表的《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中说，两国领导人"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② 当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即毛泽东以中苏军事合作出现分歧为理由促使赫鲁晓夫紧急访问北京，本来就是为了使美国认为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得到苏联的赞成和支持，毕竟这时空战已经开始。客观上给美国人造成中国的军事行动得到苏联支持的印象，这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时避免美军直接介入肯定是有利的。

如上所述，毛泽东决心炮击金门的最高目标是争取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等地。不过他和其他领导人也都无把握靠现有作战规模即能实现这一目标。③ 问题是升高军事行动强度就有可能招致美军直接介入，而避免美军直接介入又是军事行动的一个底线，是决策过程中贯彻始终的原则。中国领导人有关避免与美军直接冲突和避免采取有可能导致美军直接介入的指示和部署等，已经为众多论著所描述。④ 被忽视的是还存在另外一条底线，即尽可能避免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地区。特别是 9 月 17 日以后，美空军接手台湾的防空，使国民党空军得以每天投入 200 多架次战机在金门掩护空投、海运，并经常集中数十架战机在福建沿海上空巡航，以伺机空战。周恩来在 22 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轰炸金门"更不适宜，因这样做，恰好给蒋介石空军以轰炸我大陆的机会"，他认为在美国因不了解中方意图而不支持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的情况下，"我就以不促成蒋空军向我大陆轰炸为有利"。毛泽东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86—187 页。

② 《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4 日。

③ 编写组：《王尚荣将军》，第 423 页。

④ 可参阅《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 857–861；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 333—342 页。

则认为周恩来的方针"是很对的"。[①]对这两条底线的坚持再次证明了军事计划的重大影响，也证明了作战的防御性并没有因为选择炮击金门而消失。

可以大致推断，经过一段时间炮击和封锁以后，毛泽东已经看到单靠现有军事手段和作战规模，很难迫使国民党军队自动撤出金门。9月3日，毛泽东在黄克诚起草的《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批示"写得很好"。[②]这项指示明确说明，解决台湾和沿海岛屿问题"必须有长期的打算"，长时间内不在金门、马祖登陆作战，以及不升高当前作战的规模和强度。[③]这里已经确定了不急于攻占金门的方针。这再一次证明，毛泽东最终还是在既定的军事计划中选择行动方案，尽管他随后不断赋予军事行动更多的政治意义。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迫使国民党军队自动撤出金门？选择无非是长期僵持，或寻找其他办法。

在9月5日、8日的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所谓"绞索"的概念，即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防守金门等岛屿，等于"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④]如果仔细比较这两次讲话便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路明显地转向如何利用美国迫使国民党从金门等岛屿撤走。5日的讲话表明，毛泽东断定美国已经协防福建沿海蒋占岛屿，即"一切包过去"了。8日的讲话则透露出他已经认为美国"形成了金马脱身政策"，办法就是国民党军队"这十一万人走路"。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9月4日以后相继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造成的。

9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做这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为美军划出一条不得逾越的界限，是典型的危机管理措施，也是进一步向美国施加压力。中国政府的声明还包括明确宣布，包括金门在内的福建沿海各岛"都是中国的内海岛屿"。[⑤]同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声称美国会授权美国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⑥]当天美国务院声明，不承认中国政府关于12海里领海宽度的主张。[⑦]杜勒斯声明的主调使毛泽东当时

---

① 毛泽东：《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1958年9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24—425页。

② 毛泽东：《在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上的批语》，1958年9月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6页。

③ 参见《毛泽东传》，上册，第859—860页；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第861页。

④ 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8日，第384、393页

⑤ 《人民日报》，1958年9月5日。

⑥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后授权杜勒斯发表的声明》，1958年9月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681—2683页。

⑦ 《美国国务院关于拒绝我领海决定的声明（报道）》，1958年9月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683—2684页。

相信，美国要用“大包干制度”来协防金门。但他很可能也注意到杜勒斯声明中也有寻求谈判的内容。他在6日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谈时说，美国有可能逼迫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退。[①] 同一天周恩来发表声明，在强烈谴责美国军事干涉的同时，也宣布“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②]

还没有历史文献能用来解释周恩来此刻发出这一声明的原因和决策过程。目前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美国务院9月4日声明中，很明显地将金、马与台、澎分开，声称中国政府用12海里领海权“把所谓解放沿海岛屿跟台湾和澎湖列岛直接联系起来”。[③] 美国做这种切割也算用心良苦，有意义的是周恩来6日的声明中也将金马与台澎分开论述。声明中的点睛之笔是：“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还存在像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④] 这句话既说明了两个问题的不同性质，也点出了中国政府的轻重缓急。第二种可能是苏联外长葛罗米柯9月5日到中国，或许是苏联的担心或其他表示起了特殊作用，中国领导人需要有所表示，不如此则难以获得苏联的有力支持。以上两点都是推论，也可能是它们共同起了作用，这些都需要深入挖掘历史文献来证明。

美国政府几乎是立即对周恩来6日的声明做出反应，白宫发言人当天即声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特别注意到”周恩来的声明中提到，中方“准备同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美国驻华沙大使“随时准备立即”同中方代表会晤。[⑤] 毛泽东很可能是根据此声明断定，美国有从金、马“脱身”的意图和可能，所以他设想利用中美大使级会谈，促使美国压蒋介石从金门撤军。8日讲话中“十一万人走路”既出于此，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解放军随即加强了对金门的炮击和封锁。美军对解放军炮击的反应则一度加强了毛泽东的信心。9月10日，外交部拟定了与美国谈判的协议草案，其中包括中国必须收复金门、马祖，“如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地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不予追击”，以及“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第180页。

② 《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

③ 《美国国务院关于拒绝我领海决定的声明（报道）》，1958年9月4日。

④ 《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

⑤ 《美国白宫关于同我恢复谈判的声明》，1958年9月6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688页。

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①]

9 月 15 日，中美开始第一次会谈，中方代表很快提出预订方案，但遭到美方拒绝。中国领导人几乎立刻意识到，以军事压力和外交手段促使美国逼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马祖同时就和平解决台、澎作出承诺，不仅使相对主动的局面出现逆转的趋势，而且中方的方案有可能被美国利用来造成台、澎与大陆永久隔绝的结果。在第二次会谈中，中方立刻调整了谈判策略，以针锋相对的姿态谴责美国在台湾地区干涉内政。随后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和考虑，毛泽东等终于下决心不攻占金、马，将它们同台、澎等“一揽子”解决，“一下子收回”。[②] 目前能看到，在 10 月 6 日，中联部、外交部和对外文委向驻外和涉外机构发出通知，指出美国“也可能提出以蒋介石部队撤出金门、马祖来换取我们放弃解放台湾、澎湖列岛，承认美国侵占台湾、澎湖列岛合法化”，故在外交中必须强调反对“两个中国”，以及中国必须收复包括台、澎、金、马的全部领土。[③] 显然，中国领导人已经确信，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更有利于阻止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④] 这实际上意味着攻占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计划到此结束。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解放军已经形成三军联合打击和封锁金门的能力，并取得了随时打击金门的主动权，对蒋介石来说金门已成困局，虽然还有政治价值。特别是解放军空军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即 8 月 23 日到 10 月中旬，进入全部福建一线机场，在飞机数量和性能上占有明显的优势。经 10 月 10 日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空战，解放军空军完全取得制空权，国民党空军不再进入大陆上空作战。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基本确定，美国对福建沿海岛屿的政策并不是进攻性的，美国甚至有可能不再帮助台湾当局防卫这些岛屿。从国防的角度看，已经没有来自福建沿海岛屿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美国不大可能利用它们攻击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则没有这个能力。[⑤] 这种判断极大地缓解了使用武力夺取这些岛屿的压力。换句话说，解放军

---

① 《中美关于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协议声明（草案）》，1958 年 9 月 10 日，外交部档案馆，编号：111–00146–01。

② 毛泽东：《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958 年 10 月 2 日，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56 页。《周恩来与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 年 10 月 5 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册，第 877—878 页。

③ 《关于对外宣传和国际活动中揭露和打击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问题上制造新阴谋的通知》，外交部档案馆，1958 年 10 月 6 日，外交部档案馆，编号 102–00006–06。

④ 毛泽东：《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958 年 10 月 2 日。《周恩来与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 年 10 月 5 日，第 877—878 页。

⑤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 84 页。

虽然没有最终攻占金门、马祖，但实现了根本消除美军和国民党军队利用福建沿海岛屿威胁大陆的目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54 年展开的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是在中美因朝鲜战争而处于尖锐对抗和美国越来越深地介入台湾问题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次军事行动从开始到后来不断修改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维护国家安全——当时主要是维护东南沿海地区安全的内容。更准确地说，维护东南沿海地区的基本安全是全部东南沿海作战的首要目的，包括确保相关海域和空域不受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和骚扰；海上运输航路的安全畅通；渔业生产和渔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本消除国民党军队依托沿海岛屿所造成的军事威胁；以及抵抗美国不断变化的军事压力。毛泽东虽然在某阶段上提出了政治口号或政治目的，但他对军事形势的判断和采取的措施，均未超出解放军的战略设想、军事计划和军事能力。所以从军事决策的全局看，毛泽东本人的个性和认知、1958 年中国对外政策激进化等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的确需要认真加以界定。1958 年炮击金门是 1956 年解放军确定“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后的第一战，研究它同“积极防御”思想之间的联系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历史研究类似导演戏剧。导演有时为了剧情需要而将灯光聚焦在一个角色身上，以致观众看不到整个场景和其他角色。但是，如果一场戏剧演出从头至尾都将灯光聚焦于一人或一处，就无法使人了解戏剧的全貌了。

（《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3 期）

论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过程及其主要环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对这次政策转变的背景的探讨则显得较为薄弱。一些研究成果虽然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一些有关的因素，但对这些因素对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尚缺少深入和系统的论述。① 本文的目的是针对以往研究成果中的不足，通过探讨60年代中期到1968年末的中国安全战略、外交政策和中越关系等几个方面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尝试勾画出一个相对系统的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主要背景及其特征。这里需要指出，本文论述的三个主要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具体的互动过程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论证的，这篇论文只是将它们梳理出来并做初步的界定而已。

一、中国安全战略的演变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的安全环境有了重大的改善。在东北和西北边疆，由于有中苏同盟的保障，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安全方面的压力。1953年达成的朝鲜停战协议和1954年达成的印度支那停战协议，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面临的军事压力，美军被迫驻扎在三八线以南和法军撤出印度支那以及越南南北双方暂时相安无事，使中国在那两个地区实际拥有了两个安全缓冲地

① 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李捷：《60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姜长斌、罗伯特·罗斯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区。在台湾海峡，经过1954—1955年和1958年两次危机以后，中美互相了解了对方的底线，双方基本上处于稳定的军事对峙，而台湾当局也基本停止对大陆及沿海地区的攻击性行动。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和平外交的努力，使它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系明显改善或得到缓和。总而言之，中国从这时起已经有条件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和内部事务，不必担心会立刻发生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从后来近十年形势的演变看，导致60年代中期中国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的原因的确是多方面的。不过，不论中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多少值得商榷之处，它在南北两线同时面临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压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国领导人一直有着相当强烈的地缘安全意识。这种地缘安全意识部分来自中国的传统安全观念，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国不能允许敌对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分接近中国的边境地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认为中国没有安全感，必须要作出强烈的反应。否则，他们就不会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便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抗法战争，也不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沿三八线停战和沿十七度线停战。后来的历史也足以证明，如果美国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除它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影响着他们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在列宁主义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而且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正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加上革命战争时期的基本经验，导致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和战争威胁特别的关注和敏感。所以，研究60年代中期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是理解中国安全战略演变的关键。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安全战略的演变实际上构成了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的主要背景。

1. 越南战争升级与中国战备

60年代初，印度支那地区的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但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领导人曾经认为，美国直接进攻越南北方的可能性不大。[①]1964年8月3日，突然爆发了"东京湾事件"，美军随即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的目标。此后不久，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东京湾决议案"，声称"国会赞成和支持总统作为总司令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进攻，阻止进一步侵略"，

① 参阅李捷：《60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第265页。

以及“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包括动用武装力量，援助求援保卫其自由的任何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成员国或保护国”。[1]几乎与此同时，美军开始不断投放无人驾驶侦察机侵入中国境内，从事军事侦察活动。

美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东京湾事件”爆发前不久，由于美国不断对北越发出战争威胁并在南越军事介入、展开“特种战争”等等，中国领导人已经逐步开始作出反应。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开始扭转原定以解决“吃穿用”为主要目标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而且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2]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进一步反复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甚至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要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3]7月27日，毛泽东会见北越代表团成员。他在声明将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抗战地位同时，表示中国也要准备打仗，并提出了中国参战的可能性。[4]

8月上旬，显然是受到美国轰炸北越的影响，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更加关注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8月5日，就在美空军开始轰炸北越境内目标的当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即命令有关部队和军兵种进入战备状态。第二天，毛泽东甚至感到有必要取消原定的活动计划，因为“要打仗了”。[5]在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他甚至提出要不要搞三线建设，就如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一样，是一个革命还是不革命的问题。[6]10月间，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一项批示中称，三线建设“是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7]毛泽东的决定很快便

① 转引自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5页。

② 参阅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第4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4页。

④ 《毛泽东接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7月27日。

⑤ 毛泽东：《对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的批语》，1964年8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⑥ 参阅鲁礼华和郭冰：《毛泽东加快三线建设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38页。

⑦ 毛泽东：《对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96页。

成为中国决策层的共识，并被迅速贯彻下去。[①]

1965年3月2日，美军发动所谓“雷鸣行动”，开始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美地面部队则以保卫美空军基地为理由，开始直接在南越与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力量作战。4月间，首批美海军陆战队在南越的岘港登陆。5月间，美空军突破北纬20度线，将空袭扩大到整个越南北方。与此同时，美海空军加强了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扰活动，美海军舰只频繁地在中国南海巡弋，美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它们甚至袭击中国的商船和渔船。

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和不断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在中国南部边疆造成了紧张局势，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安全威胁。为了反击美海空军的侵扰，1965年初，中国空军奉命进驻海南岛。4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对入侵海南岛地区的美机“只起飞监视”等规定，命令“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②]解放军空军随后制订了与美空军作战的计划，计划包括在边境地区与美空军作战和反轰炸的方案，同时也制定了在中国本土进行长期和大规模空战的方针。[③]

显然，中国领导人当时对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空中打击比较敏感。周恩来通过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向美国方面转告，“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④]4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认为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中国，“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⑤]

在加紧备战的同时，中国领导人还试图利用外交途径，向美国转达中国对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严重关切，阐明中国政策的底线，以便避免因误解而导致与美国的直接战争。4月2日，周恩来利用访问巴基斯坦的机会，向当时准备前往美国访

---

① 如下文献反映了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周恩来：《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1964年10月29日；《加快三线建设》，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0—493、504—507页。李福春、薄以波和罗瑞卿：《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在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65年5月19日，《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第33—34、4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4页。《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5页。

③ 《当代中国空军》，第385页。

④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14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59—360页。

问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系统地说明了中国政府的三点方针："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他还对何谓美国对中国开战做了明确的定义，即美国即使只是对中国进行空中战争，也将被视为对中国开战。[①]后来由于阿尤布·汗推迟访美，周恩来又利用访问坦桑尼亚的机会，于6月8日，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国方面转达中国政府的上述三点方针。[②]8月20日，周恩来又向赞比亚政府代表团阐述了上述方针。[③]

当时中国几乎是全力以赴地援越抗美的动力和目的是相当复杂的，不过支持越南抵抗美国的军事干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一个重要措施，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从近代历史上看，一个敌对的大国在如此接近中国的周边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通常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更何况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本身的确也是针对中国的敌对行动。"东京湾事件"发生后，北越领导人曾经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他们打算保持行动谨慎，并尝试与美国进行谈判，以便尽可能地阻止美国直接进攻北越。中国领导人很有可能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赞成北越采取包括尝试和谈在内的谨慎措施。[④]

从1965年春季起，中国领导人开始对北越与美国和谈持反对立场，这一变化同苏联勃列日涅夫政府开始积极援助越南以及中苏关系继续恶化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扩大对北越的轰炸和派遣地面部队直接参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4月初，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访华，请求中国向北越派遣支援部队，期间双方签订了一系列涉及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协定。5月下旬，越南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具体讨论军事援助和作战问题。中共中央根据大规模援越工作的需要，组成了中央援越领导小组。从6月起，解放军支援部队开始进入北越，参加北越防空作战和协助修筑军事工程、铁路和提供后勤保障。到1970年7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遣防空、铁道、工程和后勤保障部队共达32万余人，其中最高年份达17万人。[⑤]

显然，由于失去了中苏同盟的依托，中国抗击美国入侵、主要是抗击美国使用海空力量攻击的能力，肯定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因此，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和对中

---

①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08—515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6页。

③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页。

④ 参阅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9—70页。

⑤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2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页。据该书记载，中国支援部队是从1965年10月开始进入越南的。

国领海领空的侵扰，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相对来说是加强了。这些都在加剧中国领导人对安全的担忧，他们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强硬和坚决的措施来遏制美国的干涉。这种局面无疑增加了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2. 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安全战略的调整

这一时期中国安全形势恶化还表现在与苏联不断发生边界纠纷。中苏两国当时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并且曾经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和边界纠纷。这种情况是由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与苏联结盟和对边界问题的认识，中国领导人一度并不重视解决中苏边界遗留问题。1960年代初期，由于中苏开始出现分歧和中国开始同其他国家展开边界问题谈判，中国领导人决定与苏联谈判，并准备以历史上的有关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中苏关系恶化后，双方开始关注边界问题，它们都加强了在边界地区的武装巡逻，并开始互相指责对方制造边界纠纷。从1962年以后的情况看，边界问题逐步演变成中苏敌对升级的表现形式和双方进行斗争的手段，特别是在苏联方面，成为向中国施加政治影响和军事压力的特殊手段。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此后中苏边境地区便无安宁之日了。据中国方面公布的统计数字，从这时起到1964年10月，共发生1000余起边境纠纷。[①] 在此期间，苏联方面不仅在中苏边界挑起了纠纷，苏联领导人还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特别是利用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攻击中国的对外政策，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②] 针对苏联领导人的攻击，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首次公开提出中苏两国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社论还质问苏联方面，现在提出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③]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会谈期间，7月10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佐佐木更三。他在会谈中说，沙皇俄国靠武力占领了中国大片的领土，“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笔账

---

① 《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② 可参阅周文：《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页。

③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

呢”。[1]毛泽东的谈话被公布以后，苏联舆论立即做出激烈的反应，9 月初，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领导人“鼓吹一种带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可能是为了向国际社会澄清他谈话的本意，毛泽东曾经于 9 月 10 日利用接见法国客人的机会，说明中国无意要求苏联归还那 1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只是说那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是“采取攻势”让苏联人“紧张一下”。[2]但是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就此罢手。9 月 15 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针锋相对地声称，谁胆敢破坏“神圣的”苏联边界，谁就会遭到苏联的“坚决反对”。[3]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苏联决定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致使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地段逐步发展为引起军事冲突的热点。

赫鲁晓夫的讲话和苏联的军事部署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毛泽东在 10 月 7 日和 9 日分别会见北朝鲜的崔庸健和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时，均提到要对赫鲁晓夫对中国使用武力有所准备。[4]他在考虑部署华北大城市的防御时，特别指出“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5]1965 年 5 月 21 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准备战争早打、大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打核战争”，“准备两面打”。[6]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公布的最能够直接说明中国这时就有过应付苏联发动战争的准备的文献。

主要是由于在南面面临美国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在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虽然对苏联可能采取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抱有日益增高的警惕，但在处理边界问题上总的说来是谨慎的和有节制的，对边界争论采取了冻结的态度。中国当时的确严厉抨击了苏联的对外政策，但仍限于口诛笔伐，用毛泽东的话说，中苏论战不过是“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7]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苏联的威胁与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有根本区别，美国的扩张才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胁。

---

① 《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1964 年 7 月 10 日，转引自杨奎松：《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中美关系》，《党史研究资料》，1997 年第 12 期，第 6 页。李丹慧：《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42 页。

② 《毛泽东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大使的谈话》，1964 年 9 月 10 日。

③ 周文：《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第 541 页。

④ 李丹慧：《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发展》，第 45 页；杨奎松：《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中美关系》，第 7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第 654 页。

⑥ 周恩来：《我们将赢得进步，赢得和平》，1965 年 5 月 21 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第 520—525 页。

⑦ 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 4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87 页。

1964年10月14日，苏联发生政变，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立即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尝试改善中苏关系。[①]1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加苏联举行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这次访问显然没有达到改善中苏关系的目的，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因此便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1965年2月，毛泽东接见了访问北越途经中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周恩来也同柯西金举行了多次会谈，并就改善两国关系提出了6点建议。[②]根据周恩来当时的判断，毛泽东接见柯西金"自有积极作用"，会谈即使不能解决目前的分歧，也可以为今后的交往"作一交代"。此后周恩来在会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拉宾时，曾向他转达2月向柯西金提出的6点建议，并说"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③]这表明中国领导人仍然试图维持住中苏的国家间关系。

3月1日至5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性的会议，并发表了两项会议公报。中共中央曾经一再表示反对在未经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并拒绝了苏共中央发出的会议邀请。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通过谴责苏共中央召开此次会议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公开宣布与苏联新领导人决裂，并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④]6月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提出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必须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⑤]至此，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

9月6日，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军事进攻，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局部战争扩大成为两国间的全面冲突。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印度的军事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⑥]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向印度施加压力。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越过中国－锡金的边界，并在中印边界的西段侵入中国领

①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447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3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1页。

④ 《新华月报》，1965年第4期。

⑤ 《人民日报》，1965年6月14日。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5年9月7日，《人民日报》，1965年9月8日。

土，进行军事挑衅。[①] 中国对印巴冲突做出强烈反应同中苏关系的状况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在猛烈抨击印度的军事行动是侵略行为时，特别指出不仅美国是印度扩张主义的支持者，而且苏联也在“为印度侵略者撑腰”，并称苏联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行为，同苏联在 1959 年和 1962 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中的政策一样，是在“玩弄同样的手法”，其目的之一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个新的反华浪潮”。[②]

1966 年 1 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并向中蒙边界地区大量增兵。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经宣布，由于该国家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经没有必要保持常备军，而且苏军也于 50 年代分批撤出。[③] 苏军这时宣布重新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与中国毗邻地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显然是在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他们立即做出强烈反应。3 月 28 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激烈地指责苏联企图入侵中国东北和新疆，与美国一起分裂中国。[④]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上述认识和反应同迅速增加的中苏边界纠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决定在中苏边界采取强硬行动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从 1964 年 10 月起到 1969 年 3 月，双方的边界纠纷达 4189 起，比此前增加了三倍。[⑤] 即使说当时公布的这个数字有所夸张，它所反映的情况也是足够严重的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决策层于 1968 年 1 月做出了在中苏边界东段进行军事反击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在给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的指示中，要求解放军有关部队作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在警告无效和苏军打死中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⑥]

1968 年 8 月 21 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成为推动中国领导人开

---

① 《人民日报》，1965 年 9 月 9 日。

② 《谁在给印度侵略者撑腰》，《人民日报》，1965 年 9 月 18 日。

③ 有关情况可参阅徐焰：《1969 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 年第 5 期，第 3—4 页。

④ Masaru Kojima edited, *The Record of the Talk between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t Tokyo, 1980, pp. 206–207.

⑤ 《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日报》，1969 年 5 月 25 日。据 1963 年 9 月 20 日苏联政府的声明，仅 1962 年就发生边界纠纷 5000 多次。R. 迈克法考尔、费正清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谢亮生、杨品泉、黄沫、张书生、马晓光、胡志宏、思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559 页。

⑥ 可参阅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18 页。徐焰：《1969 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第 5 页。

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考虑苏联威胁问题的关键因素。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除林彪外，中国的主要军政领导人均出席了会议。[①]会议讨论了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形势，决定公开谴责苏联。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指责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结果”。[②]10月31日，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公报正式确认了以前美苏“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判断。[③]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会见一些到访的外宾时一再提出，现在需要考虑世界大战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能力，而且它们都在准备扩大战争，因此“似乎要打仗了”，“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了。”[④]

事实表明，从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到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时期，中国的安全战略出现了重大的调整。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在面临美苏从南北两个方向威胁中国的安全时，中国国防的战略重点从“重南（美国）”逐步转向“南北并重（美苏）”。此后不久发生的美越和谈与珍宝岛事件则促成了中国安全战略从“南面”防御美国为主向“北面”防御苏联为主的转变。

二、中国外交政策演变与决策机制的重建

中国的外交决策经常受到决策层内的矛盾、分歧甚至斗争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矛盾、分歧或斗争，未必都与对外政策所要处理的问题有多少直接的关系。因此，研究有关时期里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政治状况，揭示政治形势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决策人物命运的影响等等，对分析和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有时那些事件开始时未必同某一个特定的重要决策有直接的联系。

1.“文革”对中国外交的冲击

就在中国的安全战略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对外政策与决策机制也在“文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记载会议后周恩来“到林彪处谈话”，很有可能是周恩来向林彪通报了会议情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页。

②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人民日报》，1968年8月23日。

③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④ 《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的谈话》，1968年11月28日。

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发生潜在的变化。50 年代后期，受到“大跃进”运动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左”的错误。60 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中国不得不对国内经济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对外政策也随之出现了变化的迹象。其明显的表现是，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对一个时期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检讨和批评。[①] 从王稼祥 1962 年下半年起不再主持中联部工作的情况看，中国对外政策纠“左”的努力未能实现。1963 年以后愈演愈烈的中苏论战加剧了中国对外政策指导思想中的“左”倾错误，在关于时代、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世界革命、和平共处、核战争、裁军以及民族独立运动与和平运动等等当时对中国外交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表现出越来越片面和绝对化。

1965 年间，继 3 月《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后，《人民日报》和《红旗》又于 6 月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编辑部文章，痛斥苏联对外政策的“灵魂”就是美苏合作，并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必反修”。[②] 中国对外政策“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从此成型。

9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国防部部长林彪署名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该文突出地强调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世界革命形势中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提出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国际政治格局是“世界的城市”和“世界的农村”，世界革命“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以及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等等一系列观点，并且用极其富于鼓动性的文字加以宣传。[③] 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革命中心论”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这篇文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左”倾外交提供了

---

① 王稼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 年 3 月 31 日；《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1962 年 6 月 29 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王稼祥选集》收录的有关外交问题的论述只是王稼祥这一时期所撰文稿的一部分，而且这些文稿是为在内部会议发言而作。张沱生：《难能的探索，可贵的努力》，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71 页。

② 《人民日报》，1965 年 6 月 14 日。

③ 《人民日报》，1965 年 9 月 3 日。这篇文章还没有直截了当地称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但其含义是相当明确的。林彪在 1967 年 11 月 6 日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更加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1967 年 11 月 7 日。

思想基础。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上述林彪的文章，称它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会议通过的公报进一步强调，“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①]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有关论述对中国对外政策造成的影响是重大的。

首先是中国有关对外政策的宣传越来越激进、调门越唱越高。一方面是慷慨激昂地宣称，当今是“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时代；[②]另一方面则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世界的革命中心”，等等。[③]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宣传的目的很可能更多的是要促使人们更加热心地支持和投入“文化大革命”，所以它们把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国内政治斗争描述成是为了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声称中国向何处去“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④]但是，这种对世界形势的描述和如此广泛强烈地宣传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可能不严重地影响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处理外交事务的行为。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在当时国内政局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被上述宣传煽动起来的情绪被狂热地宣泄出来，从而使中国外交脱离了正常的轨道。最初遭到冲击的是中国的驻外机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中国政府陆续召回除驻埃及大使黄华以外的所有驻外大使，这一行动必然会使中国与建交国家的关系出现困难。

1966年9月8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简报》和共青团中央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编印的《一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被同时送呈毛泽东，毛泽东于第二天

① 《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② 王力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旗》，1966年第15期；《中国的大革命和苏联的大悲剧》，《人民日报》，1967年6月4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③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67年8月15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批示称："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①] 至此中国驻外机构的工作开始与国内政治运动接轨，驻外机构内部出现混乱。随着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升温，在国际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变成了中国驻外使馆的主要工作。一些涉外人员和驻外机构滥发毛泽东思想宣传品，张贴或展出宣传"文革"的图片，在外交场合发表与其外交人员身份完全不符的各种宣传演讲，等等。

2.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破坏与重建

继驻外机构陷入混乱后不久，中国国内的外交领导机构也受到严重的冲击。1967 年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夺权"。[②] 迅速蔓延全国的夺权狂潮波及到外交部门，上至外交部长陈毅，下到几乎所有的大使、参赞，都遭到批判和揪斗，外交部门几乎无法正常展开外交工作。8 月 7 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讲话，煽动他们打倒陈毅，在外交部门夺权。[③] 由于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外交部造反派加强了夺权行动。他们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办公机构，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布指令，其结果造成了国家的外交大权旁落，外交活动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与国家外交系统陷入混乱的同时，被政治狂潮鼓动起来的群众运动也开始波及外国驻华机构。1967 年 1 月，一些中国留欧学生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到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诵毛泽东语录，结果遭到苏联警察的围攻殴打。消息传到国内后，大批群众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此后还相继发生了造反群众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驻华使馆的事件。从 5 月到 8 月，中国先后同已经建交的十几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国家发生纠纷。[④] 最严重的是 8 月 22 日晚，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不过它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契机。"文革"开始后中国驻外使馆出现的混乱很快引起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关注。1967 年 1 月间，周恩来委派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外交业务之权不能夺"。[⑤]2 月 6 日，针对中国驻外使馆的混乱情况，陈毅指示他

① 毛泽东：《关于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的批语》，1966 年 9 月 9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第 128—129 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日报》，1967 年 1 月 22 日。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177 页。

④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963 页。

⑤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949—1976》，下卷，第 963 页。

的秘书起草了一份制止在驻外使领馆搞"四大"的电报，并于当晚报送周恩来，周恩来立即转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于第二天即批发。周恩来在随后审改该电报时，补充了不许大串联、使馆不许建立战斗队以及不能进行夺权运动等内容。该电报以指示电的形式于2月7日发出。[①]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劝阻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自发赴越援越抗美的通知》，以阻止一些红卫兵和青年非法进入越南境内。[②]

这些措施显然不足以消除外交领域的混乱局面。陈毅在"二月抗争"失败后，逐步失去了对外交部的控制，周恩来不得不一再直接出面。8月8日，周恩来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王力的"八七讲话"。他曾经为此事约见康生和王力，结果被康、王二人拒绝。周恩来此举很可能是希望通过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以便控制局势，但他显然已经是力不从心了。[③]在随后与外交部造反派的数度直接交涉中，周恩来显然无法再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威信，制止外交系统混乱的事态进一步恶化。

在如此困难的时刻，周恩来决心利用火烧英国代办处提供的机会扭转局势。8月25日，周恩来单独与杨成武会谈，请他向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汇报北京发生的严重局势，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转交毛泽东。8月26日，毛泽东痛斥王力的讲话"极坏"，并决定由周恩来主持逮捕王力等人。[④]中共中央随即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宣布对王力等进行隔离审查。10月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会见外宾时，再次对周恩来给予支持，说红卫兵要打倒周恩来和陈毅等人"这不对"。[⑤]

毛泽东的表态是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外交系统的动乱受到遏止，一度失控的局面有所恢复。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周恩来稳定外交系统，主要是因为他不希望外交系统真的陷于瘫痪。在他看来，中国的安全毕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何况中国还肩负着支援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扩张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重任。从1967年夏季到中共九大召开前，毛泽东多次就涉外事务发表

① 关于《二七指示》形成的经过和主要精神可参阅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949—1976》，下卷，第123页。胡石言等：《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杜易：《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18页。

②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32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17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182—183页。另可参阅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36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194页。

批示，批评那些自我标榜、自我中心和强加于人的宣传和做法。[①]在“文革”狂热的背景下，毛泽东那些就事论事的措施当然不可能根本纠正外交领域的“左倾”错误，但处理王力和谴责“八七讲话”毕竟是对“中央文革”中支持王力煽动夺外交大权的那些人的打击，特别是为周恩来着手恢复外交系统的秩序和正常的工作，提供了回旋余地，尽管这个余地是相当有限的。

其次是在处理王力等人的过程中，在中国外交系统形成或说是确立了一种“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体制”。在“文革”初期，缘于国内政治斗争的人事变动使中国外交原有的决策机制遭到破坏，参与中国外交决策的主要人物如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等，多数无法继续从事相应的工作，致使中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几乎瘫痪。那些在“文革”初期开始走红的极左人物，无疑渴望乘机一举夺取外交大权。但是，他们一手煽动起来的狂热情绪终于酿成火烧英国代办处，而且事件发生后他们不是束手无策，便是熟视无睹。反之，周恩来表现出了必要的敏感、明达和稳健。毛泽东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并决定立即由周恩来负责处理王力等人，实际上排除了极左领导人控制外交大权的可能性，确立了周恩来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中的关键地位。后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1967 年 8 月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体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三、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

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往的研究多少忽略了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援越抗美政策对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一直存在被低估的倾向。实际上在 60 年代中期，中国几乎是全力以赴地贯彻援越抗美政策，因为它在当时的中国外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项政策首先反映了中国在地缘安全方面的需要，支持北越抵抗美国的军事进攻，可以有效地保卫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其次，援越抗美也成为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佐证，使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口号在印度支那落到实处，同时成为暴露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叛卖行经的有力武器。第三，抗美援越还可以在国内斗争中，鼓舞人们更加热情地投入到“文革”的“极左”运动中。正是因为援越抗美政策同时反映并且满足了上述中国对外政策的多方面的需要，所以它在当时的中国外交中几乎占有头等

① 《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1967 年 3 月—1971 年 3 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6 册，第 513—516 页。

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从建国后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包含着全球战略、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等三个层次的矛盾和冲突。在双边层次上主要是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和破坏中国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其中最突出也是最严重的是台湾问题。在地区层次上，当时主要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在全球战略层次上，美国要称霸，以及联合苏联反对中国和镇压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在60年代中期，中国与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对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美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上的矛盾和斗争。换句话说，只要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中国就必定要加强同北越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承担援助和支持北越的义务，因而也就很难调整安全战略和改变对美国的政策。历史的机缘是中国与北越的关系恰恰在1968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1. 中国与北越双边关系中的矛盾

1965年春季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后，中国立即决定加强对北越的各种援助，并直接派遣军队进入北越。中国积极支持北越抵抗美国，使双方的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中越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密切发展只不过掩盖了双方的矛盾，这些矛盾从发展趋势看是越来越严重。

首先是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给中越关系带来的摩擦。就在中国几乎是全力以赴地援助北越抵抗美国扩大战争时，北越的报纸杂志却不断发表有关中国封建统治者侵略越南的历史文章。越军在接受中国军事援助的同时，仍然对中国加以防范，对中国封锁越军内部的情况、战斗情况和兵力数字，要求取得对中国驻北越防空部队的指挥权，等等。此外还发生过北越港口人员以维护国家主权为理由，拒绝中国船只入港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即使是在抗美战争最激烈和中国援越最坚决、最积极的时刻，北越仍然有人公开谈论来自“北方（中国）的威胁”。中国领导人多次强烈指责越南方面的这些言行。[①]1966年4月13日，邓小平在中越领导人会谈中告诉越方，毛泽东曾经批评他们对越南援助“过分热心”。如果北越方面确实不放心，中国可以撤回全部援越部队。[②]中国的愤怒和北越承受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而由

---

① “Zhou Enlai, Deng Xiaoping, Kang Sheng and Le Duan, Nguyen Duy Trinh”, Beijing, April 13, 1966;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Hoang Tung”, Beijing, August 23, 1966; “Deng Xiaoping and Le Duan”, Beijing, Septmber 29, 1975. 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onneson and Nguyen Vu Tung edit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pp. 96–101, 187–188.

② “Deng Xiaoping and Le Duan”, September 29, 1975, *77 Conversations*, pp. 187–188.

此类问题造成的双方隔阂和疏离，则随着战争形势的演变日渐清晰。

2. 中苏关系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此后苏联对越南战争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从只是消极地反对美国的军事干涉，转变为积极援助越南抵抗美国的战争，其标志是11月27日，苏联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向越南“提供必要的援助”。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河内，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苏联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不会对保障越南的安全“漠然视之”。4月10日至17日，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访问莫斯科，苏联在苏越联合公报中声称，苏联在必要的情况下，将应北越方面的请求，派苏联人员前往越南参加战斗。[①] 苏联的积极介入和向越南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使北越和苏联的关系迅速密切起来，苏联对北越的影响力明显增强

几乎从苏联公开表示积极介入越南战争开始，中苏即在有关的各种问题上发生矛盾。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时，曾经向中方提出两方面的建议。其一是双方协调援越行动，发表一个社会主义各国首脑援越抗美的联合声明。其二是争取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提出应给美国“从越南找到一个出路”。中国领导人表示不打算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合作，他们拒绝了苏联的有关建议，只同柯西金讨论缓和中苏关系的有关问题。[②]3月莫斯科会议以后，中国对苏联的印度支那政策进行了越来越严厉的谴责，并且一再声明反对苏联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任何建议，在越南问题上决不与苏联搞“联合行动”。[③]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说明：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不包括苏联，对于苏联“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④]

中共中央不与苏联合作的方针也反映在具体的行动中。1965年2月，柯西金访华后不久，苏联政府便向中国提出，通过中国铁路运送苏联军队前往北越，并请求中国为苏联军用飞机前往北越提供军用机场和开辟空中航线。中国拒绝了苏联的

---

① 夏义善：《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9、18、25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七十年代苏联对外关系大事记》，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1、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07—708页；下卷，第247页。

③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观察家：《苏联领导同谁联合行动》，《人民日报》，1966年2月2日。

④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这些要求[①]。中国领导人表示，苏联援越物资通过中国，只能按照协议进行，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苏联利用中国港口向越南增运物资。[②]中国领导人还一再向越南表明，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志愿人员参加越南作战。[③]

中国阻止苏联插手和利用越南问题，根源于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难免引起越南方面的反对。越南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抗击美国扩大战争，它的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必然是要为民族的生存，争取一切可以得到的外援，因此不可能接受中国的立场，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的同时，拒绝接受或自我限制接受苏联的援助，更何况越南领导层中确实存在着对中国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施加压力的做法产生适得其反的影响也是自然的。越南领导人曾经直接告诉中国领导人，他们不认为苏联正在出卖越南，苏联的援助是"全心全意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评价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应该是国际主义，在越南问题上尤其如此。[④]意即越南只能以它的战略利益和对它的援助作为制定对苏政策的出发点。由此可以断定，不论中国是基于什么理由，北越方面对于中国反对与苏联联合行动以及拒绝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肯定是心怀不满的。

3. 美越和谈与中国的机遇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个矛盾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与北越的关系中，远不是那么突出和影响巨大的，因为对中国来说，援助北越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支援越南民族革命的考虑，只有"和谈"才是真正涉及到双方的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

大致是从 1965 年春季起，中国开始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举行和谈。促使中国反对美越和谈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如前所述，其中固然有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原因，也有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影响，因为苏联差不多从插手越南问题之日起，就透露出争取和平解决越南战争的意图。此外，在"文革"造成的炽热气氛中，北越的抗美救国战争也被赋予了同时具有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线和代表

---

① 可参阅《七十年代苏联对外关系大事记》，第 2 页；李丹慧：《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抗美援越》，《中共党史资料》，1998 年第 6 期，第 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74 页；"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Beijing, April 10, 1967, *77 Coversation*, pp. 103–105。

③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Beijing, October 9, 1965; "Zhou Enlai and Le Duan", Beijing, March 23, 1966; *77 Conversations*, pp. 92–93, 17.

④ "Zhou Enlai, Deng Xiaoping, Kangsheng and Le Daun, Nguyen Duy Trinh", Beijing, April 13, 1966, pp. 98–100; "Zhou Enlai , Kang Sheng and Pham Van Tong", Beijing, April 29, 1968, *77 Conversations*, p. 129.

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等双重意义。[①]不过这里有必要强调，不论在各个阶段影响中国政策的因素如何复杂，中国支持北越的政策目标是贯彻始终的，即制止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完成国家统一。这与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目标是一致的。

1965年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阐述了民解在抗美救国战争中的五点宣言。声明同时提出两点和谈的先决条件：(1) 从越南撤出一切美国军队及其装备和设施；(2) 民解必须在政治解决中有决定性的发言权。[②]4月8日，范文同在北越第三届国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了北越关于和谈的四点立场，即：(1) 美国从越南撤退军事力量和设施，停止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干涉和对越南北方的轰炸；(2) 在越南实现统一以前，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3) 根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由南方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4) 由越南两个地区的人民自己解决越南统一问题，外国不许干涉。[③]中国政府立刻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上述立场。

到1968年秋为止，中越曾就和谈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双方的讨论和争论主要围绕是否坚决贯彻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越南南北两方声明的目标。中国领导人当时不赞成北越立即与美国开始谈判，他们提出的理由主要是担心北越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放弃既定的目标，致使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这两个因素是：(1) 在苏联的影响下对美国妥协。中国领导人多次利用外交场合，介绍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是如何对美国妥协，并在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如何企图阻止解放军打过长江。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当时美国提出和谈建议不过是消灭越南革命力量的"阴谋"，那么苏联促使北越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就是要使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半途而废"。[④] (2) 关于谈判时机问题。中国领导人根据他们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军事优势，大量歼灭美军及其傀儡军队的有生力量，美国

①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援助南越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人民日报》，1965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1967年9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07—408页。

② 《人民日报》，1965年3月25日。

③ 《人民日报》，1965年4月14日。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51—452页。

才会认真谈判撤出越南。[①]

1968年初，越南武装力量发动了新春攻势。对于越南来说，这场军事攻势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美国公众能够透过媒体的报道看到，美国虽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付出了难以接受的人员伤亡，却摧毁不了越南人民的战斗意志和战争能力。在空前高涨的美国反战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的战争意志趋于瓦解。不过，从军事角度看，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在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作战能力明显下降，民解的基层组织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干部被捕被杀，总之他们的士气也因牺牲巨大而严重低落。[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约翰逊于3月31日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停止轰炸北越北纬20度以北地区。4月3日，北越即同意派代表与美国谈判。

中国领导人在事后才获知越南的决定，他们表示坚决反对越南立即开始与美国举行和谈。在同越南领导人的多次会谈中，中国领导人表示，越南的谈判决定与它过去宣布的立场不符，而且当前时机对越方并不有利，立即接受和谈建议将使自己丧失主动，陷于被动。[③]中越在和谈问题上的分歧还引发了如何评价苏联政策的争论。[④]中国领导人在和谈问题上与越南方面的分歧和越南在宣布与美国和谈前未与中国协商的作法，显然严重地损害了双方的关系。11月14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的会谈后说："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⑤]1969年6月9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谈时，公开说明了中国与越南拉开距离的方针。[⑥]

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角度看，中国因种种原因而决定与越南拉开距离，的确是历史提供的机缘。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越南战争因为美越开始和谈而相对降温，中国国防重点完成向北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进一步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定为中国外交的"最高指导原则"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继续保持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10、524页；周恩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国和谈骗局的立场》，1965年11月30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8—457页。

② 有关情况可参阅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256—262页。

③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24页。"Zhou Enlai and Pham Van Tong", Beijing, April 13, 1968, pp. 123–125;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Tong", Beijing, April 19, 1968, pp. 125–128;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Tong", Beijing, June 29, 1968, pp. 135–136; "Chen Yi and Duc Tho", Beijing, October 17, 1968, pp. 136–137. *77 Conversations*.

④ "Zhou Enlai, Kang Sheng and Pham Van Tong", Beijing, April 29, 1968, *77 Conversations*.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6页。

⑥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39页。

同越南的密切关系并因此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而且越南自己不首先迈出调整与美国关系的步伐，后来中国领导人要作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至少也会困难得多。

结 论

上述研究表明，1969 年 3 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前，中国的安全战略、对外政策及外交决策机制、中越关系等，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虽然是在涉及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分别发生的，而且有些变化并非是中国领导人有意为打开中美关系而为之，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些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变化，构织成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大背景，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得以在“文革”极度混乱的局面中，实现了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变，从而带动中国外交完成了一次战略调整。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略论60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酝酿重大的调整。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尖锐对抗和在越南战场进行的间接战争无疑导致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进程的延后，不过同时也的确为美国政府根本改变其政策造成了一些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后来被证明都是有长期影响的，因为它们植根于美国的外交决策体制与程序，以及该体制与程序背后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研究主要着重于两个方面。一类研究着重于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研究成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①] 另一类研究则是勾勒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不论是基于何种原因，后一类研究成果与前一类相比，总的看可以说是比较粗略的。[②] 本文的目的是在综合上述两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做进一步地探讨，以揭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产生的原因，以及政策后来转变的必然性。这几个关键性问题包括：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期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及其影响；1960年代中期有哪些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政策面对必须调整的局面；美国对华舆论的主要特点和影响等。

---

① 参见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1年第2期；苏格：《6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解冻”》，《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顾宁：《美国“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历史由来、反响及其意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

② 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第6章第5节《对华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九章《中美关系解冻的前奏》，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一、肯尼迪上台前后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

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动向。这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其一是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给美国对华政策造成了冲击，它使美国朝野担心因台湾问题而导致美国与中国大陆的战争。[①]其二是美国政界一些人认为，有必要根据变化的世界形势，重新审议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为这种动向的比较典型的反映是1959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后来被简称为《康仑报告》。

1958年春季，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的主持下，就美国对东亚、南亚、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政策，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目的是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一次系统的检查。5月间，参院外交委员会根据听证会的情况及其效果，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讨论全面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该小组经研究认为，进行有关的研究既有必要又切实可行。7月15日外交委员会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参议院授权进行有关的研究。31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授权外交委员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并拨款30万美元予以资助。《康仑报告》即是这项研究的产物之一。

《康仑报告》出台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报告突出了中国的重要性。该报告虽然分为南亚、远东和东南亚两个部分，但是综观全文，不论哪一部分都包含着对中国的严重关注。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报告还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

① 参阅郑永平著：《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该根据上述“假设来实施”。[①]

其次是《康仑报告》实际上已经成为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后来一段时间里，美国各方人士曾经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们都没有超出《康仑报告》设计的框架。此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与策划这一项目的人包括了很有影响的民主党参议员，如富布赖特和后来担任总统的肯尼迪。报告的撰写人包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宾诺等。这些人在政界和思想界都有着重大的或独特的影响，所以报告所包含的一些重要想法必然会被传播并保留。

根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计划，《康仑报告》出台后准备继续就对华政策问题举行听证会，以便就对华政策展开讨论。不过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显然不存在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任何条件，加之 1958 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不久，美国内对中国的敌意相当强烈，所以国务院决定不派人参加听证会。11 月间《纽约时报》登载了《康仑报告》的内容，结果引起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最后由美国国务卿赫脱亲自出面发表声明，并且国务院还专门出版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小册子，表示美国确实“无意改变现行政策”，这才将事态平息下去。[②]

在 1960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对华政策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从两党争论的情况看，双方均无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做重大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方面为了竞选政治的需要，试图在对华政策方面做些文章。不过他们的观点差不多就是《康仑报告》的设想。

4 月间，美国的《外交季刊》发表了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主席、曾经当选参议员、后来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的切斯特·鲍尔斯的长篇文章《重新考虑中国问题》。鲍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国应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目前的中国政权已经“稳固”，而且实力日增。美国在处理有关地区性的事务（如东南亚问题）和全球性事务（如裁军问题）时，如没有中国参与，其成效值得怀疑。至于如何解决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鲍尔斯提出了所谓的“中台国方案”，其内容包括台湾当局从金门、马祖撤军，大陆沿海岛屿中立化以及台湾成立独立的“中台国”。[③]

---

① 《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何慧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年版，第 2、218、263 页。

②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湾“中华日报社”，1981 年版，第 189—191 页。

③ Chester Bowels, “The China Problem Reconsidered”, *Foreign Affairs*, Vol.38, No.3, April 1960, pp. 476–487.

鲍尔斯的文章很可能反映了民主党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主流意见。在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指责共和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分不清轻重缓急。他一方面继续指责中国推行“敌视”美国和“好战”的对策，同时也公开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并称民主党希望同中国“和平相处是正确的”。[①]他在 10 月 7 日和 13 日的电视辩论中提出，美国应该只保卫台湾，放弃金门、马祖和其他一些大陆沿海岛屿。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则批评肯尼迪是在中国的“讹诈面前屈膝投降”,而他本人决不会把任何地方的“一寸土地让给共产党”。[②]肯尼迪抨击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并不完全是竞选时期的灵机一动，除了他的竞选班子的建议外，他本人在 1957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批评过美国的对华政策过于僵硬和倾向使用武力。[③]

不过就如同美国选举政治通常表现出来的一样，肯尼迪和他的政策班子在竞选时期就对华政策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在赢得大选后付诸行动。根据尼克松的回忆，肯尼迪在竞选期间便通过助手向他表示过，不希望在涉及对华政策的问题上过多纠缠。[④]肯尼迪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意识到，在美国国内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在总统竞选中过多地强调改变对华政策是不智之举。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多少表现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意愿。他在 1961 年 2 月 1 日主持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曾经讨论过是否可以略微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允许西方盟国的船只为中国承运粮食。肯尼迪在会议上要求国务院进一步研究可行的办法。[⑤]在华沙的中美大使会谈中，美方也曾经提出交换记者和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等建议。[⑥]考虑到当时中国国民经济正面临严重困难，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大量采购粮食等情况，肯尼迪政府的上述想法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性的。

不过肯尼迪的这些政策“微调”很快便不了了之了，其原因主要是包括肯尼迪

---

① 《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对华政策等问题》,《参考资料》，1960 年 7 月 17 日。

② 理查德·尼克松著:《尼克松回忆录》，上册，伍任译，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第 283—284 页；*Newsweek*, October 24, 1960, p. 16。

③ John F. Kennedy, “A Democrat Looks at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57，转引自张少书著:《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梅寅生译，台北：金禾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09 页。

④ 尼克松著:《尼克松回忆录》，上册，第 284 页。

⑤ 参阅戴万钦:《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分裂之认知与反应》，台北：正中书局，1992 年版，第 30 页。

⑥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版，第 83 页。

在内的参与处理中美关系的人物们，基本上没有理解中美关系的症结，以及中国政府当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们一直企图绕过台湾问题，通过一些“微调”先缓和中美之间的气氛。问题恰恰在于，即使像鲍尔斯那样曾经试图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人物提出的办法，当时根本不可能为中国领导人所接受，而且只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和敌意。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显然也在考虑和试探缓和双方关系的可能性。1959 年 3 月 13 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曾表示，他希望“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阻碍他的是共和党政府的三位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①]

1960 年美国总统选举进入高潮时，周恩来于 8 月 30 日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指出，美国方面企图绕过台湾问题来缓和中美关系是行不通的，至于所谓的“中台国”则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上，周恩来提出了比以往灵活的建议，即美国首先必须同意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美军何时和如何撤出台湾的具体步骤，可以随后讨论。[②]10 月 18 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裁军、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核试验和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出对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了如指掌，而且此前他在旅途中还向斯诺详细介绍有关中苏分歧的情况。由此观之，至少可以肯定周恩来对谈话是有所准备的。[③] 四天以后，即 10 月 22 日，毛泽东同斯诺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的有关内容。毛泽东集中阐述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指出中国会把金门和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主动向美国开战，并“要谈判解决”台湾问题，“不要武力解决”。[④]

中国领导人会见像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花如此之多的时间与斯诺讨论中美关系，很可能是在为与美国的新领导人打交道进行试探和准备。[⑤]

---

① Tracy B. 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 “Anna Louise Strong: Three Interviews with Chairman Mao Zedong”, *China Quarterly*, Vol. 103, September 1985, p. 493.

②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New York: Randon House, 1962, p. 91.

③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pp. 759–761.

④ 毛泽东：《同斯诺谈台湾问题及其他》，1960 年 10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 448—454 页。

⑤ 前述肯尼迪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登载在毛泽东和其他主要中国领导人了解国际问题必读的主要刊物《参考资料》上。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向美国方面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他的表态肯定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①] 陈毅在 1961 年 4 月访问雅加达期间，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关于中美关系的提问时，一方面指出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同时也说明在改善中美关系的问题上“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先做出一点贡献”。[②]

目前已经公布的历史文献尚不足以清晰全面地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全貌。不过上述迹象已经表明，在美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期间，中国领导人的确在进行密切的观察和谨慎的试探。

毛泽东关于不会进攻金门、马祖的谈话其实也是讲给蒋介石听的。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台湾当局对有关对华政策的辩论表现出极度的敏感。10 月 11 日，蒋介石会见美国记者莫尔文（Davis Mervin）时强硬地表示，台湾当局即使“战至最后一人”，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而“必须单独作战”，也决不放弃金门、马祖。[③] 三天后，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名道姓地斥责肯尼迪“不负责任”、“大慷他人之慨”、“随便处置”他国的领土，等等。声明还信誓旦旦地宣布：“不会放弃……一平方英寸领土”，而且不需要美国协防金门、马祖。[④]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蒋介石亲自前往金门、马祖视察，并在金门题字“经营战场”、“培养战力”。此后不久，台湾当局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部队达 14 万人，包括坦克、装甲运兵车等 7000 辆各类军车。

毫无疑问，毛泽东公开声明不使用武力攻占金门、马祖，至少在客观上是对蒋介石坚守金马的最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也是台湾当局敢于保证不在金门、马祖的防卫问题上拖美国下水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政策上的隔海配合的确是相当默契的。

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都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朝野一些人企图用“两个中国”的方案作为改变对华政策的出路，一开始便走不通了。当然，除了台湾海峡两岸反对“两个中国”的计划，肯尼迪政府在美国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在美国国会中，亲台湾的势力不断通过各种各样的决议，

---

①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 83 页。
② 《人民日报》，1961 年 4 月 3、6 日。
③ 转引自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 199 页。
④ 《中央日报》，1960 年 10 月 15 日。

以便反对和挫败任何有可能削弱美台关系的行动。肯尼迪是以微弱多数票战胜共和党候选人的，刚入主白宫时政治地位尚不稳固，还不敢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冒险。另外在他看来，新政府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面临着远比对华关系更为重要的问题，因此他私下表示，不希望在改变对华政策这样敏感和困难的问题上，招致公众舆论的过分关注。①

肯尼迪不打算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很快便在美国领导人的言行中反映出来。4月12日，肯尼迪就任总统后首次就对华政策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美国将继续履行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反对在目前的形势下允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支持台湾当局保留其在联合国的位置。②5月3日，美国会参议院两党领袖共同提出一项提案，支持肯尼迪关于继续履行对台湾承诺的声明。③5月14日，美国副总统约翰逊访问台湾，进一步表明美国无意改变对华政策的立场。

9月21日，联合国大会指导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讨论的议程。以此为标志，美国多年来用搁置讨论的办法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企图已经失败。面对这种局面，肯尼迪政府的方针是尽可能地推迟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在肯尼迪政府的高层会议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曾经主张，用联合国同时给予“两个中国政府”席位的办法，保住台湾当局的席位，同时也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而肯尼迪考虑的是至少要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时间拖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后。他告诉史蒂文森，“如果红色中国在我们来到首都的第一年期间进入联合国……，他们就会把我们两人都弄得筋疲力尽。”④

10月19日，肯尼迪发表特别声明，声称“美国坚决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或联合国的任何机构”。⑤史蒂文森也在联合国大会拼命鼓噪，于12月1日提出了所谓“重要问题案”，即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取代台湾当局的位置，必须要出席联合国大

---

① Warren Cohen, *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Totowa, N.J.: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1980, p. 164.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o. 3, Mcgeorge Bundy to Secretary of State, “Bunkering of Free World Ships Under Communist Chinese Charter”, February 3, 1961, Paul Kesais, *Docu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Inc.,1980, Reel 5.

②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Kennedy, 196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pp. 259–260.

③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203—204页。

④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仲宜译，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59、362页。

⑤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214页。

会的国家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①]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以61票对34票、7票弃权，表决通过了美国牵头的“五国提案”，将中国进入联合国列为“重要问题案”，从而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设置了新的障碍。

中国政府对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抨击肯尼迪政府是在搞“反华新阴谋”。[②]至此可以说在肯尼迪任内，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了。

二、1960年代中期的困境

国内新的研究成果认为，肯尼迪有意在他的第二任期（如果他能竞选连任的话）重新审议对华政策，其根据是肯尼迪在遇刺前不久，曾经在1963年11月14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当红色中国人表示其愿意同美国及其邻国和平相处时，那么很明显，美国就将重新审议自己的政策。我们并不墨守对红色中国的敌视政策。”肯尼迪遇刺后不久，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于12月13日发表了经肯尼迪审阅过的长篇讲话，其中首次提出要对中国采取“不把门关起来”的政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美国“对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能够促进我国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变化，不把门关起来”。[③]由于肯尼迪被刺身亡，人们无法证实上述观点的可靠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时的美国对华政策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约翰逊政府也未能采取、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能设想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步骤来解决问题。

从肯尼迪到约翰逊两届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都面临着中苏分裂、中国发展核武器和越南战争等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1. 关于中苏分裂问题

从中苏结盟之日起，美国政府便一直试图使用各种手段，离间和分化中苏关系。肯尼迪上台后，面对渐行渐远的中苏关系，在继续奉行促使中苏分裂政策的同时，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苏分裂。

肯尼迪上台后不久，即下令对中苏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是因为乔治·凯

① Paul E.Zinner,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61, p. 502.

② 《人民日报》，1961年9月21日、22日、28日。

③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35—337页。

南在竞选期间曾经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写信向肯尼迪进言，肯尼迪于是请他再度出山，主持有关中苏的研究项目。凯南在 1960 年 8 月 17 日给肯尼迪的信中声称：在最近的将来，对美国而言“没有比保持中苏之间在观点和政策上的分歧更重要的了”。[①] 到 1961 年底，该项目由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完成了初稿，全文长达 77 页，题为《中苏分歧与美国的政策》。报告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分裂，中苏分歧表面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因此也是难以弥合的。从长远的角度看，中苏分歧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从近期看美国未必会立即获益。因为中苏仍然都将美国视为敌人，而且由于中国的“好战”，美国在东南亚将面临更严重的挑战。[②]

1962 年 1 月 2 日，国务卿腊斯克首次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中苏分裂的国务院政策计划会议，会议讨论的依据便是上述凯南主持完成的报告。与会者认为，中苏分裂具有“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但由于缺乏有关的情报，美国难以对其发展及其影响作出判断和反应。腊斯克在会议上决定，有必要动员朝野力量，进一步收集情报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资深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在讨论中声称，苏联与中国的分歧就像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一样，中国比苏联更激进，美国可以支持铁托，但不能支持中国那类的“左派”。[③] 波伦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根据此次会议的建议和安排，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美国的思想库、甚至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有关机构，均对中苏分裂的情况展开研究。综合起来看，美国各有关方面主要关心的问题包括中苏分裂的程度、性质、未来的发展以及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响等。随着中苏分裂的日益加剧，到 1963 年夏季，肯尼迪政府大致断定，中苏分裂已经不可挽回了，而且对中苏未来的冲突可能达到的程度有些预测，如估计中苏有可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等等。实际上从 60 年代中期中苏发生边界纠纷后，约翰逊政府已经多少获得了一些有关情况的报告。

关于中苏分歧的性质，美国政府居主流的看法是，虽然中苏的分歧是围绕意识

① Letter from Kennan to Kennedy, August 17, 1960, attached to George F. Kennan Oral History, Kennedy Library.

②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 Policy”, December 19, 1961,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Box 14, Kennedy Library.

③ Memorandum from Thomason to Harriman, “Secretary’s Policy Planning Meeting, Janurary 2,1962: Discussion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 Policy”, January 12, Thomason Papers, Box 15, Kennedy Library.

形态展开的，但其深层原因的确相当复杂。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目标互不相容，历史上中俄两个民族的矛盾的影响，中苏结盟后双方在军事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等等因素，都是导致中苏分裂和矛盾升级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造成中苏分歧的原因如此复杂，所以从根本上看双方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①

至于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响，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苏联和中国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敌对的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因为它们之间的争论而发生根本变化。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国更为"激进"和"好战"。1962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战争等等，均强化了肯尼迪政府中敌视中国的情绪，使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中国是对美国更直接和更危险的威胁。②美国舆论界也危言耸听地散布所谓"中国是主要威胁"的言论。

根据1962年底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肯尼迪政府认为，只有使中国"软弱、孤立"，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压力。③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一旦断定中苏同盟不复存在，肯尼迪政府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苏联与中国的分歧，向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政策，而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则基本是萧规曹随的。

2. 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

在肯尼迪上台以前，美国政府就在跟踪、了解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在1960年的估计，中国将在1961年晚些时候建成核反应堆，在1962年生产出可用于核裂变的铀。从1961年起，美国开始利用台湾作为U-2型侦察机的基地，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其深入地点达到兰州和包头。这些侦察飞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展。④与此同时，由于卫星摄像技术的发展，美国可以通过卫星获得有关的照片资料。1961年12月，美国通过卫星拍摄，得到了第一张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的照片。1963年3月和6月，美国情报部门通过卫星照片分析认为，中国核原料工厂坐落在兰州。有关照片还提供了一些发电厂与兰州工厂之间的输电线路。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何时会爆炸第一颗核装置作出了

① 参阅戴万钦：《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166—172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一千天》，第643页。

③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pp. 326–332.

④ Chris Pocock, *Dragon Lady: The History of the U-2 Spyplane*, Shrewsbury: Airlife, 1989, pp. 92–95.

种种估计，其中一种相对接近后来实际情况的估计是，中国将在 1964 年晚些时候或 1965 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①]

随着情报部门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资料，美国政府中的文武官员们越来越感到紧张。他们认为，中国掌握核武器将是对美国安全的非常严重的威胁。首先是中国掌握核武器，将对美国和亚太美军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其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一些非共产党国家的安全也会受到更严重的威胁，其中一些国家有可能在中国的压力下疏远美国，接近中国；第三，一些亚太国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有可能因为恐惧而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第四，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可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总之，美国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②]肯尼迪本人更是坚决地表示他“无法忍受”中国掌握核武器，美国必须在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的问题上“有所作为”。[③]

肯尼迪的智囊们曾经企图利用美苏首脑会晤，争取苏联与美国合作，共同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但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晤证明，肯尼迪政府至少也是时机没有选对。赫鲁晓夫当时虽然有意与美国一起搞点儿缓和，但并不想走得太远。会谈中肯尼迪一再建议赫鲁晓夫应该反对中国的好战政策，包括在核禁试问题上与美国相互配合，结果都被赫鲁晓夫一一驳回。[④]美苏首脑会晤后，肯尼迪曾经相当悲观地表示，一旦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它就会控制整个东南亚。

1962 年夏季，美国政府试图加快与苏联谈判达成核禁试条约的步伐。引起美国对核禁试的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美苏在核领域竞赛的状况。1961 年 8 月 30 日，苏联恢复了大气层核试验。1962 年 1 月美英苏在日内瓦的三边会谈失败，美国随后于 4 月 25 日开始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美苏竞相恢复大气层核试验

---

① William Burr and Jeffrcy T. Richelson, “A Chinese Puzzle”,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uly/August 1997, pp. 42, 44.

② George C. McChee to Secretary Dean Rusk, “Anticipatory Action Pending Chinese Communist Demonstration of a Nuclear Capability”, September 13, 1961, Robert H. Johnson, “Nuclear Proliferation”, October 15, 1962; all of them seen in David Wolff edited,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Washington D.C.: 1996.（该资料集是编者为 1996 年 8 月中国地区档案会议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编者赠本人收存）。“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ugust 14, 1964;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Committee on Nuclear Proliferation”, January 21, 1965, *FRUS 1964–1968*, Volume XI,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pp. 81–83, pp. 173–174.

③ Oral History Interview of William C. Foster by Charles T. Morrissey, August 5, 1964, pp. 36–37, Kennedy Library.

④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一千天》，第 287—288、297 页。

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肯尼迪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之美国在核技术方面领先于苏联，所以肯尼迪政府也企图利用核禁试谈判来约束苏联。

不过当时对肯尼迪政府来说，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担心。肯尼迪在夏季主持召开的一系列与武器控制和国家安全有关的高层会议上，美国决策者及其助手们普遍表现出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将拥有核武器的严重关切和沮丧。与会者认为，美国有必要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问题上与苏联合作。[①]

直到 10 月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以后，美国政府的努力才开始从苏联得到回应。苏联政府当时建议，美苏签署的应该是一项全面停止核试验的条约。1963 年 1 月在讨论核禁试条约的会议上，肯尼迪明确地表示，他在核禁试问题上的重要考虑之一是如何防止中国拥有和使用核武器。如果一项核禁试条约有助于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就值得美国认真予以考虑，尽管那是苏联提出的也无关宏旨。[②]

根据肯尼迪的决定，美国政府对谈判采取了积极的态度。2 月 12 日日内瓦三边谈判复会。5 月下旬，美苏签订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合作备忘录。6 月 8 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宣布同意美英派特使到莫斯科谈判。两天后，肯尼迪便以一次热情洋溢的公开讲话给予了回应。7 月 14 日，美国特使哈里曼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并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欢迎。肯尼迪在第二天给哈里曼的指示中，再次透露了他对急于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动机。他声称即使少量的核武器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哈里曼还应在私下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严重性。[③] 显然，拉拢苏联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至少也是肯尼迪政府急于同苏联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7 月 25 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草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空与水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其主要内容就是两条：一是签约国不进行条约禁止的核试验；二是不纵容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8 月 5 日美英苏代表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正式签约仪式，10 月 10 日互换文本，条约正式生效。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该条约其实是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手段。[④] 实际

① Glenn T. Seaborg,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Test Ban Trea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 162–171.

② 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第 422—423 页。

③ “Telegram from State Department to Embassy in Soviet Union”, July 15, 1963, *FRUS 1961–1963*, Volume VII, p 801.

④ Oral History interview of Humphrey Treveyan by Joerph E. O’Connor, September 13, 1963, Kennedy Library.

上美国在条约签订以前已经估计到，苏联对中国核政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尽管肯尼迪仍然幻想苏联也许能说服中国也签署该条约。苏联与美国合作与其说是准备承担义务，说服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不如说是因为恐惧而与美国合谋向中国施加压力。

美国领导人在争取苏联合作迫使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计划的同时，也在考虑使用武力打击中国的核设施。6月24日，肯尼迪在访问波恩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称，美国将说服其他国家不要“抓起棘手的核问题”，否则得到的将是“与核扩散相伴而来的虚假安全”。[①]

在为哈里曼赴莫斯科谈判做准备的过程中，了解苏联是否会与美国合作对付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成了美国决策圈子的重要话题。肯尼迪在哈里曼启程前授权后者，在探讨美苏就对付中国达成谅解的可能性方面，他“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②]哈里曼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便接到肯尼迪的一项更为露骨的指示，要求他“尽力查明赫鲁晓夫对限制或阻止中共核计划的看法，以及他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还是愿意接受美国的行动”。[③]根据哈里曼的报告，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试探兴趣不大。他认为，在法国也没有签署核禁试条约的情况下，单独将中国挑出来作为威胁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一旦中国有了核武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喊大叫”了。[④]苏联领导人很可能认为，与美国共同签署核禁试条约，已经是向中国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因此没有必要再为过分的行动付出政治代价。

美英苏签署核禁试条约后，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关于使用军事打击阻止中国核试验的设想。其中比较具体的是1964年4月，国务院的罗伯特·约翰逊根据国务院政策设计室领导人的要求，提出了四种供选择的方案：(1) 由美国发动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1) 由台湾的空军进行空中打击；(3) 雇佣在中国的特务进行地面破坏；(4) 空投国民党军队。不过他在报告中指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并不可取，不仅是因为没有苏联的合作行不通，而且美国可能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

① *New York Time*, June 25, 1963, pp. 1,10.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一千天》，第644页。

③ “The Telegram from State Department to in Soviet Union”, July 15, 1963, *FRUS 1961–1963*, Volume VII, p. 801.

④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一千天》，第648页。“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Soviet Union to State Department”, July 27, 1963, *FRUS 1961–1963*, Volume VII, p. 860.

价。[①]9月15日，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前一个月，约翰逊总统专门召集会议，再次讨论如何对付迫在眉睫的中国核试验。与会者排除了由美国单独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计划，但是仍然企图尝试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并获约翰逊同意。[②]这次会议的决定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决策层这一时期多数人的看法，即美国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来阻止或拖延中国成为核国家，即使能够成功也是代价高昂的，而且根据中国的实际能力和对外政策的趋向，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政府的反应是在尽可能地贬低其影响的同时，拒绝接受中国成为核俱乐部的成员。约翰逊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声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而且不必担心"立即导致发生战争的危险"。[③]但是，在美国政府内部不少人心里都明白，不管美国愿意不愿意，中国因为握有核武器而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参与核裁军等国际事务的谈判，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肯尼迪早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说过：如果没有"人民中国"的参与，同苏联达成任何有关核试验的协议"都将是不完整的"。[④]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前，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关于核扩散和裁军的报告已经透露出对中国早晚要加入裁军谈判的无可奈何。[⑤]问题是到那时美国还能拒不承认中国吗？10月28日，国务院的托马斯在给助理国务卿邦迪的备忘录中写道，美国必须记住的两个重要事实是：一，中国早晚会进入联合国和参加核裁军的国际谈判；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往正在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因此美国必须设法改变仅仅是"遏制"的对华政策，逐步

---

① G.W.Rathjens, "Destruction of Chinese Nuclear Weapons Capabilities", Dcember 24, 1964, David Wolff edited,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②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ember 15, 1964,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③ 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美国总统约翰逊对外关系言论摘录》，1964年7—12月，国际问题研究所1965年编印，第67—68页。

④ 《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对华政策等问题》，《参考资料》，1960年7月17日。

⑤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7, 1964, pp. 13-1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16, 1964, pp. 76-81;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ugust 14, 1964, pp 88-9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22, 1965, pp. 194-196; *FRUS 1964-1968, Volume XI,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打开同中国交往的大门。[①] 这项建议毋宁说是中国核试验给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带来的启示。

3. 关于越南战争问题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而且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领导人就断定，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形势是由共产主义势力扩张造成的，那里的民族革命战争不过是那种被肯尼迪形容为“坚如磐石、冷酷无情的阴谋运动”的一个部分。[②] 约翰逊更是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美国在南越遭受失败，苏联和中国，特别是中国就会前来填补美国离开后的“真空”，可能会有两亿中国军队从“山间小路”涌进印度支那，而且其邻国会一个一个地向中国“屈服”。为了制止中国的扩张，约翰逊从上任伊始，便声称他“将不丧失越南”，不做“目睹东南亚重蹈中国覆辙”的美国总统。[③] 需要指出的是，约翰逊的这种看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美国政府内的主导倾向，它毋宁说是当时美国政府中弥漫着的反华、反共和反革命的歇斯底里的典型而且是极其有影响力的反映。[④]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特别直接参与越南战争，目的都是为了遏止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但是美国也因此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首先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和地位，从一开始就限制了美国干预的规模和限度。换句话说，美国既要遏止中国，又不希望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这种困境从一开始就在折磨美国领导人。例如在肯尼迪执政初期，美国政府内部曾经有人建议，在老挝形势危急时，直接向那里派遣美国军队，结果遭到否决。反对派遣美军的人的主要理由就是担心那样做会引起中国介入，他们提出要么大干，要么不干，除非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否则干脆不要直接插手。[⑤]

---

① “Memorandum for Mr. Bundy”, October 28, 1964,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② 肯尼迪对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看法可参阅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 83—84 页。

③ 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P. 460，并见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 154 页。

④ 可参阅 Robert S.Mcnamara with Brian VanDeMark,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pp. 64–65, 102，116, 218.

⑤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一千天》，第 259 页。

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直接介入越南战争时，面临同样的困境。它每一次决定是否将军事干涉升级时，都不得不反复考虑中国的反应，因为他们确实担心会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结果是美国为了遏止中国而卷入越南战争，同时又因为担心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不得不对军事卷入的规模和程度有所限制。

美国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北越由于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一再拒绝了美国关于举行和谈的建议。据美国方面的统计，直到1968年，美国为和谈而进行的大大小小的试探多达2000多次，但是从未有结果。[①]北越坚持武装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向北越提供全面援助的同时，也一再劝告北越领导人不要轻易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否则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完成国家统一的斗争将前功尽弃。中国的反对至少也是北越长期拒绝与美国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国际上制造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论。[②]中国报刊这一时期强烈谴责美国的和谈不过是企图欺骗越南人民，软化北越进行抗美救国斗争的立场。[③]中国的强硬立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鼓动国际调停的努力。

中国支持北越坚决抵抗和顽强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两手政策，确实使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进退两难。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这种局面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背景，它决定了美国如要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就有必要改变其对华政策，起码不能将遏制中国作为进行干涉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要缓和中美关系，就必须放弃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至少需要首先表明，它确实准备为结束军事干涉作出切实的努力。

这里有必要提及1966年3月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29次会谈的情况。根据中国代表王国权的回忆，美国代表在会谈中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并在会谈结束后向中方的翻译强调了这一用语的含义，而且中方翻译确认了那是

---

① 参阅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25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50页；下卷，第7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471、820页；"Documents on China and Vietnam Peace Talks", Zhai Qiang, *Beijing an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 1965–68, New Evidence from Chinese Sourc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18, pp 26–34。

③ 以1965年春美国提出和谈为例，中国的报刊对国际上的所有调停努力都进行了猛烈和密集的抨击。《揭穿约翰逊的大骗局》，《人民日报》，1965年4月11日；《正告吴丹》，《人民日报》，1965年4月12日；《短命的骗局》，《人民日报》，1965年4月13日；《评十七国"呼吁书"》，《人民日报》，1965年4月22日；《我外交部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不欢迎英国政府派特别代表来华讨论越南问题》，《新华月报》，1965年第5期，第153页。

"友好的表示"，并将此情况转达国内。[①]王国权本人和有的论著认为，主要是因为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文革"）的影响，中国政府未能迅速作出反应，从而"错过了一次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或者说是"失之交臂"。[②]就探讨中国对美决策的国内环境而言，必须承认"文革"造成的激烈气氛很可能对当时处理这一情况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如果考虑到美国正在扩大越南战争，而中国正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抵抗美国侵略并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和谈等情况的话，可以基本上断定，当时基本上不是"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没有及时做出反应，很可能并不主要是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它涉及到中美关系总的状况、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对越南战争的政策等复杂的因素。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到60年代中期确实已经陷入绝境，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政策已经势在必行。

三、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及其特点

正如以往的研究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舆论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当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陷入绝境而无法自拔时，要求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舆论却愈显活跃，声势与日俱增。

美国舆论变化的最初标志是《康仑报告》的出台，其内容已如前述。60年代初，尽管肯尼迪政府继续推行僵硬的对华政策，美国民间关于中美关系和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并没有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主持的中国研究项目。

1962年1月，美国政府由于迫切希望了解有关中苏分裂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动员"非政府"的智力资源，展开相关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正是在国务院领导人的授意下，代表东部权势集团的思想库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从2月起邀集大批专家学者，就中苏分裂和美国的对策进行讨论。

很可能是受到这些大型研讨会的影响，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于4月提出了一项研究中国的宏大项目。对外关系委员会设计这一项目的原因是该委员会认为，中国对西方在亚洲的地位构成的威胁，是美国在60年代面临的

---

① 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

② 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第155页；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47页。

两大挑战之一，必须给予关注并对那里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检讨过去 10 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提供政策备忘录供决策者参考；在《外交》季刊和其他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的文章；出版有关的小册子以及出版正式的系列著作。

根据该项目的计划于 1966 年陆续出齐的 8 部著作涵盖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各国的对华政策等领域。[①] 尽管 8 本书的内容不同且观点各异，但是它们的出发点都是要重新研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及其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含义，归宿则在于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并为制定对华政策“努力开拓新的理解”。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作者具有相当高的权威。他们中间包括有报道中国问题的资深记者、著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曾在中国任职的退休高级将领以及多次参与中美谈判的外交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项目不仅本来就同美国政府要求研究中苏关系有密切关系，而且项目的“指导委员会”还聘请前国务卿的弟弟、曾经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担任主席，从而大大增加了该项目的“非政府”色彩。[②]

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的确给美国的政治气氛多少带来了一些变化。例如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丛书出版后，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报刊给予了报道，一些权威性的报刊如《纽约时报》、《星期六评论》、《芝加哥论坛报》等，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种变化表明，谈论“重新考虑对华政策”至少已经不是大逆不道的了。

继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研究项目启动之后，美国舆论界主张松动对华关系、改变对华政策的言论此伏彼起，从未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 1966 年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主持的对华政策听证会。

1964 年 3 月 5 日，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讲话，抨击美国现行的对外政策僵化，与国际政治的现实脱节。他在讲话中指出，不能排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未来的时期里会有所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具有灵活性，以适应变化的现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在谈到中国的现实时说：“最重要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两个中国’，而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陆中国，它是在中共

---

① 这 8 本书包括：*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U.S.Experience 1953–1967;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The Future of Oversea Chinese;The U.S.Policy and Asian Security*。

② 资中筠著《缓慢的解冻》对此项目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第 13—15 页）。

的统治之下，并且很可能将无限期地统治下去。”[1] 这里实际上否定了美国对华政策长期以来赖以支撑的那个完全是虚幻的依据，即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不会长期存在下去。

从1965年开始，随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的升级，美国会中的反战势力和公众舆论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国会参、众两院就美国的对越南政策举行听证会。作为这些听证会的组成部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1966年3月8日至30日，举行了12次对华政策听证会。应邀出席作证的包括一些持各种观点的著名中国问题或国际问题专家如费正清、鲍大可、汉斯·摩根索等，也有当年著名的“中国帮”的成员周以德。这些人中除周以德等少数人表示拥护美国政府现行的对华政策外，多数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其中最有意义的是鲍大可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遏制但不孤立”。

作为在听证会上作证的第一人，鲍大可明确指出，“在未来的十年里，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将是我们对外政策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而美国的政策必须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即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并非“即将消失的现象”，而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美国只能“面对这个现实”。他认为，由于中国会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美国企图将中国永远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做法越来越难以为继。从以往的经验看，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也许还是有成效的，但是孤立中国则是失败的和不明智的。他建议美国政府当前对中国应实行一种“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而最终目的则是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2] 鲍大可的观点不仅得到多数出席作证者的赞同，而且在美国政界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实际上也是在沿着这条思路酝酿改变对华政策的。[3]

富布赖特听证会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对美国对华舆论的一次转折。在听证会期间，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4] 听证会结束后，公开讨论和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再也不是禁区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日益成为美国公众的呼声。当尼克松政府终于下决心

---

① 转引自资中筠:《缓慢的解冻》，第16页；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38页。.

② *U.S.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Eighty–Ninth Congress, 2nd sessio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66.

③ 有关美国政界人物的反应可参阅资中筠著《缓慢的解冻》(第24页）和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44—345页)。

④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45—346页。

打开与中国交往的大门时，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节所分析的对华舆论实际上是所谓的“精英舆论”，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它的产生和形成与美国的决策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制造这种舆论的机构和运行机制中，包括许多与这一时期各届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他们或是从政府退休的前官员，或是有机会在未来的政府中任职，或是与政府中的一些官员有个人交往。他们有时接受政府的咨询，有时甚至反映的是政府中一些人不宜公开表达的某种观点。

（2）这种舆论有时有可能对重要决策产生影响，或对政策转变创造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如 1966 年富布赖特听证会所起的作用。不过这种舆论有时也受政府政策调整的影响，是政府政策“导向”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如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 1962 年实施的中国研究项目，其实就是国务院建议该委员会研究中苏关系的一个副产品。至于这种舆论后来如何演变，就不是政府所能干预的了。

（3）一些参与对华决策的关键人物往往是这种舆论的参与者。如前所述，肯尼迪本人在执政前参与过富布赖特的研究项目，并在重要刊物上就对华政策发表过公开的评论。最典型的还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性人物尼克松，他在 1967 发表的那篇受到毛泽东关注的文章《越南以后的亚洲》，其实就是当时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①] 参与制造舆论以及在此过程中思考有关问题和感受国内的政治气氛，是尼克松上台后决心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准备。

总而言之，上述事实已经足以表明，关注和深入研究美国对华舆论、特别是精英舆论，的确是有重要意义的。

结 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表现在一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断定中国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的威胁甚至比苏联还要严重，所以美国必须尽可能地遏制和孤立中国。另一方面，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

①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46 No.1, October, 1967.

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60年代中后期已经无法再协调下去了，与美国对华政策陷入绝境同步发展的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正是这种状况的突出表现。这一矛盾的历史进程的意义就在于，与美国对华政策陷入山穷水尽的同时，美国对华舆论已经酝酿出对华政策将要进行调整的内在逻辑和方向。

（陶文钊编:《中美关系10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

（1969—1973）

尼克松政府的亚洲政策不仅在冷战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从冷战结束十几年后的今天看这项政策的特点及其实施的过程，仍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长期和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到今天为止东亚国际政治格局仍可看到当年尼克松政府构想的影子，尽管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及中国成了一个迅速上升的强国，它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正急速扩大。当然，尼克松政府当年在东亚的努力能够如愿以偿，是与当时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有关的。例如尼克松政府刚好碰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东亚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国的大动乱“文化大革命”恰逢此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歇期”。[①] 基辛格就说过：“（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我所遭遇过的对手中，最能接受尼克松式外交手法的一群人。”[②] 尼克松的智慧表现在他认识到了这些条件，他是因为相信“美国不是万能的”，才为美国在东亚缔造了自冷战爆发以来，对美国的战略利益而言是比较合理的国际秩序。所谓比较合理是指，为实现在东亚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美国后来付出的代价比尼克松政府之前要小得多。最近不断解密的美国历史档案，还有中国政府不时公开的一些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越南等方面陆续公开的历史文献，为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新的内容和细节。它们一方面可以帮助厘清过去的一些疑问，另一方面有利于更深入地挖掘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发展的历史逻辑。

---

① Niu Jun: “ The Background to the Shift in Chinese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1960s” ,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China, Vietnam, and the World beyond Asia*, edited by Priscilla Rober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28–334.

②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 年版，第 672 页。

在学术研究领域，尼克松政府的亚洲政策是一个已经被广泛研究和评论过的课题。不过对这项政策的形成和实施的过程及其一些基本特征，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探究的疑问。例如：当时美国领导人对全球均势和东亚地区均势之间的联系的看法；美国领导人对中国在地区问题——包括印度支那战争、印巴战争等等——上的影响力的看法，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指望能得到中国的合作；在处理对华关系过程中，利用缓和中美关系对抗苏联与结束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战争这两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上，美国领导人是如何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尼克松政府对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和中日关系的看法；等等。

本文无意梳理和分析上述以及尚未述及的所有问题，对一篇论文来说，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本文将重点放在分析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与结束印度支那干涉政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解读尼克松政府是如何构建东亚的地区均势，并将其与所谓的全球均势联系起来。之所以选择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与结束印度支那干涉政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的案例，主要是因为尼克松政府之以后中美双方在东亚地区有意义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如 1979 年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打击以及随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态的发展过程，通常看上去都是杂乱无章的。后人的解读难免会根据结果推导原因，从而将其中的各个环节合理化。本文也只能是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一）

尼克松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调整，几乎涉及了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各个主要方面，如压缩美国在亚洲的驻军、结束在越南的军事干涉、与中国和解、同苏联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冲绳归还日本和调整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等等。在所有这些重大的调整中，尼克松政府在东亚的所作所为，对于冷战中的美国政策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因为调整东亚政策是尼克松时期开始的美国遏制战略大调整的起点，这项政策的内容反映了尼克松主义——美国战略调整的指导思想——的逻辑的前提，即世界已经形成多个力量中心，美国“不是万能的”；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特别是亚洲，承担所有的责任；它需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据进行选择，在并非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让受援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思想反映在几个重要的文件中，它们包

括：1967 年 10 月发表在《外交》季刊的文章《越南之后的亚洲》[1]、1968 年 3 月 28 日在全国广播公司播发的演讲、1969 年 7 月 25 日在关岛发表的非正式谈话[2]、1970 年 2 月 18 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70 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3]。

从上述文件相继发表的顺序看，尼克松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的确是从思考美国在越南战争以及在东亚面临的严重问题开始，逐渐延伸到整个美国对外政策的。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他在 1967 年那段“不过问政治的休假”期间的一次全球游历。那段时间的游历和思考，使他对世界的变化和美国面临的困难，有了与以往很不相同的认识，并为他执政后提出新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4] 作为尼克松主义的发端之作的《越南之后的亚洲》，就是这次游历的产物之一。尼克松当时曾说，他在游历中亲眼看到了美国面临的“问题、机会和危险”，主要就是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对美国世界地位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导致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政策问题。

从冷战爆发后的历史进程看，冷战虽然是美苏两国主要在欧洲对抗的产物，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干涉却成为那段时间美国对外政策中最严重、最突出的挑战和挫折。美国从 50 年代初开始，在东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其他各种资源。首先是在 1950 年介入朝鲜战争，随后是在 60 年代初开始，逐步介入印度支那地区的冲突，直到在越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与战争。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到 1973 年美军全部撤出印度支那这 28 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东亚进行战争，而且规模巨大。这的确是相当严重的，这种状况与东亚国际政治的演变一起，极大地影响甚至塑造了美国人对这个时期对外政策问题的认识。尼克松政府调整全球战略从理解、论述并调整亚洲政策开始，应该是历史进程的必然。

如果将尼克松政府同其前任比较，约翰逊的困境和痛苦在于，已经意识到不该深陷越南泥潭，却难以从全球视角中重新给美国在亚洲的干涉清楚地定位。造成这种状况固然同领导者个人的特质和当时的处境有关，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任何一个宏大的历史过程，都不可能产生于简单、偶然的因素。冷战后美国在亚洲的

---

① “Asia after Vietnam War”, October 1967, *Foreign Affairs*, pp. 111–124.

② Richard Stenbins and Elaine Adam, *Documents of American Foreign, 1968–1969*, New York: Association of Foreign Relation, 1972, pp. 332–333.

③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Washington D.C., GPO, 1972.

④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册，伍任译，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第 360—365 页。

军事干涉一度日益扩大乃至难以自拔，很可能同干涉朝鲜战争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仅5年有关。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和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战后世界政治和安全形势的认知，是很难精确界定的。不过，不论是当时的历史文献还是后来的很多研究都证明，这种影响存在并且是巨大的。美国大规模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认知在起作用：其一是相信北朝鲜的进攻是在苏联的指使下发动的；其二是金日成发动的战争是苏联全世界扩张的又一个步骤。如同杜鲁门所描述的，当时根据美国相关部门提供的一些关键性的文件，“凡是东西方有接触的地方”，都可以使人做出苏联将在那里发起进攻的判断。[①] 李奇微将军在回忆中说，他和很多同事当时甚至认为，金日成发动的进攻是“第三次大战开始了”，苏联“终于决心摊牌了”。[②] 在此前一段时间，美国政府的文件中的确反映出美国决策者们几乎都相信，慕尼黑事件是一个导致惨痛后果的负面教训，必须要避免此类悲剧重演。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立即决心在“远在天边的地方”投入战斗。

中国军队的介入和战争最终冻结在三八线，除了加剧美国领导人对苏联阵营的亚洲部分的仇恨、怀疑和戒备之外，没有也不大可能促使他们去思考，东亚国家——不论是属于什么主义，除了无条件地效忠苏联或美国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更重要的需求，而那些需求很可能是推动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做出诸多对外政策决定的主要动力。例如，很多研究已经证明，金日成决定进攻南方肯定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和支持，但北朝鲜军事行动的原动力就很难说是来自斯大林的意志和扩张意图。再如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的主要动机，肯定不是为了推动世界革命或向朝鲜半岛扩张势力范围，等等。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对那场战争的理解又与二战的经验结合起来，严重影响了美国领导人在随后处理印度支那问题的立场和政策，他们将类似老挝问题那样由相当复杂的因素造成的地区矛盾和冲突，一体视为共产党阵营扩张计划中的一个步骤，从而使他们相信，印度支那半岛对美国也具有了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例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这样形容那里的局势：“老挝若是陷入共产党手中，可能造成其仍然自由的邻国柬埔寨和南越的相继沦陷，甚至泰国和缅甸也可能不保，犹如

①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93页。

② 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一排骨牌纷纷倒塌。这样的连锁事件将替共产党夺取整个东南亚打开通路。"[①] 肯尼迪后来则声称，他对多米诺骨牌理论深信不疑，因为中国是如此巨大，"以致失去南越，不但会增强他们向马来西亚发动游击战进攻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还会给世人造成东南亚未来的趋势属于中国和共产党的印象"，所以印度支那的未来便成了美国的一场"重要斗争"。[②] 于是，美国几经犹豫和反复，最终还是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年并以失败告终的军事干涉与战争。后来的发展表明，印度支那问题的复杂性更是大大超过了朝鲜半岛，而当时美国对那里的认识却比对朝鲜半岛的认识来得更简单，美国领导人的解释也更为直截了当，即必须在老挝和南越——后来又加上柬埔寨——赢得胜利，否则就会丢掉全世界。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期，亚洲新兴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正掀起新一波的浪潮。这股浪潮对所有主要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问题恰恰是，在这个阶段，尼克松的前任，从杜鲁门开始一直到约翰逊（主要是指他执政的前期），都好像是站在云端来俯瞰东亚。在他们眼中，那里只是欧亚大陆向东延伸出的一个边缘板块儿，没有任何其他的个性和色彩；它要么被苏联占领，要么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那里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和动荡，不是受到苏联的指使，就是中国的阴谋的结果。

实际上，不论是从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哪个方面看，东亚国家都远比美国当时理解的要复杂得多。那些国家正处在对它们来说很特殊的历史阶段，复杂而严峻的国内需求，如民族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的形成、争取实现或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社会与经济的现代化等等，从根本上决定着它们的对外政策方向。在那里的国家，不论其大者如中国，或小者如柬埔寨、老挝等，差不多都是在根据各自国家内在需求的优先次序，制定其对外政策。越南在 1960 年代开始在中苏之间的来回摆动和在 1970 年代中期在中苏之间选择倒向苏联一边，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周恩来在 1972 年第一次与尼克松会谈时告诉后者，防止印度支那被苏联控制的最好办法，就是美军尽快撤出，否则只会帮助苏联扩大影响力。[③] 这很可能是当时中国领导人的经验，越南人因为同美国的战争而需要并可以从苏联得到比中国那里更有效的军事援助，导致他们选择更靠近苏联。结果是扩大了苏联在那个地区的影响，

---

① 转引自基辛格：《大外交》，第 591 页。

②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 659.

③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2，1972，*FRUS*, vol. XVII, p. 710.

尽管比当时很多人想象的要小些。

从冷战开始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进程看，尼克松自称他的政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并非言过其实。[①] 因为尼克松和他的主要助手基辛格对美国政策的主要改变，就是在承认世界力量格局已经变化，定义美国力量的限度以及逐步了解东亚地区问题的独特性的基础上，做出了停止在东亚进行军事干涉，并依靠一种独特的均势来维持美国战略利益的重大决定。所以，尽管冷战的中心和美国遏制战略的重心在欧洲，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却是开始于美国的亚洲政策。

从近些年来已经公布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看，尼克松在入主白宫之前已经提出，要依靠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均势，来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当尼克松以白宫新主人的身份考虑对外政策时，随着对中国和对华政策的独特见解大致形成，他在所谓世界已经形成的“五个力量中心（美苏欧日中）”的架构中，逐步提出了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设想。“战略三角”这个概念不时出现在当时的美国政策文件中。[②] 随着对华政策调整和中美关系缓和趋势日益明朗，尼克松政府的全球均势设想中，逐步延伸出了东亚地区的均势蓝图，即通过在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上让日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及缓和中美关系，构建起一个美日中苏的均势结构，以维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优势和影响力。[③]

从“五个力量中心”到“战略三角”，再到亚太“四边均势”，这是历史文献给后来者提供的一条思考线索。它看上去包含着令人吃惊的逻辑性，以及从美国国家利益角度看所难以否认的合理性，所以也很容易使后来的研究者将这种逻辑性和合理性等作为尼克松等领导人的基本认知轨迹。不过如同任何战略设想一样，它最终能够成为现实，必定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各种必备的条件（包括是否有运气在内）姑且不论，一个起码的要求是能否解决当下迫在眉睫的战略性问题。对尼克松政府来说，就是能否结束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和缓和中美关系，其中结束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尤为突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

① 参见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 19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5 年版，第 352 页。

② “Minutes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Meeting”, May 15, 1969;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7”, July 3, 1969; “Draft 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63”, October, 17, 1969, all seen in *FRUS*, vol. XVII, pp. 37, 42, 108. 周恩来当时认为，这个概念中有关中国影响力的判断是夸张了。基辛格：《大外交》，第 668 页。

③ “Minutes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Meeting”, May 15, 1969; “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 August 8, 1969, *FRUS*, vol. XVII, pp. 37, 60.

（二）

关于美国如何结束在越南的军事干涉的问题，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而且还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它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细节。不过尼克松政府结束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尼克松政府结束干涉的决策及其执行的过程，对东亚均势的形成产生了何种影响，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这个问题自然联系到另一个事件：缓和中美关系。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差不多都是将两个课题分开研究的。特别是在中国学术界，将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差不多都归结为出现了“苏联威胁”这个第三者，而且这个威胁超过了美国曾经造成的威胁。对印度支那战争的进程与中美关系缓和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新近出版的论著表明，中国学术界已经在思考和探讨，印度支那战争对中国对美政策的影响，并认为其影响是至关重要的。[①] 这些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加强对尼克松政府有关政策的解读。

基辛格在他的《大外交》中，表达了对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缓和的如此理解，即：“抛开外交辞令”，《上海公报》的有关部分确认，“中美已经心照不宣地结盟阻止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主义。”[②] 一年以后美国撤出了印度支那，七年以后中国对越南进行了军事打击，后来双方又合作解决了越南入侵柬埔寨造成的问题。共同解决柬埔寨问题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局变时期，中美仍然维持住基本关系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期间中美还在阿富汗为抗击苏联的入侵进行了有成效的合作。

另一方面，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即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和解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的理解，也是建立在中美在亚洲，主要在印度支那地区合作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合作，使所谓的中美战略关系具有真实的地缘战略价值。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美国宣布制裁中国，邓小平向到访的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

① “The Background to the Shift in Chinese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1960s”, pp. 328–334；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宫力、William C. Kirby, Robert S.Ross 等编：《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基辛格：《大外交》，第673页。

说：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①] 细算起来，中国在尼克松政府以后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包括：共同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为此加入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列）、在南亚反对印度入侵巴基斯坦、在印度支那反对苏联的扩张与共同解决柬埔寨问题，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有实际效果的，是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作为，它使邓小平最有理由如此明确地告诫美国，当时中美和解和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是建立在对地缘战略的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在中美建交以后立即的作为——对越作战，是建立在上述基辛格所理解的（很可能也是毛、周、邓等中国领导人所理解的）在亚洲“心照不宣的结盟”之上的。这样推断的理由之一，是历史反复证明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即高明的政治家都明白，只是现实才能把各种事件联系起来，人们提出的政策概念可能听上去富有逻辑，却不可能将各种事件实际上纠合在一起。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识而已。

尼克松政府当时面临的现实是，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否则尼克松和基辛格关于建立全球和地区均势的所有计划，都将成为纸上谈兵。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与这个基本现实联结，尽管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美日关系的调整，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对日本和美日同盟的态度和政策。尼克松政府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它恰好赶上了了田中角荣在那个时刻成为日本的首相。这位在日本政治中可算是怪杰的日本领导人敢做敢为，他竟断然采取措施，用比尼克松式秘密外交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方式，迅速同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而消除了美国调整美日军事同盟政策可能给中美和解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论尼克松本人对日本持正面还是负面的看法，支持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初包括在遏制中国方面发挥更大作用[②]），毕竟是美国公开宣布和持续推行的政策。这项政策曾经受到中国的严厉批评和谴责。[③] 反对美日军事同盟和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一直是中国有关日本政策的舆论的主调。尼克松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曾经花了不少时间，解释美国在亚洲军事存在对抑制日本可能再次出现扩张倾向的重要含义以及他本人对此类问题的态度，以便消除中国领导人的疑虑，至少不要使这种疑虑妨碍他与中国和解的努力。[④] 显然，中日关系的迅速正常化解决了美国在构建亚太均势面临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

① 邓小平：《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1989 年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50 页。

② “Asia after Vietnam War”, p. 12.

③ 《北京周报》，1969 年 11 月 28 日，第 28—30 页。

④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1, 1972, pp. 677–68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2, 1972, pp. 693–719, *FRUS*, vol.XVII.

目前已经公开的美国外交文件中，有大量的文字证明了美国最终决定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的逻辑。几任美国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的考虑，就是要在该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主要就是遏制所谓“红色中国”的扩张。[①] 早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就断定中国在东南亚有扩张野心。当时的美国决策者就认为，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不能成为在印度支那的又一个“慕尼黑”。[②] 已经公开的历史文献，包括解密的历史档案表明，尼克松等美国领导人似乎并没有在这方面做过深刻的检讨，即印度支那的局势是不是中国扩张造成的？中国是否在印度支那有一个扩张的计划或意图？以及中国能够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等等。这是历史的真实，看上去很不合逻辑。尼克松在他那篇1967年发表的文章中，继续强调中国是亚洲——包括印度支那地区——紧张的根源。[③] 不过奇怪的是，他入主白宫后开始考虑改变对华政策时并没有提到，他的前任决定再次到万里之外进行军事干涉的理由，是否过于荒谬。[④]3月初情报机构根据基辛格的要求提交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对中国当前和未来可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分析。虽然该文件继续认为中国会在亚洲支持“人民战争”，但总地看内容了无新意。[⑤] 对尼克松要调整对华政策的愿望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尼克松执政后不久，在3月间便决定加强对北越的轰炸，并将轰炸扩大到柬埔寨。但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内部为数不多的有关如何打开中美关系的记录几乎都没有提到，印度支那战争升级可能对双方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当时尼克松政府将外交领域的努力都放在与苏联协调上面，他们认为，在影响北越领导人的政策方面，苏联是比中国重要得多的外部因素。[⑥] 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相信苏联有更大的影响力，很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美国与中国没有什么联系。这时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过是一个在想着的事情，远没达到能直接影响美国政府一些重要决定的程度。

---

① 可参阅陶文钊、牛军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三卷（下），第八编《对老挝的干涉》和第九编《越南战争与对华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收集整理并翻译了部分美国军事干涉印度支那的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了针对中国的内容。

② 《周恩来与艾登谈话记录》，1954年7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③ “Asia After Vietnam War”, pp. 111–114.

④ “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hi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February 1, 1969;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 Februay 5, 1969, *FRUS,* vol. XVII, pp. 7, 8.

⑤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March 6, 1969, *FRUS,* vol. XVII, pp. 22–24.

⑥ 基辛格：《大外交》，第675页。

尼克松在7月下旬到8月初的出访，可能对他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尼克松有关与中国和解的看法，更多的是基于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基本观察，以及基于常识的合理推理，即美国无法也不应该孤立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此而已。即使在如何认识和应对中苏之间已经公开的冲突方面，尼克松政府也是模棱两可的。尼克松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仍然相信，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扩张性的，是对东亚特别是中国的邻邦的威胁。尼克松向他拜访的亚洲国家领导人声称，美国不在乎中国的国内政策，关键是中国的对外政策对其邻国是个威胁。但是，这在那些国家的领导人看来，这种表白基本上是缺乏根据和多余的。从一些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如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那里，尼克松和基辛格听到的是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另一种评价，同当时包括二位在内的美国人的评价，几乎是截然相反的。①

8月2日尼克松与齐奥塞斯库的谈话是目前能看到的这样一份历史记录，它表明尼克松终于听到了（很可能也是听进去了）对中国亚洲政策的另一种分析，它不同于朝鲜战争以后几乎所有相关的美国官方文件的分析。齐奥塞斯库告诉尼克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威胁过她的任何邻国。②这次出访使尼克松印象深刻，即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反对针对中国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因为它们更担心苏联会从中得到好处，以致加强它在亚洲的扩张。③

北京时间8月13日，中苏在中国新疆的铁列克提地区再次发生流血冲突。华盛顿时间8月14日，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基辛格所称的“革命性的理论”，即在中苏冲突中，“苏联是更具侵略性的一方”。④这一判断对肯尼迪政府（或许更早）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的逻辑-——中国比苏联更危险和更有侵略性，是具有颠覆性的。⑤从时间的连接看，上述出访的确有可能在关键时刻，促使尼克松做出了关键性的判断。

---

①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陈瑶华、方辉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236页。

② “Memorandum Conversation: Private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Ceausescu”, August 2, 1969, seen in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the Cold War, 1969–1972: Declassified U.S. Documents*, edited by William Burr, Number 14, Source: NPMP, NSCF box 1023, Memcons–President Ceausescu August 2–3, 1969.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ptember 9, 1969, *FRUS*, vol. XVII, pp 80–81.

④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第238页。

⑤ “Report of the Sino–Soviet Task Force”, April 1, 1961,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Box 22(Z), Kennedy Library.

这次访问有可能也是引起尼克松政府重新思考中国与越南战争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已经公开的记录，在1969年8月2日与奇奥塞斯库会谈后，尼克松应该是有一次谈话，向后者专门解释了他在越南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次会谈的记录。从中国文献中披露的内容，可以推测罗马尼亚领导人可能曾经试图向中国领导人转达美国的政策意图。9月间，参加了与尼克松会谈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在参加胡志明葬礼途中，访问北京并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从中国方面间接披露的部分谈话内容看，双方肯定谈到了越南问题，毛雷尔是否转达了尼克松的谈话则不得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非常明确地告诉毛雷尔，中国明显地同北越拉开了距离。他表示对北越的政策到底是战还是和，中国均不干预；中国对进行中的巴黎和谈也全无兴趣。至于中美关系能否缓和，关键就是台湾问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①] 无法确定罗马尼亚领导人是否将周恩来的这种态度转达给尼克松政府，以及尼克松政府是否从中体会出什么东西。不过尼克松政府从后来不久与中国方面接触和间接的信息来源中也注意到，中国方面明显地将越南问题与中美关系切割，并不将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作为缓和中美关系的条件和议题。[②]

不论中国的这种立场对尼克松政府是利好还是利空，已有的文献都表明，是中国从一开始就将越南问题同中美关系缓和切割开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愿意以及如果愿意的话，如何将两个问题连接起来？

（三）

当尼克松政府决心结束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并将其放在对外政策调整的首要位置时，它在寻求与中国和解的过程中，不可能不考虑利用中美和解造成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事实上，尼克松、特别是具体规划和执行政策的基辛格，从一开始就试图将两者连接起来。基辛格的典型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提出令对方心动的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38—539页。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February 20, 1970, p. 181;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February 23, 1970, p. 186;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ogers to President Nixon", March 10, 1970, pp. 189–190;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January 12, 1971, p. 254; *FRUS*, vol. XVII.

“诱因”。在获知中国方面强调在中美和解的过程中，中国只关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否改变政策后，基辛格即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与印度支那局势联系起来。他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称，在可能发生的双方高层次的会谈中，不应只讨论台湾问题，而且要说明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与东亚的紧张局势有关，美国军事存在的削减取决于消除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①

在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问北京之前，美国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即在解决越南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至少必须共同讨论这个问题。②基辛格在第一次见周恩来时，将印度支那问题列为双方需要讨论的第二个议题，仅次于台湾问题。③很有可能的是，在基辛格心目中，将台湾问题列在第一，只是外交手腕儿的需要而已。

在同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谈中，基辛格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向周恩来解释美国的政策和美越谈判的进展与最新出现的症结。当时尼克松似乎希望，在这个议题上基辛格应有所节制，可能是他不希望使中国留下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印象。不过基辛格毕竟在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这足以促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两者紧密地连接起来。基辛格以看上去尽可能坦诚的方式，详细并耐心地向周恩来解释了尼克松政府希望从越南撤军的真诚愿望，并力图使后者相信，事实上美国与北越是有很多共同点的，目前和谈进展困难，主要是因为北越领导人立场有些僵化；他们不断提出新的提案以致造成新的障碍，他们好像不能理解，美国早一天撤走对北越其实是有利的。基辛格对周恩来竟然不了解巴黎谈判的情况和对北越的“新九点建议”一无所知，肯定会留下印象。他不厌其详地向周恩来介绍美国与北越的分歧，并试图使周相信，美国撤军的意图是真诚的，美国准备制订出完全撤出印度支那的具体可行的时间表，而且完全不必担心美国撤出后，还会找借口卷土重来。④

尼克松政府很走运，中国领导人明白无误地解读了基辛格的良苦用心。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第一次会谈开始就直率地指出，他并不讳言台湾与印度支那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印度支那地区因为“还在流血”，所以可能更紧迫一些。周恩

①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undated, *FRUS*, vol. XVII, p. 249.

②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the Ambassador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McConaughy)”, June 30, 1971, p. 350;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 File”, July 1, 1971, pp. 355–356; *FRUS*, XVII.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FRUS*, p .362.

④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0，1971, *FRUS*, pp. 362–364。

来告诉基辛格，中国完全支持北越的七点建议，而且那是一个供讨论的基础。中国的立场就是两点：第一是外国军事力量完全撤出印度支那地区；第二是那里的问题由那里的人民自己解决。美国撤出后，中国不会派军队去那里，也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就像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它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那样。周恩来还说明，中国并不了解也无意详细探讨美越谈判的具体内容，而且也不清楚北越新提出的“九点建议”，美越谈判完全是它们之间的事情。不过从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他对基辛格就美国撤出越南的决心和准备采取的步骤，如制订时间表和撤出后将绝不返回等，还是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且印象深刻。[①]

周恩来在会谈之初向基辛格表示，中国无意介入美国与北越的谈判。这并不是外交托辞。自 1968 年 11 月以后，中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出现了重大的调整，其突出的特点是同北越的关系降温。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国不像过去那样，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会谈，但也绝不介入北越的和谈政策和过程。[②]从后来一段时间看，中国的援越部队从 1969 年 2 月起到 1970 年 7 月，陆续全部撤回中国（如周恩来在会谈中告基辛格，中国在越南没有军队），军事援助也大幅削减。[③]周恩来在会谈中表现出对巴黎谈判和北越的新建议不甚了解，以及他表示中国不会介入美国与北越的谈判，也是实情。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越关系的冷淡程度；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的印度支那政策的基本特点使然。

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升级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反对北越与美国进行和谈。中国的理由除了政治经验、军事考虑之外，还是因为对北越的支持和援助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援越抗美是证明所谓“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付诸实施的重要标志，甚至是鼓舞中国公众热情参与“文化大革命”以把中国建成“世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手段。周恩来在向外国领导人解释中国不干预美越巴黎和谈进程的理由时说：美越谈判有苏联“插手”，苏联把越南当作与美国交易的筹码。[④]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中国是如何看待美越和谈的。所以当北越在未与中国协商即公开宣布准备与美国谈判后，中国很快便决定冷淡与北越的关系，并减少军事援助。

1970 年春美军入侵柬埔寨以后，中国与北越的关系有所改善，中国公开表示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0，1971, *FRUS*, pp. 365.

② “The Background to the Shift in Chinese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1960s”, pp. 328–334.

③ 曲爱国：《中国职员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版，第 101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539 页。

将加强对北越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也在会谈中向北越领导人表示，可以理解并支持北越选择与美国谈判的政策。毛泽东甚至赞扬北越外交努力的成果。[①] 更重要的是中国这时已经向美国提出，双方需要通过更高级别的谈判，才能排除阻碍中美和解的障碍。中国领导人当然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否定北越的和谈政策。不过中国领导人这时很可能仍然不相信美越谈判会有真正的结果，就如同他们还不能断定中美和解的进程必然实现或必然很快实现一样。[②] 在他们看来，北越与美国和谈不过是另一种斗争手段而已。中国媒体则继续保持既往的论调，在中国报刊公开发表的声明或其他文章中，仅对北越的武装斗争予以肯定和支持，对和谈则避而不谈，或间接地批评。[③] 可以说，即使中国与北越的关系有所改善，中国对越美和谈不再持那么僵化的立场，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中国已经改变了对越美谈判的基本政策，更不能断定中国与北越已和好如初。

正因为如此，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周恩来与基辛格秘密会谈期间，很快改变了不介入美越谈判的姿态。在 7 月 11 日的会谈中，周恩来明确表示，他会向他的“越南朋友”转达与基辛格会谈的这部分内容。[④] 发生这种变化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国自己已经开始了与美国和解的进程，不过仍有一些更复杂的原因需要分析。

一方面，美国将从越南撤军与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存在联系起来，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希望加速美国撤出在台湾的军事力量，从而造成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例如 1973 年间，毛泽东曾经再次尝试实现国共和谈，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⑤] 中国领导人当时有可能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是难以长期生存的。

从更广阔的背景看，中国有关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安全战略的逐步转变，即从主要反对和防范美国的威胁，逐步转向防范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这个转

---

① “Maoz Zedong and Le Duan,” May 11, 1970; “Mao Zedong and Pham Van Dong”, September 23, 1970; all seen in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China, Vietnam, and the World beyond Asia*, edited by Priscilla Robert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17–522.

② “Mao Zedong and Pham Van Dong”, September 23, 1970.

③ 《中共中央电贺越南劳动党成立四十周年》，1970 年 2 月 2 日，《人民日报》，1970 年 2 月 2 日；《中国党政领导人致越南党政领导人的贺电》，1970 年 9 月 1 日，《人民日报》，1970 年 9 月 2 日；《中国党政领导人电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1970 年 12 月 19 日，《人民日报》，1970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党政领导人致越南党政领导人的贺电》，1970 年 9 月 1 日，《人民日报》，1970 年 9 月 2 日。

④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1, 1971, *FRUS*, p. 445.

⑤ 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年版，第 69 页。

变一方面促使中国领导人将注意力转向防范北方的苏联威胁。不过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以美军入侵柬埔寨为标志的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升级行动，仍然使中国强烈感到南面的威胁。早日结束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是中国完成安全战略转变的关键之一。另一方面，苏联勃列日涅夫政府提出建立所谓“亚洲集体安全”的设想和加强在印度支那地区的介入后，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与苏联之间的竞争关系形成并持续升级。这方面的考虑构成了中国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和美国尽快撤出的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因为美国持续的战争行动已经成为迫使北越加剧倒向苏联怀抱的重要因素。周恩来在后来一次与黑格的谈话中告诉后者，美国在越南轰炸的升级只会增加苏联的影响力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①] 循着这个逻辑就可以理解，当确认美国确实希望早日从印度支那撤出军事力量和绝无可能卷土重来之后，中国领导人很可能改变了过去对和谈前景的看法，相信美国结束干涉是真心诚意的，结束战争的时机的确正在出现。基辛格报告尼克松他与周恩来会谈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在印度支那会对美国有所帮助，中国清楚表明希望谈判解决并会转告河内此一想法。[②]

中国方面公开的一些文献间接表明，中国领导人在与基辛格会谈后，的确做出了说服越南方面的努力。7 月 13 日，即基辛格离开北京两天后，周恩来亲自前往河内向北越领导人通报情况。目前中国文献并未透露双方会谈的内容，不过有资料间接表明，北越对中方的看法很不满意。周恩来离开后，越南的《人民报》于 7 月 19 日 发表社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明显地影射批评中美会谈。社论说：尼克松政策“阴谋实现各大国之间的妥协，妄图强迫各小国必须听从它们的摆布”，等等。[③] 周恩来后来曾在外交部发给各驻外机构的《外交通报》中批示说，在中美和解中，除双边问题外，凡涉及两国之外的国家，只能由当事国自己解决，中国不能涉入。[④] 由此也可以推测，周恩来与北越领导人的会谈至少也是不欢而散。

但是，不论周恩来与北越领导人的会谈成功与否，基辛格访华与随后发生的周恩来访问河内，导致了中美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迈出了相互理解、信任和合作的第一步，也是所谓中美战略关系对双方真正在地缘战略上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是非常初步的，但似乎立即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北越在随后的巴黎会谈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anuary 3, 1972, *FRUS*, p. 646.

②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November, 1971, *FRUS*, p. 527.

③ 该文全文见《参考资料》(上)，1971 年 7 月 20 日，第 1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 469 页。

中，很可能开始更重视与中国领导人交换看法。是年11月，北越领导人，也是谈判负责人范文同访问北京，与周恩来签署了联合公报。双方在公报中确认，支持南越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而七点建议基本点就是，美国从越南撤出全部军事力量和让越南人民自决其前途。[①]这种表述所表达的其实就是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阐述的原则，尽管在文字表述上增加了很多具体的措辞。至于为什么北越方面11月接受了中国方面的意见（至少在公开的文字上表示接受），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有待相关的档案进一步开放。

后来的发展表明，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远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1973年11月美越签订协议为止，在有些时候中国甚至还加强了对印度支那三国抗美力量的支持与援助。由于中国的印度支那政策的极端复杂和对中国对外政策影响巨大等原因，中国领导人一直表示，不可能接受与尼克松政府合作的建议。中国领导人对他们将继续支持北越抗战，也是直言不讳的。[②]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真正需要重视的是，美国在此期间空中作战的升级，以及中国在此期间增加对北越的军事援助，并强烈谴责美国的每一次军事升级行动等等，都没有导致中美和解陷于停顿。其根本原因就在前引《上海公报》中那段话，以及中美领导人对两国战略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含义的理解。也正是这种理解，导致中国在1979年对越作战并相信和实际上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也导致了中美后来在解决柬埔寨问题过程中的漫长合作。

结 论

本文对尼克松政府东亚政策的初步分析表明，一项重大的战略构想要成为现实并有长期的影响，必须能解决紧迫的地缘政治问题，否则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尼克松政府东亚政策的调整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它的实施也是基于一种长远的战略设计。从实际过程看，这项战略设计最终落实为可操作的东亚政策，并演变为东亚国际政治的现实，主要还是因为在其执行过程中，尼克松政府能将战略性的设想逐步与东亚地区已经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结合在一起。在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固然包含着如何利用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以形成新的战略均势。但是，如果尼

① 《联合公报》，1971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1971年11月27日。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三）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页。

克松政府不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找到与对华政策的联结点，利用中国共同对付苏联的构想至少也会是内容贫乏的，很可能也是经不住考验的。

本文在论述中也一再提到，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得以实现，是有运气的成分的，例如中日关系正常化、中苏恰在那个时候发生边境冲突、中国与北越关系降温和中国调整其印度支那政策，等等。这种所谓的“运气”其实表明的是，在大国之间既存在数不清的矛盾，也有数不清的机会。涉及到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这类复杂的问题，最好不要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过于简单地理解对方，如此才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战略利益。尼克松政府对东亚的战略设想能够逐步成为现实，在很多情况下也就在应对具体问题时的一念之差而已。

（《冷战国际史研究》2007 年第 5 期）

代 结 语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60年之经线

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和分析贯穿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以下简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线索。任何领域的历史研究之起步均在界定时间和空间，使用经纬的概念或许可以比较形象地界定时空。纬线类似研究者在认知过程中对时间的切割，即呈现所谓历史发展演变的阶段性，每个阶段构成一个包含着复杂和流动性内容的相对独立的空间，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决定对外政策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不同，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以及不同的最高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不同和对外交目标的追求各有其特点、侧重，致使建国以来的对外关系发展出现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反映了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不同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历经60个春秋，它的对外关系的历程同国家的历史进程一样，可以大致划分为前30年（1949—1978年）和后30年（1979年至今）两个时期。前30年又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后30年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划分阶段的标准是以国内政治和与国内政治紧密联系的对外政策的变化为标准，至于为什么以此为标准和如何划分出这些阶段，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故在此不赘述。

经线则类似事务发展的连续性的追寻和表述。建国以来的对外关系的历史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对外政策、对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重要的外交活动、有关的外交人物和丰富的外交思想，等等。认识、把握和阐述这些丰富的内容有很多角度，也有相当多的或长或短的线索，不过其中主要的也是贯穿始终的线索是：(1)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2)中国内政的影响；(3)中国对外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及其与中国外交之间互动的影响。这三条经线

本身肯定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的存在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它们在60年里是如何贯穿始终的，每条经线都包含什么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等等，则大有必要深入分析和研究。本文只是在这方面做初步的尝试，很有可能是论文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

一、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

要理解中国对外关系，首先必须理解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理解中国革命运动与6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天然联系”。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是同中国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同建国前历届政府的外交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基于对此前中国外交的彻底否定和深刻批判，而不是此前中国外交的自动延续或有意继承。在这方面，世界上相反的例证大大多于相同的例证。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发生对研究革命国家的外交是有典型意义的。

所谓“天然联系”，从历史连接的意义上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是从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直接转变过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同外部世界建立了某种联系，如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一些国家从事民族和革命运动的组织之间的关系，还有抗日战争时期与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这些关系远谈不上是丰富全面的，但对后来成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共的外交思想形成、组织建构和人员构成等等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①

不过所谓的“天然联系”并不仅仅是，而且主要还不是指“历史连接”。它的核心是指新中国外交形成和发展的最初动力直接来自中国革命运动，它在形成阶段的主要目标产生于中国革命运动，它的主要特点也是由中国革命运动所塑造的，而且它也是直接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延续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对外政策就是在国共内战后期（1948年冬至1949年春）制定的。在最深层面上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核心价值如独立、平等和尊严，以及以平等为中心的现代国际正义诉求等，都是在革命运动时期酝酿成熟并最终转移到60年的外交之中并逐步扎根。所以，只有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才能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及其主要特

① 参阅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1935—194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2008年版；刘德喜：《延安时期毛泽东外交战略（1943—1949）》，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征的来龙去脉。

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同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革命运动之所以发生，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造成巨大的冲击、痛苦和破坏。总地看来，从清王朝崩溃到辛亥革命失败，无论中国的统治者和各种政治势力基于什么样的现实需要、试图或已经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外部威胁，以及争取建立符合他们利益的对外关系，其后果几乎都是导致中国的各种权益不断地丧失，以及列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日渐深入。[①]

另一方面，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危机成为重要的催化剂，促成了一波又一波并日益加速的社会下层民众的反抗运动和上层各种形式的改革运动，并最终在20世纪初开始逐步汇聚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革命运动。站在这场运动前列的部分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的变革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未来的革命运动必定同时兼具政治、社会改造和民族解放的双重使命，它的目标就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种以独立、平等和尊严为其核心诉求的全新的对外关系，进而争取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

20世纪兴起的民族革命运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而展现了新的特点。中国共产党诞生本身就同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很多地区蓬勃兴起有直接的关系，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在亚洲广泛传播有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共的诞生和发展同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极为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密切相关，即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推行面貌一新的对华政策，裂解了列强在华的权势体系，缘起于中国下层社会和知识精英的反帝革命运动，终于得到一个大国真诚的同情与支持。“走俄国人的路”，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执行“联俄”政策，成为当时一大批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择。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选择对1949年以后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中共从诞生之日起便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将推翻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作为革命运动的奋斗目标之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等，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对外政策等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这种认识框架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各个

①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牛军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外交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

时期的战略和策略。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认为："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①]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从 20 年代到 30 年代中期，中共参加并参与领导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再到后来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建立了基本的对外关系格局。中共在这十余年里与国际社会的全部联系，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当然也得到了苏联的各种支持和援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法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②] 但 1940 年 1 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③]1941 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导致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④] 自 1942 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 年 5（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06、108 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53—254 页。

③ 毛泽东：《新民族主义论》，1940 年 11 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66—672 页。

④ 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 年 7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34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33—534 页。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①] 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②] 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不过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中共领导人相信，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③]

全面内战的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 1942 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包含的重要观点之一便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④] 不过它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 年 9 月，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⑤] 大约是从 1948 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⑥] 四个月后，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

①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 年 8 月 26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52 页。

②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 年 10 月 17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62 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1946 年 1 月 10 日，《新华日报》，1946 年 1 月 12 日；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1946 年 1 月 31 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第 120 页。

④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93—1194 页。

⑤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59—1260 页。

⑥ 《中央关于批转东北局关于学习南共问题决议的指示》，1948 年 8 月 11 日。

"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①]

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新国家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提出的"一边倒"方针也说明，他们开始考虑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②]

强调中国对外关系与中国革命运动之联系的重要性，还因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又同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从革命运动的领袖向国家领导人的转变密不可分，或者说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层面。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一套有关国际政治的理论观点、他们在革命时代对中国对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对新中国外交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关于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和坚持。任何一项对外政策原则能够有长期的生命力并得到公众的持久支持，必定是因为它同一国之国内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能够反映一国之基本的国内需求和理解。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和坚持，最初是同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联系在一起。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不久，即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中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特殊，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在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历史逻辑与观念逻辑相互影响并高度统一的发展进程，最终铸造了新中国外交的最主要和最坚定的指导原则。

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和坚持固然有其客观需求，同时也需要有其他条件。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同样提出在外交中要独立自主，但在现实中却难以贯彻、难以坚持。从近代历史看，晚清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列强有能力对中国内政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它们甚至能够直接利用在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纵横捭阖，从而达到操弄中国外交的目的。从中国内部看，不论是晚清政府，

---

①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

还是北洋政府，以至后来的国民政府，无一不是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在几乎所有那些矛盾纷争的背后，或明或暗地都可以看到列强假手其中的魅影。

中国共产党与当时中国所有那些政治集团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它有至今看来也是罕见的极为坚强的组织。中共的领导核心是由一批有着共同理想的政治精英所组成的，他们长期保持着高度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意志，甚至有着相同或类似的政治性格。因此，任何一个大国当时几乎都没有可能在中共内部找到它们可以利用的矛盾，以达到影响中共内外政策的目的。这一特点在 1940 年代初期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显得尤为突出和鲜明。

另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治组织曾经像中国共产党人那样如此坚忍不拔地顽强地深耕中国农村这片政治土地，从而获得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真诚和长期的支持与拥护。这片政治土地在那个时代蕴含着惊天动地的力量，同时又与中国现代政治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他们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史无前例的改造，将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连接起来，从而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没有这样深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直到今天都视为指针的“独立自主”原则，最终会成为一句空话。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即为前车之鉴。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曾经从国际上赢得了列强赋予的巨大合法性，它最终却由于失去了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而迅速土崩瓦解。

从更深的层面看，中国对外关系不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形态，以及今后可能会出现多么复杂的变化，它最终还是要回应中国、中华民族的基本需求和愿望。任何政治集团如果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不能从中国社会中获得政治合法性，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得到中国民众的基本支持，其对外政策都将是软弱无力和难以长久维持的。

其次，则是中国革命在最后阶段那种大规模群众和武装斗争的进程与形态，以及这种形态之深层反映的革命领袖对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认知与经验。毛泽东这一代中共领导人差不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他们几乎都走过一段从救国到革命，从学习西方到赞赏十月革命，并最终信奉共产主义的心路历程。他们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所加于中国人的耻辱，使他们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激进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结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那种任人宰割和欺凌的屈辱地位，以及摧毁造成中国这种地位的国际体系。这个国际体系的核心就是压迫和不平等。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的经验也在激励着他们。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君主立宪到五族共和，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系列的变革和革命呈加速度的发生和发展，社会思潮也在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中飞速变化。那个革命的时代造就了革命的思维方式和革命的激情。中国的政治精英越来越相信和追求激进的变革，并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毛泽东是他们中的典型。中国革命运动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荡涤旧世界一切污泥浊水的洪流，是史无前例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空前壮举，是一首无比壮丽的史诗。毛泽东相信这场革命不仅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中国，而且可以也应该创造出全新的中国外交，一举洗刷中国一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并进而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新型的国际秩序。可以说毛泽东这一代人在中国社会中造就了对革命的长期崇拜，其影响至大且久远。

总之，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它的特点和本质，对中国60年对外关系的影响至深且大。新的中国对外关系从其产生之日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实现中国革命运动的目标。时至今日，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仍然存在，包括革命的思维方式和革命运动的基本理论仍然在影响着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评价和诉求。不过在经历了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之后，很有必要审视中国革命运动的部分诉求。中国近代追求的主权独立、保持领土完整这些理念本身就是现当代国际体系的产物，甚至是这个体系赖以存在至今的核心理念。所以，追求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是不可能靠摧毁现当代国际体系来实现的，其过程最终必定是导致这个体系的改革、改善。中国人在实现中国革命运动的诉求过程中最终导致的是重新认识和修订中国革命运动的理念和理论本身，这正是历史之深层逻辑值得玩味之处。

二、中国内政与中国对外关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句话在外交研究领域几乎像公理一样，是不言而喻的。学术界对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研究，差不多都要涉及到该国内部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特征、该国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动、国家发展战略或国内一些重大政策的变动、国内不断出现的新的重要政治需求、由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问题引起的政治斗争，等等。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都会对该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说只有来自各种不同的国内政策与措施，并在该国国民的历史经历中占据核心地

位，才能阐释和主导该国有关的外交政策和重大外交事态的发展，从而形成重要和持久的影响力。

尽管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中，对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尤其是内政对外交的影响等的分析和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甚至不少研究成果显示了明显的无自觉，这主要表现为这方面的历史描述无条理、不清晰，这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则接近于零。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进程已经相当清楚地展示了中国内政对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贯彻始终的，它应该受到自觉的重视。由于中国内政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巨大影响，分析和阐述这种影响的过程、程度和独特的方式，应该成为分析和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逻辑框架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对中国内政对对外关系影响的研究，不论是实证性研究，还是方法论的探讨，都构成了这个领域中的一类关键性知识。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说，中国对外关系未来的发展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同内政纠缠在一起，有时甚至受到内政的决定性影响。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养成认知视角的自觉，是至关重要的。

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所谓内政基本上可以归为两个层次的因素：

第一个层次是比较直接的，内容大致包括：(1) 决策层内部在重大的政策问题上——包括对外政策和其他一些政策——的分歧和矛盾等；(2) 国内的发展战略或重大政策的转变，反映这些转变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等；(3) 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诸如媒体所造成的公众情绪变化，其他一些问题导致的社会氛围的变化，等等。这些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带动对外政策发生变化。中国对外关系60年的历史证明，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转变所产生的影响是最关键的。

近些年来，历史学家的大量研究表明，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访问莫斯科，为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奠定了基础，斯大林也从此决定，接纳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有关这次访问中一个不太被重视但十分重要的情况是，刘少奇在历时40多天的访问中，与斯大林会谈的次数并不多，他利用其余的时间参观访问了苏联的政府部门、职能机构和工矿企业，了解苏联国家管理和建设的各个领域，包括企业党组织的活动和作用。[①] 他回国时脑子里装了一套苏联的国家发展模式。后来的历史表明，中共领导人差不多就是根据苏联的模式建立了新国家。这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诞生便与社会主义国际体系全面接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教育、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从政策到体制，无一不是既

① 师哲的回忆详细描述了刘少奇在莫斯科的访问活动，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424页。

迅速又顺畅。显然，建国初期的外交“一边倒”同当时中共领导人选择的建国模式和发展道路有关，这个选择甚至有可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导致中苏同盟破裂和中国脱离苏联阵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斯大林去世后，中国不能再容忍这个体系中苏联与其他国家那种“父子”、“猫鼠”式的不平等关系。不过中苏关系破裂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当赫鲁晓夫试图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时，中国的发展道路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延伸。[①] 这也是导致后来的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它也是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场论战中，毛泽东那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逐步建构完成。中苏同盟破裂过程是中国内政与外交互动（也可以说是恶性循环）的一个经典案例。

1970 年代初中国决定打开对美关系，主要是由于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②] 但是，发展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与当时中国国内“文革”极端“左倾”的政策极不协调，这其实是制约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使谈判长达多年的重要因素之一。[③] 而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的忽视或缺乏研究，给相当多的中国人造成这样一种看法，即只要在战略安全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就足以维系与美国的关系。不过事实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只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却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在时间上也是基本同步的。[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协调，其标志性事件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这种协调的出现是以国家发展道路的巨大转变为基础和主要动力的，它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冷战后中国对外关系面临的困难要严重得多。1980 年代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也证明，中国之所以后来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决心退出美国与苏联两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竞争，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⑤] 当今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仍然在不断地证明上述结论。

第二个层次是同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有关的因素。从现代多民族

---

① 参阅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② 参阅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 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③ 参阅李捷：《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宫力、威廉·C. 柯比和罗伯特·S. 罗斯编：《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64—289 页。

④ 参阅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 章。

⑤ 参阅牛军：《告别冷战：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含义》，《历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

统一国家发展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的特殊阶段。如同 20 世纪的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兴民族国家发展一样，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在 1949 年以后面临着一些基本的问题。在中国任何政治力量、政党的存在和是否拥有合法性，都同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有关；这些政治力量、政党提出和推行的各种思想、各项政策，包括对外政策，也必须能够解决或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才具有持久性和指导意义。这些基本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主权与领土完整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它们不能受到侵犯和损害，或者不能让它们受到的威胁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国民普遍感到不安全，或者感到没有基本的发展前途。不论当今世界上有关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问题存在多少争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兴民族国家来说，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仍然是生存尤其是发展的起码条件。

其次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或统称为实现现代化。这也是新兴民族国家在当今世界上保持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具有典型意义，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对此问题有高度的共识。在经历了建国后多年的曲折后，当今的中国有两个强大的推动力，推动决策者集中精力于“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一个推动力是人们追求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另一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追求。这两个动力产生于中华民族近代的历史和当今的中国社会，基础极其深厚。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为现代化首先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是没有多大争议的原则。

第三是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二战后亚洲一些新兴民族国家长期存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严重任务。如越南通过十余年的战争，才在 1975 年实现了国家统一；朝鲜半岛现在还处于分裂状态，等等。维护国家统一问题对中国更为突出，也更为敏感，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以及面临着反分裂的严峻挑战。争取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同时反对各种分裂势力，以及各种被认为可能导致中国出现分裂内乱的政治意图、意识形态和活动，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得到中国公众广泛的支持和认同。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维护国家统一一直是政治治理的核心问题，也是一种“核心价值”。从历史上看，秦以后的中国一直是靠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来维护国家统一的，没有任何一种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可以用别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或者说是维护这个价值。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高难度的重要原因（今后有可能成为主要原因）。当今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种政治治理模式（它的建构当然不全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成了中国同一部分发达国家的所谓“结

构性矛盾”的一个根源。

第四是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与国家认同的形成。二战后所有新兴民族国家都必定要经历一个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过程，并在已建立的核心价值基础上，逐步形成相对牢固的国家认同，包括对国家特性和基本形象的认知、认可甚至欣赏，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基本制度的信任和信心。这是历史进程决定的，二战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冷战使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并经常在一些国家导致极其尖锐的政治斗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华民族同样面临社会核心价值建构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同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其影响巨大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今后完成现代国家核心价值的建构过程，必定会伴随着对外政策的讨论，伴随着如何认识中外关系的讨论，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很可能会比以往更强烈。

第五是执政集团的合法性问题。二战后所有新兴民族国家的执政者都面临合法性的挑战，这部分是因为这些执政集团最初得到支持是因为他们在革命阶段满足了公众对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独立的诉求。但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能否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必要的荣誉感，以及满足国民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日益强烈的要求，则成为对合法性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能否遵循大致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的正义程序，也取决于能否制定和有效地贯彻合理的国家战略和政策。在此前提下，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包括解决上述几个基本问题创造比较有利甚至是越来越有利的外部环境，是衡量当今中国外交成就的基本标准，是执政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最后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既是中国历史延续下来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独特的重大问题，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对外政策，今后可能影响会更突出。这类问题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如不同地区与中央的关系、不同地区对外部世界不同的依存程度、同中国周边不同地区形成的不同关系、受到性质和程度不同的外部影响、在不同的边疆地区也面临着不同类型的安全威胁，等等。它们反映到中国外交上，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需求，甚至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对外关系更全面的发展，以及地方国际化进程的深入，包括中国地区社会特别是边疆地区社会在同外部交往中不断发生变化，等等，变化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可能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更为重要和复杂的影响。[①]

---

① 关于中国“地方国际化”的研究可参阅上海外国语大学苏长河：《国际化与地方的全球联系：中国地方的国际化研究（1978—2008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

以上几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在根本上是为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服务的，是为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对外关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出现过特殊时期，但绝不可能长期与回应这些问题的基本需要背道而驰。换一个角度说，上述几个问题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理解对外政策问题的框架。执政者在其中思考和制定对外政策；公众依靠它衡量对外政策和提出诉求，研究者则可以通过它观察和分析对外政策。

三、国际环境及其与中国对外关系的互动

国际环境对中国对外关系有重大的影响，这是不需要更多论证的结论，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一些方面就是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做出的反应。但是，国际环境作为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包括哪些内容，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产生影响，以及在那些值得研究的重大事件中它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等等，都还是需要讨论和研究的，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仍大有丰富和深化的必要。

在最表层，国际环境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表现在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何认识那些变化并作出反应，制定或调整对外政策。从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历史进程看，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外部环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冷战时期，另一个是“后冷战”或冷战后时期。前一个时期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被简单地称为是美苏两极对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阵营的对抗决定着世界政治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走向。后一个时期在中国被称为是走向多极世界，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格局是“一超多强”，这种力量格局和多极化发展趋势支配着世界政治。当然两个时期只是大略的划分而已，随着近十几年来“全球史”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成果描述出一个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的世界图景。在每个时期都有远比所谓“两极世界”或“一超多强”、“多极化趋势”等复杂得多的内容，它们很可能同样在影响中国对外关系。

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同二战结束后不久爆发的冷战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美苏两国在中国都奉行既互相限制又互相妥协的政策，造成了独特且有利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外部条件。当时在中国出现的美苏互相遏制，国共一竞雄长的局面，使国共两党都有机会尽其所能地利用美苏的矛盾，争取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条件。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看起来显然更有智慧和谋略，当然首先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具有更坚实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美苏冷战既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外部条件，也是中共建国时不得不面对的主要外部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部分地就是为应付美苏对抗的局面而制定的。中共中央选择“一边倒”向苏联的对外政策塑造了后来十几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即站在苏联阵营一边，与美国对抗。这种对外关系格局的出现，除了前述理论观点和经验使然，也是中共当时在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中，针对美苏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态度做出的反应，是中共分别与美苏互动的结果。美苏同中共的关系的确有本质的区别：苏联是中共的支持者，不论这种支持达到何种程度和有何种复杂的特点；美国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对者。

1960 年代中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对外关系随之发生变化等，固然有其内政的原因，但也包含着对变动的外部环境做出反应。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美苏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的变化，苏联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变化，等等。

从美苏关系的变化看，60 年代末美苏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形成了战略均势，特别是核均势。这给美苏双方提出了重大的对外政策问题，即选择继续对抗，还是选择缓和。苏联选择了前者，美国则选择“缓和”。美苏关系的变化带动了欧洲和广大第三世界地区的形势变化。与此相联系，1960 年代末期中国直接面对的外部环境也出现了两个基本变化。一个是中国同苏联从盟友变成敌人，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严重挑战。中苏边界持续升高的紧张局势最终在 1969 年 3 月酿成了双方在中苏边界东段的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并在夏季蔓延到中苏边界的西段。此前不久，1968 年 8 月 21 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在促使中国大幅度改变对外政策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它推动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考虑苏联威胁的问题。10 月 31 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确认了苏联已经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的判断，这导致了后来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①]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 1960 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酝酿重大的调整。尼克松执政后不久，便决定采取措施缓和中美关系。美国的战略调整和有关调整对华政策的宣示和措施是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认识国际形势的重要国际因素。1969 年秋季，在初步稳定了中苏边界局势并大致判断清楚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方向之后，中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1968 年 10 月 31 日，《人民日报》，1968 年 11 月 1 日。

国领导人决心迈出缓和中美关系的步伐。[1]1972年2月，在经过艰苦的外交努力以后，尼克松终于实现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从而迈出了中美和解并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

在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和中美关系开始缓和的背景下，针对冷战中美苏战略态势的变化，中国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被称为是“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联合世界上一切主张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民族和各种政治力量，组成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国际统一战线，其中主要是反苏联的扩张政策。[2]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思想就包含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政策的思想。[3]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三个世界”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对美苏关系格局变化的反应。毛泽东使用这个概念并试图据此建立一套理论，目的主要还是回应世界政治中的另一个巨大变化，即二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历史性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国家力量蓬勃兴起，正成为世界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19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以及因中东石油输出国联合限制石油出口所造成的石油危机等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和判断。他们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就是要为中国在日益复杂的世界格局中界定位置，以及为相关的政策提供认识框架和理论支撑。[4]相比较而言，中国在这个时期对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重视的程度大大超过后30年，其原因需专文探讨。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巨大影响，学术界至今还缺乏深入的探讨，这需要弥补。

1990年代初，冷战以东欧剧变和苏联的突然解体而告结束，二战后世界政治的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也是1949年以来中国外部环境的最大变化。从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开始，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关注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当时中国面对的另一个直接和突出的问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全面制裁。这些

---

① 参阅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的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November 12, 1973, *FRUS*, 1969–1976, XVIII, 1973–1976, China，pp. 123–138，380–399. 另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③ 参阅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研究纲要》，萧延中主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④ 毛泽东:《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1970年7月11日;《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1974年2月22日；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7—588，600—601页。《邓小平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0日，《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变化是推动中国领导人提出“韬光养晦”政策的主要国际背景。

从冷战结束至今，国际形势虽然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苏联解体后所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国内，不断就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进行研究和讨论。特别是针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从 1990 年代中期到末期从未中断并日益深入，在 1999 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时甚至达到一个高潮。这些讨论的发生和持续本身就表明，国际环境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正日益深入，因为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变化，人们必然更加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其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

以上指出国际环境的变动及其与中国对外关系之间互动的重要影响，除了因为这是理解中国对外关系发展方面必须认识到的一个基本因素之外，还是因为它可以促成更有启发性的思考。在上述互动的过程中，中国人对世界国际政治潮流（有时被称为时代）的认识起着关键的作用。历史进程表明，决定中国外交成败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是首要条件），就是中国人对世界政治潮流的判断合理与否，包括全面认识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潮流的发展方向，合理判断它们在各个阶段上的影响和相互关系。世界政治潮流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是由几个大趋势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政治格局通常都是在它们的相互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来实现飞跃性发展。

二战结束至今虽然有冷战和后冷战两个时期，决定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潮流在本质上并无变化。这些主要潮流包括：（1）世界强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各自控制的军事集团的对抗与对峙；在后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一超多强之间复杂的合作、竞争与地缘政治对抗。（2）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其后果，即大批新独立的国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新兴力量，并在冷战后形成世界政治中一些新的力量中心。（3）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现代化潮流的快速扩展。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冷战结束后，现代化潮流的全球性愈显突出。（4）科学技术巨大跨越式的进步。它持续不断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包括改变大国政治的存在和发展方式。（5）意识形态斗争。在冷战时期比较集中地表现为美苏两国围绕两种社会制度和新兴国家现代化实现模式的激烈斗争，同时也存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思潮；冷战后则演变为“西化”与非西方思潮、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的争论与斗争。

中国对外关系 60 年的发展证明，中国外交与国际环境的互动曾经由于主观认知的历史局限性、片面性——忽视或过度强调世界政治潮流的某个方面——而受到

影响，甚至导致对外关系出现全局性的错误。以前30年为例，毛泽东比较重视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前途和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后来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突出任务。再如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认识，使毛泽东极为重视中国的国家安全，并在一个时期形成了同时同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局面。如果将毛泽东这些认识分开来看，都各有其根据。问题是他严重忽视甚至无视世界政治中的其他潮流，诸如忽视追求现代化的世界性潮流，以及忽视科学技术进步对世界政治越来越突出的影响，等等。结果导致对时代问题的认识长期摇摆，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以及出现缓和趋势的历史性原因，甚至夸大"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一度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提出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等等。[①] 这些认识和政策导致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致使中国一度陷入孤立。

改革开放以后，在总结前30年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平"与"发展"两个主题的思想，即在各种复杂的世界政治潮流相互影响和相互激荡中，"和平"与"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主要追求和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世界规模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不存在对中国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这一思想是基于对大国关系、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斗争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的长期思考和判断，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后经过多次争论和论证，在中国形成了高度的共识。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时时关注时代潮流的变化并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研究国际环境与中国外交的互动是由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决定的，这个历史性的命题可以简称为"中国与世界"。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160年来，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对外关系的走向和成败。这一古老命题演化至今，其核心部分就是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

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一命题之所以日显突出，最初是由冷战后中美关系变化引起的，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深层因素是中国与

①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

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这是由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中美各自在其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所处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也许正是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正形成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同时又不断遇到困难和麻烦，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谈论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与之相伴而生的诸如“与国际经济接轨”、“参与全球化进程”、“建设性融入”、“做负责任的大国”等等观点，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在此领域的思考及其达到的深度。[①]

“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无疑包括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主要与现存国际体系的一些主要特征联系在一起，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这个体系的主要规则是由它们主导制订的，当然也就更符合它们的利益，而且一些规则还在按照它们的愿望修改或调整。另一个更为深刻一些的因素则来自中国的内部，即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历史的进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道路固然给中国发展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不过这条发展道路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步显露出来的某些特点，同样也构成了目前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融合的内在限度。正是内外两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内部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完全认同现存国际体系注定经历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后才变成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自然展现了一些独特的面貌。

中国人对现当代国际体系的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延伸。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形成与对外关系联系紧密，中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同革命与冷战紧密相关，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塑造成型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中国人对现当代国际体系的态度。中国人对现代国际体系的认同大致起始于 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从那时起到今天，中国已经全面参与到包括全球的和地区的几乎所有国际组织。作为逐步走上认同现代国际体系道路的一个结果，各种国际组织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强，与各种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必定要大大超越传统论述中专注于双边关系、大国关系、战略关系等范畴，从全球史和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史等更广阔的视角，界定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领域和问题。

---

① 参阅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均见牛军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外交卷）。

结 论

以上概述了6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三条经线，也即是理解6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三条基本线索。本文的内容只能算是粗略地提出并界定了每条基本线索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在每一个方面都还需要更为深入和丰富的论述。尤为重要的是这三条线索是如何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以及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历史人物是如何有意或无意地回应这些经线中包含的历史性需求，并用他们的思考和个性给历史留下独特的烙印，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专门和深入的研究的，如此才有可能更为清晰地展示着三条经线之间的连接，中国对外关系也因此才是鲜活和引人入胜的。可以说这些专门和深入的研究在中国外交研究领域是特别缺乏的，这种缺乏正是造成宏观思考难以深入、结构探讨和方法少有创新的关键性原因。

（《外交评论》2010年第3期）